

萨空了 著



两年，  
在国民党集中营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目 录

一 被 捕 .....	( 1 )
二 最初的一个月 .....	( 11 )
三 抗议的结果 .....	( 23 )
四 罪 状 .....	( 35 )
五 狱中采访到的新闻 .....	( 40 )
六 迁入桂林调统室 .....	( 50 )
七 毕生难忘的一个月 .....	( 63 )
八 调统室中的人物 .....	( 77 )
九 由桂飞渝 .....	( 90 )
十 落发改装 .....	(100)
十一 训导团组织概况 .....	(110)
十二 入伍教育 .....	(116)
十三 学生的学生 .....	(124)
十四 集中营里的医药 .....	(135)
十五 女政治犯 .....	(147)
十六 团内的思想斗争 .....	(160)
十七 逃 亡 .....	(173)
十八 特工的凶残 .....	(186)
十九 我的出团交涉 .....	(202)
二十 在研究室 .....	(219)
二十一 获释前后 .....	(250)

## 一、被 捕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下午，我外出回家时，邻居宋之的和王萍夫妇交给我一封信，说是由乐群社的茶房送来的。他们还说，据茶房说，信是由两位苏联人交给他，让他找到我的地址送来的。

我接过信，心里暗暗吃惊，桂林的乐群社表面上是个普通旅店，实际上却是特务活动的场所。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住在“嵩庐”呢？

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两封信，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让我转交给当时广西省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邵荃麟，署名为皓。我看出这是周恩来的亲笔信，就立刻给邵荃麟送去了。回来时顺便到乐群社看望了那两位苏联人，他们是彼得洛夫和毕德尼亚阔夫。

当时，我正准备去云南昆明。由于桂系军人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做出了许多让步。军统、中统的特务在桂林这地方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我在桂林已成为特务注意的人物之一。为了避开危险，我和生活书店的朋友们已经说好，带两本书去昆明，一方面为书店作点事，另一方面也算是个掩护。

收到周恩来的信后，我感觉到出现了危险的信号。在桂林活

动的特务们一定会立刻知道苏联人给我带信来，甚至已经偷看到信的内容，这就会促使他们加快对我下毒手。于是我向生活书店借了两千块钱，打算快点离开桂林。

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许，我在桂林乐群社的门前，被两个特务（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隶属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绑架到一辆汽车上，送至桂林西北郊夹山的一个尼庵中，从此我便失掉了自由。

这一天下午我有两个约会，四点钟要访美国新闻处桂林分处处长裴克(G. Peck)，晚八时约定了见李任潮先生。上午就留在家里没有出门，直到过了正午才和郁风跟她的妹妹怡民同到嘉陵川菜馆去吃了三客客饭。饭后因为距赴四时的约会还早，又因为我们决定日内赴滇，郁风想买一件单衫在路上穿，就到乐群社对面的乐群拍卖行去看旧货。在那里我遇到了甫自重庆来的大公报的一个职员李福林，他说我有一个在渝的学生有话托他转达。郁风和怡民跟我约定在距这拍卖行约四五家铺面的另一拍卖行——安利行内等我，当我和李福林谈完了话才举步向那拍卖行走去时，便有一个人在身后喊：“萨先生，萨先生……”

回头看，是一个不认识的着西服的男子，并已走过来和我握手。最初的一刹那我还在感觉奇怪，自己的记忆素来不算太坏，为什么这个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方拟启齿问他的姓名，他却连忙说：

“有一件事不大明白，请去谈一谈！”

说时就要拉我登那已驶近我们，且开了车门的汽车。我立刻明白这是听说已久，料想可能发生的“特务绑架”已经到来了，我立刻答复他说：



“可以去，但请允许我通知一声在前面等我的朋友。”

“不必了！”这是他的回答。我本已转身要走，他拖我转来，他腰间的手枪早已被我发现，我知道争执没有什么意义，便在他的搀扶下，上了那辆汽车。汽车中先已坐了一个胖子，于是我被夹坐在当中，汽车就开动了。汽车开动后我看见裴克和新来桂不久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毕德尼亚阔夫上校在道旁边边走边谈，和我坐的汽车交臂而过，但他们都没有看见我，否则我相信至少裴克一定会立即感到奇怪，在汽车久已成为绝少数人的享用物的桂林，为什么我会忽然变成了“汽车阶级”！

汽车由乐群路转经太平路到桂林西路驶向桂林的闹市中心十字街，突然车中的胖子说：

“夹山可以去吗？”

“可以去。”汽车夫这样答复。

“那么开到夹山去！”

汽车立即在马路上掉头，经榕荫路沿丽君路驶向桂林的西郊。桂林西郊我太不熟悉了，只有在躲空袭时，我曾到过老君洞。一过老君洞，我就全不认识了。夹山这名词，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他们要把我劫持到一个什么地方，当时简直无从想象。

在汽车上他们两个人都默不作声，我以为不必使空气总是这么紧张，于是先开口，请问他们贵姓，两个人都不答复。我不禁说：“谈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才各说了一声，“我姓张”，“我姓余”。当然都是假的，不过我却由此可以继续和他们攀谈了。

“是什么人想和我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得到的答复是“你到了就知道了！”“谈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去！”

汽车愈走道旁愈荒凉，终于转入了一个山谷，看见道旁有兵把守。又驶行了约十分钟，汽车停到了一片松林的旁边，这里有了人家，是一座小洋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时广西省政府秘书长邱昌渭的住所。由此沿着一条小径，走进去，在高山的拱卫下，一片荒地上，有一所依山建筑的三开间两进的奇特木屋。说它奇特是因为它是在十几棵约两丈高的石柱的支撑下建成的扎绑木屋，它是一座凌空的危楼，我只在重庆的江边看见过类此的建筑，不过那些建筑的支柱都是长长的松杉，不象这里用一节节二三尺长的石柱结叠成近两丈的一根根的长石柱。所以看过第一眼之后，我就觉得这木屋实在比四川贫民住的以竹子为主要材料作成的扎绑房子更危险。更奇特的是这木屋的大门并不依照中国习惯开在正面而开在傍山的一端。最初也许是为了迷信风水，现在却适合了作囚牢的条件，只要有人守着大门，被囚的人除非是有由两丈高的地方跳下而不致受伤的训练，否则就没有了逃亡的可能。

最初我以为他们一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机关去审讯，不意竟把我带到这么一个荒僻的所在来。当我在两个人的监视下走向那大门时，我听见那木屋中有人在喊：“又送人来了，又送人来了。”

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灶，到第二进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庙宇的佛堂，可是四周已放满了两层的高架木床，成为一群兵士的宿舍。他们把我带进更里面的一间，这房里有三张床一个木台。特务请我坐在床上，然后给我介绍了一个二十多岁带少尉领章的军官说：“这是李队附！”

我就问他们：“谁要和我谈话？”

绑架我来的人说：“今夜你只好住在这里了，明天才能有人

来和你谈。”

“睡在什么地方呢？被褥也没有！”我问。

“可以睡在我的床上，用我的东西。”这是那个李队附的答复。

我知道我从此已失掉了自由，且可能由此失掉了生命：我知道过去有许多人曾这样在社会上永远失了踪。在这种情形下除了听任他们摆布之外，争执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也不再多说。

这时劫我来的另一特务似乎忽然又想到他还有任务未了，就对我说：

“对不起，我要搜搜你的身，看你身上有些什么？”

我从口袋中摸出来早晨放在身边的一千元国币，还有一张国民兵身份证和一份缓役证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把一千元还给了我，但把身份证和缓役证拿去了。他好象为了要安慰我，但也可以说是为了要掩饰他自己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安，在搜完身之后对我说：

“这没有什么的，只要写张悔过书就没有事了。你是有社会地位的，将来怕还不比我们的地位高得多！”

“你们是把我把当了共产党才绑来的吗？那你们就错了。”这是我的回答。

“不，我过去抓了许多共产党，他们也很镇定呢！这样吧，请你写个条子，我要到你的家里去看看你的书，我们由这里可以研究出来你的思想，同时我也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给带了来。”

“在这条子上我怎么写呢？我写自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回家？”

“你就写，有要事须即赴金城江，不及回家收拾行李，请将行

李衣物交来人带来，还有常看的书，也请一并交来。”

我依照他的话，写了一封信给郁风。写的是她的另外一个名字，为了减少特务对她的注意。我相信她一接到这封信，立刻可以想到我是失掉了自由，因为我决不会去金城江连回家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两个特务和那个李队附一同走了，我才有机会看看这间房和房里的许多人。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直是在人的包围中，有十几个兵，但也有几个穿中山服和便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是怎样的一种人，只好暂时不理睬他们。特务和李走出去，大家不再围着我，都改到屋外尺余宽的走廊上去目送他们沿着那低两丈的木屋旁小径向外走，我也跟着到那走廊上来眺望。

楼前最近的地方是一片菜圃，菜圃前有几间竹屋，驻有另一队士兵。竹屋前是拥有一个升旗台的操场，再远的地方为一片松林和杂树遮断，只能看见树顶上环抱着我们的奇形怪状的桂林式的山峰。

特务们沿小径没入了松林。一个青年搬了一条板凳过来，请我坐和我攀谈。他说：

“萨先生，你不记得我了吧？在欧阳予倩先生的家里，我和你一起吃过一次饭，我姓陈。”

我渐渐记起来，在约一年前，是在予倩家碰到过两个青年，予倩给我介绍，说是陈豹隐的孩子。那时他们都是光头，现在他蓄了头发，所以有点不认识了。

“真没想到您也会到这里来了！前几天在《半月文萃》上看见你写的《由兰州到迪化》一文，我还和这里的朋友谈到你。不想只几天——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卢老先生、黄先生、李先生、

黄医生，都是同难；还有班长和他的兄弟们。这是萨先生。”

我随着他的手指的指点，一一和他们点了头，于是同难的人就纷纷提出问题，问我今天被捕的经过。我简单地回答了几句，黄班长已在喊：

“来吃饭吧！”

大家都进房去拿自己的碗筷，陈也送了一份碗筷给我。这时不过四点半左右，我没有一点饿意，不想吃，陈坚劝我要吃一点，他说：“这里只是上午九时一餐，现在一餐，不吃，等一下就什么也没有得吃了！”

在佛龕前的空隙处放了两张台子。一张围满了士兵，站着吃。我们这一张台子是坐下来吃的，除了班长之外，就都是同难者。粗粝的米，只有一样菜，放在一个马口铁制的圆盒里。那菜我从来未看见过，吃到口里有点苦，且感到盐味不够。问陈，才知道这种菜叫“苦菜菜”，菜市上少有人卖，是广西野生的一种马的饲料。但这里所有的菜钱，却天天只好吃这么一种菜。

饭后因为这里的规例是谁也不能走出这座屋，大小便也要通知背了盒子炮的卫兵跟了去，只好大家聚在一起闲谈。由此我立即知道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广西省政府卫士队的夹山队部，这座屋原是一个乡下的尼庵，有四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即住在佛堂的后进。省府卫队所以派一班卫士住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尼庵后进接连着一个天然岩洞，省府为防空袭，把它作了贮藏档案的所在。后来省党部调统室发现了这里是一个囚人的好地方，于是就时时有政治犯送来交给卫兵和档案一起保管。

问同难的人到这里的时间，最久的是那个卢老先生，已经三年多；其次的是陈，已近一年；另外三个人最短，也在一个月以

上了。据说在我来的前几天，还放出去了一批人，其中有一个是女公务员。当她在时，大家就觉得更不方便了，她一个人占去了一间房，许多同难只好睡在地上。陈的弟弟和陈同时被捕，本同囚在这里，最近忽然把他转移到桂林皇城内的省府卫士队队部去。

“为什么要把你们分开呢？”我问。

这一问引出来了陈对每一个被送来的政治犯所要面对着的问题的叙述。他说：

“每一个人被捕之后，调统室照例派特务来迫你自承是共产党，并说如肯承认即可释放。有许多人为求释放遂胡乱承认，不料一承认跟着就来了更多的问题。先要交出来一个十个人的名单地址，据说这叫交出来自己所在的小组。于是他们根据这名单地址去逮捕，这叫粉碎共产党的组织网。以后还要立一个自首悔过书，找两个文官荐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的人，担保以后不再‘危害民国’。试问找人担保这样一个罪名，岂是容易！所以往往有人胡乱攀诬了自己十个朋友，立了自首悔过书之后，却以找不到保而仍被羁押；甚至什么手续都照办了，还是不放；这本是只凭特务是否高兴而决定的事，他不放你又有什么办法！我们被捉进来，就由先在此的同难把这一切告诉了我们，我们遂决定任他们怎样威迫，决不随便诬害朋友。自己既非共党，决不乱填自首悔过书，因此被关到现在。最近听说他们认为我们两兄弟在一起容易‘串供’，问不出来结果，就把我们分开了！”

他跟着又低声地告诉我：“那个姓李的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姓黄的医生也是才由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学生。都是在第一天就交了名单，立了自首悔过书。特务答应几天后就放他们，可是半个

多月已过去了，依然没有释放的消息。”

“那么李、黄都真是共产党了？”

“也不是。”

“那么他们怎么能交名单立自首悔过书，交的名单又是些什么人呢？”

“还不是照例的，为了出去，先承认了是共产党并愿立自首悔过书。到被迫交名单时，交不出，特务就来开导：‘你们没有加入过共党，交不出小组，你们参加过什么读书会、歌咏团吧？写那些同团同会的人就可以！’于是，许多无辜遂由此变了特务的对象。”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为了自救，竟不惜害人！”

“据他们说，他们填的名单都是确知已离开了广西的同学朋友，甚至是已死了的人！”

“特务组织是全国性的，离开了广西，被他们填入名单，不也很危险么？”

“是啊，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肯干这种事！”

太阳在我们的闲谈中早已没入山后。一个乡下女人到佛堂来上香，敲了一阵磬和鼓，卫士点起来光仅如豆的油盏，大家都在作睡觉的准备了。陈把里间房中的三张床之一指给我，说那就是李队附的床。我知道这里不会再象有电灯的桂林，在天黑之后，还有五六小时的夜生活，一定是依照乡间的古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遂和陈一同回到房里，上床就睡。

大半天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紧张，一切见闻都极陌生而奇特，使我没有一点思想的余地。等到躺在床上，又是素不习惯的别人的木板床，于是不自禁地思索起来，再也不能入睡了。

自己的心理，显然地不能适应这突变的环境。首先想到两个孩子和郁风，在我失踪后的惊慌，和传来消息后朋友们的惊慌。跟着想到自己的许多事业上的计划会由此遭受到的损害，于是希望早点恢复自由的愿望油然而生。但是陈下午告诉我的许多话，立即全部回到心上来，特务如果也希望我搞那一套交名单填自首悔过书的把戏时，我如何能够干？不能够干，今后孩子们如何生活，郁风……事业……一切的焦急，使自己在床上连躺也躺不住了。

佛堂后，隔着一段板壁，两个尼姑正在伴着木鱼合声诵经，更叫我难以入睡。一、二小时后，经声虽止，我又感到臭虫和跳蚤非常猖獗。没有灯，在黑暗中我都可以用手摸到它们在我身旁吸血，引起来全身的燥痒，于是几乎一个整夜全在辗转反侧中度过。



## 二、最初的一个月

我被捕后第二天的下午，来了一个自称姓王的江浙口音的人和我谈话。一开始他就问我的姓名和履历，我不禁地笑了说：

“如果你们连我的姓名履历都不清楚，凭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

他说：“不是全不知道，只是不见得正确。希望你能告诉我，并且最好是你自己写出来以免我向上级呈报时记错了反而不好。”

我觉得也许是我自己写出来关于自己的一切，要比给特务胡乱转述好些，遂同意了他的要求，向卫士们借来了笔墨，决定用文字答复他提出的问题。

首先他问我的履历，我简略地写了由北平到上海、香港、迪化、重庆，及重回香港，和港陷逃桂过程中所作过的一些工作。他看我写完，就说还应写曾参加过什么政党。我就写了：“从未参加任何政党。”他又问是不是包括共产党在内，我就又加了一个括弧，写明“包括共产党在内”。

跟着他又问我是不是对政府不满意。我问他在这个问题下，他希望我答复的中心是什么？他说只是问你是不满现政府，如

果不满，因为什么不满。我写：因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一向主张言论应有自由，言论无自由，等于为贪污张目。现政府对言论素采束缚政策，我根本反对这种政策！

他又问我对三民主义国民党有什么批评，我说我非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素无研究，自然不能胡乱批评。我的笔答也就到此为止，还签了名。以后我又和他谈了许多闲话，我告诉他自己在内国作记者已垂二十年，我看见了无数的政权起伏。我不喜欢卷入政海的漩涡，所以我始终想以记者终其身，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也是为此。我又告诉他今日政府中的某些部长、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的某些中委，许多都是我的旧同事，我深知他们这些人内心的苦闷。我最喜欢和他们谈最坦率的话，我并举某次和军委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李中襄闲谈的内容，告诉他：我以为一个政党没有健全的理论是不能从事政治斗争的。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注释，人异其词，党员作宣传，便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困难。再者党内不应有派，否则使人入党之后会有“升堂也未入室也”之感。还有政府组织不大入轨，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哪一个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经济部长翁文灏把辞呈送给行政院，蒋兼院长在一个星期后还没有看见，再送呈文到侍从室才能看到。所以也许应说侍从室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我记得李当时曾不自禁地叹息说：“这岂不等于把家政交给了门房代管！”我不禁也就说出来：“你已是国民党中很重要的干部了，为什么不建议改革？”他又先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一年能见到几次委员长啊！”

我举出这一切来，意在告诉他，人民对现政府不满，是有理由的，且是极普通的现象，也决非靠逮捕屠杀所能消灭。我并很

明白地告诉他：“我以为他们逮捕我，就是干了一桩极蠢的蠢事。我在新闻界中已混了快二十年，足迹走遍了全国，认识的人很多，谁也知道我是一个好说梗直话的毫无政党关系的记者。只以当局不喜欢我的直言，屡施压迫，我才于一年多以前离开重庆《新蜀报》到香港参加《光明报》。不幸香港沦陷，我虽知道国内当局为了办《光明报》比以前更加不喜欢我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留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所以我毅然重回桂林。过去在报馆中作总编辑，作主笔，要说话，为当局所不喜，遂改作经理，不料仍为当局所不喜。是以这次回桂，连经理也不想作而改为闭门著书。当局又忽派刘伯闵、程思远来坚邀赴渝。赴渝干什么呢？办报不可能，教书不可能，仍然只好闲住。那么在桂林住，生活所需，比在重庆便宜很多，我为什么要去重庆？大约就是为了拒绝赴渝，今天就逮捕了我。这件事对我的最大损害不过使我的两个女孩子无人负责教养，但对政府则将是一件喧腾中外的不民主的证例。我为政府设想，还是释放我比拘留我在这里更有利。

他静听我说完了这一片话后，没有表示意见，只说他将负责转达。在离开前他又和其他同难的人，除了卢老先生外，一一地谈了几句。最后告诉我：

“明天有一个比我重要的人会再来和你谈。”

我说：“欢迎，欢迎！”

到下午，又来了一个特务，给我送来了我自己用的被单、被褥、蚊帐、洗漱用具、替换衣服。由此我知道郁风和孩子们一定明白了我已被捕。被单不是我自己用的那一张，而是郁风用的一张。为什么她要换掉？曾叫我想了很久。

李队附不久也回来了，他指定佛堂中近门的一张高架床的

上铺为我睡觉的地方。下铺睡的是一个卫士。

由这一晚起我睡的比第一夜更坏，因为这张高架床的臭虫比李队附的床更多得多。

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所谓更重要的人，并没有来。又从许多同难者的口中知道，他们所谓有人来，一向是靠不住的。大家都劝我不要焦急，焦急也没有用，应该作长期住下来的打算。

我告诉他们我最惦记的是我的孩子，同时我心中还有一种不能吐露的焦灼，就是郁风的安全。那个姓王的特务和我谈话时，曾问过我一句：“郁风是不是共产党？”可见他们也很注意她。我相信在我被捕后，她一定要四出奔走，那就更要引起特务的注意，万一也把她逮捕了，一定和曾拘在这里的女政治犯一样，要吃更多的苦！

同难人中，陈是最关心我的一个。有一天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他就低声告诉我，叫我准备一封信。因为过不了一两天，他会有一个妹妹来看他，可以偷偷地把我的信带出去。再过一周，他的妹妹也许可以把我的女儿带来探望我。

我问他这里的规矩，是不是可以允许家属来探望？他说：“这很难说，有人来看，只要卫士不禁止就可以，但卫士是否禁止，却不一定。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在这一年中，每三个月卫士都要调一次防，每调一次防，对被囚禁的政治犯的方法都有出入。有的很宽厚，有的就很酷虐，这大约是要靠带那一队卫士来的队附的人性决定的。——现在的这个李队附就是最坏的一个！”

“李怎样坏法呢？”

“他没有一定的办法，一切凭他自己的喜怒来决定。有的人的家属来探望，他很慷慨地招待他们进来坐，长谈几小时都可

以；有的他就根本不许见面。”

“他的喜怒又靠什么决定呢？”

“——这很难说，大致如果是女人来探视，获得见面的机会要多一点！”

“那你怎样能断定这个星期你的家人来一定可以接见呢？”

“前几个星期都来过，都曾接见，这次想来不会有问题。”

这次谈话后我开始忙碌起来，而不再是长天只空空洞洞的玄想了。我要把我自己的遭遇都写出去，告诉关心我的人，我要写信出去要求广西当局释放。但是我写这些东西怎样能叫卫士们不注意我呢？几天来除了答复特务的询问外，我未动过一次笔，现在如果忽然伏案写起信来，自然要引起注意。我曾又和陈商酌这一点，他主张我公开宣布以后每天要用一部分时间来写作，并托卫士赴桂林市区时替我买笔墨纸张，这样以后我就可以长天伏案也没有人注意了。在这里，写作是允许的。

也就由于这件事的提示，我重新安排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在被捕后的一个星期之内，我仍然存着或者会由于朋友的奔走而被释放的侥幸心，所以对什么事都未作长期打算。一个星期来的失眠，已使我自己瘦了许多，陈知道这是我不能睡的结果。他说，臭虫跳蚤一定都是使我失眠的原因，就劝我把床拆开肃清一次隐匿在夹缝中的臭虫，同时晒一晒被褥也可以减少跳蚤。但是我总是一天推一天，不肯动手。他屡次说帮我作，我也总是推脱。到这时，我觉得我自己的仍存侥幸心是完全错误了，于是我决心把自己的生活整个调整过。我看见同难的人，每天早晨都是天一亮就起来随着卢老先生学打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也应当学习。

此外的时间，别人都是看书闲谈，我以为我应当真就用这个时间来写作。多少年来有许多材料自己都想写，只以没有时间放了手。现在一旦被逼休息下来，环境又可以写作，为什么我不写？于是我决定每天一定要写八小时。第一本书，我决定了写在未失自由前就答应了书店中的朋友要我写的《青年职业修养讲话》。希望靠这本书，能养成一些新社会中的干部，叫他们懂得科学管理，懂得组织在事业中的重要性，和在事业中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当然也希望我能由此仍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产分子，仍有收入，养自己的二女。

经过两天的构思，写全书的大纲，跟着就动手一章章地写起来。在写书的空隙里，也同时准备好了我要托人带出去的信。

我一共准备了五封信。一封信给两个孩子，一封信给郁风，一封信给梁漱溟先生，另外有两封信附在致梁先生的信里，请他转给李任潮先生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给黄的信中我指出来这种绑票式的逮捕，和拘留人在二十四小时以上不送法院的作法，都将是广西政治上的污点。我希望他能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如认为我有罪就该把我送交法院，如果无罪，应当立即释放。给任潮先生的信中，我只希望他如果可能时，给我一点帮助。因为我深知道当时他虽然是一个住在桂林的最高长官，可是他的实权，简直小到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

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我希望她们在下一个星期来看我；给郁风的信里，告诉她我最近一周的生活和今后对她的希望，并请她切实当心自己的安全。虽然我也很急切地想见她一面，但是我没有叫她跟孩子一道来看我，我怕那会对她不利。

信写好了之后，放在什么地方都感到不安全。怕被那李队附

发现,也不敢立即交给陈,怕在他那里被发现,更影响了他的安全。这种心情不是一个过来人,大致是不可能体会到的。

在星期日的上午,我终于把我的信都交给了陈,叮嘱他千万见机而作,如果没有机会交出去宁可不交,不要心急坏事。陈说他自己会处理一切,叫我放心!

这一天我虽和往常一样,坐在里间房的台子旁写文章,可是写不了十个字,我的心就失掉了宁静,再也写不下去了。到下午三时,陈跑过来偷偷地通知我,他家里的人已经来了,我偷偷地向那松林旁的小径望去,果然看见有三个妇女向这边走来。人的脸还看不清,可是我的心,似乎已跳起来抵住我的喉咙,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陈也装作没看见她们来,仍抱了一本书在看。那个李队附,恰巧不在家,于是陈的一家人一直就走了进来,卫士也未阻拦。陈给我介绍,一个是他的母亲,两个是她的妹妹。他的妹妹本是我大女儿的同学,她立刻认出了我。他的母亲也是知道我的,但是我不敢在这环境中表示和她们很熟,便由里房中跑出来,让他们一家人在里面谈话。我却找了那个站在门边,显然是监视陈的那个卫士闲扯,我希望由此减少他对陈的注意力,希望我的信能够安全交出去。

大约不到一小时,陈的家人走了,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里房中的一切动作,不过我不能断定我的信是否交出。等陈送她们走了以后,便偷偷地告诉我,信已交出去了,我的心才象一块石头由高空坠落在地面上一样,有了一种安全之感。

以后这一个星期,我虽仍然是依照预定计划来打发日子,可是我总感觉到这个星期的每一天都太长了。我恨不能立刻就到第二

个星期日。我想象那时我的孩子一定会来看我，也许郁风也会来，虽然我说了不叫她来，但她知道有见面的机会还会放过吗？假如她们来，卫士许不许我们谈话呢？可以谈，又谈什么？

我由陈的那里知道了许多她的妹妹转述的外面在我失踪后所引起的骚动情形，不禁又怕万一她们来看我会在半途中发生问题。因为她们来一定是只凭了陈的妹妹的转告，知道我在这里，并未得过什么人的允许；至于其他的同难者的家属来此探望，据说都是在省府卫士队总部得到过同意的。这样一想，我遂觉得也许她们根本不会来，她们来，一定要出毛病……

每天我虽然还是一样地写作八小时，可是所能写出来的成绩，减少了竟不只一半。每天虽然照样看书，然而一点也看不进去，书上报上，只看见一行行的黑线。

这样熬到星期五，我又想到，她们即使来了怕也不能痛快讲话，我还是应当写信，写出来我自己心中想告诉她们的一切，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孩子，一封信给郁风。

星期日到了，当然心情上更紧张，等了一天，结果竟没有人来。不只我的孩子没有来，连陈的家人也没有来。“是不是上星期日她们出去时，遇到人检查，发现了我写的信，因而出了问题？”这一新的不安，在我心上代替了上一周等人的焦灼。我怕为我影响了陈的家人，反是陈来安慰我说不会有这种事，因为他的母亲在桂林高级法院作书记官，想不会有问题。

狱中的日子，是任你如何焦急也没有用的。人类本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所以一个人被囚禁久了之后，他自然地就会不再焦急，而日子也就过得似乎快了。每天都是刻板的生活，写作写作，又是一个星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都忘了又到了星期日。



约在下午二时，我正写得很入神，忽然陈又跑来小声地说：“有人来了，——好得很，李队附不在家，——好象有你的孩子？”

我象在作梦一样，当我的大孩子苦茶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陈的两个妹妹同她一道来，她给我带来了不少吃的东西放在桌上，我们都不知道应当说什么话。一个卫士就站在门外，显然是因为我第一次有人来探视，他不知道应当不应当叫她见我，又是跟了陈的妹妹同来，更加叫他感到困惑。我立即打开她带来的糖食包分赠大家，同时也送给每一个没有出街的卫士。这一点小贿赂叫他们感到了不好意思，于是当值的卫士也站到了较远的走廊上去。隔着窗他虽仍可看见房内，可是到底有了遮栏，我们在室内遂有了作手脚的机会。我上周预写的信偷偷从椅子旁交了过去，于是我的心平静下来，问了苦茶许多关于生活上的问题。苦茶也告诉了我梁漱溟先生和其他朋友为我奔走但无结果的情形。我写给黄旭初、李任潮的信，据说也已转了去；同时我由她口中还知道郁风已离开了桂林去重庆。乍听到这个消息叫我很有点失望，因为我本希望能见她一面再叫她走，但一转念间，觉得她走了也对，万一为了一点感情上的依恋弄出来更不幸的结果，那我岂不更要痛苦得多！

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苦茶走了。我和她约定以后每星期日都要来看我，最好能叫由我在上海《立报》的时代起就和我在一起工作的陆蔚芳一同来，因为她比较熟识我的朋友，她来我可以当面跟她商讨，如何和朋友们筹笔钱，照顾我的两个孩子。

在这天之后，我的心就更安定下来了，同时，我们的环境也变得更安静了。那个姓黄的医生和姓李的师范学院的学生，大约是已满足了特务们的要求，都被放了出去。只剩下了那个姓黄的

省教厅的职员、卢老、陈跟我四个人。

黄和黄医生及姓李的师范学院学生是同一天被捕的，本也可以释放了，因为他已填过那张十个人的名单，只是不肯写自首悔过书。他说，他没加入过共产党，一填，倒象他真加入过了似的，所以拒填。也就为此，遂被留了下来。

至于那个卢老年纪已经是六十三岁，在年纪上，同难者中他为最老。他的名字叫炜昌，作过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足迹曾走遍了南洋。他为什么被捕，因为大家都比他后来，不甚了了。他是同难者中，不再希望恢复自由的一个，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来的时候还很有钱，困禁了三年之后，所有随身带的表、自来水笔、衣服都已卖光，作了自己的囚粮。现在残余的每一件的衣服都已到了一着手即破的腐朽程度，所用的白蚊帐已变成了灰黑色，但也不能再洗，破的地方不能再缝，也无布可补，只好用纸裱糊起来。棉被这时已是他仅有的值钱的财产，因为他来了之后，冬天夹山太冷，曾得到一个队附的帮忙，借到了一张公家的棉被，以后并未交还，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棉被收起来未用。到我来时，还用报纸很周密地包好悬挂在里间房的梁上，但也已在接洽出卖中了。他想卖给省教厅的黄，黄原本是一个人租住民居，被捕后，所居即无人负责。后来托释出的同难者去看过，已什么都被别人拿光。所以他如被释，势非买一棉被不可。卢卖出棉被，则希望能换买一些土布，作两条可以蔽体的短裤。如再有余，即用来补充补充营养。卢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所以无从希望得到他们的接济。

不过虽在这么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形下，这六十以上的老人的生存欲望，依然非常强烈。他长年不断地打拳，同时

他还有两三本外国人作的讲“维他命”常识的中文译本，不时地强迫我们看，唤起我们对食物营养的注意。大家在他的这种精神感召下，都觉得虽然失掉自由，甚至生死未卜，但趁机锻炼体魄，保爱自己的生命，以准备日后继续奋斗的壮志是不应消泯的。于是我们在囚饭之外决定了加菜，可是陈、卢、黄都非常困窘，我是唯一的尚有千元在身边的人，我就决定先用了它再说。这时的物价是三四十元一天也可以买到一些营养品，预计这笔钱约可用到一个月上下。

从此我的生活是真的安定下来了：学打拳由太极拳开始；写作，每天固定的可有三千字；监守者不禁止订阅报纸，我就订了一份桂林《大公报》，以保持自己不与世事脱节；有空时还给陈补习英文兼讲一点国文，助人也就等于自己进修。对于孩子的生活，因为自己能够写作就不怕养不活她们，已比较放心。郁风离开了桂林，就是安全的可能性已经增强，她是素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的人，当然不用我再多过问。为了求自己的感情能有寄托并能传送给她，我决定每周写一封信给她并希望每周也能收到她一封信。在我写给她第一封信中，我写了几句旧诗，叙述我被捕后的感想：

縲继非吾罪，屋陋睡转安，  
山拱如朝我，松挺象贞坚；  
世事愈难问，雄心未逊前，  
倚风一长啸，天地为之宽。

我想借此告诉她，在一切的折磨下，我仍能很达观。同时希望她能达观，并盼她能够等待我一年。一年后如我仍未恢复自由，那我就希望她忘掉我，而勇敢地生活下去。

这是我在囚禁中心情的第一度转变。由焦灼重归平静，时间是一个多月。可是在这一个月多的时间中，我自己都能由卢老所藏的一面镜子中看出来，我已瘦弱了许多。

### 三、抗议的结果

虽然说已能由焦灼重归于平静，事实上，这平静显然是勉强的。因此只要有机会，可以争取被释时，总不免想要尝试。

我在未被捕之前，曾有一度为了特务决定要逮捕新中国剧社的杜宣兄的问题，去托过桂林建设研究会常委陈劭先先生，请他向桂林省调统室方面代杜缓颊。在这次交涉中，我知道了桂调统室人事上的更动，由一个叫梁凤庭的人代替了过去任调统室主任的梁学玑。当我被捕一个多月后，夹山卫士调防，那个李队附调走，由一个姓莫的队附率了一班卫士来接防。我们由卢老那里晓得他是黄旭初的一个亲信，年已四十以上，再没有什么野心。他曾作过黄的卫队长，现在降为队附仍肯干下去，目的是混个一官半职，对他经商有些便利。人的脾气很好，也肯为人帮忙，因此教厅职员老黄，就想托他探听自己的释放有无可能。莫告诉他：“你写一封信给梁主任，我可以给你送去。”我由此就想到了陈劭老告诉我的那一段话，因而起了想和这位调统室主任谈谈的意思。于是我也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梁主任，告诉他，我在广西当局中熟人很不少，只是不认识他，很希望能认识认识，并盼能面谈一次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此外我还写了给省府主席黄旭初，省党部

书记长刘士衡的信，请梁代转，催促他们对我的问题迅予解决。如果永久是这样不审讯也不释放，他们就是连国民党自己颁布的训政时期约法也违反了！信写好交给了莫队附，请他到省党部调统室去领我们的囚粮代金时，代为转交。黄在这时也写好了一封信交莫代转给梁。

我托莫转这封信，也曾经过仔细的考虑。莫来代替那个李队附之后，我由莫那里知道了许多李的情形，证明了莫要比李好得多。莫公开告诉我，我的囚粮代金是由省党部调统室每月发八百余元。他看见我们每餐加菜，便主张我们和士兵分爨，他愿把代金全数交给我们自己支配。这在过去，那个李队附是一个字也不肯提的。李的办法是所有的囚粮代金都入了他的腰包。据一个卫士说，我被送到夹山来，照常例，根本李就不应当收，因为没有省府秘书长的条子，夹山卫士队实没有代省党部羁押人的义务。可是为了李贪图多收一个人可多领一个人的代金，而米菜则吃的是兄弟们的大锅饭，又不要他多出一个钱，所以他就收了，而连夜进城去报告。到此我才知道那天他把床让我的人情，内幕原来如此。虽然我不相信那卫士说的李如当日不收我，特务或者也许会放了我的说法，但我想至少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就把我安顿下来，则是事实。

还有李到省党部调统室去，喜欢把在囚的人的情形作些不必要的小报告，但回来对在囚的人，则不肯吐露关于调统室的一个字。莫则不然，他常常能把在囚的人，当作朋友一样看待，闲谈时甚至随便报告出来许多关于省府、党部的消息。我们遂都很喜欢和他谈天。在许多次晚饭后大家和他讨论广西问题的言论中，我证明了他有正义感，不满国民党势力侵入广西后所造成的一切局

面。比起以前那个李，一开口，就吹牛他是中央警校的学生，把上款题有他的名字，下款是他们自己署名的蒋介石和李济深的照片放在一个小木板上，表示他自己因为认识这两个人而非常重要的那种法西斯崇拜领袖狂的味道，显然有了云泥之别。为此，我才敢托他为我转信。

但这一次转信的结果，竟出人意外的产生了恶果。莫送了信去，第二天回来，脸上显出非常颓丧的神气，先把我给梁凤庭的信还给我，说省党部没有这么一个人。我一看那封信却是拆过的，我便问他，没有这个人，谁拆了我的信，我托交黄旭初、刘士衡的信又如何了？他说：“黄主席、刘书记长的信收下了，梁主任这封信他们拆开看了之后，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可怜这个老实人，在说这些话时，显然是内心非常不安，我不想再多问他，否则那对他简直是施以苦刑了。

在和我谈了之后，过了一刻，他又把省教厅的老黄叫了出去，在大门外谈了半天。黄回来，我发现他脸上的神气也变得非常不对了。陈问他，莫和他谈了些什么，他不作声，我们也就不再多问。第二天，莫又出街，老黄才告诉我们，我这次送信给梁凤庭惹出了问题。梁凤庭认为我所以知道是他在作调统室主任，一定是老黄泄露的。因为老黄过去在广西学生军中曾和梁一同作过工作，如不是他泄露的，我一定不会知道他这个人。他很不喜欢我知道他在作这种见不得人的工作，所以就迁怒于老黄。他叫莫警告黄，如再这样，将永远失掉了被释的机会，对于我呢，他告诉莫要加严对我的管制。

在第一次我的大女儿苦茶来看了我之后，每当星期日，她和陆蔚芳，有时还带了我的小女儿苦蔡，总要来看我一次。她们每次

来，都带给我许多朋友的消息，时局的内幕新闻，郁风的来信，新书，新杂志，此外还一定要送一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到了知道我快没钱的时候，就送来钱。同时也就带出去我给朋友的信，给郁风的信，和把我写好的稿件拿了出去卖。这些带来带去的東西，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带来的东西象新书、新杂志、新消息可以叫我和住在桂林时一样的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如何在运行着，郁风的信可以把我带到一个远远的梦里去，成为我工作之余的一个极好的安慰。她给我的，会等我十年乃至一生的诺言，就是她们带进来的。她们带来的吃的东西和书报是公开的，可是信件总是很秘密的，有时粘在一本厚书的封面或封底页里，有时甚至是埋在白糖中或夹在面包里。我给他们带出去的信，也常常贴在交还的书籍里。最初卫士们对带进来的东西还检查，后来因为大家一天比一天熟，他们这些出身农村的人，懂得了我们都是好人之后，在同情的意念下，检查遂只是打开一看便算了事，所以以后无论什么都可以带进带出了。

到莫为我们送信到调统室去之后的那个星期日，这些便利突然发生了变化。莫在早晨便出去了，这我们也不认为奇怪，他和那个李队附的习惯是不同的。李好动，天天要出去跑，有时跑到被囚禁的人家中去作些小敲诈；或者知道人家家中只有妇女，便上门去谈谈混些饮食，这些家属谁能不敷衍他？据说他甚至曾亲去邀请一个在囚的同难者的太太，问她为什么不来夹山看她的丈夫。莫却不是如此，他一周只偶尔有一两天出街，据说是为了生意，其余的时间全留在屋里，不是和大家闲谈就是拥被大睡。这一天他出去我还以为又是去作生意了，所以不以为异。到下午我的孩子和蔚芳来看我，忽然卫士阻止她们进来，只把送来的东西代我收



下。在她们和卫士争执为什么过去可以见面现在又忽然不可以的时候，我在里屋中听见了，走到门口问那卫士，才知道是莫队附临走时关照的，以后不许我的孩子再来看我。到现在我才明白莫今天是躲了出去，怕留在屋里，大家都难为情。为了不叫卫士为难，便嘱孩子和蔚芳回去，并嘱在下星期也不要来，除非经过朋友向当局交涉得到了许可。我也是怕再连累了她们。只在他们走时，我又说了一句，希望她们去托梁先生设法。

卢、黄、陈对这件事都以为莫太不对了，我却能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人。所以当他受了申斥，奉到新命令时，自然只有执行。我认为这并不是他不对，而是我自己的估计有了错误。我希望和特务讲人情、讲道理，想经过抗议获得自由，当然只有寻来更多的烦恼。所以当夜莫回来，他自己很有点忸怩之感，我却很大方地和平日一样地跟他谈笑，叫他一点也不感到白天那件事曾在我心上留下了任何痕迹。

由于这次教训，我懂得了不能和特务讲理；可是我失掉了和外面交通的便利，这代价在我实在是花得太大了。我下决心要再恢复和外面的交通。我先想在卫士身上设法，和陈商讨，他认为不妥，因为卫士中没有一个不是黄旭初的容县同乡，语言上已有隔阂；他们又都是文盲，思想上也没有同情我们的可能。要买通他们只有金钱一项，可是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于是只好放弃这一想法，再找第二个对象。我想到了一个每天中午一定到我们这里来叫卖烧饼油条的小贩。由于早晚饭的时间过长，我们中午自己补充一次“点心”已成了习惯，有时买这小贩的烧饼油条，有时就自己煮些糖粥。自从我决心想利用这小贩，便改变为每天一定买他的食物。买得成了习惯，他每天必来，大家也一天比一天熟识起来。

他是个山东人，在语言上他就先对我有一种亲近之感。我想造成便于私人和他谈话的环境，当买他的东西时，总是先和卫士说明，然后自己到大门外的石级下去买。这石级和大门口的距离是约两丈高矮，卫士看得见我的动作，可是我们的谈话，他们就不容易听得清了。尤其是我们讲北方话的时候，他们就更易弄清。天天如此，那些卫士中细心的还跟我到大门口看看，粗心的就连跟出大门口来看看也不愿了。

每天和这山东小贩闲谈几句，我已清楚了他的身世。他则以为我是一个住在乡间的省党部的官长。有时他还托我替他写家信。我觉得时机已熟，于是有一天，我就把先准备好的写给蔚芳的一封信，托他送到城里她的办公处去。我说：“天气太热，懒得进城，你是一定要回到城里去的，为我送这封信好吧？”于是除了买他的食物外我还另给了他五元作茶钱，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工作，并答应第二天给我送来回条，且在第二天真的做到了。不过我仍然不敢太相信他，我有时甚至神经过敏地想，这个人会不会是调统室故意派来试探我们的人呢？所以我托他转的信，总是谈生活上的问题，不谈其他。经过最初的几次试验，都是第二天我就能得到蔚芳的简单复函，我才敢把我再度想向黄旭初抗议的信送给蔚芳转托梁漱老送黄。我在信中说，即使我是待决之囚，也没有阻止我接见家人的理由，希望他答复为什么我应受到这种待遇。不过，这事我虽然做了，却还不敢告诉陈，卢、黄就更不敢了。在长久的恶劣环境的教训下，我已懂得，中国人的所谓“秘密”是什么。要秘密，首先就要自己对谁也不说，才能保守得住。

靠着这个交通我和外面提心吊胆地维系着联络。蔚芳对这个烧饼小贩曾屡次表示没有信心。有几次，他拿去了我的信不是当

天交到而是要迟到第二天，因为我由蔚芳的收条中每次都能知道她收到信的日期时间，就更增加了我的不安。同时蔚芳怕出问题，也不敢把外面想交给我的信经过他送来，只能用隐语告诉我一些简单消息，所以它实在只是一个半通半闭的交通线而已。我很想再建立另一个交通线，但是事实上太困难了！

正当我焦忧而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一天早晨新调来接替莫队附职务的黄队附，接到了经过邱昌渭家转来的卫士队黄队长的电话，说黄主席派了人来夹山看我，叫他准备接待。

莫走黄来，说明我在这不健全的交通中又已混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他们是三个月一调班。我的孩子不能再来看我这件事，发生在莫接班后不久的时候。新来的黄队附，是又不同于莫的另一种典型的人物。他走的是市井英雄的道路，讲义气，说了就算，不怕事，敢负责。抱的是“脑袋掉了，也不过碗口大小的疤痕”的人生观。只要你给他一顶高帽子，他就肯为你赴汤蹈火。这个人，当然比那个莫队附更容易相与。所以不几天，我和他关系已打得挺好。当他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即通知了我。我这时在长期失掉自由的修养中，已能作到不动心的地步了。“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又忽然想到了我？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事前任何揣想，既都毫无用处，反正要到来的不幸，在一个囚徒除了听任它来而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仍然根据自订的日程，吃过早饭后，续写我要写的文稿。

傍午的时候，一个到外面去闲逛的卫士匆忙跑了回来说：“来了，来了！”黄队附整了整军装，扣好风纪扣出去迎接。我隔窗望出去，原来是《广西日报》社的社长黎蒙，陪了一个不相识的人一同沿着小径走来。黎是我在二十六年由沪第一次到港时认识的朋

友，他那时在港办《珠江日报》，几年来往还很多。在我被捕之后，也曾有一次写了一封信交我的孩子带了出去找他，请他帮忙。一直没有消息，我已几乎忘了这件事。现在他来，是不是我写那信的结果呢？

我自己还未对自己作出来答案，黄队附已陪了他们走进来。在我和黎握手之后，他就给我介绍另一个人说：“这是梁秘书学玘，黄主任的机要秘书！”

跟着黎又对我说：“你写给主席的信他都看见了，不过你这件事是奉总裁电令办理的，他实在不能作主。奉行总裁电令后，主席曾打过四次电报去请示，问你这件事以后应当怎么办，都没有接到复电，所以只好请你耐心等一下。不过关于你的生活，主席非常关心，已嘱尽量改善。……”

在被捕之后，这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老朋友，我遂不能自禁地发了许多牢骚。我指出来没有罪状劫持我是违法；逮捕后不送法院是违法；禁止家属来探视，是不尽人情；不许家属来，即是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断绝经济来源，在生活上又不负责任为我安排好，是不是想把我折磨至死呢？……

我这一连串话，说的梁学玘固然无话可说，就是黎蒙也很难表示意见，只好再说几句安慰的话，告诉我：“主席最近也许要去重庆开会，他已经答应到重庆后一定向中央请示你这问题应如何解决，你耐心等一等好了。至于生活，回去一定请主席即下命令改善。”

一阵牢骚发过，我也感到了我这样对一个热心来看我的朋友是有点不对的，也就改变了口吻对他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我们谈话时，黄队附和那些卫士们一直是象看戏一样地在看

着。他们走后，我感觉到在卫士们的心中这一席谈很起了点作用，社长和机要秘书都是不小的官，我对他们这样不客气地谈，他们还是很客气地对待我，卫士们似乎下意识地泛起了对我要另眼看待的意念。

黎、梁去后不几天，一个晚上，黄队附从外面回来，由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已经喝了几杯酒，很得意地告诉我：“今天主席把我喊了上去，问你的生活情形，同时还有陈此生委员，黎社长也在主席那里。……陈此生委员我想你一定是很熟的，在我报告了你在大概情形后，他和黎社长都说应当改善你的生活。主席遂说了叫优待你，……叫给你买一张新床，伙食费要增加……我就下来了，这一切我都会为你去找党部，催他们办！”

在这天以后，我的囚徒生活真渐渐地改善了。我的女孩子们和蔚芳可以再来看我了，这就是很重要的改善，因为我又可以获得了外面的经济接济。蔚芳来且曾告诉我，有几个我过去的朋友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都写信给她，愿意每月每人赀资五百元来维持我和我的孩子的生活。同时我写的书，也找到了书业朋友肯用我的笔名代为出版。我在狱中想靠自己的笔生存的希望，已可如愿。我就决定叫蔚芳写信给赀资来帮助我的朋友，请他们以后不要再汇钱来。

又经过了黄队附半个月以上的奔走，调统室居然给他钱替我买来一具新的竹床。我自己又买来了四只粗瓷碗放在新竹床的四只脚下，在碗中贮满了清水，使臭虫没有能爬入这新床的可能，于是我的睡眠也入了常轨。

伙食代金，因为桂林粮价陡涨，这时党部也把它加到了每月一千二百余元。这倒并非对我特别优待，而是所有同难者都可以获得

同此数字的代金。事实上，如拿这笔钱到市场上去买米，也是除了买米之外，再谈不到买什么菜。我们为了叫那些副食费决不够买任何菜的卫士们也可以吃到一点菜，就把这笔款仍全数交给他们，每天我们只分吃一些他们的大锅饭，另外再由我自己买自己吃的菜。因为我们的食量有限，他们也很欢迎。由于我们对卫士的这种补贴，自然换来了许多好感。所以我们如果想买任何食物，卫士们遂都肯为我们设法去买，在乡间买不到的，就到城里去买。因此在吃的方面，只要我的经济来源不成问题，需要任何营养食物，都可如愿得到。

但在所有这些生活改善上，最叫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我们合力争到的每日晚饭后外出散步。我不相信这件事调统室会能同意，大半这只是黄队附个人独断的决定。

这件事的能够争取到，是由卢老发动的。他说过去只是他一个人在这里时，也是这个黄队附来值勤，就常常陪他一同到夹山村里去闲逛，或到村中小店去找老百姓谈天。这次他来，如果我们向他提出去村里散步的要求，也许他可以接受。在一个适合的机会里，我试着向他提出了这意见，他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即指派了一个班长，每天在晚饭后陪我们去散步。

当第一天我们得到这项散步的权利时，我真是快乐得不可言宣。几个月来只在一座木屋中转动，全然象一只飞鸟被困在一个鸟笼中一样。现在我们又能自由翱翔了，即使不能飞得太高太远，总比不能飞强了许多。

乍出去散步，我们还不好意思走得太远。那个班长每天都只把我们引到约半里外的一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中去，因为这是他们喜欢到的地方。村里有两三家杂货店，可以买到土糖果，花生

米，和劣质的三花酒。到这种地方，只要有一点点钱，他们不但可以得到一些食欲上的满足，另外还可以得到一点群的生活的温暖。因为这种小店都是家庭化的商店，买东西的人都有资格作这个家庭的上宾。买二两酒，一撮花生米，谈上半小时、一小时都是受欢迎的。最初对于这种商店我们也很感兴趣，但是天天去，未免有点厌烦。我和卢老又商酌是否可以改变个地方走走，他同意我的意见，就设法和那班长说明，于是我们走的地方又扩大了。

每天晚饭后都有两小时出去散步，走的地方在附近的三五里地里已没有什么限制，遂叫我有把夹山一带乡村都走遍了的机会。夹山是桂林一个风景区，我在被捕前并未听说过，但只凭被捕后直觉的观察，我已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了。一条小河曲迂地绕着这个小村流过，这就是桂林有名的桃花江，江流在两支山脉的当中。这地方所以叫夹山，就是为此。也就因而使它成为广西许多要人建筑避空袭的别墅所在。同时还有一个直隶军政部的兵工厂也设在这里。据说是因为这地方在两山夹缝中，敌机在天空中很不易发现。有了要人的住宅又有一个很大的兵工厂，为了保卫兵工厂又驻了很多的驻军，这个小村就平添了千数以上的居民。兵工厂沿着江的建筑迤邐足有四五里长，江边修有游泳用的浮台跳板，打篮球用的场地，简直形成了一个新村。这新村，以后就成为我们天天必去一次的地方。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几个人，后面一定跟有一个卫士，渐渐在这新村中，也成了众人注意的对象。我曾和卢老说笑话：“住夹山的人，不知道真相，也许以为我们是什么要人，在卫士的保护下来散步吧！”这话倒不是为自己解嘲，在我的心目中确实以为一个人如果重要起来而要防人民加害

他时，他的生活实在也和我们这些囚犯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的记忆中，盛世才在迪化的生活，总在一大群卫士的包围中，就和我在夹山作囚徒时差不多。

所以在回忆中，经过我自己向省府抗议，和朋友代我向黄旭初抗议之后的夹山，已不是一个只留有不愉快的记忆的地方了。



## 四、罪 状

被绑进夹山以后，我就时时在追询我的罪状是什么。我问过劫持我来夹山的两个特务；问过第二天来询问我许多问题的王某；黎蒙和梁学玠来，我也问过，都没有得到过答案。为什么省党部调统室就可以把我劫来夹山使我长期失掉自由？是不是根本就不管有无罪状，只要他们不喜欢谁，谁就会失掉自由呢？我想应当不至如此。但经多次追询都无结果之后，我遂不能不假定是如此了，再证诸许多同难者的叙述，也就更说明了我的推断相当正确。

卢老，我们相处的日子久了之后，据他自己说，他之被捕，只是为了他过去开罪过桂林的警察局长周某。周卸了警察局长职，他本一度有被释机会，后仍以周反对而作罢。

因为周卸职后仍任省府参议，怕放了他他会有报复之意，于是再拖下来。三年过去，结果周死了，恨他的虽已无人，可是肯挺身而出主张释放他的也没有人，于是他就成为被遗忘了的囚犯。他曾跟我说过，希望我能被释，然后由我去为他奔走奔走，他说张君劭是他的老朋友，如果告诉君劭，他大概肯来保他的。——卢老是一个自己说不出来罪状的人的印象，就由此在我心上造成。

陈是在桂林高中好好地读着书，突然来了两个特务，把他们两兄弟逮捕起来，叫他们自承是共产党。两个人不承认，经过欧阳予倩和白鹏飞担保也不肯放。他们的父亲陈豹隐在作蒋委员长的参事室参事，也不能护庇他们，也就不过问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到我被捕，他们两兄弟已被分囚在两地。在我被捕半年后，靠他们的母亲的奔走，得到邱昌渭的帮忙，结果还是送到衡阳去受训，据说还要训上三个月或半年才能释放，这是陈在离开夹山前告诉我的。如果能够如期被释，不是也已要被关快两年了么？他们的罪状又是什么？不也是一样地没有罪状？

至于教育厅的黄，是在教育厅办着公，忽然有特务到教厅来，喊他到主任秘书的面前，叫他 把 公 务 交 代 了 一 下，就 把 他 押 走 了。也 是 叫 他 承 认 是 共 产 党。他 不 肯 承 认，可 是 为 求 释 放，胡 乱 填 过 一 张 什 么 小 组 名 单。他 的 哥 哥，一 个 在 桂 南 某 县 作 承 审 的 人，为 了 他 的 问 题 已 回 到 桂 林，找 到 调 统 室 负 责 人，请 他 吃 酒，陪 他 打 牌，又 经 过 了 许 多 周 折，在 陈 未 走 前，先 放 了 出 去。放 出 去 一 个 多 月 后，他 又 回 到 夹 山 来 看 望 我 们 一 次，据 说 他 被 释 之 前 曾 被 带 到 调 统 室，着 实 地 威 吓 过 他 一 阵，叫 他 恢 复 自 由 后 仍 回 教 厅 工 作，不 准 离 职，否 则 将 对 他 更 不 利。他 的 罪 状 又 是 什 么 呢？尤 其 奇 怪 的 是 他 在 夹 山 被 囚 的 时 候，他 托 了 在 夹 山 当 值 的 黄 队 附 到 教 厅 去 领 他 的 薪 水，未 去 办 过 公 的 月 份 的 薪 水 居 然 仍 可 领 到，这 不 是 更 叫 人 莫 名 其 妙 么？

从许多同难的实例上，我既证明被囚并不需有什么罪状，我也就不再想这问题了。

不料就在我作出上述结论不久之后，忽然我收到了戏剧家、当时却在桂林编文艺刊物的熊佛西兄的一个条子，也是蔚芳和孩

子们给我送进来的。他报告我，张道藩到了桂林，他曾去看过他。因为他们是老朋友，所以他就向他提出来我的问题，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何以因在夹山不放。

佛西是我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书时的老同事，一转眼已过去了十多年。那时候张道藩才由国外回来不久。我还曾听说过，他也要到艺术学院来教书。现在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府的部长，CC的主要人物了。佛西向他问到我，就是为了他深知我不会有什么罪状，为什么一囚已快一年，既无释放的消息，也不交付审判，代我抱不平。

据佛西的通知，他居然从张道藩的口中探得了我的罪状。张说，我的被捕，是根据新疆的要求，并不是重庆当局的意思。他回重庆后当设法代我和新疆方面疏通，以求早日释放。并嘱佛西转告我，本应来夹山探视我，但革于环境，只好托佛西转为致意。

这话实在太怪了，我之被捕，广西当局明明说是奉国民党总裁电令办理的，为什么张道藩要推给新疆？即使是与新疆有关，政府为什么对新疆的要求，会奉命唯谨地照办？我和张道藩素无来往，又何劳他来探视？显然种种所谈不过是敷衍佛西的话而已。佛西素来天真，竟信以为真，甚至相信他疏通，我即可早日被释，所以连忙写信交给我的孩子来通知我。

我也在下一个星期日就答复了佛西一封信，告诉他张的话全不可信。我离开新疆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时隔三年，地隔万里，为什么新疆方面忽然又想到了我？不错，杜重远受了盛世才的诬陷在迪化失了自由，我是重远的好友，有可能也受到诬陷。不过一九四二年秋我还收到过盛世才给我的信，说：“香港沦陷后，得

知我兄安全回抵桂林，非常高兴，希望继续为国努力。”说这话不到一年，他会忽然又想到陷害我么？很难叫人相信天下竟有这种人。即使盛就是这样一种人，重庆当局似乎也不应当相信他的话，毫无凭证即入人于罪。

我虽然写信给佛西指出这一切，好象我真相信了他们是为了这个罪状逮捕我，所以我要和他们争辩。事实上，我心里并不相信当局逮捕我的原因，是为了新疆方面的问题；也不相信那两个特务劫持我时的说法，是误把我当作共产党才捉了来。我相信中统局早已确知我不是共产党，对新疆的任何诬陷，也不会相信。他们逮捕我，只是为了不喜欢我在桂林虽不作什么工作，但仍有许多社会活动，尤其是不喜欢外国记者经过桂林，多来找我这类事。根据法律，这当然不能构成罪状；可是象我所说的批评政府不应不给人民以言论自由的话，对当局在国际间的信誉是不利的，他们当然要把这种事当作重大的罪恶。逮捕之后，看看国内外舆论非常不满这件事，于是想至少应创造出来一个罪名以塞悠悠之口，于是捕我是新疆主动的说法就有计划地散布出来了。

就在佛西通知我这消息之后没有多久，我又从在重庆的朋友那里晓得了我这一罪状，甚至很正式地被当局提出来。据说：当局为了满足国际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比较民主一点”的舆论，遂采取了清末筹备立宪那一套办法。宣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时候，民主政团同盟的领袖们由黄任之、左舜生出面，向邵力子先生提出我这个人现在何处的询问。并问邵是由他负责办这件事呢，还是当他们在开大会时，正式提出来。邵立即阻止他们说：“不要因为小事情而把大事闹坏，请你们写封信来，我把它转给侍从室陈布雷先生，问问他，大约他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这是

宪政实施协进会要开第一次会以前的事。

黄、左两先生后来就照邵的意思写了信交邵转给陈布雷，不久收到了陈的答复，仍是邵转的。信中居然说了我的问题与新疆有关。据说左先生在看了这封信之后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这样说，那就是政府纵容军阀。”

左、黄两先生对我这件事的热心，目的当然并不是只在对我个人帮忙，而是把它当作一桩争民主的事作的。他们以为即说准备实施宪政，希望各党派都来参加，现在连起码的个人身体自由都无法保障，还有什么好说？

不管有什么理由，捕人不交司法机关，不公开审判，总不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所应有的事。质询我这件事只得到一个“莫须有”的“与新疆问题有关”的答案，所有在野党派的人士当时对所谓实施宪政诺言的真象，已看明白了大半。以后的参与开会，也就等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 五、狱中采访到的新闻

虽然说在狱中我自己把生活安排得很够紧张，但是仍然有许多时间闲谈。这种闲谈往往不是我情愿的。例如当值的队附由外面回来，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他为了客气，或者偶尔兴致好要和我攀谈，我就不可能拒绝；还有每天出去散步，也是一定要同难、班长、卫士这些人闲谈的时候。闲谈虽未经我排入自己的生活日程，可是实际上它已固定地占去了我的每日生活之一部。

这些闲谈倒也不是毫无收获的。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运用我自己的采访常识，往往能把毫无目的的闲谈引领上我所想到的题目上去。所以在狱中半年以后，我已在闲谈中很采访到了一些新闻，解开了许多在狱外时认为不易了然的疑团。

综合在狱中听到的许多消息，我得到了一个印象，就是在我被捕的这个时期，在广西就一般“自行失踪”的人讲，应说是一个幸运的时期。

特务势力的伸入广西，也经过很长期的斗争。最初是中央特务不公开地侵入广西，下一步才是中央和广西地方当局在特工工作上合作。我被捕时是在第二个阶段里，并且是第二个阶段里的一个新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期的产生，就是因为是在桂林发生了一个

惊人的事件，这事件我在被捕前即有所闻，但是不很详细。被捕后由同难者和卫士的口中相互印证，我才更多知道了一点它的真相。——这就是桂林逸仙中学三个教师自缢身死的事件。

这三个逸中的教师是一男二女，他们曾一同被捕。过了一个时期，又全放了出来。放出来没有几天就一同自缢身死。在狱外时我曾听说过这三个人是中共桂林的重要分子的传说。我被捕后才知道这三个人被捕后受刑甚重。据说他们因为受刑不过曾填了所谓交出小组的名单，所以特务才肯放了他们出去。后来据说特务认为所填的名单不真实，要再逮捕他们，遂造成了他们自杀的惨剧。另一个说法是他们因为填了名单自己感觉羞愧，所以自杀。总之这一桩自杀案，我到狱中后才确知是由特务逼出来的。以我的经验来判断，他们是否真的共产党也还是疑问。不过他们受了刑，很重的刑。这一材料对我很新，所以我就在卫士们的口中拼命搜集。

我曾问一个卫士，特务捉了人之后是不是都用刑？为什么我到夹山来所遇到的许多人，都是没受过刑的？

这个卫士告诉我他看见过特务打人，那是一个收容难童的机关，因为有一个难童逃亡，请特务代为追回。结果是真地抓了回来。那机关说这孩子偷去了一柄手枪，被捉回的难童不承认有此事，于是特务就把这孩子吊起来打。

“怎么吊呢？”我问。

“用绳子把双手倒背起，缚好，再吊起来。——他们打得那孩子死去活来好几次……”

“那孩子承认没承认他偷了手枪？”

“天！打，还能不承认么！……”

又从另一个班长那里我听到，桂林漓江东岸有名的龙隐岩，在过去就是省党部调统室拷打人的地方。夜里经过，一定可以听见鬼哭神号的怪叫。

“为什么在夹山的许多人都是没有挨过打的？”他们答复我这一问题时说，听说是因为那三个教师吊死之后，引起了桂林当局中某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不同意这种摧残人民的办法，他们说弄死的都是广西人民；广西的人材本就缺乏，现在再自己随便摧残，被摧残的又多是有才有志的青年，那广西还有什么希望？据此向省当局力争，于是刑讯遂停顿了一个时期。

甚至把许多人囚在省府卫士队部，有人也说这是省府控制省党部调统室的办法，因为这样省府才易于了解党部方面捉了一些什么人。

这些传说，到后来有许多都被我证实了是似是而非的话。不过说省政府省党部调统室间有矛盾则是事实。省党部的主委和省政府的主席，虽都是黄旭初，可是省党部下的调统室因为是中央所派的特务与广西所派的特务合组而成，中央特务时常自由地为所欲为，所以弄得广西当局必须另拨出一笔款来养另一批特务。于是在广西，遂形成了有中统特务、军统特务、广西特务三种特务力量的世界。过去我有些学生在广西省府中工作，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怕到我家里来看我，因为一来看我，就等于在几处地方挂了号，说他们认识我。我起初还以为是他们神经衰弱，疑神疑鬼，到夹山之后，我才明白他们所疑虑的全是事实。

在三种特务力量下的广西青年真是太苦了。广西大学在我被捕前曾有一次学潮，结果是学生在高压下屈服，学生会主席在事后没有了下落。他的下落也被我在夹山找到，那就是我到时他刚



刚离开这尼庵，但还是被押解逐出了广西省。

在夹山我还得到一个印象，是所谓特务逮捕共产党，在广西几乎都与过去“广西学生军”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作特务的，有许多是参加过广西学生军的，而被捕的所谓共产党，也多是参加过学生军的。陈氏兄弟两个，教厅的黄，都是学生军。而梁凤庭则是学生军的教官！这件事叫我想到了全中国特务集团中有许多留苏学生和共产党中也有许多留苏学生是一样的情形。这种现象，实在是政府当局左摇右摆的结果。所以中国许多青年所受的苦难实在都与当局自己摇摆不定的错误有关。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罪人，他们才真犯了不可宽恕的罪恶。可是他们却恬不知耻地硬说别人犯了罪，甚至下毒手去毁灭他人，借以掩饰自己的罪恶，我感到天下真是再没有比干这种事的人更无耻的了。

在夹山我也不是只能得到有关特务的新闻，还有许多大新闻，为一般有自由的人所不能知道的，我居然能够听到。我在夹山狱中时期，有两个大消息在报上并未详细刊载过，而我在这里面却知道得很清楚。一个是白崇禧为他的母亲大摆寿筵的消息，一个是蒋夫妇到桂林的消息。

前一个消息在报上刊载的地位异常的小，因为事实上他们既然办得很铺张，在报纸上他们就不愿意民众知道他们是很铺张了。但是我们夹山的卫士和队附，因为极接近省府的庶务工作人员，他们遂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因为办酒席叫桂林的海味鹅鸭鱼肉都起了十倍以上的价格，甚至派专人到桂林附近各县去采买鹅鸭；又如广西全省大小官员都送了些什么争奇斗艳的礼物；中央为了庆祝这位白太夫人的寿，派了何应钦作代表来致贺和他带来了多少随员；这些新闻都是每天由进城去过的卫士或队

附带回来说给我们听的。由筹备到大典举行的那两天，新闻达到了高潮，连夹山的卫士都被动员了一部分去参加警戒。他们回来，就带来了更多的琐屑有趣的报告。象谁来致敬闹了笑话，以及来致敬的人根本连所敬的人都看不见，只分设了几个礼堂，任人向照片鞠躬之类。高潮过后，我就又听到对这一次大摆寿筵的清算。过去象这类大典，广西也常有，不过没有象这一次叫广西当局如此地着过急，象这次用了若干万的巨款，真是连省库中的每一张票子都动用了，还是不够。幸而是中央送了一笔若干万的厚礼才能敷衍过去。广西的财源都叫中央掌握了去，广西象白老总也不能不靠中央给钱才能办寿。和我讲这话的队附，言下也颇有“感慨系之”的样子，这就更不是我在夹山以外所能体验到的感情了。

至于蒋夫妇到桂的消息，依据近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宣部的办法，是他们到任何地方的时候，不只事前决不发表，就是当他们到达之后也还不发表，一定要等到走后，才肯发表。有的时候甚至走了之后，也不肯发表。如果后世只以报纸为凭来考证，甚至连蒋夫妇曾在某年某月到过某一地方的事实，都会认为不可信。但当我在夹山的时候这种消息封锁对我这个囚徒却失掉了效用。还在蒋夫妇未到之前，我就听见队附告诉我，说好象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人要来，这两天省府已在派人修整北门外观音阁的一个官邸作住所了。这地方过去是说给蒋委员长作行辕的，一向有中央宪兵在驻扎，我想也许是蒋委员长要来。

又过了几天忽然队附由外面回来说，“蒋委员长和夫人已经来了。不得了，只是为随员买枕头已买掉了几百万，而且买到的还是不称心的货呢！”

这以后，就又有委员长今天在哪里训话；在哪里宴会；预定

了去看西南戏剧展览的演出，结果又未去；明天决定去衡阳几天就回来，夫人不跟了去；种种消息连续着传来。但是报纸上竟一个字也没有。在蒋委员长由衡山回来飞回了重庆，桂林报上才发表了一个消息，说蒋夫人曾到桂林慰劳美国空军将士。这倒是一件事实，可是她并不是专为慰劳空军而来，但是报纸上却再不敢多提了。

这种在狱中反比外面消息灵通的事实，最初也叫我有点相信了那个“省府要把政治犯关在卫士队队部是含有保护意义”的说法。因为依照我的想法，一个囚政治犯的地方，应当是戒备得非常森严，不应当这样马马虎虎。可是到后来我被迁移过几个囚禁我的地方之后，才渐渐明白，那倒不是在什么地方就好，或对某些人特别优待的问题，而根本是一个官僚机构的问题。因为是官僚机构，所以就是办一个囚政治犯的地方也不会改变官僚主义的作风。一个机关弄起来，在最初或者还有人过问一下，时间一久，这个机关可能变得与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再去管它。上面不管，下面的人也就一切率由旧章不敢多事。象卢老，明明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囚犯，可是谁也不敢去和黄旭初说一声，说有这样一个人还关押在夹山，请问应否释放。再如为了卢老所有的衣服都朽烂了，我曾和几个队附说过，政府要囚禁一个人，也应负起来责任。蔽体的衣服至少要给他，现在谁也不管，难道叫他有一天真的过裸体生活？这话说了一点也没有用，即使有责任心的当值队附把这话报告了上去，可是他的上级一不理就没有了下文。卢老说，有一次他病到自己都以为没有什么希望了，盼能找一个医生来看看病，都是一两个星期交涉不出来结果。到后来他的病自己完全好了，这时才来了一个中医和他闲谈了一阵。什么事都是拖，不负责，到处都是官僚主义，所以中国的监狱也就成为一

种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的监狱。大家明白了这个，对在监狱里可以采访新闻的事，也就不会认为奇怪了。

此外在夹山我也还曾采访到了许多有关民生疾苦的新闻：

我住的尼庵，原是私产，省府硬占去了它的佛堂和一间方丈住屋来住卫士队，庵中的老尼都欣然接受了。她以为省府卫士队总比较可以讲理，有他们住进来，也可减少对外人的欺压。后来省府为了想再多要尼庵一间房存放武器，老尼不肯。省府允对这间房付二十元一月的房租，她才勉强答应。但是经过几年，二十元已不够买二斤青菜的时候，这租金也未增加过，且不能按月领到。更可怜的是她也没有得到卫士的保护而少受一点欺侮。

我亲眼看见的两件事叫我至今难忘，一桩是庵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尼，突然死去。她确实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个生活到“厌倦了生活”才死的人。她因为嫁了一个看见她就要打她的丈夫便出了家，到尼庵住了三十多年。资格虽老可是没有能力，所以始终不能在庵中取得一个较好的地位，只是牧了大半辈子的牛。我听她跟我说过不只一次，“死了就算了，但是总不死！”不料到她真死了，还惹出了麻烦。她死后，庵中的住持，另一老尼，想把她葬在庵旁一个高坡上。这高坡的土地所有权本是属于这尼庵的，夹山有了兵工厂后便被列为禁区，立了一段篱笆，不许民众入内。可是这片土地也并未根据法令征用，给尼庵以应得的金钱。尼庵在最初对此曾提出抗议，兵工厂说可以允许他们白天进篱笆去种植，只是夜晚不许走进。她们也就抱息事宁人的心理，苟安下来。现在她们要葬这老尼的棺木到篱笆内的高坡上时，兵工厂的守卫却不许她们把棺木抬进去。问他们有什么理由，他们说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不许。住持老尼在棺材旁呼天抢

地地哭诉，他们也不允许。我虽然是一个囚徒也再忍耐不住了，我主张她到兵工厂去质问，我说动了省府的卫士们，支持住持老尼，反对那些兵工厂卫士的蛮不讲理。经过了两天的交涉，才算勉强许她们下了葬，但是不许烧纸钱和放爆竹，说是怕引起火灾。事实上那里是一片荒野，有什么可烧？不过是多给老尼们心上增加一些不快而已。

另一桩事是这庵中女尼的生活，本来靠了这尼庵拥有二三十亩田地。她们在过去是把它佃出去，坐收每年的收获。抗战后征实征购在广西实行。这几亩薄田佃出去的收入，已养不活她们几个人。恰巧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因为不愿意顺从她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地主作妾的命令，逃来请求收容，她们就收容了她。因为她体力强壮，遂决定把田地收回来，自己耕种。我被捕时，据卢老说这小女尼已来了一年多。她也再不是一个强壮的青年妇女，而是惨白的，瘦弱的，近乎中年妇女样子的人了。卢老告诉我，他曾有许多次想劝她结婚：一个卫士也好，一个乡农也好，都比为老尼们作牛马强。长年茹素没有一点营养，身体安能不日就颓衰！可是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在封建的社会中，这种劝说，虽出自六十岁以上的卢老，也不能担保不发生纠纷。

我亲眼看见她每天黎明即出，起来便携了农具去下田操作，直到中午才回来吃点东西，吃后再出去操作，直到天黑才回来。晚饭后还要为了赚少量的钱，缝鞋底缝到午夜。全庵中的人都靠了她一个的劳动生存，可是她仍然要常常挨住持老尼的责骂。

犁田，下种，插秧，除草，灌田，收割，我都看见她一个人蹒跚地独来独去，把这所有的工作肩负了下来。在农隙时，她还要种菜，卖菜，斩柴，拾粪，舂米，担水。

也就因为亲眼看见她操劳得如此之苦，当我们听到她种的菜常常被人偷去时，不自禁地变为非常愤怒。

偷菜的又是那些兵工厂的卫兵。是在深夜偷去，预备第二天佐餐。她发现后总是叫骂一阵，但第二夜就偷得更凶。甚至有一次在清晨，尼庵住持的一个亲戚的小孩子，因为来看住持，留住庵内，早起去厕所，看见卫兵偷菜，就喊起来。那些卫兵竟敢把那个孩子大打一顿。

我们知道那些卫兵，也是可怜的，他们的副食费决买不起菜；但偷菜而打人，则无论如何超出了可被原谅的范围。……

但是这类事应当怎样解决呢？自然我又想到了总的问题。政治不入轨，这些事将会无穷尽地产生，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争到头破血出，还不知道是谁害得他们同室操戈。想到这里，我只站在女尼一方面看而产生的愤怒，就自然地平息了。

离开尼庵，我常散步的兵工厂那个环境，也供给了我许多民生疾苦的报道。

在僻陋的山村里，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但还有空闲的时间，作点什么呢？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工余的教育与娱乐，于是一个赌场就在这环境里应求而产生。监视我们的省府卫士中也有不少去赌的赌客，赌场的新闻也就传到我们耳中来。

据说这个赌场是在一个营长包庇之下的，他每天坐收八百元的彩钱。因此，专以骗取工人的金钱为目的的赌场，就在夹山明目张胆地建立起来。过去为了风声愈传愈远，桂林警察局曾派警察来抄赌一次，结果是引起了一场战事。兵工厂卫士在营长指挥下开火，说警察冲入警卫区事前没有通知，赌场和赌徒却逃掉了被抄到的机会。这场战争是以“误会”二字了结，赌场则仍能在包庇下

存在。

只由夹山卫士赌输到卖军服，向我们这些囚徒半借半勒索的要钱，就可以知道那赌场害人之深了。至于工场工友的因赌而互殴，而作出来种种违法的事，更是常常听到。这是谁害的他们？谁促使他们作出这类事来，不是很显明吗？

还有当下午五时我们散步到工厂一带时，如果那一天是工厂发薪，我们立即可以发觉。因为这天的夹山街上是显然和往常两样的，卖杂货的小摊，比平常要收得晚，道旁也有人候在那里，都是为了收帐。也就在这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许多工人的叹息：“一还帐只剩下了几块钱，明天不晓得应当怎样过！”所穿的都是几乎仅能蔽体的破旧衣服，这些大半是有家属的。他们虽然说是职业，可是显然是在半饥寒的情形下活着。每当看到这种景象时，我总是想，大约他们都在怨自己的命运不好，而不知道在操纵着他们的命运的，竟是活在这现实世界中的一群法西斯恶魔。

夹山的一年多囚徒生活，我说采访到许多新闻，其实还是不对的。我应当说，我更深入到了民众群中，和士兵、乡民、工人生活到一起，又学到许多学问，长了许多见识。也更证明了我们要争的民主，对今日的中国，是起死回生的良药。再没有民主，中国这个国家实已走近整个溃灭的边缘了。

## 六、迁入桂林调统室

被捕到夹山，不几天就过端午节，跟着就过中秋、新历新年、旧历新年，一转眼竟又是端午节了。我初到夹山时的焦躁到快满一年时，渐渐地重新爬上心来。

在这一年中，挥着汗，熬着严寒，我都能伏案疾书，至少每天写三千字。我写了《青年职业修养讲话》、《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由香港到新疆》、《科学的艺术概论》和一个中篇小说《懦夫》；编译了《宣传心理研究》；译了《一个民主的斗士——公民：汤·潘恩》的节本和《窦德大使日记》。《窦德大使日记》是一本三十万字的书，我也鼓起勇气来，决心要把它译完。

我永远不会忘掉的是这一个冬天，我用一个不到两寸高的鹰牌炼乳罐头小桶作油壶，用线搓成灯芯，凑成了一盏最原始的光仅如豆的灯。这豆灯在撼得全楼震颤的狂风下，几乎很难燃着。我把一本洋装书打开立在它的旁边，作了避风的屏障，才勉强借着了它的光写下去。手脚都冻得僵痛，甚至溃烂，我仍不肯停止工作。我要更坚强地活下去，我更不愿接受别人给我的帮助，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叫自己和两个孩子生活下去。

我想得到我随时都可以死。不说刽子手的屠杀，只就我们住



的那座木屋讲，卢老就说过，随时它都可能被狂风吹倒，叫我们都葬身其中。这话一点都不夸张，那木屋早已向右倾斜，只靠了两根松木支撑着，每遇狂风，全屋的接榫处都唧唧作响。更不幸的是这木屋建筑的所在，正是一个当风的山谷谷底，风由它处吹来，到此撞到山上，又复卷回，所以它受到的风的袭击，要比附近任何一所房屋都大。

午夜把预定的工作完成，揉揉倦眼，走到房外的走廊上；因为在走廊下放有一个尿桶，夜间囚徒可以在此小便，而不必再叫卫士跟了到屋旁的厕所里去，所以我在午夜还有自由可以走出来。这时值夜的卫士，大半是抱了一柄盒子炮守着大门打盹。

外面的冷风，叫我的头脑象洗过了一次似地感到清新。满天的星斗，远远地传来的打木梆子的声音，给我一种启示，好象我才从梦中醒觉。在这时候，我曾不只一次地想到，我是不是应当就这样在这夹山等待下去。

“我在等待什么？”对这个问题我自己都不能答复。等待他们释放我或杀掉我么？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争取主动？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拘禁我，我竟驯服地任他们拘禁，这岂是我应有的态度？

外面有无穷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作；有孩子在等待着我教养；还有一个人，在等待我想完成一个我们共同设计过的美丽的人生的梦。

想到这一切时，我总是决定再不能这样忍耐下去了，于是一切逃走计划全都想到。我相信在夜里只要能设法跳到三丈下的地面而不惊醒这些卫士，那么我就可以跑到火车站，搭车离开桂林。离开桂林之后，再想抓到我就很难了。

根据这种想法，我且曾写信出去征询朋友们的同意和郁风的同意。在这一年中我总是保持着每周写给郁风一封信，可是她的信则是一个月才有一封。我知道她离桂后就到了重庆，到重庆后又随了徐悲鸿他们一个团体到成都上青城写生。我有许多信写到重庆她都没有看到。等到知道她到了成都，再写信去成都，这些信反先到了她的手中。在青城山她曾写了许多长的信到桂林，讲到她的生活和以后的计划。我知道她虽然在很强地说她生活得很好，实际上她一定很痛苦。所以在我知道她预备在成都住一个时期，再到嘉定一带四川的小城市去跑一跑，然后就去昆明时，我立即写信告诉她，我赞成她去昆明，并决定我也逃到昆明去。那时，昆明在政治上比重庆所完全控制了省份多少还有点自由。我相信到昆明隐居一个时期，也许还可以再设法溜到国外。

不过这种想法，并非全无矛盾。有时我也想，这种逃走的方式是我所不愿意采取的。我一逃亡，倒象我真有什么罪状了。我不逃走，在政治上对捕我的人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因此我似乎不应当逃。还有我如逃走而逃不脱，过去他们没有处置我的借口，这一下却为他们找到借口了。被捉回一定凶多吉少，所以是否真能逃得脱，也应考虑。

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我收到的外面朋友的信和郁风的信，都不主张我出此下策。朋友们是有一篇大道理，以为为了我的安全和强调政治上重庆当局应负的责任，都不应该产生逃走的意念；郁则更强调我的安全，并劝我不要为了她太心急，我才又耐心捱下去。

这时候已是一九四四年的春末夏初，敌人想打通湘桂路的企图已很明显。我知道桂林要沦入敌手的可能已非常之大，有一次

我曾和卢老讲笑话说：“也许我们被释放之期已不太远了。敌人来了，桂当局还能带了我们逃难么？”根据这个认识，我计划着叫我的孩子在这个暑假中转到贵阳去上学，又写信给郁风在砵石东吴大学读书的妹妹，快点回桂准备赴渝，以免被敌人给隔留在完全没有人照顾她的广东。

事实证明我的推想非常正确。敌人的进攻果然一天比一天激烈。桂省府已在作它迁准备的消息，我也已经由卫士口中听到。这是五月初，突然有一天下午有两个人来访我，没有姓名，当然是特务不成问题。寒暄之后，我问他们的来意，他们说：

“奉命来请萨先生搬个地方。”

我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我说：

“我不能搬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还知道有一个黄旭初对我负责，因为我是被幽囚在他的省府卫士队队部中。现在又来叫我搬，是谁叫我搬？搬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搬？这一切都没有弄明白之前我决不搬。过去糊里糊涂把我抓了来，一关就是一年，没有审讯，也没有罪状宣布，这已够滑稽的了，不要再搞更多的滑稽把戏吧！”

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面面相觑了片刻，然后其中的一个人说：“就是黄主席要请你搬一搬！”

我就问他有什么凭证，是不是黄自己有亲笔的手令？我认识他的字，可以拿给我看。

他们拿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这些把戏不要再和我耍了。“比如你们两个人就没有真姓名，我问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在什么机关工作？你们不会说；如果说出来，也是假的。你们这些人根本就谈不到人格，也从不讲真话，叫我如何能信任你们！”

他们看这情形同我谈完全不会有结果，就退出去，拉了当时第二度回到夹山来值勤的黄队附，到外边去谈。

这时候是下午两点，我未译完的《窦德大使日记》正摊在室内唯一的小桌上。我坐下来，象这件事未发生一样，又开始做我的工作。卢老溜进来说：“你还是准备准备吧，也许他们非拉你走不可呢！”我说：“不，我一定不走。”他说：“另一方面的准备也应该有啊！”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来整理我的皮箱。这箱子是当我被囚约六个月时特务给我送来的。因为我在和郁风通了许多信之后，她偶然提到在她离开桂林时，曾把我们在一起买的我的一套沙士坚西服，和她为我剪裁好但未缝起的一件夏布“夏威夷”衬衫，还有一些书，一同放在一个皮箱内，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跟被褥等物一起都交给了特务。但到我收到信时，那箱子衣服和书，都还没有送给我。我非常生气，就写信交当值的队附去质问调统室。我说：“我的书也许你们要审查，但是我的衣服和箱子应不至也要审查吧？就说审查吧，半年的时间也应该审查完了，为什么还不送回给我，甚至也不通知我一声？”

经我这样抗议后，他们才把这箱子送给我。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套洗干净了的沙士坚西服，已被人穿脏了。我为此曾和卢老说过这样的笑话：“他们才是专共别人产的‘共产党’呢！”

在理箱子的时候，我把我在夹山所写的日记和朋友们以及郁风写给我的信都交给了卢老，叫他在我万一被拉走之后，当我女儿和蔚芳星期日来探视我时，转交给她们保存。我还留了一个简单的信给我的女儿和蔚芳，告诉她们也许我会被他们给搬了走，走了之后一有通知她们的自由时，当立即通知，请转告各友不要为

我担忧。

这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已过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四点钟了，曾来过的两个人又同了另外两个人回来。进来之后，新来的两个人中之一向我作自我介绍说：

“我是梁凤庭！”

我笑了说：“我在很久以前曾给你写过信，交这里的队附送了去，据说没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信却被拆开了。你看见过我这封信没有呢？”

“没有，我没有看见过这样一封信。”他也是一个没有真话讲的人，在这一问答中，先被我断定了。

不过他来说的话，比先来的两个人要具体一些。他说：

“我来是请你即日搬到城里我们住的地方去住，因为重庆有电报来，叫送你到重庆，黄主席也已有批示，叫我送你到重庆。我已买好了飞机票。就是明天起飞的飞机中，已排好了我们两个人的位子。所以今天你必须离开这里，住到城里去，明天才能搭得到飞机。——你不是希望快点解决你这个问题么？我看这次到重庆一定可以很快地不出一个月便可解决了。委员长希望看见你，见面之后，还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要看见黄主席亲笔写的字你才肯走，你看这就是他的批示！”

他给我一张电报看，那电报的角上确实有黄亲笔写的着梁凤庭押送赴渝的字样。至于那原电我还未看清楚他已收了回去，大意也是叫把我送到重庆。

他说：“这样你应肯去了吧？”

我说：“还是不能去，我有两个小孩子在桂林，没有人照应，如果我走了谁替我负责？为这件事我也曾屡次写信给黄主席，始

终没有结果。现在同在一个城市里她们还可以来看我，我还可以随时指示她们向谁去借款。我如飞去重庆，难道叫她们去讨饭？拘禁没有罪状，现在又要置我的两个孩子于绝境，我当然反对。除非你们能答应把我的两个孩子也带了走。”

“带你的孩子走是不可能了。你看这里是飞机票，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现在票很难买，临时要添两个人当然办不到。”

我看那飞机票确实是两张，票上居然贴有我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我被捕的那天，一个特务曾给我看过一次，他当时是夸耀他们有办法，他说：

“你从来不照像，但是我们仍然弄到了你的照片。我们为了你已花了二三十万元了！”

这张照片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自称为后辈的桂林记者到家里来访我时照的。他来，说了许多客气而无聊的话，辞出时我送他到门口，他就举起拿在手中的照相机说：“我给您照个像可以吧？”我答应了他，他就拍了一张我的半身像去，以后还曾洗了一张送给我。我住的房子大门外的“嵩庐”两个字，也被拍了进去。就是这张照片被收进了特务的档案。他们得了我这张照片是他们的成功；可是为此叫我多认识了一个他们的特工人员，却不能不算是他们的失败！

现在就是这张照片被放大了贴在飞机票上，我的名字却改作了萨忠，梁那一张用的也不是他的真姓名。

我看了飞机票，仍然拒绝跟他们走。我说那是他们的决定，并不能强我照他们的决定作。说到这里，梁忽然改变为非常强横，说：如果好说我不肯去，那他们就不能不考虑其它的办法了。

我这时却笑了，并告诉他，如果他用他的手枪指着我的胸膛说，如果我不去就打死我时，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我到夹山来之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请你拿出你的办法来好了！”

我本来坐在床上，说了这一段话后，我站了起来，表示不愿和他再谈。大约他的最后办法已为我说穿，晓得强硬并不见得能有结果，遂再转为和我商量的态度。

他说：“我这是奉命，实在由不得我。你要是不肯去渝，也请你先到城里我们的地方，那里有电话，你可以在电话中和黄主席商量。黄主席如果同意你明天不去，我当然没有问题。至于你说你的女孩子问题，她在桂林女中上学，我们进城时可以先到桂林女中找她，带她一同到我们那里，大家商量一个办法。”

这时黄队附也帮同来劝我，主张我跟他们走。我仔细考虑一下之后，觉得我没有什么地方怕他们，进城就进城，到哪里不是一样。如果我决定不走，进城之后他们又能奈我何。

那时已是下午五时许，我收拾了一下行装，由梁凤庭等陪伴着离开夹山，驶回桂林。临行时怕连累卢老，连和他好好谈一下都没能够，我想我走了之后他要更孤独更艰苦了！

一年的时光过去，当汽车沿着丽君路驶入桂林时，我已不认识丽君路了，许多新的房子夹着马路盖了起来。车转进到环湖路桂林女中时，我发现连环湖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个特务跑进桂林女中去找我的大女孩子。等了许久，跑出来说我孩子不在学校，因为患盲肠炎，已送到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了。

这真是太巧了，为什么她突然在这两天会患了盲肠炎？入院后开刀没有？开刀后安全与否？我自然都极需知道。想到她在

桂林，这时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妹妹已去距桂林四十里外的双潭墟武穆中学上学。仅有的亲人是我，而我失掉了自由，她在病榻上的感想将是多么凄凉啊！我始而悲痛，继而变成了愤怒。我立即告诉梁凤庭，无论如何我明天不能去重庆，一定要知道我的大女儿在医院是否安全才能谈到其它。我告诉他：

“我是一个政治犯。不过政治问题不会永无解决之日。大家尽管政治意见不同，但谁也不应去创造一种永不能弥补的创伤。万一将来有一天，现在我的主张你们都接受了，可是你们在现在给了我一种记忆，就是我的女儿在生死间不容发之际你们都不肯留一点人情叫我见她一面，那将是你们永久不能弥补的后悔。我希望你们好好地多考虑考虑！”

梁答应我到了他们的地方再从长讨论。这时汽车也已驶过洋桥，到了桂林南门附近的一条小巷口。这是我在桂年余从来未到过的一条小巷。下车后他们前后拥卫着我走进巷内，由门牌上我知道了这巷子叫德润里。走了许久，才在一个外表看来完全是一个民居的房子前站下来，叫开了门把我带到第二进的穿堂又兼礼堂的一间大厅中，请我坐下。我说它是礼堂，因为在屏门上贴有孙中山的像，和所谓“党员十二守则”。说它是穿堂，因为屏门开了一扇，可以通到后面的一进房屋。

梁凤庭回到这地方之后，一面招呼人为我预备饭和打扫住屋，一面就打电话出去报告我已搬到了他的地方，并说了我的孩子入院和我不肯明日飞渝的情形。和他谈话的人我已听了出来是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刘士衡。可是当他挂了电话之后，却告诉我说黄主席已同意了改下一班飞机去，不过下一班飞机什么时候有就很难说了。说了之后，他就打发一个人去航空公司退票。



我这时就要求他许我打一个电话给陆蔚芳，说我要叫我这个女学生去看看我的孩子在医院里的情形。梁同意了，我就用他们的电话打到蔚芳办公的地方。恰巧她不在那里，我又商得了梁的同意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留给她，叫她回来时打电话来。另外还要求梁派一个人替我送一封信给蔚芳，叫她接信后，就跟了这个人来看我一次。

一切都安排了，饭已作好，他们就请我吃饭，是特别为我作的三菜一汤。因为他们是吃两餐的，这时已早过了他们吃晚饭的时间。饭后，为我收拾的一间房子已经收拾好，是在礼堂的后进右边一间。他们把我的皮箱送进这间房，我也跟进去看了一下。才进房门，一股潮湿的气息，就扑入了我的鼻孔。房内只放了一张单人竹床，我要求他们再找一把椅子一张桌子给我，因为我要在未离开桂林前，偷空把《窦德大使日记》译完。他们答应了我，立即为我找来了桌椅。我又喊屋子太潮，要求他们把上边窗子打开时，他们却都不响了。我看看那两扇大窗，原来都是用大钉钉死了的，我才省悟到，这原来一向就是一间牢房。我遂说：

“如果窗不能开，至少那窗上糊的纸，一定要撕掉才行，否则空气太坏了。”他们这才连忙应声说：“可以撕掉，可以撕掉。还可以叫他们撮一些石灰来垫在地下，把潮气吸收了去。”

这些事都作完，我自己挂起来我的蚊帐。蔚芳这时也已被去找她的那个特务带了来。他们把她让到礼堂旁的左首房内(也就是电话的所在地)叫我到那里去见她。这间房的里间便是梁凤庭的卧室，而在我和她谈话时，还有一个特务在旁边监视着。

我把他们要把我移到重庆去的事和找苦茶才知道她已进了医院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然后拜托她去为我看看苦茶，并找朋友为

我借一点钱。因为这时我身上已没有什么钱，乍被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不知何时才能又与朋友们接得上关系，所以非预备些钱带走不可。此外我又请她写信通知所有在渝的朋友和在蓉的郁风，说我已被解到渝，希望大家设法把我的两个孩子也能搬到重庆，她都答应了我办。并说明天一定设法再来告诉我办理各事的结果，然后走了。

这时已是十点多钟，我请特务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他们领我走进一个旁门，那里是一间厨房，穿过厨房便是厕所。这厕所是用几块木板和竹席在水上架起来的。我到这里才知道这所房子有三面被一片臭水塘环绕着，确是一个很好的囚禁人的所在。由厕所回来我就睡到了床上，把灯熄灭，准备就睡。

在未睡之前，我就曾考虑了很久，他们这里是不是也和夹山一样有人在夜间守卫？我一个人睡到这房间里，我是应当闭上门睡，还是开了门睡，抑或是掩了门睡？我感到有点不易决定。还有他们说要把我送去重庆，甚至还拿了电文给我看，那是不是真的呢？特务是什么都会捏造的，也许他们要用另外的方法处置我？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了闭起门来睡。我认为我应当还照平常一样，自认为我是有自由的人。如果有人干涉我的自由，那我们至少也要争辩争辩。我在家里睡时，照例是要闭了门睡的，现在我当然要闭了门睡，于是我闭了门。

睡下之后，因为睡前思虑过多，就又犯了失眠的毛病。半小时过去了，我仍然在嗅着一阵阵扑来的夹着潮气的石灰味道，听着围绕着蚊帐翻飞的蚊虫的声息，焦躁，不能入睡。我还不大敢反侧，因为一动那张破竹床就唧唧地响。大约是因为我很久都不翻身，他们以为我已睡熟，曾有一个人到我的房门外来推了一下

我的房门，并摸弄了一下门上的铁扣鼻。我推想，也许是他们为了怕我逃走，把我倒锁在房内了吧？但为了不叫他们察觉，我也不能立即起来去看看他们是否真的倒锁了门，我决定多等一下再起来去研究这件事。但不晓得是为了日间太疲乏还是为了什么，我竟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破晓。我听到，院中正有人在扫地。跳下床开始观察我这新居，在昨夜桂林著名的不亮的电灯下，我还没有发觉这间房是这样的齷齪。虽然地下布满了石灰，但一点也不能叫人有整洁的印象。地面坎坷不平，四壁污秽不堪，屋顶窗纱尘封布满；尤其是这间房没有新式的玻璃窗，全是旧式的窗棂，上面糊了高昌纸，只有一格窗棂间钉了约七八寸长四五寸宽的一块玻璃，可以窥探一下院中的景象。

我忍耐不住这间比夹山还坏的囚牢房间所给我造成的心理上的厌恶，我立即把门的插关拔开，想打开房门。这时我才突然触起昨晚的记忆，可是我仍不顾一切去拉门，门居然开了，我倒有点感到惶惑起来，昨夜的事难道是我听错了？门既打开，我也就不管一切走了出去。门外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天井，但比我那间房里的空气总好多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几次，就在阶前打起太极拳。因为我想离开了夹山和卢老之后，我仍应保持着一年来所养成的良好习惯。但终以地方太小，又没有了在夹山时自制的竹棍与竹剑，有几套国术已不能不放弃了。

扫院子的是昨晚为我特备晚饭的厨子。他看见我起来，就到我房中去拿了我的脸盆替我舀来洗脸水，于是我就回到房中洗脸漱口。盥漱后，再没有事好干，打开箱子把未译完的《窦德大使日记》和原稿拿出来放在房子里唯一的一张破桌子上，继续工作起来。

为了叫房子的空气好一点，我把房门大开着。渐渐地院中人的活动多起来了，我发觉和我的房门对门的另一间房中，住有他们的一个特务。在我这一间房的前一进，就是在礼堂右首，面对着有电话的房和梁凤庭卧室的两间，则是他们的办公室。在我这一进房的后面，还有一进房，那大约就是有家眷的特务的住所了。女人小孩子出出进进，是叫我作这推断的佐证。

九点多钟之后，梁凤庭起来，洗了脸就到我房间里来坐了一下，问我睡得如何，还需要什么。我就告诉他我需要一百一十瓦特的电灯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灯泡，我才能在晚间继续工作，也才可能在我离桂之前把《窦德大使日记》译完。他答应我即日可以办到。

在这次谈话中，他说明我以后每天可和他一起吃饭，安心做我的工作，等待飞机，等待我的女儿病好起来。不过如果要到街上去时，希望我通知他一声。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到街上去。我干脆为他戳穿说：“我不会出街叫你为难！”他听了这句话感觉很满意，然后告诉我重庆马上要开党的中央委员会议，飞机座位困难得很，今天没有走，说不定有几个星期好等呢！我给他的答复还是那几句话，我希望知道我大女儿的病况，如果必须去重庆，我希望把两个孩子都带走。至于我自己本身根本不愿去重庆。话不投机，当然是无结果而散。

## 七、毕生难忘的一个月

那是我被迁入桂林调统室的第三天，出我意料之外的我的大女儿竟和蔚芳一同到调统室来看我。经过了许多的麻烦，她们才被允许和我见面。特务肯叫她们和我见面，还是希望我们见面之后我肯赴渝。当见面时仍有一个特务被派坐在旁边，这一点自然叫我心上感到远不如在夹山自由。不过我们既没有什么话怕他们听，也就不在意他们是否有人坐在那里。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的病是慢性盲肠炎，医生并不主张立即开刀，所以我已不必再等待什么。如果我被解到渝即能恢复自由，她反主张我快点走。她这样说，显然是特务先告诉了她一套话，叫她相信了我到渝即可被释。我还是说，要走一定要叫她们两个孩子跟我一道走，否则，我决不走。蔚芳这时已替我借到了一点钱，还有我在夹山托她拿到城里洗的衣服，她都送来了给我。我的大女儿发现我的皮鞋已经很旧，就说一两天将再买一双皮鞋为我送来。这样东谈西扯，直到大家觉得已无话可谈了，她们才离开我回去。

她们走了以后的晚上，梁凤庭又来和我商量走的事，他说：“令爱病已不成问题，当然可以走了。”我仍说：“非带她们两个

走，我决不走。前次你未和我商酌就买了票，所以少买了两张；现在要重新购票，已可多买两张了，为什么不能带她们！”

梁这时遂用非常委婉的口吻反复地向我劝说，希望我不坚持我的主张。他说：“现在飞机票非常困难，一下要买四张谈何容易！再说你到渝不出一个月，我可以担保，一定可以恢复自由，又何必一定要在现在要带了孩子去。要带孩子，结果不外是迟缓了行期，也就是迟缓了你恢复自由的日子，这是何苦来！我敢以人格向你保证，我梁凤庭，以后总还要见到你的；如果过了一个月，你仍未恢复自由，我负责把你的两个孩子送到重庆，我这样说你难道还不相信！”

在他的苦劝下，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我先同他飞渝，我到渝后一个月内，梁应负责将我的两个孩子送到重庆。所谓负责我也曾和他很清楚地讲明，我不要他们代我付两个小孩子的旅费，我将设法自筹。所要叫他负责的，就是代她们向航空检查所订购两张票。因为她们年纪太小，要乘火车汽车作长途旅行，没有人照料怕有问题，所以我希望她们乘飞机。梁很慷慨地表示他一定负责为她们在一个月内购到机票。这样我和梁先乘机离桂飞渝，算是决定了。

不料我决定肯走之后，梁却连两张飞机票也买不到了。于是我遂不能不在桂林调统室里住下去，一住竟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真比夹山的一年叫我感觉到痛苦得多。在夹山与其说我是在被囚，不如说我是隐居在乡间写作。但到了调统室，虽然梁凤庭对他的听差，常常称我为客人，可是事实上我过的是比地狱还苦的日子。

那是从我到调统室的第四夜起的，我在那天晚上还和在夹山

时一样，译《窦德大使日记》一书到晚十点。这一晚在八时后全院即非常之静。在八时前虽曾有一阵显着他们这一群特务都非常紧张的象征，我且听到梁凤庭的房中有许多次把子弹推入手枪弹槽中的声音，但不一刻他们这许多人就都走出去了。他们一走，院中即刻静了下来，十点后，我工作得疲倦了，停下来上床入睡，且即刻睡熟。但睡梦中，忽然被许多嘈杂的声音惊醒，我不能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因为我被捕之后就遗失了我的表。但我可以推想，也许不过十二点或一点钟，心中暗忖大约是那些特务到外边去玩了才回来。

可是再仔细听下去，却觉得不对了，有一个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口音在那嘈杂的声音里。在朦胧中，我以为是他们来了客人，并未介意。因为希望在被吵醒之后仍能续睡，甚至叫自己不去听前进房的嘈杂声音。可是那声音愈来愈奇怪，终至一片凄厉的惨叫传到我耳中。我遂不能不由床上跳了起来，而忘掉了这样一来叫那张破竹床起了一阵极大的唧唧声响。可是，我的起来所造成的响动，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反应。

起来后，走到只有一方小玻璃的窗口去看，前一进房灯火通明，人似乎全集中在那间礼堂里，由礼堂通到我们这一进的天井来的那扇屏门，已经关闭。我开始倾听礼堂中发出来的一切声音。我听到一个特务在那里用粗暴严厉的口吻提出询问，最听得清楚的句子就是“说，你说，不说么？”旁边还有几个特务在帮衬着威吓引诱：“说了吧，不然还是徒然吃许多苦？”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拷讯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到此我睡意全失，干脆坐到室中我写字时用的那张唯一的破椅子上，静听这件事的发展。

被讯问的人，起初是任他们百般威胁劝诱一声都不响，于是他们遂用刑了。先喊：“不说不么，那么你伸出手来，伸出来！”接着就是几个人动作的声音；竹器打在手掌上的声音。那个一声不响的人，现在喊了，由“哎哟”的呼痛，转到力竭声嘶地惨叫。我才知道刚才惊醒我的叫声，是说明他们已对这个不幸者用过了一次刑。

打了一二十下之后，停止了，被打者还不断在呻吟。“说，说呀”的讯问又复开始。那个适才似乎还很刚强一声不响的人，已在哭着哀求：

“你们要我说明什么呢？我知道的都已告诉了你们，你们不相信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不给你一点厉害看看你是不肯说的，来，把他吊起来！”

于是一阵走动和搬动东西的声音之后，那拷讯者又发言了：

“想一想吧，你说不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好，吊！”

“你们要把我弄死，就弄死好了，这是作什么呢？”

“少说话，你不说，看吊起你来之后还说不说。——绑好了么，好，把绳子拉住，——怎么样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来，吊！”

起初这个被吊的人还在“哎哟哎哟”地喊痛，后来却转为滞重的呻吟，再往后这个人已再没有了声息。我推想他已失了知觉，这经过，前后也不过几分钟。



“好了，放下来，去拿冷水来，——没有用的小子！”又是一阵响动，这个人被放了下来，跟着又是几声把水泼在这个人的脸上的声响，渐渐地一种微低的声音，似呻吟非呻吟地由那不幸者发出。那群特务，似乎也在休息等那个人苏醒，划火柴燃烟的动作，我都一一可以听到。

十分钟后那个人已经苏转，他哀求希望喝点水，他们给了他，劝诱的话从这时又开始了：

“你这是何苦来呢，早点说了不就完了，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苦？”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说呀……”这话是很勉强断断续续说出的，“你们叫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那我能说什么呢？”

“不说你还是要吃苦的，难道吊起来好过……”

经过一阵委婉的劝，也没有结果，那拷讯者又转成暴虐凶残的声调：

“还是不说，好，那就再吊，来，再吊！”

这次听到“再吊”，这个不幸者已不再象上次说要吊他时那样冷静了，他喊出来凄厉的声音，象发狂一般：

“呵，来不得了，来不得了，希望你们慈悲慈悲吧，你们用手枪打死我好了，我愿意死，我愿意死！”

但是他们仍然是再度吊晕了他又救他活回来，而没有用枪打死他。在落到特务手中之后，人类连要求死的自由显然也被剥夺了。这样蹂躏一个人直到窗上已现曙色他们才肯罢手，叫把这受尽了体刑的人带开。礼堂通我住的房前天井的屏门突然打开，几个人拥扶着一个人向厕所去的相反方向走去，我这才知道那边还有一个囚人的院落。我不愿意被他们发觉我曾坐起来听他们拷

讯，就立即轻轻回到竹床上睡下。我说不出来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头疼得不得了，疲倦得要死，努力叫自己安定下来，渐渐地竟入了睡，直睡到他们吃早饭时我才起来。

起来虽然很迟，还是感觉睡眠不够，头疼虽稍减轻，可是头沉沉然显得重得不得了，吃饭时没有一点滋味，吃了一些便放下了。

饭后回到房中想再睡一下，调统室的王书记长忽然意外地跑到我房里来坐。这个人是从我到调统室的第二天吃早饭时就认识了的。他是那天早晨才由柳州回来，由梁凤庭介绍后，每天吃饭时总谈几句应酬话。他是北平人，和我说起来似乎是同乡。因为我虽不生在北平，却在北平长大，说的是纯正的北平话，所以他对我表示很亲切。我曾在一次闲谈中问他在北平什么学校读书，他笑一笑，没有回答，只说“我很久就知道你了！”

这一天，他特别到我房中来闲谈，谈了一阵之后才转入正题，他说：

“昨夜你大约没睡好吧？”

“是的，我一夜没睡。”

“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汉奸。我对汉奸是素不容情的，我在北平沦陷后作地下工作，被汉奸告密，叫日本人逮捕了去。我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受了多少刑。后来我逃出来，我恨汉奸入骨，所以我决不轻饶他们！”

我先“啊”了一声，本不想表示意见，可是昨夜的惨叫声似乎犹在耳旁，我忍耐不住，不能不为那些不幸的人讲几句话。于是我问他：

“你说他们是汉奸有什么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我们决不是毫无根据便逮捕人的。”

“可是你们还是用刑，我想你们所说的有证据，似乎就有问题。”

于是我就给他讲起美国的联邦侦探局的工作，这是我从一个杂志上看到的。我告诉他有几个纳粹曾乘潜艇在美登陆，企图在美国作种种破坏工作，结果是被美国侦探局一一破获了。我告诉他美国的侦探局决不随便捕人，逮捕一个人时，一定是什么证据都已齐备，使被捕者除了签字承认之外，已没有别的话可说。我更特别强调地说，美国侦探局根本没有权随便捕人，更不能拷问。再说拷问决不会有什么良好结果，拷问的结果，往往是叫被拷问者信口胡说，并不见得能得到什么真实材料。说到这里我故意问他：

“你这些年来对拷问人一定很有经验了。根据你的经验，用刑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用刑之后，可以多得到许多材料？还有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又如何？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他给我的答复是用刑的结果确实不能多得到什么材料，有时多得到一些材料，再去调查，却往往是假的。

他这样坦白承认之后，我才提出我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用刑？”

“那也是出于不得已呀！我们的经费有限，用人太少，所以我们的工作自然无法与美国的联邦侦探局相比。我们也一样希望能得到确凿证据之后再逮捕，可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已决定离开桂林时，我们就不能不动手了。否则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派人去追踪，所有前功岂非尽弃了？等到捕来之后如不用刑，那任你讯问千百遍也没有用，所以用刑也是不得已！”

“那么这样不是可能屈打了人，甚至可能有屈打成招的事

么？”

他点了点头承认了我的话。可是他仍认为在中国证据不足的逮捕与用刑，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特务组织不够大，经费太不足。

我到此已没有什么可再和他多说，只对他下了一个结论，我说：“这样的滥捕滥用刑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即使说是对汉奸嫌疑犯也是一样。我以为中国今日所最需要的是人权的保障，在无真凭实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是汉奸之前，决不应随便去蹂躏他的人权。”

这种谈话当然不会有双方都同意的结论，谈一阵之后就散了。到了那天晚上，他们还是照样的用刑拷讯，我还是照样不能入睡，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我虽然极不想听那种声音，可是，前一进房的每一种响动都有震撼我的全身心的力量，不容我不听。

从这审讯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审讯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大部都是广东人。男的有电影导演；女的有一个据说是粤曲大王；还有一些作生意的混合种的半广东人；家庭妇女；舞女；也有苏州娘姨。

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省籍，不同的身份，每晚发出来不同的受刑后的惨叫。

他们用刑且不只是打和吊，也有时候用电刑。他们用电刑是由妇女开始的。那一晚和每天一样，我躺在床上准备陪着那些不幸的人受心理上的苦刑，忽然听出来这晚他们要讯问的是一个妇女，同时也听到了帮同讯问的还有两个女特务。这两个女特务说话很少，所以审讯时的空气，比较往日要文静，只听到主讯者那

个所谓王书记长在声势汹汹地喊叫。

讯问了许久没有结果，就再用刑。先还是打，打了以后，那个女的呜呜地哭起来，没有完没有了地痛哭。过了很久，讯问才能再赓续，可是仍然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就改用一具手摇电话机作为施用电刑的刑具。我很清晰地听到他们摇那电机摇手的声音，跟着我又听到那通常都听到的威吓，“说不说？”对方仍然没有答复，于是我就听到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女人的怪叫。这一种叫，和挨了打或被吊起来的惨叫，全不相同。这怪叫象一声霹雳，来得那么突然，终止得又那么迅速，一次，两次，三次，我在床上坐了起来，我用回忆来试想过去自己无意中摸到一个漏电电灯开关的感觉；我想到我在桂林青鸟咖啡馆亲眼看见一个茶房触电晕厥，经过几小时才救活，茶房的右手都被烧焦的记忆。我以为对一个女人用电刑是太残酷了，他们有什么权力可以这样虐待一个女人？是谁授给他们的这种权力？世上竟有这么暴虐的统治者，也就有这么残忍的肯作刽子手的人，这是一个“人”的世界么？我悲愤，可是这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故意找了一个机会找那个王书记长闲谈，我故意把话题扯到电学上去。我给他讲了许多电力的惊人力量，慢慢地把话引到我想告诉他的一个人如果心脏不强，突然给电力一接触，可能叫他心脏陷落而死这问题上来。我说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想听听他的反应。他居然立即有了反应说：

“会有这种事么？”看他那神情，我相信他也许不是装作不懂而是真正不懂。常识贫乏到这种程度，却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中国的特务将干出无穷的罪恶勾当来，由这里已说明了。尤其是在我为他说明了之后，后来他们还是应用电刑，这证明他们是有心为

恶，杀害无辜亦所不惜。中国有这种特务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不会有一天好日子过，已很显然了。

最叫我感觉到他们荒唐的是他们拷问那个苏州娘姨。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来拷问她。她没有什么知识，由她的答复询问，和跟他们蛮闹上可以听得出来。她一点也不怕这些特务，她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她批评他们不应当这样恶。他们打她，她就反抗，要吊她她挣扎逃避，自听到他们拷问人以来，这是最不平凡的一晚。

我为这件事，心上起了无限的波澜。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是太脆弱得象羔羊了，这个无知娘姨的出自本能的反抗，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课题！

也就因为她的不顾一切的反抗，反弄得那些特务束手了。第二天吃饭时，他们还在把她当作笑话谈。我既同他们一起吃饭，不禁就插嘴问那王书记长：

“这个娘姨是什么罪名呢？”

“根据我们的报告，她是日本人，是一个间谍！”

“但她讲的是那么纯正的苏州话……”

“这不是常有的么，许多日本人都能讲很好的中国话。”

我当然不必和他们争辩，到了晚间又闹了一夜，还是毫无结果。她是那么无知粗野，乱叫乱闹，如果她真是一个间谍，那装假的技术太好了。

过了两天，他们大约自己也不能不否定自己的报告而决定释放她了。于是不但释放了她，还释放了她的女主人，一个舞女。那是分两天释放的，释放的时间都是黄昏。先用黑手帕将她们的眼蒙起，由两个特务搀扶着在院中旋转，扶到厨房，转入厕所，

又转回第三进房，出到第二进，到第一进再由侧门回到第二进，穿过第三进，出后门。这样乱转，大约是为了叫她们在记忆中不会记得调统室是怎么样的一所房屋，也不能知道她们在被释前曾走了多远的路。这所房屋的后门很僻静，可以通到桂林南门的河边。后来我听说释放时，就是由特务把人带到那河边，然后下警告，不过十分钟不许解开蒙眼睛的手帕，这样特务可以从容走开，也可以留在附近监视，使被释者象作了一个恶梦一样的莫名其妙。

这些被拷问者，在白天我也有看到他们的机会，那就是在所谓“放茅”的时候。大致是在早上八九时之间，每个人都被允许上一次厕所。因为厕所是要穿过厨房的，也就可以在厨房舀一瓢水洗洗手和脸。

这些人我可以看得出来显然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乍来的那几天，每个人不论是男是女，由衣着到表情，都还有一副社会上所谓上等人的外表，四五天后，就都改变了，男的头发矗立起来，平整的西装已皱得象睡衣一样；女的粉脂脱尽，头发飞蓬，眼圈哭肿，更显出来狼狈不堪的神气。

在厨房里洗脸，没有一个人有洗脸毛巾，至于肥皂当然更不会有。那个据说是导演的太太又是粤曲大王的女子，每天洗脸都是用一方手帕蘸湿了抹一抹。我看不过这种情形，就喊常常为我打洗脸水的厨子拿一块洗衣服的肥皂送给他们用。他们在调统室中忽然受到同情的馈赠，当然感到这是非常意外的事。我推想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定也以为我是特务，因为当时我还有在屋外室内往来盘旋的自由。在调统室中有自由的人，无疑地不会是好人的。

但是我这个在他们眼中不会是好人的，确实为他们几个不

幸者努了不少的力。

例如那个导演，还有那个混血儿，都曾患疟疾，发高热。调统室只为他们找省府的中医来看。中医治疟，当然不会一剂药奏效，所以拖了许久都不见好。我由那厨子口中知道了这情形，一天那个王书记又来和我闲谈，我就问他他们几个人都患疟疾，为什么不买“奎宁”给他们吃。他告诉我：

“我们这里是不能随便给犯人药吃的，吃药一定须是根据本室医生开的药方买来的药，否则万一出了问题，谁负得了那责任。”

“可是明明知道他们是患疟疾，‘奎宁’是治疟的特效药，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如果说怕负责任，也可以替他们找个西医，请他处方呀！”

“这我就没办法了，调统室是只有中医没有西医的，找西医我不能负这责任！”

“如果就这样叫他们的疟疾不断地发下去，也可以发死人的呢！这不也是责任么？”

“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由这段谈话可以说明他们的责任观念，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责任观念。我虽然为他们尽了力，但是却没能发生什么效果。

不过我的努力，也不是全无效果。当时桂林正是霍乱流行。我们吃的水，却是水夫担来的河水，污浊不堪。传染霍乱病菌的可能性，当然非常之高。于是我建议买漂白粉来消毒。这件事经过我一再游说，终于有了结果。虽说这是因为特务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大家同喝一种水，我们这些囚犯自然也沾了



光！

但是许多囚犯虽沾了光，我这个囚犯却多了一件事。因为他们那些特务怕麻烦，厨子是根本反对放这种有怪味道的东西到水里去，于是放漂白粉到水里这工作竟成了我的日课。我接受他们的庶务买来的漂白粉，把它保藏在一个不透气的玻璃瓶中。每天水夫担水来，我即到厨房中去把漂白粉加下去，这件事我一直作到我离开调统室的那一天，才再把那玻璃瓶交还给他们的庶务。我当时曾想，如果我有点什么有毒的药物不是也可以公开地放在那水缸中么？中国的任何机关办事都是马马虎虎，甚至特务机关，也是一样！

这一批囚犯，虽然我曾尽了我的可能想帮助他们，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他们在那恐怖的酷刑下，不只一天比一天显出来瘦弱，甚至他们且都变成了一种畏怯的可怜动物。即使是和调统室的听差讲话，他们的脸上都表现出来是在陪着十二万分的小心。我一点不清楚他们是否汉奸，因为国民党是把共产党也叫作汉奸，奸党，把民主同盟的盟员也叫作奸伪分子或第五纵队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那句话，即使是对真正的汉奸嫌疑犯，谁也没有权力在未证明他们是汉奸之前，就乱用酷刑。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五刑之下，何求不得？”不是汉奸而以酷刑迫使自承是汉奸，那可能性是很高的。中国只要还有一点法治的精神，特务滥施刑罚这件事即不能许其存在。一个月的时间，在桂林调统室中，夜听罪状不明的同胞，在酷刑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宛转哀吟，这一痛苦的记忆，到今天仍难以忘怀。这种现象如任它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即一天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所以我认为凡是许身于争

取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今日都应当以争取取消特务为当前的第一  
急务！

## 八、调统室中的人物

桂林调统室的一个月生活除了前章所写的痛苦记忆外，还有一些关于调统室中人物的记忆值得记述。

我先来介绍一对特务夫妻。

从我到调统室的翌日起，我发觉，每天当吃饭时他们一定要留两个人的菜饭。起初我并不注意，几天后，每餐都要留。“留给谁吃呢？”我遂开始运用起来我的推想力。不是留给囚犯，因为囚犯的菜饭是另有准备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也不象是留给调统室的特务工作人员，因为如果是为特工人员留，应当每餐有两个人回来吃这菜饭。他们吃饭又照例都是在摆在穿堂中的两张桌子上吃的，为别人留菜饭时也就都放在这两张桌子上。可是这两份菜饭，永远是留下后即端到后一进房里去。我推想大约是在后面还另外囚禁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身份大约比一般囚犯要好，所以给他们留的是我们吃的菜饭而不是囚犯的菜饭。于是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还有一件事叫我怀疑，就是在我到调统室的第二日，吃早饭之前，对着我的房间的作为特务的办公室的前一进房，有一个旁门，并未关闭。早饭后，忽然有人来把那两扇门锁了起来，我立即意识到

那行动与我有关，我以为他们大约是怕我溜进去看到他们的文件。

过了三四天，一个傍晚，我开着房门正在译书，突然有一个女人匆忙地由我门外跑过，跑得太匆忙几乎跌倒。我无意中站起来到门口去看，却看出来，那个女人很象我过去在桂林三多路“嵩庐”住时的一个邻居。

她和我对门而居约在半年以上，但是很少和我交谈。她的丈夫，更是和我从来未交谈过。但当我不在家时，她却常和我的孩子谈天。

想到了这些旧事，我又立即想到当茅盾兄离开桂林赴渝后不久，曾有一个朋友由柳州来到“嵩庐”看我，说茅盾在车站上遇到他，托他带一个消息给我。所带的消息是：茅盾到柳州后住在乐群社，曾有一个不相识的人来看他，自称是奉命跟随着他的特务，将护送他到金城江，以后另有其他特务接替护送他到重庆。在谈话中这个特务还说出来，我在桂林的住所，有特务和我同住，监视着我。当时这消息并未引起我多大的兴趣，我知道特务在注意着我，注意又怎么样，反正我没有作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这时我在调统室中忽然发现了我的这位邻居太太，再想到这些旧事，我却大感兴趣了。我没有想到和我同住的这一对夫妇竟真是特务。我回想到我的邻居是一个普通话说不好的青年。迁来之初，长天无事，留在家里。迁来后不久，忽然参加了当时郁风正在教画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去作学生，墙上挂起了亚里士多德的木炭画像。那时我还和郁风说我的邻居成了她的学生。到此我也才领悟到，那原来是不但要监视我还要监视她。

“那么她的丈夫是不是这时也在这调统室中呢？”我亟思知道。我再运用我的推想力，我猜到她的丈夫一定也在这里了。因为我

联想到留两份菜饭和办公室的门的两件事，我立即断定都是为了他们夫妻怕见了我的面以后难为情。

于是我留心侦察，果然被我发觉他们两个人都在调统室中工作。他们每天都由最后一进房穿过厕所厨房和一条狭窄的夹道到办公室去办公，每天都像和我表演捉迷藏一样，要窥伺着我的行动。我心里曾暗暗地好笑：“他们曾监视我半年，现在是轮到我来禁闭他们几个星期了。”

有一次我曾明白告诉一个特务，我说我已发现了跟我在“嵩庐”同住的那一对特务夫妇在调统室里，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过去的事我是不会介意的，公开见面谈谈往事，我以为也很有风趣呢！但是直到我离开调统室，他们还是未敢来见我。

第二我要谈谈两个在调统室中不愿当特务而作了特务的青年。

这两个人，一个就住在调统室里，假定他姓A吧，是一个在军队中干了很久的青年。他在军队中作的是下级军官，离开军队另谋职业，自己就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中统局下的一个部门，当了特务。他不大常出去，所以和我见面闲谈的时间最多。十几天之后，他渐渐地吐露出内心的烦闷，他表示出来他并不愿意干特务，可是他已不能脱离。他说他是羡慕我的，虽然我在受苦，可是前途是光明的，心上是安泰的；他自己年纪固比我小，然而前途已是什么希望都没有，内心更苦闷得厉害！

经我给了他一些鼓励，希望他有机会时立即自拔，他更觉得和我有了进一步的友谊。每天在傍晚当调统室的人都出去溜街，而我也工作了一天需要休息时，他即和我坐在院中闲谈。由于和他闲谈叫我对桂林调统室更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桂林调统室在我在的时候，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对立，是不必经过什么人说明，我就可以察觉的。梁凤庭是主任，代表地方势力；王书记长来自中央，当然代表中央。由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方无意中在语气中流露出的不满，就可以知道。至于他们以下的干部，有的是广西土著，有的是自中央调来，壁垒更显得非常分明。A是不属于中央亦不属于地方，但以他不是广西人，所以在广西中央两派中，都把他看为中央体系下的一员，而他自己则竭力想置身于这两者之外。于是他宁愿一个人孤独着不同两边的任何人多有往来。甚至对于我，我相信他的心扉也是只打开了一半。但我相信他不是怕我而仍是怕那环境。他知道我是什么顾忌也没有的，他如对我太坦白了，万一我和梁、王谈话，泄漏了什么他和我谈的话，那对他真是一个性命交关的问题，他当然不能不谨慎。我懂得这种分寸，所以我们在一起时，我从不对他提出有关特务的问题，他和我谈时，我也只是静听而不追问。不过当他对我叙述他自己的生活的或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的事时，我也间接知道了不少关于特务的消息。

他告诉我他生活得很苦，报酬也很低。我有点惊讶，大家都知道特务是有钱的工作，所以才有很多人肯作，为什么他却说低？于是他告诉我，中统局的薪给制度是和政府的文官制度相仿佛的，也有等级，等于文官的有特简荐委，所拿的薪金数目也差不多。不过特务有奖金，每办一个案子，凡参加工作的不论是捕人，是讯问，是用刑，是录供，只作一点工作就有奖金。所以办案愈多，对特务愈有利。无辜被捕的人多，也未尝不可以说是这种制度给鼓励出来的。他在调统室中我推想是作电讯工作的。因为他告诉我，他过去在军队中干过电讯工作。有一次他曾告诉我，看重庆的

电报，似乎对你尚无恶意。在他看来，对我这已是泄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但是怎样的无恶意，我当然很愿意知道，可是我并没有再追问。我相信我这态度是对他最合适的态度。记得有一次特务们又是晚饭后紧张起来，一阵推子弹入槽声响之后，人也一阵风似地完全跑光，我知道当晚大约又有拷问要来了，因为这种情形就是他们出去捕人的信号。可是当夜十一时许特务完全回来，却没有捕来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推想不出。到了第二天傍晚，还是A告诉了我：“昨夜他们去捕人碰了壁，因为他们要捕的人，有军统局的特务给他保镖，未能下手。否则如果和军统的人冲突起来，不得下台，就难办了。”从一个记者的眼中来看，中统和军统的对立，这是多么宝贵的消息。可是我仍然没有追问，我以为追问也不会多得到什么消息，反而伤害了他对我的信任。同时我也觉得只有他的态度是如此才能叫我信任他，如果一点防我的心都没有，那也许他来和我接近，又是另一种特务工作的方式了。在一个月的时光中，我证明他对我防范的樊篱是一天比一天减撤。当我走的那一天的前夜，他出去买了两包饼干来送给我，这是他出自衷心的友谊的表现。礼物虽然不重，可是他送给我东西显然是冒着危险的，这一点叫我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极可感动的事。也就为了他，叫我有了特务中并不是没有一个好人的看法。

至于另外一个青年B，和A全不相同，他完全是一个孩子，不懂什么事。从外表来看，纯然是上海小开的神气。我注意他接近他是因为他和A很相得。每天晚饭后，如果不出街，B总是来找A唱几段皮簧。A和B都可以拉胡琴，这也许是建筑起他们的友谊的基础。

B不住在调统室里，但所住的地方距调统室并不远，那似乎

是调统室以地方不够用在附近另租的一个宿舍。那边连水都没有，所以B总是一起来就跑来洗脸，而他所有的盥漱用具就存在A的房里。

我看他的神气至多只有二十岁，一个年纪这么小的人为什么要到特务机关来工作，我决定了要问问他。一天晚饭后A出去了，只剩了B，他显然感到很无聊的时候，我就先问起他的家世。

他是江苏人，所姓的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我一听见那姓，又听到他的口音，就断定了他是上海某一企业大王的族人。我的断定果然由他自己证实。我遂问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厂里找点事作而要到这调统室来。他说他自己未到这里来之前，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上海沦陷，家乡里的厂都停了工，没有工作只好到内地来。他虽知道在成都他们已有厂重建起来，可是他走到桂林已没有了路费，找朋友借钱，朋友就给他找了这份工作。他是学会计的，在调统室中也管的是会计。

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苟安性很强，所以他进了这机关也就安于这机关。每天起来对着镜子要用半小时把头发梳起一个蓬，然后记记帐，唱几句皮簧，溜溜街就混过去一天。他也说过他不喜欢这个一进来就不能离开的机关，可是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他要走的时候就脱离。显然他是有CC后台的人，所以他心上没有A那么痛苦，真是真非也分不清楚，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坏人。大家相熟了之后，他对我非常要好，我要买什么东西，他都肯为我代买。当我要离开时，他送了我一份瓷的饭碗，羹匙和小碟，都是一式的团龙花纹，据他说是他过九江时买的，一定要送我作个纪念。我曾几番拒绝，都非送给我不可，最后只好接受。这个人我想在调统室中，应算是一个难得的人。此外，据我来看就大都是甘心作特



务，不惜害人的分子了。

最后我要再谈两个女特务。

第一天我被移入调统室，就曾看到了这两个女人，叫我很难判断她们的身份。一个胖胖的，是上海人，一个较矮而身材长得还匀称的，是广东人。我知道她们不是调统室中任何一个特务的眷属，特务眷属都住在最后一进院子里，她们却住在最前一进。一天到晚由前院跑到后院，又由后院跑到前院，态度很不端庄。吃饭时总是自己来盛并不和我们同吃，她们有比我更多的自由，可是总未听说过她们出街。说她们是特务，也未听见她们到那办公室里办公。

记得大约是我到调统室的第三夜，调统室中的人完全出去了，我在灯下译书。突然窗外有女人的笑声，跟着是一阵两个人跑走的杂沓脚步声，我才意识到她们两个人曾凭着那几方寸的玻璃窗向里面窥探。这种行动引起了我无边的厌恶，我心上是先把她们肯定为特务的，在窗外窥探是什么意思？我心上于是决定了，如果她们再来窥探，我立即到门外去问问她们看什么，要看，可以到房里来看。

过了不久，果然她们又来，于是我就实行了我的决定。不过我没有出去，只是隔着窗子说了我要说的话，“要看什么可以进来看！”

我这话说过之后，她们两个人就都到我的房门口来了。那个胖一点的先开口说：

“请您不要误会，我们是想和您谈谈。”

“那么就进来坐吧！”这是我的回答，当然声气都不太和蔼。那个胖的就跨进门来坐在我让给她的椅子上，我则退坐在竹床上，另外一个还倚门而立，没有进来。

进来的这个进来后就给我作了一段很长的解说，她说的是很好的北平话。她说：

“我叫吴秀娟，父亲在上海海关作职员，小时在北平住过，读过书，一直读到中学。上海沦陷，家破了产，我遂沦落为舞女，在香港舞场中混过很久。在香港时，认识了她（她用手指站在门外的那个女子）。香港沦陷后，过了一个时期，转到广州湾，再转来桂林。受了她的牵累，被抓到了这里，一直不放，已几个月了。我们两个本来就住在您现在住的这间屋里，前几天他们忽然喊我们搬，搬到前面又狭又坏的房子去，说有一个重要的人要搬来住。我们气死了，不晓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不要我们和您接近，要我们向您承认是他们这里的女工作人员，我们就更莫名其妙了。所以趁他们都出去之后，我们就想来找您谈谈。”

“我还以为你们真是这里的女特务呢，想不到你们竟和我一样，也是囚犯。大家同难，我自然很欢迎和你们谈谈。”

于是我就问她她的家人现在何处，站在门外的女孩子又是什么人，她们为什么原因到这里来。她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她的家人现在在哪里，至于另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莺，是一个电影明星。她说到这里，就受到了门口外边站着的女孩子的阻扰，她说：

“萨先生，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我在广州曾经演过戏，也演过电影，不过不是什么明星。在广州时我认识夏衍先生。我相信夏先生一定是您的朋友，我还喊夏先生作干爹呢！”

由她这一段插话，叫我感觉她似乎是一个和文化界有过关连的人。我想老夏到广州是上海沦陷后不久的事，他在粤留住的时候是办《救亡日报》，那时郁风也在广州，我就问她认识不认识郁风。

她却说不认识。我正想再往下盘问她，忽然她却跑开了。这时我也听到了外院有人走进来。不一刻工夫，王莺又跑来窗外喊吴出去，我立即觉得有点不安，她们的身份既然也是囚徒，特务又关照不许她们和我接近，现在至少是有一个才从外面回来的特务，知道了吴曾到我的房里来，那对她们一定很不利。虽说不是我找她们来的，但我如不询问得太多而事前能想到会有人回来碰见不好，也许就不会给她们找出这种麻烦来，但是这时追悔已来不及了。

除了追悔的心情之外，当时我还有一种心情，就是想知道这两个人是以什么罪状捕进来的。问她们的话虽然不少，只是这一点却未正面提出，也有点可惜。我心中决定一定要设法把那原委探听出来！

第二天我又和A在一起闲谈，我故意把话题扯到吴和王的身上去，同时将昨夜吴等在窗外笑闹及到房中来坐的经过情形告诉他，引逗他为我讲她们来调统室的原因。他果然为我原原本本地谈了起来。

他说，吴说是王莺牵累了她，这一点倒是的。王莺的被捕是为了她的丈夫。调统室接到报告，说她的丈夫是日寇的间谍，设有一个电台，在桂林飞机场的附近，每天向敌人报告出动飞机的架数和次数。那时正是陈纳德的部下在用桂林机场作前进基地的时候，所以她的丈夫遂被逮捕，审讯之后，她的丈夫供认不讳，就被解交广西绥署枪决了。她是调统室抓来想追索余党的。吴则是当王受拷讯后，被王牵连抓来的。A相信王是为了香港沦陷，草率地和她的所谓丈夫结合在一起，因为他很有钱。现在她丈夫枪毙了，还有几十万块钱的遗产留给她，不过她也许还不知道她

的丈夫已经枪毙。

“那么王和吴是否已证明也是汉奸呢？”

“这倒未能证明，所以她们已有被释放的可能了。”

在这以后，有好几天都没有机会再接近她们。虽然天天看见，但是大家都不交一言。直到又一天似乎是一个什么假期，所有的特务全出去了，家里只余下那个厨子和杂差。吴拿了一个上面抄有一首英文歌的练习簿来找我教她读。我懂得她要我教她是为了叫厨子等不怀疑。并且这次不是在我的房内，而是在穿堂中平日吃饭的桌子旁，我们一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我教她读了几次之后，遂又谈起天来。最初王也曾在旁边，后来她一再警告吴说，等一下叫他们回来又看见，对萨先生也不利，不要学了吧！吴不肯听，她就一个人跑开，吴才又告诉我一段叫我很感新奇的故事。她说，她们两个人本来早已可以释放了，但是现在他们还不肯放，原因又与王有关。她进来就是受了王的牵累，想不到现在出不去，仍然是受了王的牵累。调统室中有一个人对于王起了人财两得的心思，他想把王弄到手，王应承受的遗产也就同时可以到他手上。这个人当然是调统室中一个有地位的人。而同时另一个也有地位的人却反对他这种作法，两个人闹僵了，结果就把王给僵在调统室中。因为王不能放，他们感觉只剩下一个王不放也不好，于是吴遂被留下来当作陪客。

我虽不能凭事实来判断吴这些话是否可靠，不过这种事，据我想，可能有几分近乎事实。特务被赋予的权柄是无量数的大，他们如何能不在有机会时，就想放纵他们自己的一切欲望。眼前是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不算小的一笔遗产，又有汉奸嫌疑，一举手即可人财两得，怎能叫他们不作此想？特务制度的容易制造

罪恶，这里可说又有了一个极具体的证例！

在困难的环境中，人类如处在同一的被压迫的境地，大家就很容易接近。吴和我不过谈过两次话，王只交谈过几句，以后为了怕特务找麻烦，每天见面甚至连头都不点一点。可是她们在晚饭后如果央得什么人为她们买来了一些零食或是煮了一点莲子、百合，甚至糖粥，一定有一些送给我。不能由她们直接送给我时，她们就托那厨子为我送来。我也就只好吃过之后把碗向厨房一送，连谢也不必道一声。

有时我也想不应总是白吃她们的东西，也想过托 A或B 为我买点什么送给她们。但是想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于是什么也没有酬答过她们。

在审讯其他女犯时，她们总是受命作临时帮凶，她们自然只有惟命是从。所以她们也常常是彻夜不睡，到第二天睡一个整天。吴在一次谈话中曾告诉我，她看不得对女犯用电刑。她说：“用过电刑之后，皮肤上会留下一个青色的印痕，很久都不退。”她还说过她反对对女人在生活上一点也不予以方便，把她们囚在和男人完全一样的环境里。她说：“这样热的天气，连叫人到家里去取几件里衣裤都不肯，那个粤曲大王多少天来只穿一套衬衣裤，想想她怎样往下活！”

我还问过她们两个人，是否也受过刑。她们都说曾经受过，不过没有受什么酷刑——也许是在用酷刑之前，她们已把什么都说得叫特务满意了。

经过这种种体验之后，我相信她们对特务决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虽然她们什么思想也谈不到。可是想不到到最后她们两个人竟是都正式变成了女特务才离开调统室。

这也是吴来告诉我的。在我快要离开桂林的前几天，她说：“我们已经可以出去了，不过还有点手续要办，办好了，就放我们。”我问她想人财两得的人，竟肯放手了么？她说：

“那很难说，不过说放他们是已正式表示过了。”

“所谓手续又是什么呢？”

“叫我们参加他们的工作。”

“你们答应了没有呢？”

“当然答应了，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我们什么都可以答应。”

我默然了。对普通的女孩子，我能希望她们坚拒什么呢！在放她们那一天的上午，我听见吴和王两个人被喊到梁凤庭的房里去，正式宣誓参加他们的组织。由梁先念一段誓词，再由吴、王循声朗诵。当时，我心中曾对自己说：

“她们以为这样可以恢复自由，殊不知是更进一步卖掉了自己的自由。世界上是又少了两个好人，多了两个女特务。”

不过她们自己显然没有这种感觉。下午两个人都修饰了起来，脂粉和新的衣服叫她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并且眼睛似乎也放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的光芒。王莺在忙进忙出跑了一阵之后，曾在过我的门外时，向我说了一声：

“萨先生，再见了。”吴呢，则更大方地正式向我来道别。下午四时左右她们被放走了。大约因为她们已成了“同志”，所以并未把她们的眼睛蒙起来由后门送出，而是派调统室的一个科长由前门把她们送走的。

她们走后的第三天，我和A正在一起闲谈，那个送她们两个人走的科长忽然跑来向我说，她们两个人曾拜托他来问我一种治皮肤病的药的名称，这是我从前看见她们烂脚而告诉她们过的药。

我写了给他，随着不禁问了他一声：“你还去看她们么？”他的答复是“不错，等一下要去看她们。”

最后我还是由A那里晓得了她们两个人离开调统室后，就被送进了一家旅馆住下来。天天仍有特务去看她们，并给她们一些工作。此外调统室正在计划着给她们介绍正式工作。王莺可能被介绍到在桂林空军基地上军委会办的空军励志社去作女职员。这样她可以为他们供给很多的情报，因为王的面貌还漂亮，适于担任这一工作。至于吴，将给她介绍一个什么职业，尚在考虑之中。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们两个人的最后消息了。

## 九、由桂飞渝

在桂林调统室住过了一个月，到六月六日前几天梁凤庭来告诉我，六日我们已可飞渝，我就通知苦茶和蔚芳我已有了行期。她们都来看我，苦茶给我送来了一双皮鞋，我也为她们安排了以后如何赴渝，如介绍梁凤庭给她，当面交代，托梁以后为她们买飞机票等事。

六日清晨七时我即起来把行李整好，把译完的《塞德大使日记》一书交梁凤庭看过。托他为我派人转送蔚芳，再由她转找朋友出版，以维持今后两个孩子的生活。八时他们为我买来了一碗肉丝面，叫我吃了，以免到机场没有东西吃，要挨半天饿。在等面吃的时候，那个厨子来告诉我：“你的小姐很早就等在门外，没有见到面么？”这一问叫我非常生气，我明白，一定是特务怕有什么麻烦，如我临时要求带我的孩子走，或孩子哭哭啼啼要跟我走之类，干脆不叫我们见面可省些事。所以孩子来送我，他们却不许她进来。

我立即去找梁凤庭办交涉，叫他立刻放我的孩子进来。可是据到大门外去负责放她进来的一个特务回来说：“她已不在门外了”，这当然更叫我不快。可是想一想，特务的行为，素来都是



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转过脸去无所不为，我又何能苛责他们对我不好！

九时许我又在特务的拥卫下上了一辆汽车，驶赴桂林机场。在赴机场的途中，我发现桂林机场已大大的改变，不再象过去那样简陋了。机场开辟得非常之大，许多小土丘都被切开成为一个凹字形的缺口，作为停放和掩护飞机的处所，跑道也已加阔加长。汽车驶到机场，飞机显然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走，他们遂把我载到距飞机较远的地方停下来等候。等了一两个钟头，飞机有了起飞的消息，他们才偕我走到机旁，但仍把我带到与普通客人隔离稍远的一隅，直到所有的客人都上了飞机，他们才叫我和梁凤庭登机。我想他们自以为已作得很严密了，可是在我登机之前，我仍然看见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站在送行的一群人中。看见这个人后，我就安了心，我知道我已在这一天离桂飞渝的消息，一定可以由他带到我的女儿和所有的朋友耳中去了。

飞机起飞之后，我发觉这是一个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班机，乘客是各种身份的人都有。飞机则是一架美国运输机，没有座位，大家在机内对坐成为两个单行，梁凤庭坐在我的身旁，中间则放了大家的行李。

在国内乘飞机飞行，我所保持的纪录，一向比一般的朋友多，甚至有的在航校已将毕业的学生所保持的空中飞行时间纪录，都赶不上我。我乘飞机从未有过晕机的事，到迪化去几度飞过秦岭、天山，都能安然无事。可是这次在飞越贵州的花秋坪入四川境时，我却头晕，手足冰冷，心脏跳得厉害，甚至要呕吐。这一现象，叫我感觉得很悲哀。因为由此证明我的健康在一年多的囚禁中退步了，虽然我曾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健康，可是现实的答

复是我并未能做到。

下午三时许飞机飞到了重庆上空，并缓缓地沿着扬子江下降，降落在珊瑚坝机场上。我和这块土地已阔别了三年，可是一切仍是老样子！依然是几个草棚搭在这一片被江水环绕着的石坝上，作为上下机旅客休息的地方。飞机停下来，我和梁凤庭走下飞机，立即有四五个人接上来，包围了我们。

先把我拥到另一个草棚中去，意在把我和其他旅客隔离开，海关的检查也藉此避免了。接我们的这四五个人当然是特务，他们和梁凤庭附耳谈了几句话，便请我和他们一道上渡船划向对岸。到了对岸立即为我喊了一乘轿子抬我上坡，我的行李也由他们代我招呼着往上抬，他们这些人则围绕着我的轿子，拾级而上。

快爬到坡上马路旁的时候，在欧亚航空公司门口，意外地一个人喊，“萨先生你回来了”，我顺着声音去看，发现喊我的是一个姓金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职员。我过去乘欧亚飞机的时候很多，所以大家很相熟，不意这次又遇见了他。他也许以为我是由西北回来，殊不知我是由桂林被押解来此。我知道他这样一喊，一定已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所以我只答了他一句：“是的，回来了。”同时我心里又在想，特务想不叫重庆的朋友知道我已到了重庆，这次又失败了。我相信不出一周，他曾见到了我的消息，一定可以传到了关心我的人的耳中。

轿子放下来，一辆大而新的黑色汽车已驶了过来。梁凤庭过来告诉我，他坐在后面的另一辆汽车上，请我坐这大车。我坐进去，跟着就有五个特务挤坐在车里来，仍然是我坐在两个特务的当中，前座坐了另外的两个特务，和一个特务司机。汽车沿着马

路驶去，环绕着南区公园爬到两路口，梁凤庭的汽车已经不见，我们的车则转入两浮支路驶向重庆的郊外。这些地方，我都很熟，他们这种走法，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避免走人多的区域，以免再有人看见我。车过了化龙桥、小龙坎、山洞，仍不断地沿着成渝公路向前飞驰。

“他们要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开始默想，我推想他们一定是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囚禁的所在，可是这地方在哪里呢？不在重庆市内，也不应离得太远呀！现在这样向前飞奔，我真猜不出来他们的目的地何在。

可是我却不想询问。一方面是因为知道问也得不到真实的答复；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下飞机之后要呕吐的情形虽曾好了一下，可是坐上汽车，在每小时四十里以上速度的急驰中，我又恢复了在机上时不舒服的情形，所以懒得谈话。

五个特务中有一个年纪很轻，手里拿着一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印行的中文本哲学书，很象一个大学生，曾屡次和我攀谈。攀谈时所说的话表示出来他很知道我的情形。他最先问的是我的孩子的盲肠炎已否痊愈，现在是否就要到重庆来，我都很简单地作了答。后来因为我愈来愈感觉难过，连简单的回答我也懒得作了。

车过山洞，我曾几次要求他们停车，他们不懂得我的意思，不肯停。直到我说出来，我心脏非常不适，才在路旁把车暂停了一下，许我下车到路边有一股山泉流下来的地方，浸湿了我的手帕，抹一抹脸并蹲在路旁休息了一下。休息了五分钟，我果然好了许多。可是特务却很不耐地屡催我走，我想早点到一个地方也好，于是重新上车奔驰下去。车到青木关，特务们却自动地叫车

子停下来，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快要下落了。特务把车子停在青木关的社会服务处门前，社会服务处的职员和这些特务很熟地打招呼，请我们坐在门外的茶座里。特务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吃，因为我感觉得非常不适。他们警告我说，你在这里不吃今晚就没有东西吃了。我说我们去的地方连一点简单的饮食都不能临时准备一下吗？他们一致地摇了摇头。于是我说那么给我一碗白糖水，我知道白糖水可以有助于我的心脏不适。此外，还要了两个煮鸡蛋。特务们则叫了鸡蛋下面每人两碗，还叫了一些菜。为了等他们吃东西，我这次休息的时间长了。那个大学生似的特务先吃完了东西，忽然问我，在欧亚航空公司的那个老金，你和他很熟么？他居然这样单刀直入地来问我刚才和我打招呼的人，倒有点出我意料之外。我遂故意以很不经意的态度答复他：“只是买飞机票时认识而已，怕连我叫什么他还搞不清呢！”我希望这样能减轻他们对老金的注意。

太阳完全落了山，我们才离开青木关，我看着汽车驰向赴北碚的路而不再沿成渝公路前进，我遂推想也许他们要把我送到北碚什么地方。但是前进不一刻钟，汽车忽然在一个很荒凉的处所停下来。我以为是汽车出了毛病，忽然听见下车去的特务在喊滑竿，我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叫我离开汽车。天色已黑得出手不能见掌，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办，我也不知道。好在自被捕以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我倒一点也不慌张，静看他们到底要送我到什么地方。

喊了大半天，只喊来了一乘滑竿，再也找不到第二乘。于是特务们就请我坐上去，又雇了一个农夫替我背了箱子，开始离开了公路，爬上一个山坡，走向更荒僻的山野。他们这一群特务，则在

地下跟着滑竿跑。下坡、上坡，四川的山村向来是这样的。抬滑竿的农民，走惯了这种路，抬着一个人，还可以跑得飞快，可是这些特务，却叫苦连天了。翻过两个坡之后，特务已都气喘如牛，渐渐地不能再跟着跑，但是还有一个身体看来最壮的，仍在拼命追随。他大约是为了恐吓我，但在我看来却无宁说是为了壮他自己的胆，在手上拿了两支手枪玩弄。起初我还不知道他在玩弄的是手枪，因为夜色笼罩了一切，对面都不能辨清人的面貌，谁能看得见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到上一个大山坡时，抬滑竿的人脚步自然地慢下来，他赶到前面去，快到坡顶，他把一柄手枪丢向半空再用手接住，我才能确断，那是手枪。

离开公路约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一条小河旁边。水的流声，在安静的夜里听得很清晰。同时我看到了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有很亮的电灯似的光芒照耀着。

“这么荒僻的乡下，竟有电灯，四川的农村比其他省份的农村确实进步多了。”这是我坐在滑竿上看见那灯光后的感想。这时我的滑竿竟显然是向着那有灯光的地方走，我心上也遂暗暗在猜想：“那大约是他们要送我去的地方。”

我这判断，很快地便为事实证明。又爬上一段峻坡，发现了一段城垣挡住去路；滑竿抬进城垣，又有第二道城门。在这里滑竿放下来，两个持枪的卫兵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玩枪的特务上前去说了一声：

“送人来的”，那两个卫兵就把我们带进第二道城门，同时我却发现了还有第三道城门。

这是什么地方，我虽不能立即判断，但从有这么多神秘的门来看，已猜到它不是一个小规模的机关。

第二道城门与第三道城门之间有一个小的会客室，我们被领到这间房内，方才坐下，被滑竿遗落在后面的三个特务也已赶到。

到这时我想我不能再不问问这是什么地方了，于是我回送我来的特务：

“你们几位哪一位是负责任送我来的，我有几句话想询问一下。”

他们中间的一个高而瘦的特务说：

“有什么话，请向我谈罢！”

我说：“在桂林，梁凤庭告诉我委员长要见我，叫把我送来重庆，到重庆后不出一个月即可释放。现在梁凤庭半途溜掉了，换了你们几位来，把我送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送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告诉我！还有我有两个孩子在桂林，需人教养，梁凤庭答应我在一个月内把孩子替我送来重庆，以他这种中途溜掉的情形来看，我如何能够信任他！我被囚年余，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现在又把我搬来这里，如果又是不明不白地搁下去，我的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那个高瘦特务答复我说：

“这里是战时青年训导团，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叫你住，只好暂时送你到此地来。至于你的孩子，我们回去一定向上边报告，希望他们能为你设法解决。”

我听见说这是一个什么青年训导团，我不禁反问他：“我早已不是青年，你们送我来这里，难道还要训导我一番？”

“训导当然谈不到了，他们这里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训导你的，只不过叫你到此地来住一住。住一住，青年不青年有何关

系？总之我们回去一定向上面把你讲的话都报告上去，在桂林他们既告诉你很快可以解决，想必是很快可以解决的！”

我这时就更痛快地和他们讲，我希望和他们中统局的局长徐恩曾见面谈谈。并告诉他们这样随便使一个人在社会上失踪许久，决非有利于政府当局的事！他也诺诺连声，答应为我转达。

这时到第三道城门内去报告的一个士兵已经回来，请我们进去。于是我的箱子又由一个兵士荷负着跟我们走进了这个所谓训导团。

城垣内，地方很大，走了许久，才到一个门前有花圃的三大间旧式屋宇之内。在光芒如豆的油盏下，一个睡眼惺忪的类乎小职员的人物，由房间里出来见我们。几个特务上前去和他办交涉，起初那个小职员还似乎不允收留，因为最后我听到了那小职员曾一再说：

“你们要补公事来。”

然后他对另一个士兵下命令：

“送他到第二队上去！”

送我来的特务们和我到此也分手了。他们由我们进来的路走出去，我则被领进另一个院落。进门时，曾有卫兵喊问口令，漆黑中摸索着，穿过几个门走到一排房的门外，那个士兵喊了一声报告就推门进去，再喊：

“王区队长，送学生来了！”

“这么晚！”

“是的，请你起来收下吧！”

一阵床板声，一个人爬下床划火柴燃起来一盏油灯。我这时

还立在门外，他请我进去，又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晚，怎么搞的，从哪里送来的？”

“从桂林！”我这样答复他。

“桂林！几时来的？”

“今早从桂林乘飞机来的！”

“啊，”显然我的答复颇出他意料之外。这时他发现了那士兵提来的我的皮箱，再问我：

“这是你的行李，一只箱子，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

“好，送他到第二队去睡吧，一切明早再说，箱子暂时留在我这里，叫班长招呼他！”

那士兵把我带出来，再转到另一排房的门口，喊了一声：“张××，王区队长叫你招呼他，他是新来的！”

又一盏油灯燃起，我才看清这是两间房打通了的一个大通间，室内一行行地放满了高架床，每张床上下共睡二人，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在那里睡。

一个二十几岁推光头的青年由帐子里钻出身子来，上下打量了我一阵，然后指着贴近墙的一架高架床的上铺对我说：“你就在这里睡吧，有没有被子蚊帐？”

我答复他有，但是在箱子里。他叫我跟他去找那所谓王区队长要被子蚊帐，我跟了他去把被和帐子拿来。因为我的帐子是圆顶的，未带竹帐圈，挂了半天也挂不起来，我遂说将就一夜再说吧，省得吵醒了大家。脱了鞋，爬上那高架床的上铺躺下去，把未挂好的蚊帐盖了脸。那个班长也就把油灯吹熄，重躺回他自己的铺上去。



这一天我虽疲倦得不得了，可是躺下后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昨夜还睡在桂林的调统室，今夜却到了这个近北碚的什么青年训导团，那士兵又在喊我是学生，这真是太奇怪了！怪得令人几乎难于相信它是事实。

纷乱的思潮起伏叫我在那高架床上本已无法入睡，加上那床又没有床板，代替床板的是竹蔑编成的一张竹排，软软的叫我忧心会掉到床下去。蚊帐未挂好，只勉强遮住我的脸，很快已有了蚊虫在向我两手进袭，更叫我难于睡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有点朦胧。

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我一生中永难忘记的一天，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一天竟也是世界上不易被遗忘的日子，——第二次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是这同一天开辟的。这事实，过了好几天，我补看旧报方才晓得！

## 十、落发改装

到战时青年训导团的翌晨，我被一阵号音惊醒。因为彻夜未眠，眼睛很不想睁开，可是室内的许多喧扰动作，叫我不能起身来看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间约四方丈大小的房，除了高架床之外，只有一张竹桌，此外再无其它家具。这时每一张床上睡的人都已起身，他们穿的是一律的草黄色军服，都在忙着洗脸、漱口、打绑腿。看见这情形，我自然不好意思再睡在床上。起身下床，大家似乎谁也没注意到我，站在床旁边，因为地方狭小，自己觉得显然有点碍人家的手脚，可是也不晓得应当怎么办好。这房内喧扰了约二十分钟，忽然一下子所有人完全跑光，跟着，又一阵号声传来。昨夜那个王区队长带着昨夜我已认识了张班长跑来，当我的面告诉他替我换了衣服，然后带我去见队长。说过之后，他便走了。

我问张换衣服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凡到这里来受训的人都要把头发剃光，改穿军服。

“那么说，他们是要我受训了！这和那几个特务昨夜和我说的完全不符，他们只说叫我到此地来往，并未说叫我受训。我不能同意剃光头发和改装，你可以去告诉他们！”

“这怕不行吧！”张犹疑了半天这样说。

“有什么不行？”我看他似乎是怕去替我谈这话，便说：“那么我自己去说。”

“好，我就先替你去问问。”

去了一下立刻回来告诉我：

“队长说一定要你剃头改装受训！”

“我有很特别的情形必须找此地一个负责人谈，是不是我们可以立即一道去找这个队长谈。”说后，我不再等他同意，就要走出去。他这时忽然变为很诚恳的样子向我讲：

“我想你应当多多考虑一下，过去我已看见几个拒绝受训的人的下场。这里的官长都不是人，他们残酷得很。一个人要能曲能伸，你被送到这里来了，就应耐心受点委曲。我看还是不要再反抗了吧。就是这几天便有一个姓朱的，因为拒绝受训而被禁闭，被打，他自己绝食，他们把他送到厕所里去锁起来。饿了几天不死，他再忍耐不下去而想吃东西时，他们却不肯给他了。给他一点点，叫他永远吃不饱！——反之，受训倒没有什么可怕，拒绝受训，那苦头才大得多！”

他的诚恳词句感动了我，我说我很感谢他的指引，不过我确有我的特别情形，所以还是想找这里的一个负责人谈一次，如果他们仍不讲道理，我就接受他的劝告。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遂陪我去见那个队长。所谓队长请我进去坐，听我诉说我自己的历史，被捕及被送来此地的经过。我对他曾强调地指出捕我没有罪状，年余未经审讯，送来此地之前说是将要召见我，送我到门口，还说只是叫我在住一住，现在忽然叫我受训，岂不是太滑稽了！我有孩子在桂林，如果叫我受什么

训，我的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他倾听完了我的话便对我说，他很同情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可是战时青年训导团只是一个负责训导的机关，而无权去过问被送来的人过去的一切。我的情形确实比别人不同，但是我既然被送了来，也就须接受训练。所以他劝我在原则上先接受训练，以后再通过训练团的总队长，主任副主任来设法求解决。

我冷静地想了一想这两方面的话，我当然比较信任那个班长的诚恳的语句，而不会信任这个队长的甜蜜外交词令。如果我拒绝受训，这个说甜蜜外交词令的人一定会立刻变为穷凶极恶的恶魔。对于与特务办交涉，我们已很有经验了。所以我仔细地思忖了一下，还是决定了暂时屈辱一下答应他们落发改装。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吃眼前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如不被他们关起来还可以有机会研究研究这个机构。若只为了表示强硬而失掉了了解它的机会，从一个记者的眼光来看，也是不上算呢！

在夹山时，那个陈被送去衡阳，后来我知道就是进了一个青年训导团。这种训导团，是和德国集中营一样性质的东西。集中营制度在中国的翻版是什么样子，我很久就想知道了，只需落发改装，即能深入地研究中国集中营，我想任何一个记者都肯干的。

在我答应了落发改装之后，五分钟内即来了一个理发兵用推子剪去了我已蓄了二十五年的长发。看见每一撮头发抛在地上，自己确实有点难过，精神上是被侮辱了的观念仍未能完全自我克服。剪完了发，两套绿色军服，两套绿色衬衣裤，一顶军帽，一对绑腿，一双草鞋，还有一顶合于高架床用的破蚊帐，一领草席，一条军毯，一个木脸盆同时发来给我。只是没有给我被褥，

因为我自己有。

至于我自己的东西，则一件件地开了一个详单，放入箱子内，交到贮藏室去收藏。我这时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兵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着军服，所以我不会打绑腿，张班长便代我打起来。此外他曾教给我，如何把被子折起，如何要把军毯弄得见棱见角，如何把蚊帐弄得象一张白云母石桌面样的平整。此外他还告诉了我一套穿草鞋须知。

这一切对我都是非常新颖的知识。我从未想到过，我这一生中还能有一次当兵的经验。

改过装，张告诉我队长曾交代他，改装后立即领我去见总队长。他还教给了我见总队长时的礼节，如在门外喊报告，进门脱军帽，然后鞠躬之类。最后且为我说明一个学生入营立即见总队长谈话，这是过去少有的事情。一个普通学生，和队长谈话也要在若干天之后，更不要说总队长了。

在到总队长室去的时候，我已看出来这房子旧日一定是一座庙宇，正殿两庑，一层比一层高的大殿共计三进。总队长室，就是最后的一进大殿。

张在门外喊了报告领我进去，看见一个也推了光头的四十多岁穿军服的胖子坐在那里。我依然象往常遇见生人一样，和他点了点头，而忘了张嘱咐我的一切礼节。他请我坐下，张则退到门外去。总队长开始用他的湖南腔问我的经历，我又复述了一遍告诉过队长的那些话。他听了之后只叫我先安心受训，一切等副主任回来再谈。又告诉我副主任是因公去成都了。在他的谈吐中我发觉他是比那个队长还没有见解，还庸懦的人。没有什么可谈，也就退了出来，再由张陪我回到寝室。

张借这时机大略告诉了我一下训导团里的生活，他说：

“因为你新来，队长叫我来陪你，我也就乐得偷半天懒。否则这时候正在上课，我应坐在教室里，根本就不能到寝室来。这里的生活是每天早五时起床到晚上九时睡觉，没有一刻时间能有自由。全天无时无刻不是集体行动。区队长的口笛，就是我们的催命符，口笛一吹，就须迅速集合。集合，集合，每天都弄得你头晕眼花，我不幸被派作班长，就更忙得要命，忙之外，还得挨骂。

“上面的区队长一不顺心，就骂；为了执行上面的命令，又要挨同学的骂；说不干也不行，因为这是命令。这地方完全无理可讲，只有服从命令，每一种命令皆须绝对的服从。”

“如果不服从命令又怎么样？”

“那就是自找苦吃，禁闭，打，都是家常便饭。禁闭还有轻重之分，轻禁闭是关在一间只有一个小窗的黑暗的房间内。重禁闭则是把一个人关在黑暗房间内的一个站笼一样的小木箱内。”

“被打被禁闭的事是不是常常有呢？”

“怎么不常有，禁闭室从未空闲过，打也不断地发生。”

谈到这里又听到了一阵号音，张听见便说这是最后一堂课下课，已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我们要到大礼堂前去等集合吃饭了。

大礼堂在作寝室的一片房屋的围墙之外，中间隔了一个广场，是一个新的建筑。张一面走一面告诉我这里能有今天这个规模，都是前后期同学胼手胝足的结果。老百姓把这地方叫作五云山。在清朝咸丰年间，本是一个避兵燹的寨子，后来就改成了庙宇。民国之后，地方上的人曾在这庙中办过小学，抗战后政府迁渝才把小学赶出去，变成集中营。作集中营的时间，不过三年

余。听说初来时，庙宇院落道路都已非常颓败，集中营的长官就利用这些名为学生实为政治犯的人，开始作开辟荆棘修葺建筑的工作。作大礼堂地基的长石条、木料、砖、瓦，都是学生一件件由山下搬上来的。这广场现在这样平整，也都是由学生刨挖之后再由山下抬上来石土填平的。沿着广场修起来的人行道，夹着人行道栽起来的桐树，也是学生们劳动的结果。

这个地方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学校的地方，尤其是当张把我带到大礼堂前一片可以向下眺望的草地上向下看时，就更显出这个地方的可爱。

我们脚踏着的就是城垛的遗址，叫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是被围在了一个山顶上小小的城堡内。城堡很高，城堡外一条小河横在不远的面前。

这座小山都被开垦了，眺望下去，四周都是农田，一方方不同的绿色稻田连缀在一起，很象一块大地毯，呼吸时似乎都可嗅到稻香。如果这地方不是被用作集中营，时间不是今天这样动乱的时代，在这里办一个学校，真可说是太合理想了。

又一阵号音吹起打断了我的玄想。张把我带进了我应当参加的队伍，所有的学生似乎都在用眼睛望着我，我第一次听到立正、报数等口令而参加动作，跟着鱼贯地走进大礼堂吃午饭。六个人一桌，二菜一汤。所谓汤，实在是盐味都没有的上面飘有两三片菜叶的冷开水，菜也是只有点盐味而无油味的水煮青菜。所谓青菜，也是当时最便宜，四川人经常用以喂猪的藤藤菜，和老得不得了的扁豆。至于饭，也是粗粝不堪的米，不但有数不清的谷子和稗子，且含有小粒的砂石。

立正，开动，两声口号之后，大家开始吃起来。不到十分

钟，我同桌的五个人，已全部吃过了三碗饭，只有我是连一碗饭还未吃下去。一个同桌的学生和我笑着说：

“你吃不惯这种饭吧？”

我只对他笑一笑。又一声“立正”之后，队长，队附，区队长先走出去，其余的学生，大部分也都放下碗走出去，我也放下碗向外走。在这时，我看见剩在这饭堂中的许多学生忙作一团，都奔向方才队长等吃饭的桌子，有的抢剩下来的菜，有的抢剩下来的饭，不一刻的工夫，桌上什么都已抢空。后赶上来的，只好贪婪地看看桌上的空菜碗空饭桶，然后失望地走开。

我看了这情形，心里非常难过。我明白他们都是为了饥饿的趋使，才作出来这种在平日他们决不肯作的事。

饭后回到寝室，张通知我，这是强迫午睡的时间，不管你想睡不想睡，都要倒到床上去。除非你有病，才可以通融你去医务所。不过去时先要向班长报名，然后由班长派一个同学领了去。这个负责领了人去的人，还要负责领了这些人回来。

强迫午睡一个多小时以后，号音又响，接着口笛声四起。这时我又多有了一种听口笛的能力，口笛声的先长后短，或几长声几短声，代表着不同的队的番号。我在的是第二队，是一长声二短声。同队的人嘱咐我，以后听到这种口笛，即应赶到指定的地方集合。

集合之后，又一个同队的人告诉我，今天下午是劳作。区队长来报数之后，就喊了几个同学去找二队的上士拿工具。不一刻，拿来了许多铁铲、铁锹、竹筐、竹竿。区队长下命令叫报名时报单数的同学每人拿一种工具，然后在几个区队长和队长、队附的率领下，出了这个集中营的营门，被带到营门外半山的一片土坡



上。这土坡已被开垦成菜圃，一部分种了南瓜、扁豆、红豆之类的爬蔓植物，一部分种了茄子、青椒、番茄，也有几块地方种了高粱和玉蜀黍。

太阳高照在天空，这一片土地上没有一块阴凉，因为附近没有树木也没有竹林。六月重庆的阳光照在人的皮肤上，长久了之后，是会令人感觉疼痛的。但这些集中营的官长不管一切，立刻把两队的学生平均支配到这一片菜圃的每一块土地上，叫我们晒着日光拔草。拔草对于种菜是必要的，据说种菜的目的是为补助同学的伙食，我们也有劳作的义务。可是偏偏挑这太阳大的时候来叫我们拔草，能说也是必要的么？是不是含有故意虐待我们的意思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地可以想得明白。

在太阳地里拔草两小时，我被晒得有点头晕，然后又被带到河边指定的区域内去洗澡。洗澡时，我把被晒的痛苦马上忘掉了。我想这种待遇对我们这般书生，在他们的心里，大约以为是一种蹂躏，事实上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有益的锻炼。我们长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很少接近阳光，所以一晒就感觉吃不住，其实长晒晒，也许更叫我们经得起折磨，更能健壮一点！

洗澡后上山，我感到了自己非常疲乏无力。昨天的辛苦，今天全天的紧张生活，还有全天吃过的东西不过一碗饭和一些青菜，都是原因。但是回到营中，参加降国旗仪式后吃晚饭，还是没有吃完一碗饭，大家都已散去，我也只好出来！

晚饭后半小时又是集合，再被强迫到教室里去自修。教室中是每两个人一张竹桌，一条板凳。我这时也领到了两套书籍，一套是经过删削的《总理遗教》，一套是不知道什么人搞起来的《总裁言论》。每一套都是四册，书小而厚。又发了几张四川人用作

手纸的全张土纸和两条有点韧性的高昌纸。土纸据说是给我们作笔记和周记本用的，高昌纸则是钉笔记本周记本的材料。此外我还得到了一支毛笔，一块石砚，一锭臭墨，都是最坏的文具。

名义是自修，可是事实上却不能自修，因为灯光不够。营中当局为了省灯油，每四人至六人才分享得到一盏小桐油灯盏。坐在教室中，大家连面貌都相互分不清，哪里谈得到读书写字。是以所谓自修者，实质上是把大家禁闭在室内，不许出去在黑暗中四处乱跑，以免有人逃走！

我记得初来之夜在途中好象看见这集中营里有极亮的电灯光，为什么来了之后灯的问题会如此严重？举以问张，才知道那是每个星期中只有一天有训育讲话时，才在大礼堂中点起来的汽灯。

灯光不够，大家闷坐在室内无聊，区队长要求大家轮流讲笑话。在什么都须绝对服从的环境里，当然只好讲。但是讲笑话和听笑话的人，心上不会有半丝笑意，连那区队长也很明白。

九时前下自修的号音响后，大家到指定的二队单独集合的草场上去等集合。晚点名号响，大家集合列队唱党的国歌，默诵含着法西斯精神的军人读训十条后，解散，即强迫回寝室就睡。十分钟后熄灯号起，你不肯睡，或不能睡也只好干躺在床上；因为区队长不知何时就会拿着手电筒钻进来，查查谁还未睡！

这就是我到集中营后第一天的经历，以后若干月的日子，在日常生活上，大致都过得和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口笛下生活

着，我们成了一种耳朵对口笛感觉最敏锐的动物。

## 十一、训导团组织概况

这个战时青年训导团是怎样组织成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关，它的目的何在，何时成立，有多少学生，这些问题，我进去之后就 very 急切地想知道。从许多所谓老同学的口中我得到了不少材料，可是总是零零碎碎不够具体。直到我被关到一年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找到了一个该团的“最机密”文件，才有了较具体的了解。我在这里就把这“最机密”的文件抄几段在下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报告，他们还能否认么？

在这最机密文件中，说这个团筹设的经过的原文如下：

“本团之筹设：缘于民国三十年中央党政军第十次联席会报，通过组织大纲、并决议：（一）本团名义上隶属于内政部，实际上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中央党部、政治部及两调查统计局协助。（二）本团组织大纲先呈请核准后，再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备案，不必由国民政府公布。（三）由联席会报秘书处草拟训练纲要，交供本团实施时参考，但应作为密件。此案经会报主席何总长（应钦）录案签奉批准后，当由会报秘书处于二月十五日分函行政院中央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两调查统计局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查照……”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机关是由何应钦签奉批准而组织的秘密机关，用政府的公帑而交给党的机构去办。

以后这个团即由上文所述的几个机关派出代表组成“战时青年训导团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是由三青团的康泽、徐君佩，政治部的邓铨，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王思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郑锡麟，内政部的酆裕坤等组成。

最初的团址决定由政治部拨用战干一团綦江湾滩子、禹王庙、三角镇等三处营房，后以不敷用，始决定设于巴县兴隆乡五云山的现址。

民国三十年十月一日行政院令派康泽为这个团的主任，徐君佩为副主任。于是这个团正式成立，我被送来时，这个团已有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历史。

为什么要秘密地办这么一个机关，在我找到的最机密文件中，有康泽写的一篇序言，曾有所说明。他说：

“自抗战军兴以来，全国上下悉集中意志与力量，在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努力奋斗……不幸奸党分子，竟于此时，阴怀诡计，宣传异说，诱惑青年，企图破坏抗战建国大业，各地青年受其荼毒，思想行动，越出常轨，陷社会于不安之状态，政府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种行动不能不加以阻遏，同时为爱惜国力，矜恤典刑，又当予以自新之路，因决议设立本团，调集训导，以期纠正其思想行动，成为国家有用之人才。……”

这段话是要经过翻译和说明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现在为了太不象民主的口号而太象法西斯的口号，已不再听见，可是在国民党内这思想是一点没有改变的。由这思想出发，所以在他们的那一个党之外，其余的党，都是奸党。凡是不

肯与他们那一个党同流合污，而又弄不清是否属于某党者，就给加上一个“奸党分子”的名义。这些人的说法，尤其是主张民主一点，在老百姓中曾得到广大的同情，所以这种“异说”，遂非遏制不可。不幸的是这种人非常之多，遏制也不能纯粹用杀戮的办法，于是遂不得不唱出来“矜恤刑典”，另用一种方法改变那些过去曾反对他们不民主的人，为他们的党徒，作他们的特务。康泽的话就应当作此解释。

这个团的训导计划，在“最机密”的文件中规定：分甲乙两组。甲组训练曾受专科以上教育者，乙组训练曾受中等教育者。知识低于中等教育者，得另行编组训练。又共党干部及案情重大分子则予以隔离训练。这一项计划，到我到这团中时证明全未实行。因为我和五十岁以上的老留学生，十五岁以下的未进过正式学校的孩子，曾在一起受训。

至于训导的时间，该团原规定为前后两期，每期六个月。到我入团时又加了一个“入伍教育”，定为三个月。加这三个月的原因我明白他们是为了凑人数，开一班一定要有二三十个以上的人，否则在经费上划不来。两个调统局送人到这团里来，数目极不一定，一个也送，几十个也送，所以这个团非设一“等人阶段”不可。我入团后加入的第二队虽已有了二十余人，事实上新送来的不过三五个，其余的都是已受了一个时期的前期教育或后期教育，但因为不够服从而被特别降级下来的所谓“调皮分子”。

依照该团的规定受过前期教育六个月之后，经过一次考验，如能令团中当局满意，便可准许出团，否则还要留训。留训的学生再经过六个月的后期教育训练，仍要经过考验，如不能叫他们满意，还是出不了团。考验标准他们虽悬了所谓(一)思想(二)学

识(三)品德(四)能力(五)体格，实际上是只看一点，那就是你肯不肯绝对服从他们。不过即使你肯绝对服从他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出团的。因为还有两项手续要等你办。用他们的原文说，这手续是两项：

“（一）学生曾参加奸党组织，在入团前未自首者，应行自首后，方准出团。”

“（二）学生出团，得令其取其家长或其他适当人员之保证。”

就是这两项手续办了，他们也还不放心，所以又有一条规定：

“学生出团后之指导监督，由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必要时，得通知中央调查统计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及各地特种机关协助办理。”

这些条文在实际执行上的情形，以后我还要谈到，这里暂不多赘。

这个团，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五云山总团之外，还在全中国其他各地成立六个分团，一个收容所。其名称，及在第一年中收训的人数据该最机密文件的报告如下：

（一）东南分团：设于上饶，收训赣闽浙及苏南皖南各地青年共五百零九名。

（二）豫鄂分团：设于老河口，收训鄂西北及豫西北各地青年，共二百七十名。

（三）恩施分团：设于恩施，收训湘西、鄂西、黔东、黔北各地青年，共一百一十三名。

（四）鲁苏豫皖边区分团：原设郾城后迁至河南叶县，收训山东、皖北，苏北、豫东各地青年共二百四十六名。

(五) 衡阳分团：设于衡阳，收训湘粤桂各地青年十四名。

(六) 洛阳分团：原定设于洛阳，收训豫北、陕南、晋东南各地青年，后因故缓设而改设鲁苏分团，据云系应事实上的需要，至该最机密文件付印时，尚未收训学生，但已即可收训。

另外的一个收容所，名“贵州省收容所”，设于贵阳，专收容黔省青年，然后分期送五云山总团受训，当时已收容青年七十名。

加上当时总团收训的人数三百二十二名，合计这个团开办的第一年中已收容了的受训人数，总共是一千五百四十四名。

到我进团后，分团的数目听说只多了两个，就是在傅作义所辖的榆林，和李品仙所辖的立煌，各有一个分团成立。其他分团，则以敌人进攻的关系，地址有些移动。例如东南分团，由上饶迁到了江西崇安，鲁苏豫皖分团由河南叶县迁到了皖西北的临泉，衡阳分团改称湘黔分团迁到了辰谿。

不过这个团虽然说是规模不小，分团不少，但是它并不是中国唯一的集中营，而只是康泽一系主办的集中营。中外知名的胡宗南主持的西安劳动营，就与这个团毫无关系。此外军统局在贵州息烽，四川重庆近郊等等地方所办的集中营，以及军统局，中统局在各地自己所办的羁押人的地方，都与这个团不相关连。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囚禁政治犯的地方，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从这最机密文件的报告来看，有权送政治犯到这总团里来的机关，两调统局并不是主要机关。主要机关是四川特种委员会，和它在各县的分会。此外省党部，县党部，卫戍司令部，宪兵司



令部，警察局，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专员公署，县政府。教育部，甚至教育部特设战区学生指导处，都有权送人来受训。最令我惊讶的是中正学校和一个四川涪陵同学会也有权送人来受训，此外还有主任（指康泽）手令交训及叶青先生介绍受训这么两种特别花样。

从这种事实来看，我得到了一个印象，似乎是不论什么机关都可以有权把一个人送到这集中营受训，中国人权之无保障，在此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由他们所定的制度而言，大致是每一年总可以有一大部分受过训的人出团。三年多的历史，至少是已有了三批人出团。如果每一年训一两千人，那么三年多只就康泽这一个体系的集中营讲，也已有近万的人出入过了。

不过这团中由开办就被送来，直到我被送来仍未出去的“三朝元老”也还有好几个。这几个人对我了解这个战时青年训导团，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章里，我们说的许多情形，除了采自那本最机密文件之内的材料外，就是他们口述的材料。而他们口述的材料，对我了解那最机密文件的真实性，也有极大的帮助。

## 十二、入伍教育

在前章中概括说明了战时青年训导团的组织情况之后，现在再来谈我个人在这个团里所体验到的种种。

我的入伍教育开始了。

下午都是劳作。拔草，担水，挖土，这虽然是很苦的工作，可是询问同队的人，却都表示宁愿干苦工，而不愿意上什么“鬼课”。有几个来自农村的朋友，因为有点农作技术，被派为农作班。他们的工作中包含有担粪，他们都仍欣然接受。

为什么他们怕那“鬼课”比担粪还怕？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上“鬼课”的时间，都是上午。据说因为是入伍教育，所以“鬼课”不多。大部分上午上课的时间，都是叫我们自己看总理遗教和总裁言论并作笔记，没有人来讲什么，只有一个训育员来负责监督。他也不是经常留在教室里，偶尔来一下绕一圈便又走掉，但是在这教室中的学生却不许随便离开。

在很安静的教室里，看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写写摘要。在第一二天中，我觉得过去未曾系统地研究过孙中山的著作，现在被迫仔细地阅读，也不能说全无收获。但是当我读了几章三民主义作了笔记之后，一个同难的人翻阅我

的笔记后偷偷地和我说：

“你不要太天真，你的笔记我认为写得非常不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四讲，虽然确实说过：‘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和‘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但是在这里，你一定要略过这些话不要写出。不然这里的官长会说你亲苏，亲苏就是共产党，你将永远出不了团。所以我劝你快把你写的那一段撕掉。用笔抹掉都不行，他们会在本子上看出来，他们都是些专门想在鸡蛋里寻骨头的坏蛋。”

我答复他：“这不都是孙中山的遗教么？他们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怎么能看见人家引用孙中山的话而说他是共产党呢？再说这两段话在民族主义中很重要，怎么能略掉？”

这个同难听后摇摇头，意谓我这个人简直不懂好歹。我在笔记中也始终未把这一段撕掉。不过以后我注意看其他同难的笔记，竟完全是略掉了的。

由此我懂得了所谓读什么东西作笔记，在集中营里的人，也都是以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应付的。这种心情，未尝过文字狱苦味的人，当然不会懂得。到此我已了然，同难者为什么不喜欢上上午上课的一段时间了。

但同难者最厌恶的，还不是这个，他们最厌恶的是真有人来给我们上课。在入伍教育期间训导团为了节省经费，来上课的“教官”很少，可是每一周仍有两三个人来。上什么课呢？普通课也有所谓哲学概论、历史、地理之类。此外就是军事学，则有所谓步兵操典、陆军礼节之类。

不过不论哪一种课，如果你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你一定会惊讶这些所谓教官的胆量之大，一面却又时时为他们捏一把汗。

普通学科的教官，虽然也是信口胡说，像讲历史仍在乱扯什么轩辕皇帝，但是他们识字大至还无问题。至于那些军事学教官往往是连步兵操典的句读都分不清，且有时突然遇见一只“拦路虎”不认识它，又不知如何办，就囫圇吞枣略过去了事，叫我们一面可怜他们一面又痛恨他们。大好的时间坐下来听他们鬼扯，无怪同难者叫上课作上“鬼课”，总想用种种方法逃避了。

此外，受入伍教育的人不喜欢这上课的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进了团的人，都被迫要写一篇自传，写自传的时间就指定在这上课时间内。进团后读总理遗教、总裁言论的笔记缓交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这篇自传，总是接二连三地催逼，非在入团后第一个月内交出不可。

写一篇自传本不是难事，不过在集中营里写自传，又要在他们指定的范围内写，就成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了。有许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过去公开给集中营的官长，可是又怕对他们不公开而捏造一段假自传时，万一被他们察觉将被认为不坦白而加重了自己的罪状。还有一个困难是被送来这里的人，十个有九个曾在军统局、中统局、特种委员会、宪兵司令部、卫戍司令部、党部等地受过酷虐的体刑，被逼承认过根本莫须有的事。现在叫他们写自传，他们怎么写呢？写过去自己在其它机关承认过的事都是谰言，集中营的官长们一定不相信；说过去被逼承认过的事都是事实，可是那根本不是事实。因为不是事实，所以自己已很难记得自己曾承认过什么事。即使想把曾承认了的再写出来，也记不齐全了，这也一样可以构成不够坦白的罪状。

还有先来这里的同难间有一种传说，说中统、军统等机关对这个训导团向采不合作的态度。为什么这个团要进来的人，每人写一

篇自传？就是因为被送来的人的案由中统、军统送人来此时，从来不肯抄给他们，所以他们只有靠每个人的自传来了解每一个人的过去。因此这些先进的同难坚持翻供主张，叫大家不要再承认在中统局、军统局承认过的那一套，而不妨再另乱写一套。这主张使许多人觉得很动听，且对自己有利，可是又觉得万一这些先进同难的话并非事实，训导团与中统军统都有联系，可以调阅卷宗，那自己岂不将被证明素不诚实？许多同难为此曾踌躇很久都不敢下笔！

再说这自传也确难写。为了写自传，训育员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发有一篇写自传的说明。要把一切都写得非常详明。例如先问姓名、籍贯、年龄、求学经过、工作经历、有无兄弟姊妹、曾否结婚、婚姻是否幸福、有无子女、子女年龄、已否入校，关于个人历史可谓问得已无微不至。以下再问因何被捕，被捕经过，及送来训导团经过。最后则询问个人的政治关系及对国是的意见，如对国民党的意见，对共产党的意见等。

向一个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询问他关于国是的意见，这谁也知道那等于和这个政治犯开玩笑。如果中国许人民自由发表意见，他何至于进了集中营？如果根本不许人民自由发表政见，有人偏要自由发表以致进了集中营，这时忽然要求他发表政见，他将有什么感想？他心里当然很明白在这时征询他的政见，无非是叫他们投降的意思。他如果不顾一切说出来为当局所痛恨，但为他自己所笃信的真理，那只有更加深他自己的罪状，使自己因在集中营里永远出不去而已。

所以这一写自传的办法，对每一个初进团的人都是一大难关。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拿着发下来的自传写法说明，看了整整半

天，结果写不出来一个字。有的写了一个星期，只写了几百字便再也写不下去。有的已经写了几千字，突然自己感觉不对，就把它全部撕毁，再重新写起。我认为这件事对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实在等于施以一种精神上的酷刑，是比施以肉体的折磨更令人痛苦的折磨。

不过这件事对于我倒很简单，并没有折磨到我，我用了三个上午便把自传写成了。他们问我的过去，我把自已求学教书作记者的经历都如实地写了出来。我没有什么怕他们晓得，所以一点也用不着隐瞒。问我被捕经过，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如何被绑架而失了自由。问我对国是的意见，我说言论自由民主是我一贯的要求。问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见，我引他们发给我的总理遗教中孙中山主张容共的话，并引在总裁言论中蒋说过的对中共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的话，作为我以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应当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的根据。我说这是我一向的主张，也是国民党领袖的一贯主张，因为蒋在抗战后确也从未公开说过一次反共的话。

我的自传写好后，同队的人都要求看，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许多人都咋舌说：

“你真的就这样交给他们么？”

“为什么不这样交，否则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这答复使许多人不再作声。但也有真正爱护我的人，偷偷地来劝我，最好不就这样交出去。他们的理由是：“这地方是以共产党当敌人的，主张国共合作，他们将把你当作共产党，当作他们的敌人，你将吃很大的亏！”

我明白他们所谓很大的亏，是不能出团。我早已想过，我根

本是不可能出团的。他们办这个团的目的，是把每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彻底地毁掉，把他变成屈辱到再也抬不起头的人，然后才叫他重回到社会中去。这一点，在我到团中住了两星期后我已洞若观火地明白了。

他们利用所谓训育讲话的时间强迫一些曾承认参加过共党的人到讲台上去作自我批评，这是又一种精神上的酷虐刑罚。自己要说自己过去太糊涂以至误入歧途加入了共党，然后把共党大骂一顿，所骂的理由，不外是共党向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则须说自己现在得救了，今后将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努力奋斗。

这样把自己的过去痛骂一顿还不够，因为骂一次之后，仍然是口说无凭，所以训育员们还要叫他把自己说过的写出来，在这个团办的刊物上登出。这种刊物是公开发卖的，每一次出版一定在报纸上把作者和文章的题目在广告栏里刊出。那么只要是认识你的人，你自己侮蔑自己的文章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在社会上，凡是进步的朋友，都会认为你是已经自首过了的怯懦分子而不再把你当作朋友，他们毁掉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有许多人，根本没参加过共党，只以在中统局或军统局中吃不消酷刑而曾自承为共党，到这团里后又告诉团中官长自己曾在特务面前承认过是共党，那么这一套自辱把戏，必须一一履行。某些人因为一再受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已习于屈辱，而抱了自暴自弃的心理，于是任他们叫他如何都可以，他只要求能早出团。这样团中的官长和这类学生遂各得其所，官长是混一口饭吃，学生是混早出团。

我自问没有可能受这样屈辱。我不是共产党，但也不是国民党，我有我的独立意志，我要自由思想，要自由地行自己之所信。

团中这些官长，一定不能允许我有这种思想和行动，最后一定是对立、冲突、永久出不了团。这种事实既然是可以预先见到的，那我还有什么顾忌的必要？反正是出不了团，为什么不从开始就抱定不屈不挠的态度！我的自传就是在这种心理下写成的。俗谚有云：“拼了一身刚，敢把皇帝老子骂”，我的自传终于就这样交出去了！

对于每一个进团的人的自传，据说都要由主管训育员考核并加按语，然后送给训育组，作为是否准许出团的标准之一。所谓训育员的考核，就是找了每一个人到他住的房间里去谈话。对这种谈话，每一个人都怀着不安的心理。因为每一个进团的人都可以由他们的“先进”那里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同时还知道这些所谓训育员们，个个都是以敌视这些人为职业的。他们决不会对任何进这个团的人具有同情心，他们胸中所怀的也是想“在鸡蛋中寻出来骨头”的心理。你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有一点前言后语不符之处，否则不真诚、不坦白、狡诈之类的评语就会批在你的自传之上。

此外先进们还告诉我们这些后进，训育员喊你去时，并不能就去，一定要先到区队长那里去请示，是不是准许去。因为训导团对于这些学生，采取的是三权鼎立的管理制度。所谓三权，就是管、教、训。管由总队长负责，教由教务组长负责，训由训育组长负责。三权既然鼎立，于是就各不相下。各不相下的结果，当然是学生倒霉。

负责所谓“管”的队上官长，多半是康泽在合川主办的特训班出身。也都是读书不成器，想混军队的人物。学识谈不到，又受过以反共为职业的基本训练，所以他们都养成了以虐待非国民党人为他们的天赋的神圣权利的心理。



负责“训”的也多出身于那同一的训练班。可是职业上有了界线之后，心理也就产生了界线。因为决定学生出团，训育员的报告关系比较重要些，在学生中威信就比较大。于是负责“管”的他们的特训班的同学们，竟吃起醋来。因而利用“县官不如现管”这一实权，相互争风，弄得所谓学生大受其夹板气。

训育员到教室里来喊一个学生到他的宿舍中去谈话，他安敢不去，去了回来，区队长就会把你叫去大骂一顿，问你为什么敢不请示队上就去和训育员谈话。如果你说是训育员亲自来喊，所以只好立即跟了去，他就会告诉你，不管谁来喊，一定要叫他写条子通知队上才能去。下次训育员再来喊，你如据实把区队长的话告诉训育员，训育员又会告诉你：“不要睬他们，你跟我来！”你安敢不跟了去！这种不讲理的折磨，作了训导团的学生除了忍受之外，便再无其他更好的应付办法了！——这也是叫学生怕与训育员接近的一个缘由。

所有这些叫学生感觉苦恼的事总是在上午发生。下午在作苦工时，便没有这些麻烦。大家于是宁可欢迎作苦工的下午，而不喜欢安闲静坐的上午。并不是他们反常，喜劳恶逸，实在是为了那种精神上的劳比肉体上的劳更叫人吃不消！

## 十三、学生的学生

到社会上作事二十年后，忽然又倒退回去做起学生来，自己实在有点不习惯。例如被人连名带姓合起来喊，这件事就是叫我感觉不习惯的一端。二十年来总被人称呼某先生某兄，至亲近的也只不过唤一声名字，一旦忽然连一个勤务兵也可以连名带姓地喊我，不由自己地便要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但仔细想一想，这实在是自己的阶级观念在作祟时，对同难的朋友，私下总是称呼我先生或兄，反感不安起来。——我认为我应当完全忘掉自己的过去，来体验一下作为一个小兵的新生活。不料中国这个“土地虽然很大，可是社会圈子却非常之小”的国家，却不允许我那样作。

因为过去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混过若干年，致使抗战后流徙到任何一个小地方，总会遇到熟人。记得我由汉口飞到迪化的第二天，忽然有人到我住的督办公署来拜访我。见面后知道他是一个在五年前我在北平民国大学教过的学生，这件事已够叫我惊讶了。不意这次在五云山落发自己重作了学生之后，竟又遇见了类似的事情！

我的入伍教育开始了一个多月之后，由每周的课程表上，我

们突然发现，向来由训育员监督的读总裁言论的课程，换了个姓樊的教官来指导。这一新的改变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他来上课时，照例点过名，讲了一套他主张的研究总裁言论的方法，谁也没注意听。下课后，我才要到教室外去散散步，忽然训育员来找我：

“樊教官想跟你谈谈，你认识他么？”

我说：“我想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认识你，他说他是你的学生，在北平跟你读过书，你就跟我来跟他谈谈吧！”

跟着训育员走进他的宿舍，樊教官很恭敬地站起来，伸过手来和我握手，请我坐在室内所谓上座的一张椅子上，然后开口说：

“萨老师怕不记得我了吧！”

“是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是北平十七高中的学生，你在那里教书的时候，我正在那里读书……”

我想起来了，那是十几年前我在北平民国大学教书的时候，民大教务长焦实斋新兼任了河北省立十七高中的校长。这个学校在北平地安门外，是一个办得不坏的中学。他坚邀我去兼任点钟新闻学，我答应了他。这个樊一定就是那时候的学生。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我约略地和他谈了一下来这里的经过。他对我说：

“有机会我一定向这里的副主任报告一下老师的情形。可惜老师不能出去，不然我的家就在这团附近，应该请到家里去吃一顿饭。”

我们这度的谈话，当天下午便传遍了全团。因为任何一个学生被训育员喊了去，全队的人照例都会关心。所以当我离开训育员室后，即被其他同难包围了起来问长问短。我据实告诉了他们，他们便把这件事当作新闻，很迅速地散布了出去。

这件事发生后约两个星期，团中一天忽然紧张起来。区队长下命令切实整饬环境卫生。平日对于环境的种种勤务，就是队上官长“整”学生的一种题目。地未扫干净，花圃未整理好，都会被罚。这一天下的命令比平日就更严格了！阶前的阴沟需要通；操场上的细草固须拔净；甚至地面的青苔也要铲光。至于寝室内的内务，也是不只被子、毯子要叠得比平日更见棱见角，连一个口盅的柄放在面盆内，应当向哪一方也要一律。

“这是为什么？突然这样紧张起来？”我偷偷问一个同难。他告诉我：

“听说是因为副主任汤如炎要回来了。他到成都去参加一个三青团的夏令营，已两个月。现在一旦要回来，这些奴性十足的人，自然要抓着鸡毛当令箭来‘整’我们这些倒霉的人一下了！”

“汤如炎是怎样一个人呢？”

“听说也是黄埔出身，和康泽是同学，可是离开黄埔后并未干过军队，而回到他的湖南本乡去办学校。直到近年才被康泽喊出来，在三青团中任职，并兼这里的副主任。康是一年难得到这里一次的，事实上这个团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由于这段话，我对这个副主任开始有了一点概念。

这样紧张的生活过了两天后，汤如炎回来了。在早晨升旗的时候，他第一次在我们面前露面，四十岁上下的一个人。在他向大家训话时，报告他去游历川西北几县的感想。这与我们这一群

政治犯有什么关系？我猜想不出。但也只好伫立静听。不过由于听他谈话，我倒有了了解他的机会。

由他的谈吐中，我知道他读过些旧书，孔孟哲学大概是他的思想基础。他谈了许多川西北小民族的强悍，以及为种鸦片而产生的官民间的斗争，谈了许多问题都搔不到痒处。于是许多团中官长，在他未归之前为我建立起来的他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的幻象，首先在我心上破灭了。他的观点已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人，我安能在他身上寄托什么希望。

根据过去听到的许多官长对我的问题的推测，有几个同难在汤回来后偷偷向我建议写个报告要求与汤面谈，也许容易出团。我告诉他们这种万一的机会并不存在，我知道我的问题也不是汤这样的人所能解决的。

汤回来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忽然由我们的训育员那里得悉我这个学生的学生樊教官奉汤副主任的命令不再上第二队的总裁言论课了。又过了几天，队长叫人来喊我去说汤副主任要见我，他决定了叫萧区队附陪我去，并要我快点把绑腿打起来，系起来腰皮带。

在萧的陪伴下，我又走到了第一天入团时曾到过，平日则很少走到的训导团的神经中枢区。三间房，中间是客厅，左边一间，门外挂着主任室的牌子，右边一间门外则挂了副主任的牌子。可是汤这时却在主任室内。我的学生樊教官也坐在客厅内等候传见。

我走进去不久，樊即被喊了进去。樊走进去，即自道姓名、职位，显然汤并不认识他，然后再说“特来辞行”。汤用官腔应付了他两句，他便退了出来，只低声和我说了一句“再见”便跑了出去。这时萧区队附便站到主任室门外恭敬地喊了一声报告，然后进去

说：“萨空了来了！”等我走进去，萧即退出来。汤请我在他的写字桌对面一张藤椅上坐下，然后和我谈话。他首先说：

“师道尊严，所以我知道樊某过去是你的学生时，我即停了他的职……”到此我才明白樊的饭碗是不幸有了我这么一个老师打破的。跟着他也照例地问我的经历和来团的经过。我简略地答复了他的询问，跟着我就对他提出来我一向在追询着的两个问题：（一）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罪？尤其是逮捕之后，一囚经年，全不审讯，是什么意思？（二）我有两个女儿留在桂林，无人教养。桂林调统室曾答应我把她们在一个月內送来重庆，现在已过一月没有一点消息。我的两女如果流离失所，谁能负这责任？最后我更加重语气讲：

“过去一年中，我从未遇见一个政府方面的负责人，所遇到的都是一些没有一定姓名的特务。现在在这个团里，遇到了这个团的最高负责人，我想我这两个问题，应当可以获得解答了！”

汤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交了一件公文给我看。那是由徐恩曾签署、中央调查统计局致战时青年训导团的送我受训的文件。文中的主要语句是：“奸伪分子，与新疆阴谋暴动案有关之萨空了，现奉谕交贵团长期管训。”

我看了之后就问汤：

“中统局加在别人身上的罪名，是不是也容人分辩呢？关于我个人的罪名，今天我是第一次正式听到，但是全非事实。然而为此我已被囚禁了一年多。如果这个政府说，就是这样不讲理，那我自然无话可说了。如果在这个政府之下，还有道理可讲，那我就要说，这样囚禁我，我认为完全不合理。我要抗议政府这种不讲理而随便剥夺他人自由的作法。”

“政府当然是讲理的,你有什么意见尽可以讲。”这是汤的答复。他既说了许我讲,于是我就先对中统局加诸我的罪状加以驳斥。

我对汤说:“关于奸伪分子就是在被捕之后才知道那是共产党的别名。现在给我戴上这么一顶帽子,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多作什么分辩。二十年来我在社会上作新闻记者,我的行为一切都昭昭在人耳目。如果中统局都不能知道我是否共产党,那我除了笑他们的经费人力完全都浪费了以外,不想再说什么。至于说我与什么新疆‘阴谋暴动案’有关,那我就要问,所谓新疆‘阴谋暴动案’是哪一年哪一月发生的?在盛世才的统治下,可以说年年都有所谓‘阴谋暴动案’。是以不能只含含混混地说与新疆的‘阴谋暴动案’有关,而一定要指明是哪一桩所谓‘阴谋暴动案’?在那一桩案子发生时,我还在不在新疆?如果所谓‘阴谋暴动案’发生在我离开新疆几年以后,或发生在当我寄身于距新疆万里以外的地方之时,而谓我与一个时隔数年,地隔万里的什么‘阴谋暴动案’有关,中统局自己想想能否自圆其说?谁也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谁也知道时隔数年地隔万里不会搞得成什么。那么所加给我的罪名,即以诬陷说,不也太不技巧了吗?”

汤听了我的话之后,没有什么话可讲,就说:“你可以把你在新疆的时间写给我,我去向中统局代你交涉。”我再提出来我所提的第二个问题问他应当如何办,他也说他要询问中统局才能答复。

这些话谈过之后,汤又和我客气了一阵,并问了一些关于我的生活的话,表示他对我的关切。到他没有话说了之后,我就退了出来。

我和汤这次会见,在官长学生间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尤其是我的严正的质询态度，和汤的特别和蔼的态度，在他们心中都认为是罕见的现象。

谈话后第二天我写了我在新疆的时间和在新工作前后的情形，托队长转给了汤。同时我重述了一遍我当面和他谈的话，要求他早日解决我和我的两个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叫自己把这件事忘掉，因为我知道对这些事寄托希望，才是真正的愚蠢。

为了樊教官问题，我们的训育员证实了我在自传上所写的曾在北平民国大学教过书这件事之后，有一天他忽然又找我来谈，他说：“在团中我又发现了一个你的学生。”

我问他是谁？他告诉我这个人叫朱念群，现在关在禁闭室里，因为他不肯受训。我知道这个人一定就是张班长在我一进团时和我谈过的那个叫他们“整”得很苦的那个人了。关于这个人我在进团后一个多月中已又听到了许多消息，并且也听见说过他是民国大学的学生。据说在这团里曾有一个区队长赵××是他的同学。这个赵××，依照我的记忆，似乎在北平民大新闻系的学生中，确曾有过这么一个人。不过到我进团时赵已离团它去，现在再由训育员说出，也许朱是我的学生并非假的。

不过在各种传说中，叫我很难判断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人告诉我他曾在延安读过抗大，后来离开延安，就被抓进了西安的劳动营。在劳动营里被“训”了一个时期之后放了出来，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过事，参加了朱家骅那个系统。后来即混到了国外，想去苏联。

这次被送来团，是当他到了伊朗之后被戴笠在国外的人发现，把他弄了回来的。时间大约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开罗会议之后，提回来送到训导团来，他竟坚决拒绝受训。为什么他过去



在西安劳动营时不拒绝受训，现在却拒绝起来？这些说法都叫我不能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对他这个人也就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心。

我们的训育员所以向我来提他，他的目的，最后说了出来，是想叫我去看看他，劝他接受训练。

对于这个要求我给他的回答是：“我可以去看看他，但是他是在禁闭室中的人，训育员叫我去看他，队上会不会允许呢？还有朱愿意不愿意意见我呢？再说即或可以见到他，我也不能负责去劝他受训，因为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朱已表示过愿意意见你了。他是你的学生，也是他自己对我承认的呢！”

这时候我由同难那里知道团中官长因为汤如炎回来，朱仍不肯受训，怕受责难，正在想种种方法劝诱他。训育员想找我去劝他，也是他们所想出来的方法之一种。

不过在这以后他们始终并未叫我去和朱见面，大约是因为他们并不信任我，不相信我和朱见了面会能使他答应受训。

可是朱这个人，却由这时起更叫我注意他了。每有一个同难为了一些事故关入禁闭室三天或一星期后放出来，我都要问问他们在里面和朱见面没有，曾谈些什么？我的关切，也唤起了许多同难者对他的同情。禁闭室中的人的伙食，照例是由队上的值日同难负责分出，交炊事兵送去的。大家为了同情他，总是多分一点给他。有一次我还送了一点钱给他，也是为了有人住过禁闭室后出来说，在禁闭室内有钱也可以买东西，由守禁闭室的兵代买，不过贵一点。又有一次天气渐冷，朱有些衣服存在第二队的贮藏室里，要求队上官长送给他，几次都没有结果，他就托由禁闭室中放出

来的同难告诉我，请我帮忙。我遂找了一个机会和第二队的队长委婉提出：“朱某在团中因为不肯受训始终在穿他自己的衣服，可是他的衣服都存在第二队贮藏室里。现在天气已冷，大家都发了棉背心，他自然也需要加衣御寒，据说他已请求了几次要他自己的衣服，但是队上未送给他，不知道队长是否知道？”

我的询问是当队长要求我帮忙他作点事时提出的，为了表示酬谢我，他说：“他自己的衣服当然可以给他，就由你找班长一同为他拣出来送给他吧！”

当我去拣他的箱子时，我发现箱子中已没有什么东西，只还有一件破大衣，一件破西装上身，一条围巾，就都给了队上的勤务兵给朱送去。

据陪我拣箱子的班长说：“我曾看见过这个箱中有许多东西，而且都是由国外带来的，很好的东西。现在不晓得怎么会都不见了。”

为朱作这件事，也又助长了一点我对训导团内部腐败的认识。

在这以后约计一年的时间中，我知道团中对朱曾使用种种手段压迫他，叫他受训。他的头发养到不能再长的时候，只好被推成光头。他不肯上课堂受训，他们就排定了一个课程表叫教官轮流对他进行单独教授。但是并不告诉他那是单独教授，只是把他从禁闭室中放出来，由去作单独教授的教官和他在露天的院子里对谈，一天换一个人。起初朱似乎还很高兴，因为可以走出禁闭室来换换空气，且有人和他谈谈，比孤独地呆在禁闭室里好。几天后，他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他又开始拒绝接受这种露天训练。教官们也都感到为一个人这样卖力气不太合算，于是以朱仍

不肯受训为借口中止了单独教授。为此，据说朱曾受过体刑，坐过长期重禁闭。最后大约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交，他在这训导团中过了一年多禁闭生活之后，被送走了。据说是送回了原来送训的机关，但另外也有一个谣传，说他已被枪毙了。这个所谓是我学生的人，下场到底如何，至今在我心中仍是一个疑问！

除了樊、朱之外，后来我发现还有七个也可说是我的学生的人，进过这个训导团。这七个人，都是在一九三九年我由香港赴新疆时，参加过我所率领的远征队的人。那时候他们都是高中才毕业的学生。因为读了杜重远所写的为盛世才宣传的小册子：《盛世才与新新疆》，遂产生了赴新疆的意念。在千百个青年中他们一共有十七个人，算是最幸运的，受过新疆学院的入学试验而被录取。他们都是想学土木工程的。可是这一群在当时被大家认为最幸运的人，后来在事实上证明了，他们是最不幸的一群。

新疆学院在内地招生本出自重远的提议，但立即得到了盛世才的赞许。最初想至少录取六十人。学工的，学社会科学的都要。重远回到重庆把这件事委托给邹韬奋、张仲实代办，就和我飞到香港。据说当时并未公开招考，也没在报纸上登过一次招生广告，可是生活书店已收到上千封打听这个消息的信。后来因为盛世才的一再变卦，只考取了十七个学工程的人，而叫我经过重庆时把他们带去迪化。在从重庆到迪化的途中，他们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两三个月，他们都曾以老师的地位看待我。

到了迪化之后，他们的幻梦破灭了，很过了几年不愉快的日子。在盛世才决定转变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之后，同时决定把他们送回内地。大约是一面送他们回来，一面也打电报给国民党当局，报告这些人已被遣回。所以他们回到兰州之后即被中统局派

人监视，由兰州跟踪他们，一直跟到成都再到重庆。这十七个人在兰州、成都两地都有人离队，所以到重庆时已只剩下了七个人。这七个人被一网打尽捉了送来训导团。不过到我进团时，他们都已经过了一年以上的训练奉准出团了。

出团后大部都仍进了大学续读土木工程系，他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好奇而赴新疆，结果是浪费了几年光阴，以至他们的许多同学都在大学毕业了业，他们还在作大学生。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这几年的经验，对他们也是很珍贵的收获。他们过去的幼稚冲动，现在已洗练为老成持重了。

一个出团后到复旦大学入土木工程系的学生C，乘暑假的机会曾回到团里来看他的朋友，遇见了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所有其他曾随我赴新的许多人的消息。我问他是不是后悔去新疆，他摇摇头。虽然在新疆吃了许多苦，回来之后又在这训导团中吃了许多苦，他说这种苦作为中国人大约总是要吃的，早吃也许比晚吃还好一点。他的看法当然是一种达观的看法，可是我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今日作一个人，所过的那种任人抛弃的皮球似的日子，不持这种达观看法，也实在活不下去！

我自己的生活圈子并不太广泛，教书的时间不过是在北平的二三年。当我走进这个集中营之后，竟碰上了这么多的学生，我以为这可以证明社会上爱好真理正义不畏刀斧的人还是很多的。同时也许从另一面来看，我应当说，他们办的集中营中收容的被无辜逮捕的好人太多，所以才造成了这些巧遇。

## 十四、集中营里的医药

我进了战时青年训导团这个集中营之后不久，便生了一场大病。生病的缘由共有两个：一个是属于身体的，一个是属于精神的。在桂林时我虽失了自由，可是生活仍和我平日的的生活相差不多，每天吃的并不太坏，工作是写写文章，甚至比有自由的时期还清闲。到了重庆，就不同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兵。吃得坏，体力劳动远多过脑力劳动；又以初来，许多关系搞不清楚，身上还有一些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买到补充营养的食物，因此身体遂一天比一天显然地差起来。

就在这时候，我的一些在重庆的学生，知道了我已被移解到兴隆场，他们就推举了一个Y到团里来探望我。Y通过了他的许多私人关系，知道到团里来看我不会发生问题之后，坐了一乘滑竿跑来。

我正晒在太阳底下劳作，他站在农场旁代表他的同学送来了一点钱给我，并说了些安慰我的话。我对他之来，当然非常喜欢，因为训导团虽说准学生与他的家族朋友通信，但是寄出和寄进来的信都要经过训育员的检查，每月写出的信且只限两封，弄得消息非常不灵通。我这时急切地想知道我的孩子的消息，还有郁

风的消息。我不知道她们是否已知道我安抵重庆现在兴隆场，亟思设法通知她们。Y对通知我的孩子立即表示愿负全责，说到郁风，他却不响了。我再说一次逼他答应我这件事，他沉吟了一下，然后对我说：

“我希望您忘了这件事吧，她已经和别人订了婚。大家怕您听了难过，叫我不要告诉您，我想早晚总会知道，所以不想再瞒着！”

我当时真不相信他的话，我说：“也许那是一种烟幕，为了减轻特务对她的注意。”

“不，确是事实！”Y给了我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容不相信了。我遂说：“那么就叫我自己写信给她吧！”

Y走了，他走时似乎很担心带给我的消息会给我太大的影响，一再说，要我想得开阔一点。我笑着告诉他不必担心，我受过比这更大的打击。我说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安慰Y的词令，我确实自信我经得起这个打击。当天晚上，趁着上自修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去成都可以转信给她的人说，“我已由别人处听到了你又订婚了的消息，我不能相信，可是言之凿凿又不容我不相信，我愿意直接由你来证实或否认这件事。”这信我是托了奉派到兴隆场去赶场采买菜蔬的同难代寄的，并未照正常手续交训育员读后再寄。这当然有点冒险，因为团中有一种传说，在兴隆场的邮局中住有一个训导团的职员，负责检查有无团里的学生私自发信。可是这封信我宁愿冒险也不愿送给人检查。我这封信根本用不着署真名，我相信假使邮局有检查也大约逃得过去。

在理智上，我虽深信我经得起这个打击，但是在感情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叫我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并且很难分析是由哪

里产生的，在理智上已决定忘了那一切，可是它似乎仍不免会悄悄地回到心上来。精神上的悒郁，加在日就衰退的身体上，于是我病倒了。旧日的胃病、心脏衰弱叫我倒下来，跟着又恢复了失眠。团里的伙食我已不能再吃，吃下去就胃疼，没有东西可垫的硬板床，长天睡在上面，睡得全身皆痛。为此，我遂不能不乞灵于团里的医务所，因而增加了我对医务所的认识。

医务所主任是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出身。医官一共两个，一个是贵阳医学院毕业的政治犯，送来团里受训，因为他懂得医道，很快就准他出了团，但是以留在团里作若干时间的医官为条件，他只好留下来。因为他曾是团里的学生，所以对同难，比较还好。不过因为人多，医官少，逐渐养成了他对工作敷衍的态度，看病总是马马虎虎。另一个医官则是跟医务主任多年的看护，医理修养非常浅薄，但以他是一个乡下人，人很老实，自己也明知自己能力差，倒肯兢兢业业作。然而他的勤并补不了他的拙。至于医务主任自己，由他的学校我们已可判断他不是第一流的医生，他得到这个位子是因为和康泽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为此他遂常常不在团里工作而把这主任职位看成一个挂名差使。医官之外还有一个看护长，也不是受过正式看护教育的人。至于配药的人和看护都不过是一些在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受过小学教育，又还聪明的人而已。

医务所由这样一群人组成其简陋已可想见，再加上训导团中流行的官僚主义浸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于是他们在医药上所能贡献的一切和团中政治犯在医药上的要求，其间的距离，就差得太远了。

为了减少他们的责任与麻烦，医务所虽然可以留医，但是他们总是尽可能拒绝团里的同难由队上搬进医务所。一方面是为

了省事，一方面也是怕万一有人从医务室逃走，他们可能会受到处分。

此外他们还掌握着团里学生是否可以请病假和请哪一种病假，如“全休”或“半休”的权力。全休就是不上课，不上操，不劳作，甚至可以搬进医务所休息。半休则是仍须上课，不过操可不上，劳作可以免役。他们既有这种权力，对团里的同难他们也就有了相当的威风。如果哪一个同难平日对他们客气得不够，则需要他们作证请假时就逃不掉他们的刁难了。

如果谈到医术，那可以用一句话说完，那就是凡是由这个医务所治得好的病，大部分是不治也会好的病。真正的疑难大症，请他们诊治，能医好的希望，大约并不太多。

我的病就是靠了自己过去患病时的治疗经验医好的，并没有住过一天医务所。并且靠了我的一点可怜的医药常识，还有时帮助了医官的诊断。

一个朝阳学院的学生L，就是在我卧病的时候送到团里来，送来时已是奄奄一息。据他说，在送来之前在卫戍司令部监狱里已住了一年多。他的病状是身体弱得不堪，全口的牙齿都已摇摇欲坠，不能咀嚼任何食物，只能喝一点米汤或稀饭，不过神志却还清醒。于是在大寝室中，我算多了一个伴侣。可是我们很少交谈，因为我没有精力交谈，他就更懒得开口。

一天中午我正在午睡，突然一阵人声把我惊醒。几个同难和一个勤务兵把L抬了进来。我起来询问什么原因，据说L到厕所去，走到操场上突然晕倒，所以抬他回来。同难都说他是中了暑，有人便拿出来一些暑药给他吃。我下了木床来看他时，他已经清醒过来。我看他的情形，显然并不是为中暑而晕倒，乃是为



了虚弱而晕倒。休息了半天之后，我仔细问他天天到团里的医务所去，他们给他怎么医治呢？他说：

“他们只给我涂点药在牙齿上。”

显然他们在把他的病当作牙病在治。但根据我在桂林被囚禁中读过的几本论“维他命”的书来看，我感觉到他的病，很象书中所说的，缺乏维他命的现象。有一本书中曾指出南美洲的黑人，因为长年吃玉蜀黍，缺乏维他命C，遂患一种坏血症，牙龈出血，牙齿动摇。我回想L说的在卫戍司令部的年余中所吃的不能吃饱的囚粮，当然比南美的黑人生活更苦。现在他的病也是牙齿动摇出血，自然不会是什么牙病，而是缺乏维他命。

于是我跑去医务所找到那曾作过政治犯的医官，因为他是比较有点知识也还肯同情同难者的人，向他提出来我的推想。他说L的病是另一医官给他看的，他不知道他的病情，但照我所说的情形听来，似乎我的推想很有点道理。我再拖了他到寝室中给L诊视，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下诊断说，要治L的病，只有增加他的营养。他需要吃得好，他需要吃桔柑这一类的东西，至少也需吃番茄，最好能吃些鸡蛋。

我们的菜圃这时恰巧正有番茄收获，队上官长把成熟的番茄摘下，拿了一部分给同难分配。我向同难建议，为了救治L的病，把番茄全部都送给他吃，得到了一致的同意。两个星期后他竟逐渐康复起来！这一个例子，我想已足够说明这个医务所所能给团中同难的医药帮助的程度了。

不过在许多小疾病上，对同难者自然还是有它比没有它好。例如团中最流行的疾病是胃病和皮肤病，这些由于监狱里粗劣食物和污湿环境的恩赐而来的毛病，有点苏打粉，硫磺膏，都可减少

患者的痛苦。不过就是这点小帮助，这个医务所也还不时叫人失望。因为他们是有预算的，每月只能领到一些苏打粉。如果那个月患者突增，预算的药粉用完，便须等到下个月一号才能再有药吃。所以在团中如果生病最好是在上半月，可以一定有药。如果在下半月生病，即有无药可吃的危险。万一你生的病需要吃价钱贵一点的药，那问题就更困难了。疟疾在四川是一项很普通的流行传染病，但是在抗战中，奎宁丸因为国外来源不畅，竟成了珍品。于是这个医务所对于要吃奎宁的病人，就规定了一种去医务所吃的特例。发着高热他也要你到医务所去吃药，而不能领回去自己吃。理由是怕你不把药吃掉。问他们团里的政治犯怎么可能出去卖药？他们的答复是可以卖给团里的勤务兵，再由他们转卖到兴隆场药店里去。这种事在他们没说出之前，不但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我连听都没听见人说过。但是他们要防范，我们打了摆子就需挺着高热亲到医务所去吃药。假使你生的病所要吃的是比奎宁更贵重的药，据说则须由医务所主任，甚至转请副主任批准才准服用。假使是急症，那么也许尚未批下来，人已经死了！

此外这个团里还有一些政治犯所患的病，医务所认为是与他们没有关系的，那就是神经病。

在我所在的第二队中就有三个神经病患者。一个是中央大学教育系四年生，一个是航委会的职员，一个是贵州盘县国民党党部书记。

那个中央大学学生是一个山东人，结了婚。因为思想问题被捕，也是被关了一年多才送来团中。我到团里时他已来了年余，但仍然没有出团的希望。他所患的神经病的情形是神志并不十分混乱，乍与他接近，甚至完全不能发觉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可是与他相处半日之后，你就觉到他的心理是不正常的了。他所表现出来不正常的情形都是很轻微的，例如他的话很多，甚至自己一个人走路时口里也总是滔滔不绝。说话的内容并不是全部错乱，他甚至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文章，读起来理路也还清楚，不过其中却必有些荒谬的地方。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的句子：“三民主义既不足以抗战，亦不足以建国。”他在答复“现在是军政时期还是训政时期”时，他答复是“军政兼宪政时期”。

就因为他的不正常并不太厉害，于是团里的教官，队上的官长和训育员，都认为他不是有什么神经病，而是故意捣乱，为此他曾受了许多不应受的欺侮。一个区队长曾用竹扁担殴打他，直到把扁担打断。至于关禁闭，那对他更是家常便饭了。我研究他为什么会神经不正常起来，有知道他的底细的同难告诉我，在他被捕之后不久，他的太太便遗弃了他另嫁了别人，是使他发狂的主因。所以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谈到他的太太时，他的不正常一定要更厉害一点。

那个航委会职员的神经病就更比较来得文静。他从来不讲一句话，你和他讲话，他也不大回答，回答也一定很简单。上课时他决不听课，但不上课时他也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上操时他倒也还能跟着大家一样的动作，如果动作烦难一点，他就有点不能跟得上了，可是他还肯努力追随。他最常有的表情是笑，一个人仰望着天空发出那种像看见他的爱人一样的出自心底的微笑。这虽不是令人看了不愉快的表情，可是当你明白那是他的发狂的表现时，那种笑脸，就更叫人感觉到可悲。他的神经的更不正常，由他写的文字可以看出来。没有一篇他写的文章可以读得通，读得懂。从同难那里知道他到团里来时并不是这样的。他本是航委会一个会

计，有妻有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抓了起来。关了一个时期，又送来训导团，他的痴笑大半是为了怀念他的妻和子。

至于那个贵州盘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则是一个更可怜的政治犯。他曾作过县党部书记，可以证明他曾被认为是思想正确的。后来大约是为了人事处不好，有人向贵州省党部告他反动，于是被捕，幽囚了许久，他就发了疯。后来县省党部证明他是被人诬告，把他释放。可是他已失掉自己谋生的能力，又没有亲属可以豢养他，于是省党部便把他交给了训导团在贵阳办的贵州收容所，暂时叫他在那里吃一口闲饭。贵州收容所的主持人虽明知他已不是政治犯，可是为了他要释放另一个向他托了人情的政治犯，遂利用他的神志不清，把他当作替死鬼送来重庆，而告诉贵州省党部说他自己愿意到重庆受训。他到兴隆场来的经过就是如此的。

到兴隆场以后，他自己并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他是被人出卖了才送来的，只有和他同时由贵州收容所送来的人才知道这种情形。可是这些人都是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环境里，谁还能帮助他？所以他糊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政治犯受起训来。

但是他的神经已错乱到不能接受什么训练的境地。他常常在深夜别人熟睡之际起床在室内四处巡游。甚至去惊醒其他同难。在日间上课时，他总是不听任何教官的讲授，而在团里发给他的笔记或周记的本子上乱画。甚至有的时候连团里发给他的军帽绑腿上也画上一些步枪之类的图画。

由他写的字和画的画来看，说他是一个疯人，也很难令人相

信。他的字体画风不但正常、而且应当说不坏，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利用他那笔不坏的字，写成什么意思明确的文章了。

他的个性似乎又成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子，有机会时便要戏弄一下同伴。但他更象小孩子的地方却是他对什么人都怀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你如果有一点发怒的表示他便被制服了。也就为了他有这么一种畏惧的心理，才能叫他跟大家勉强地过一种集体生活。他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起床、早操、上课、劳作、自修、就寝，如果不知道他的精神不正常，几乎无法判断他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不过在两种情形下，他就要彻底地表现出他是疯人了，那就是(一)在食的问题上，(二)在性的问题上。

他每天吃饭时都比别人吃得多，别人最多吃三碗，他则有时比三碗还要多，一定要到再没有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饭时，他才肯罢手。不过他的畏惧心理又叫他怕与人争，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每天都吃不饱。有一次我们这些政治犯大家筹资为一个离职的训育员饯别，他也知道那是筹资，他自己一个钱也没有，遂怕来吃饭。经我告诉他他应出的钱已有人代他付了，他才欣然就食。他的食量在这一次吃饭中证明了至少是兼人之量。饭后我问他“今天是不是吃饱了？”他笑着回答我说：“吃饱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也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说“吃饱”。也就从这一天起，每当吃饭时看见他我心下便非常痛苦，我知道他每天至少是在心理的饥饿中生活着。

记得在我患胃病的时间里，为了减少胃痛，我曾改吃团里合作社出售的饅首，不吃大锅的米饭。但这种饅首是冷的，冷饅首吃下去对我的胃也不利，遂把冷饅首埋在热饭里，预备到和大家

一道吃时，至少可以使馒首的表皮变为温热。在这时期，我的馒首竟屡屡失窃，每餐几乎都会少一个馒首。这事引起了许多同难的注意。后来有一个同难来告诉我，他可以确证是这位党部书记偷的，我连忙阻止他再声张，我明白这是一种对于食物的心理变态而产生的结果，再声扬起来更要刺激他，也许会弄成我们意想不到的悲剧。

女性的问题上，他是否变态，本来是不易判断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却叫我们获得了证明。

训导团距离北碚很近，北碚复旦大学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团员，忽然有兴到我们团里来玩，于是在副主任的命令下，团里顿时热闹起来，名义是要和他们联欢。除了组成篮球队和他们比赛之外，还要准备一些游艺节目。一个由贵阳来的政治犯推荐这个党部书记有表演苏州滩簧的天才，筹备的主持者找他来试验了一下，居然很不错，于是也就把他排到节目单里去。到了表演的那天晚上，他上台去很熟练地把他应表演的苏滩唱完，还赢得了一片掌声。他如果立刻下台，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在掌声中他突然发起狂来。

他把放在表演台旁作装饰的一盆花拿起来顶在头上，然后就地翻一个筋斗，花盆打破，全体哄堂。区队长连忙把他拖到一旁，但已叫那位副主任震怒了。第二天总队长责备了队长，于是他被关入了禁闭室。

他为什么突然发起狂来，据与他同来的贵阳同难说，就是因为复旦三青团里的几个女团员。他在过去也是看见打扮得娇艳的妇女疯狂便会加重。

象这些个狂人，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本来是应当给他

们医治的；可是在这个团里，医务所根本认为这种病人和他们无关，而团里也不把这些人当病人看待。他们不承认这些人是心理变态的疯人，竟残酷地说他们都是装疯，施以严厉的体刑就会变好，所以他们这些人受惩罚的机会比正常的同难还要多。

后来那个县党部书记因受禁闭，疯狂益甚。在禁闭室中随意大小便，他们就把他改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牛栏里，一边是牛一边是他。于是他连团里发给他的军服也脱下来，把它们撕成一条条的布条。更据喂牛的人传出来的消息说，因为他吃下去第一碗饭之后，再给他第二碗，他便耍弄那只碗，往往把碗打烂，所以每餐他们遂只给他一碗饭，不再多给。

我真不能想象这个人在牛栏里所过的那种赤裸的、半挨饿的生活！我曾有一次婉转地向队长说，象这样心理变态的人，再关他们实在没有什么道理了，为什么不释放他们？队长给我的答复是：“我们曾故意放他逃走，这样我们便可向上报告：‘他逃了’消案了事，不意他在外边徘徊了半日之后仍然回到牛栏里，所以我们没有了办法。如果正式叫他出团，那时担保他的手续等叫谁替他办呢？”

医生可以对疯人不负责任。疯人不能释放，因为手续有问题。这是我没进这个团之前所不能设想到的事。但到此我也遂彻底地明白了这个团的设有医务所，其目的大约并不是真想救治什么有病的政治犯，也不过是想完成一种手续而已。集中营里设有医务所，如果再有政治犯死亡，那就怪不得集中营而要怪他们自己了！我对在这种心理下设立的医务所，苛求他们负起来救治所有政治犯疾病的责任，当然是我犯了错误。我所以犯这错误的原

因，大约是由于我误认为他人的心，都象我们的心一样的良善！



## 十五、女政治犯

凭我在训导团中的冷静观察，我觉得放在每一个政治犯面前的物质上的痛苦，连吃不饱也包括在内，他们都似乎并不太介意；至于日间穿不暖，夜间被不够等，他们更都能挺着忍受下去。但是遇到了精神上的痛苦，尤其来自爱人妻子方面的，他们就都显出脆弱来了。前章所述的三个在第二队的疯狂同难，其发狂原由固皆与女性有关；就是没有发狂的同难，除了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而外，我感觉到几乎没有一个人心上不有一段哀痛的故事，叫他们烦恼苦闷。

每一个送进训导团来的人，都起码已被幽囚了一年二年。到训导团之后，恢复自由的希望也是最快要在一年二年之后。前后三四年的时光，一双情侣或者夫妇分离，被囚禁的一方发生问题的机会当然没有，可是有自由的一方，就很难不改变了。心上的故事每一个人虽全不同，可是女性一方背信，竟成为一致的结局。音信中断，又是最普通的背信的宣示。我曾看见过许多幅被小心翼翼珍藏着的女孩子的照片，每一个照片的幸存，都有着一段费尽心机的保全经过。可是这幸存的照片，竟多半成为不可摸触的心上的创伤。我当然了解，这并不能证明妇女在爱情上不忠

贞，而只是因为我所接触的是男性失掉了自由的环境。如果我有机会接触女性失掉了自由的环境，也许那些女政治犯的遭遇更要来得痛苦吧？我的这种推测，引导我想研究训导团中女政治犯的生活。虽然环境几乎不许我有研究的可能，但在我不断的努力中，我居然获得一些成果。

当我被解到训导团里时，训导团中已只剩下一个女政治犯T，她是一个弄弄音乐戏剧的小姐。她之所以被送来训导团，是因为她有一个和她有些爱情关系的表兄，以思想问题被捕，在拷问他有什么同伙时，他竟把自己的爱人T供了出来，结果是T也被捕，最后两个人先后被送来团。

对于T，团里可说真是特别优待。我到团后不及一周，她便请假外出就医，去歌乐山中央医院住院。在医院里过了一个多月，回到团里来，不到三周，她竟已被保释。担保她的据说是合川特训班的主任，团里的一班训育员、队长、区队长都是他的学生。T有了这个人作靠山，自然一点亏也不会尝到了。

她在团中，从未上过操也未做过劳作。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有一个女区队长和一个女勤务兵。所谓女区队长应当是管她的，事实上却成了她的伙伴。至于女勤务兵，实际上则是一个女仆。所以她的生活，实在过得够舒服。晚饭后大家在等上自修的休息时间内，她常常是和表兄在一起散步，更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所以对于T，我得到的材料是颇叫我失望的。

我曾再试着追询过去训导团中女同难的生活，由老同难的口中虽晓得不少故事，但不是亲眼看见的，总感不够真切。我由他们口中知道训导团中女政治犯最多时曾有三十人上下，所以另设了女区队长管理，但仍闹了许多笑话。最大的笑话是一个女政治犯忽

然在团里怀了孕，严讯的结果才知道原来毛病是出在也在团里的她的丈夫身上。还有女政治犯也是许多教官训育员及队上官长的追求对象。女政治犯为了要出团都不敢得罪他们。可是实际上谁也不甘心受他们的玩弄，因此闹翻，使女区队长不知如何处理的事也常常发生。由这些话里我虽然找到了女政治犯的痛苦踪迹，可是因为不是摆在面前的事实，所以总感到耳闻的比不上目睹的逼真。他们所述说的一切是凭他们的主观来介绍给我的，如果我有机会面对着那事实，说不定我所注意的会全不是他们所告诉我的那些事。所以我始终认为自己因为到团太晚，失掉了了解女政治犯问题的许多实际材料。

但在我离开这个团之前，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在T出团之后不久，又一个女政治犯W由重庆卫戍司令部送到团里来。她来时的装束，完全象一个女丐，一包袱烂衣服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身上穿的也是一件不知多久也没洗过的旗袍，头发颜面看来也醜陋不堪。在一队队部办了手续之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一队。团里照例叫她换了女兵制服，剪短了头发，竟象变了另外一个人。

两个比她先由重庆卫戍司令部送来的同难，给了我一个关于她的身世的介绍。

据说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性。泼辣，大胆，男子可能都比不上她。她的丈夫先以共产党嫌疑被捕，不久她也被捕。被捕后，她以答复参加特务工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自由。恢复自由后，她并未信守她的诺言。她被介绍到教育部里工作，但未依时向特务机关写送她应当写送的报告。再经过高压她再度屈服，开始写送报告了，但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她的一个上级对她发生了

好感，又一个她的上级的上级也对她发生了好感。某次上级的上级给了她一个命令。叫她某晚到某旅馆去谈话，她却悄悄地通知了她的上级也到那里去，叫他们两个碰头出丑。这件事，她自以为玩得很成功，结果是她的上级和她的上级的上级联合起来商酌了一下，她就进了卫戍司令部的监狱。

她本有两个孩子，只好交给姐姐去教养。丈夫的下落，完全不明。一个人遭遇到这种刺激，心理上当然不会没有变化，于是她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中国社会中罕见的女性。

向我作关于她的报告的同难，说得她非常不堪，据说只要你给她一点便宜占，就没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本来她应当和他们一道送来训导团，只以临解送之前，忽然被管狱的人发觉，她穿上了囚在他对面室内老国民党中委 C 某的儿子西装裤，于是又被留下来多住了几个月。C 某的儿子是由 C 某亲笔写信派人押送到卫戍部来要求囚禁的。因为他的儿子自称国社党，被认为思想不妥。但这位少爷事实上是一个“二流子”，什么党也谈不上。狱中无聊，所以和 W 一见钟情，结果是害得 W 多住了几个月卫戍部的监狱。

这些话里面有多少分是事实，我完全不敢判断，只是姑且接受这些材料，作为了解她的参考。

由她的日常行动来看，我第一先证实了她没有中国社会中一般女性所特具的那种封建气质。其它的女孩子到了一个有几百男子的环境中，一定会有不安之感，她一点也没有。总是非常大方，先找其他男性同难攀谈。她是吸纸烟的，团里由勤务兵出卖的纸烟价贵且不易得，于是她看见有同难吸那种用一条纸卷起土烟丝来吸的烟，她不问熟识与否，都上前去向人家索取。上课时她总

是自己干自己的事；下课后她也不管别人同意与否，就在他人的书桌下抽出笔记来照抄。吃饭时，她抢菜抢饭的猛勇也不下于任何一个男性同难。为此她引起了同难们普遍的不满，大家都认为她太没有女性应有的自尊心了。

对于这类看法，起初我还不太同意。我以为男女间的壁垒是应当摧毁了的，W对两性间的防嫌观念看得非常淡薄，未始不是好的习惯，我们不应当为此反轻视她。后来我知道她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多，才觉得她实在是心理上有了点不正常，才不再重视两性界限，并不是理智的基于两性应当平等的观念而不再重视两性界限。

当我的失眠症尚未痊愈之前，一天午夜我正躺在木床上，听着室外的风声蛩鸣伴着室内同难的不同鼾声苦苦地为了不能入睡而焦急，忽然间一声女人的尖叫从女生宿舍传来。女生宿舍是一个单间，里边住着女区队长，女政治犯和女勤务兵。但这房子是和男政治犯同在一个院落内的。随着那一声尖叫，我又听到女人的喊声，仔细听去，辨出是那个女勤务兵。她似乎已出到了院子里，口中在喊：“有鬼有鬼。”跟着又听到值夜班的一个区队长在询问女勤务兵是怎么一回事，跟着其他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其他队上官长也都起来了。几条手电筒的光芒，在院里闪烁不定，仿佛在寻找什么。大多数的同难都被吵醒，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到院子里去。据说过去只有当有同难在夜里逃亡之时，才会这么乱。大家为了避免有什么不幸惹上身，所以谁也不敢离开寝室。不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问题显然不论是仍躺在床上或已起来站在寝室内的同难，都急切地想明瞭。

“我正睡得很香，忽然觉得有一只手来摸我，我不由得喊了

起来，似乎有一个影子由窗子那里一晃就不见了。”这是那个惊魂甫定的女勤务兵的叙述。

“W，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人进了你们的房子？”A区队长向W提出这个问题。W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她一喊，我才被惊醒，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了，好了，没有什么，就去睡吧，以后不许再这样大惊小怪！”A区队长申斥了那女勤务兵之后，使用手电筒照向每一个寝室，同时喊：“大家都去睡，不许再看！”

许多同难只好都悄悄地回到床上，然后低声地交换了一些关于这一阵骚扰的意见，慢慢地又都睡熟了。只有我还是不能睡，暗暗地用默念数目字的办法为自己催眠，也仍睡不着。正在这样自己对自己作苦痛的挣扎，忽然听到那女勤务兵又大喊起来了：“不是闹鬼，是闹贼呀，是闹贼呀！”

队长区队长们都再起来，手电筒的光又在四下里闪烁，同难再度被惊醒并爬下床，跟着重听到那个值日区队长的喊问：“又是什么事？不许你大惊小怪，何以你不听！”

“队长你看，是这样一块大石头由窗子抛进来，真吓死我了！”

当那些官长们弄清楚是有人投石头到女生宿舍时，立刻决定了搜查各寝室。另一个队长去询问守这个院落三个大门的卫兵，是不是曾有人跑进来或者跑出去。

搜查把各队寝室弄到“鸡飞狗跳”般的紊乱。因为许多同难都下了床，听说官长来查，都忙着睡回去。这样一来，睡上铺的同难自然吃了亏，爬不回去的，都一一挨了骂。

这样一来，搜查自然也就没有了结果。搜查的目的只证明了

一点，在各队的寝室里没有什么这个院子里的人。

当时喧扰一阵毫无结果，第二天这件事就成了全团上下一致关心的一件新闻。二队队长把W和女勤务兵又喊了去询问。二队队附在院内晒衣场发现用石块砌成的一段石阶少了一块大石块，搬来那块投掷在女生宿舍中的石块放在该处，证明了这石块就是从那里搬去投掷的，这一点更证明了是住在这院落里的人干的事。

另外又从作伙食委员和作监厨的同难那里传来一个消息，说那女勤务是一个炊事兵的老婆，她每天都和炊事兵们在一起吃饭。这一天吃饭时，她说她昨夜很显然地是听见有一个男人在她们的宿舍里和W谈话，她以为是听错了，翻一个身又哼了一声，昏沉地要再入睡时，就觉得有人来摸她，所以她就喊起来。并说这并不是第一夜她听到她们的宿舍里有人声。自从女区队长因为丈夫来请假去重庆之后不久就常常在夜间听到。

为了这个消息，叫大家更明白了一定是W和某一个男同难利用女区队长不在团内的时间玩出来的把戏。W决不会如她所说的那样完全不知道。

所谓官长们都闭口不再谈这件事。有些顽皮的同难故意问“团里是否夜间闹鬼”，官长们不是申斥两句就是完全不答。但是夜间的巡查，显然加强了。许多同难都相戒在夜间不要再出寝室到设有临时便桶的地方(因为这院落没有厕所)去小便，宁可忍耐到天明，以免被诬指为有什么不轨行为。

一个星期过去，夜间都没有事，大家的戒备心渐渐松懈了下来。突然一天夜里，我又听到了一阵小喧扰，好象有一个人打了另外的人两个耳光，并听到了被打的人呼痛，以肩就看见一片手

电筒的闪光，并听到一片杂沓的脚步声，一刻工夫院内又全平静。除了我这个失眠的人而外，很少人听到了这次喧扰。再则手电筒，脚步声，本是值夜区队长常常在深夜带给同难们的。大家对这种现象所存的是恐惧的心理，多半是有同难逃亡时才会发生。大家看见听到这种现象，大都是伏在床上不敢起来，所以这晚谁也未特别注意有这次喧扰。

第二天早晨，第一队的同难们才传出来他们队上一个由难童教养院送来受训的高某，被一个姓王的区队长在半夜里捉到，关起来了。据说是当他想翻窗子进W的寝室时被抓到的。

高这时已是一个年纪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叫他作难童，那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他是一个在鄂湘一带被收容带到重庆来的难童。因为品行不好，虽然是在蒋夫人属下的教养院，也觉得这个难童不堪造就了，所以就把他送进我们这个集中营。他的品行不好的事实，据说是曾强奸过一个教养院邻近的童养媳，又曾犯过嫖的罪行，染上了花柳病。

他到团里后，仍一贯地保持着他的流浪儿童的作风。他的教育程度本来很低，和其他因为政治问题而被逮捕送来的同难，自然地不能接受相同的训练。所以他到团虽已很久，可是他一直是在丙级中上课。因此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之浅。

高被抓之后，先被绑起来，关在队上一间储藏室里，后改因在禁闭室中。跟着就传来队上审讯W和高的许多传说。高始终不肯承认他曾和W有什么不轨行为。至于W，据说却和二队的队附招出来一些真相，不过所谓真相，却言人人殊。那队附本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这时竟“噤若寒蝉”，不肯谈这件事。只听说这件事



已报上去，报到副主任那里，等他裁决了。

一天，早晨升旗之后，副主任突然招集了全体受训的人听训。这时高也被由禁闭室里提了出来。但是W这天早晨却受命没有出席。于是这位副主任把高痛骂了一顿。在声述高的罪状时，言辞相当含混，但他显然的目的是想在同难之中造成一种印象，即高确曾有过一种企图，不过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他宣布高将受无定期的禁闭的惩处。对W则似乎把她完全当作一个无辜者看待，没有提对她将如何办。

以后，高所受到的并不只是长期的禁闭，每隔一个星期还要受一次用细竹条鞭挞的处置。这消息，是同难者由医务所方面听来的。因为用细竹条鞭挞是某医官的建议。据说如果用竹扁担或木棍打一个人，多么强壮的人也经不起二十下重击，就要晕绝。并且只在最初三四下，被打者会感到痛苦，五下以后，他的肉体就失掉知觉了。所以打一个人如果要叫他痛苦，就不要用大棍竹扁担，而应用细竹条。细竹条打一二百下也不会晕绝，并且使受打者痛苦的时间长。打后一星期，被打的部分仍会感到碰都不能碰一下的疼痛。

对于高，我老实说素无好感。但在这件事发生后，他们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对付他，却叫我产生了同情他的意念。我以为他们这样惩处他，没有一点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憎恶他，于是不惜以最凶狠的手段对付他。如果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说，这种憎恶实在可说是出自一种嫉妒的心理，否则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痛恨他到这种程度？

何况事实渐渐被我们察觉，W、高之间的问题并不简单，高决不是单方的想有什么不轨行动。如果人家男女两方是两相情愿

的，依理，别人干涉，已不应该了。现在不只是干涉，且只惩处男性，不过问女性，自然是太不公平了。

我说W和高之间的问题不简单并不是推测之词。W在高被关几个月之后，曾偷偷地问过一个由禁闭室中才放出来的同难，高在禁闭室里的生活情形，足证她是不断在关心着他。也就为此我对训导团在弄明白事实后却颠倒黑白，只对男的一方下毒手，有了极大的反感。

W在团中，我感到在每一个人的口里，都是一个不堪的女人，可是事实上有许多人对她还是很感兴趣的。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二队的王区队长。

这位王区队长平素对同难非常凶狠。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因为不惯同其他同难抢饭吃，宁愿挨饿，王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答称：“难道区队长愿意我也参加他们的抢？”就是这一句话顶撞了王，王把这个小孩子的胳膊竟打到不能动作约一个月。

可是这么凶狠的人，遇到W却变成了一个非常谦和的官长，处处对她宽容。这种宽容施到够聪明的W身上，也就起了相当的反应。她不时对这位官长当着同难撒点娇，故意作些小反抗，这当然给那位王区队长一点难堪；可是这是属于令人舒适的小难堪，所以他常常给她的也是一种类乎宠爱的不严重的惩罚。另外W也有时很恭顺地为王区队长服务。王很喜欢打篮球，把二队精壮的同难组成一个篮球队，和他队比赛，胜利之后，便在他自己的房里安排一次庆功宴。这是瞒上不瞒下的把戏，庆功宴进行中，王总是指定年纪小的同难把风，看见副主任总队长来时要预先报信，以便解散。在这种场合中，W便是王的庆功宴的备办

者，煮肉炒菜之余也参加饮酒庆祝。这时谁也不能相信W会是一个在背后被骂得比妓女还下贱的人物了。

就是在同难中，情形也是一样。有一次曾发生过一件我几乎完全不能相信的怪事，那就是忽然有一个素日被认为学识修养还好的H被关入了禁闭室。

原因是他和W两个人单独在一间教室被其他顽皮的同难发现。那同难说看到他们在室内拥抱就鼓噪起来。不意适值总队附由此经过，查询如何鼓噪，又发现他们两人确实是单独地留在教室内，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把H关起来。幸而H和第二队的队附是陕西同乡，他很肯帮H的忙，不同意总队附只关男的不问女的这一决定，便严厉地审讯了一次W。据说W的供状很坦白。她说：

“是我看见H一个人在教室内，我便走进去跟他要香烟，他说没有，我便自己去摸他的口袋。这是由我发动的，责任应由我负。”

当然这责任也并不是只应该由她一个人负的，如果那个H平常并不予她以颜色，她一定不敢硬去搜他的口袋。

总而言之，由于W这个人，我确实增加了许多关于人类两性间关系的认识。在集中营里她也和同难一样有着种种痛苦，不过她的痛苦与男同难并不一样。因为全团中只有她这么一个女性，所以她似乎在受着优待，但也可说她在受着比男同难更深一层的侮辱。W对男性的许多放肆态度，连我这个并不是太封建的人，起初也实在感觉看不惯。日子久了以后，我却渐渐谅解她了。她在我面前从未有过一点轻纵自己的表现，我知道了她的所以那样不自检点，实在是为了适应环境。她失掉了丈夫、孩子，受尽了一切

践踏，她如果不走今天这条路，也只有和其他男同难一样地发疯了。她面对着社会上一切残酷的对女性的侮辱，如不修正自己的传统道德观以求适应，那她还怎么活得下去！

她有相当聪慧的天赋，曾在团里表演过几次戏，每次都相当成功。她就靠了她自己的这些长处去争取她的生存。队上的官长，我确信每一个都有点基于嫉妒心理而故意折磨她。

据同难讲，据我亲眼看见过的前一个女政治犯所受的待遇，都能证明女政治犯是不要参加跑步之类的劳动的，到她来却改变了。她被迫和我们一齐受严厉的军事训练，因此她也就运用她的聪明和这些意在凌虐的官长们斗争。

“要我演戏么？我要求半休一个月”，她就是这样提出对策。一个戏排演了一半她要求请假一两天出团去看她的孩子；要求派人到重庆去为她借钱；甚至于要求为她注射九一四，因为她染上了花柳病。如果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拒绝排演或上演。大家都骂她刁猾，可是她如不刁猾，不是只好甘受他们的蹂躏，甘心等待那些恶魔带给她的花柳把她杀死么？

抱着浓厚头巾气的道德观念来批评，当然她是太卑贱了。可是由她所受的政治迫害来体会她的遭遇，谁还能自己觉着他有权利可以责难她的行为！

所以从W这个现实的例子，我确实深刻地了解了女政治犯被迫害的结果，比男政治犯更要痛苦万倍。如果不疯狂，不自杀，大致一般的女政治犯，都会被逼走上W所曾走的路。为此在中国坚持独裁的党徒们，在毁灭中国青年肉体与灵魂上所犯的罪恶，决不弱于纳粹法西斯匪徒们在其他国家内所犯的罪恶。如果他们不受到清算反得到支持，那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是“为民主而战”的

话，显然又是谎言了！

## 十六、团内的思想斗争

许多青年被集中到战时青年训导团里来，谁也知道这是中国国内有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在进行着的一种结果。把青年关到这训导团里，其目的也仍是为了作思想斗争。这些青年大都不是中共党员，可是在思想上大部分都是追随中共今日所走的道路的人。国民党跟踪着纳粹法西斯的步伐，知道这批人非只靠屠杀所能消灭，遂成立训导团这类集中营，想用强迫灌输自己的思想代替共产党的思想的办法，来改变这些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

不过国民党这一企图，依据我在团里的观察是完全失败了，甚至且收到了相反的结果。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要作的是思想斗争，可是他们却缺乏作思想斗争的武器——思想。墙上尽管大书：“纠正纷歧错杂的思想”，但那些他们认为纷歧错杂的思想并不是可以用这句标语当作符篆就可以吓退的！

说国民党没有思想作思想斗争，他们是不肯心服的。我在团里时每作此言，他们一定说“三民主义你能说不是我们可据以作战的思想吗？”对于三民主义的评价，这里暂且不谈，并姑先承认它是国民党可据以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但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党员口中也是“言人人殊”。有这种自己人对自己的思想都不能一致

的现象，安能不陷于思想上不能斗争的境地！

我到这训导团里时，教官中最有势力的是背叛了中共变为国民党，实际上大家都认为他是托洛斯基派的叶青（也就是任卓宣）的一派人马。这个团有一个研究室，所负的主要任务据说是：“研究各项训导工作上的重要问题，并阐扬本党（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纲、政策以及研究批评异党的理论与行动，供教训上之用。……对于本团教务训育之实施办法亦加以研究，并提供改进意见，此亦为研究室基本工作。”（引自该团民国三十一年度工作总报告），由此可知它实是训导团的训导设计机构，而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便是叶青。

不过叶青并不长住在团内，每隔四周才到团里来一次，研究室的事务给了他的亲信弟子代为主持。叶青每次来团，都是匆匆忙忙地上堂下堂，上一阵课。他讲的是“总理遗教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之类的课程。此外还有哲学概论，逻辑学，党派批判等，则由他的亲信弟子分任。可见训导团的思想训导全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

但同时团里也还有其他的教官。其中有一个李某，是陈立夫唯生哲学的信仰者。于是他和叶青便成了思想上的敌人，使三民主义在团中，产生了纷歧错杂的解释：叶青讲一套，李某也讲一套，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同难者不禁大感乐趣。于是叶上课时，他们便把李的话介绍给叶，叫叶骂李一顿；然后，李来上课时，再把叶骂李的话介绍给李，使李也骂叶一顿。这样相互介绍，使他们相互对骂，遂能把同难们认为极痛苦的上课，变成极有兴趣的戏弄教官的把戏。而这种把戏发展的极峰，便是酿成了李和叶的一个门徒在教员休息室中演出了一出交手战。

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训导团中，他们都作不到思想统一？一方固因为团的当局要位置私人而置思想斗争于不顾，另一方也是因为叶青手下的人太少了。叫他都位置他的党羽，他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位置。以他放在团中的人来说，那水准也实在不够肩负所付托给他们的责任。

有一次叶青的一个门徒在纪念周上讲演，高唱了一番恋爱至上主义，以致又被那位李教官抓到了题目，而支持同难在团里的一个壁报上增出一个特刊来批判他的错误。壁报贴出的当夜，不知被谁撕去了，同难们就连夜再赶写一份，并在其中加一幅漫画，描画一个人偷着去撕壁报，使叶青那位门徒很久不好意思进团门，且喊了許多次要辞职。

叶青的手下人才既如此贫弱，团当局自然更有机会位置了许多私人作教官。这些“私人”教官对于我们这群政治犯可说是一群小丑，他们不但取消了这个团想和我们作思想斗争的目的，且成为叫我们开心的一群角色。

例如教我们社会学的L，号称是留法的博士，但是他的知识水准比关在团里十五岁的小朋友还要低。低还不要紧，他又喜欢吹。最有趣味的例子是他说：“辩证法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发明的穷变法比辩证法还要进一步。什么叫作穷变法？就是“穷则变，变则通……”这种叫人听了啼笑皆非的理论加上随时会说的“兄弟在法国的时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再如教中国历史的张某，牛吹得更大。在中国学问方面讲，他自称十四岁时曾在问难中，问倒过章太炎，因而被诮为神童。这个故事，有的同难说他至少已听过了三四遍。在外国学问方面他自称懂几国文字，得过三五个博士。但当他讲中国历史时，却



仍因袭着讲皇帝家谱的那种讲法，由三皇五帝讲起。不过说他讲，还是错了，他不是讲而是写。除了第一次上课时吹过自己学贯中西之后，再上堂便是埋头在黑板上苦写，由他在黑板上写的字来看，可以证明他写黑板极有经验。最大的本领是他把一块黑板写完之际，一定是摇铃下课之时，所以任何一堂都用不着讲，只是他在黑板上练字，我们在笔记簿上练字。五十分钟过后，他算又混到了一堂钟点费，我们则又混过了一堂我们应受的思想训练。

大约这种写法他自己也觉得有伤他中国神童外国博士的尊严，所以他写黑板时似乎并不照抄什么东西，而是秉粉笔直书一挥而就，大约他以为只有如此才可以表示他有点神童博士气概。起初我也有点相信了他真是“博闻强记”。因为他好象并没有拿着什么书，而能默写下来许多古史中的辞句。我判断他是默写，是因为他右手写黑板，左手不时背到后面来，手上并没有拿着什么。后经一位老同难为我指出，事实上他左手中有一个几寸大小的笔记本，他不时玩那“苏秦背剑”（即把左手背到身后来）把戏，目的就在骗大家相信“博闻强记”。在我知道这事实后我真替他难过得不得了。有时一个顽皮的同难在堂上喊出来：

“先生，我可以借你手中的小本子抄一抄么？”

这时弄得我都有点不敢抬起头去看他的脸，我怕他太难为情，但他却能含混支吾一阵而支吾过去。在我心中认为这种人是太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了，可是就是这种人居然会受到了陈立夫的教育部的褒扬，说他在重庆大学曾执教十年以上应予褒扬！

另外还有一些更比这些教官凄惨的混饭吃的教官们。象一个在北平曾教过很多年自然科学的老教授 Y，他在国民党北伐之后就投入了国民党内倾向法西斯的小派系怀抱里，可是一直就不得

意。这时竟也挨进这个团，用二十年前的落了伍的自然科学知识来鬼混。他一上堂就会发许多牢骚，我看见他因为没有衣服而和我一样穿起那发给他的臃肿的棉军服时，我一面是恨他太没有出息，一面我也真有点可怜他！

再如一个教国文的教官L，他只受过教子曰诗云的“学房铺”教育，叫他来教我们国文，他是除了可以背诵“四书”“五经”而外，并没有其他的特长。甚至就是那些可以背诵的“四书”“五经”，他也不能讲解得清楚。

他本更应是属于被可怜的人物类型里的人，但是因为他以与康泽有私人关系的背景，夤缘混入这个团之后，又渐渐地感染上了以反民主分子——尤其是共产党为他的职业基础的观念，先自己叫自己相信了对团里这些人残忍并没有什么不合理。这些人是死不足惜的，所以这个可怜虫竟变成了最可恨的恶魔。

我们同难中有一个将近五十的H，老留法勤工俭学生，北大哲学系毕业。精研宗教哲学，对于佛教、基督教、回教都有研究，抗战后曾在重庆天主教神学院教了一个时期的书，后来被四川内江佛学院请了去主持该院。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内江稽查处的特务，突然被请到郅子举的司令部，问了几句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之后，就软禁起来。过了几天糊里糊涂便被送来渝，进了这个训导团。H快到五十了，还未结婚，所以养成了一种到处可以为家的随遇而安的习惯。初到训导团时，他曾认为这个地方山明水秀，风景优美，很想把自己的侄子叫来和他一同受训。后来逐渐明白了这个团的目的是在毁灭折磨这些同难的精神肉体，他才明白自己是太以君子之心度人了。可是，他仍然忍受着一切。他在团中素来是连同难也很少接谈。每天跟大家在一起过着机械的生活，受

军事训练，跑步，抬米，担土，都无怨言。不过对于所谓思想训练，他有点觉着受不了，可是他仍能忍受下去。叶青比他年轻，且是同时在法国留学的，他也不以上叶的课听讲为侮。就是这么好的一位老人，L教官竟为了一句话，和他结起仇来。

在国文习作中H因为不满意L谈的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在习作中写了一段：“我看L教官不要主张什么国大代表应按区域划分产生吧，保定没有收回之前，分区产生对L教官也没有什么好处……。”L是保定人，所以H说了这样话。L为此记恨在心，便硬指H文中所引大公报载伍启元作的一篇论中国经济危机文中的话，为共产党的言论。

H略予分辩，L竟说他不接受训导，交给一个训育员处理。不幸又碰上了一个和L一样凶残的训育员，于是竟把H给关入了禁闭室。在禁闭室里关了一个星期，队长去找他说他写一纸悔过书即可以出来。H的答复是在禁闭室里比在外面更好，可以免去上课，下操，劳作，宁愿不出来。又关了几天觉得再关下去也没有什么道理，才把他放了出来，但由一队降到了二队，变成和我同队，也就是说他的出团希望至少又要迟半年了。

大部分训导团中的教官，都会因为自己无能而嫉恨有能力的同难，利用自己的地位拚命压迫折磨他们。把国民党的所谓思想斗争机构，变成了更深一层的培植思想仇恨的机构。

此外这团中也还有一种教官，就是他们比这些低能混饭吃的教官有些能力，也懂得一些事，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不长进，怕吃苦，所以明知道是非白黑在那一方，他却为了自己活得安逸，宁愿站在非与黑的一面。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个曾混在桂赣一带，用黎焚薰这个笔名写过一些似乎进步的新诗的李某，他也到

这个团中来作教官和训育员，因为他也是特训班出身的人物。可是为了生活的不检，酗酒，和同事的太太的一些暧昧关系，连他的特训班同学也都不齿他。一个人写的文章和他的行为间的距离能差这么远，叫我真感到太惊异了。

训导团集合了这样一群乌合的教官来和我们这些同难进行思想斗争，所得的结果，自然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对于思想已有了基础的人，这种阵容当然是上不了阵就要垮。对于没有思想基础的人，这样的阵容，是反启发了他们帮助他们走进正确思想之门。举一事实来说明：二队中有二十三个由航空委员会送来受训的飞行士，这二十三个人大部都是航校毕业后又曾送到新疆伊犁航空训练班，由苏联教官教导过的人，有的学的是轰炸，有的学的是驾驶驱逐机。

这些人所以送去伊犁重加训练，是因为那时中国只有苏联供给中国对日作战的飞机，为了能驾驶性能更好的苏制远程飞机，非重加训练不可。等到训练有了点结果，这时中国已能由美国得到飞机，于是这些人，因为受过苏联教官训练，已不为当局所喜，又因为年轻有点自负，开罪了空军中的政治人员，于是一个个陆续被捕，关了两年之后，才送来训导团。因为他们原本都是抱了一腔热血，想以身报国的青年高中生，投考航校后，又一贯受的是法西斯式的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在思想上他们实在是一张白纸。在进团之前他们就没听到过中国还有什么各党各派等，到上叶青及其弟子们的党派批判之类的课程，才知道在中国国民党之外还有那么多的大小党派。所谓批判虽然等于是漫骂，但多少总要介绍一点其他党派的主张和人物才能骂，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拿一种货色来和他们自己的货色相比较。即使是歪曲了人家的，美化了

自己的手法很多，但是一只手总遮不住天，所以他们的笨拙的努力，往往反成了替别人宣传。例如他们攻击救国会，连沈钧儒有胡子都似乎犯了罪。但是谈到七君子谁也还记得起他们是为了主张团结抗日而被囚禁，直到抗战发动才被释出，并有三个人被请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后来的参政会。这种在社会中有历史的人，想以污蔑、漫骂来诋毁他们，结果是反令人对诋毁他们的人的用心发生疑问。有了疑问再进一步去追寻，真相便不难求得了。在团中我曾被多数的同难当作顾问，来证明教官们的谈话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可信。并且不只是同难们如此，甚至队上的官长们也把我当作顾问要我帮助他们了解世界大事，国内政局。在许多次的自修时间内，我被推作时事报告。我有时不禁心中暗暗好笑，他们放我到这团中来是为了训练我，现在是我翻转来代替了他们训练其他同难，甚至他们的队上官长了。我应当说我的许多言论比团里的教官们训育员们更有影响于一般同难。

依照团里的规定，他们有许多作思想斗争的方式。这些方式甚至是由德、意两国输入的，可是到了这些官僚主义的团中官长手中，一切都根本的变了质。

团里有小组讨论的规定，每周一次由训育员根据“总理遗教”或“总裁言论”出题目，每一个同难都要出席并且一定要发言。这办法自然是最严密地考察一个人思想的办法，可是为了训育员们的懒惰，他们并不认真用心力去考察，而只凭直觉的好恶来评定每个人发言的分数。有许多次小组讨论的大纲竟叫同难来拟，这样自然等于取消了小组讨论。

团里还订有每队必须每月办一次壁报的规定，这也是应当由训育员来监督举办的，当然也是一种考核学生思想的办法。每个

人每个月一定要给壁报写一篇论文，起初我很想避免为这种壁报写文章。后来我明白了我没有方法可以逃避这件工作，训育员们为了偷懒，他们早已决定把壁报的编辑完全推给我，自己可以安闲无事。于是我也就改变了战略，把壁报编辑工作完全接了下来。我看了全队每一个人的文章，选择出来至少是没有害的文章推荐给训育员阅后交壁报采用。对于少数卑怯无耻的同难为逢迎训育员而写的反民主、反共、反苏文章，我先把它抽掉，叫训育员看都看不见，且公开把这种无耻文字交同难传阅。如此作了一次，这类无耻文字再没有人敢写了。壁报、社论，训育员一定叫我写，我就摘抄孙中山的主张民主的言论加以发挥，为壁报进一步增加了宣传民主的作用。

我写这样的文字起初的用意在交给训育员，看他用不用；如果他怕我写的这种文章，以后就不会再找我写，也是一种拒绝的办法。不料他看之后竟一字不易交同难抄写贴出，于是我就更进一步了解了，他只要省事，其余什么也不关心。事实上一张壁报贴出后，在团中除有些同难会看看之外，其余的官长谁也没有兴趣和耐心去仰首阅读。他们评定壁报好坏的标准是字抄写的整齐不整齐，插画装饰好看不好看，在这种情形下，办壁报的作用当然也被取消了。

为了训育员们的懒惰，某一个时期我曾被训育员指定，作为他们的训育讲话记录员。因为这种记录是要送给训育主任看的，他们要我记，目的在不论他们讲得如何杂乱无章，我总可以把他们的大意连缀成一篇通顺的文字。以后更进一步干脆就由我来代他们拟训育讲话的底稿了。因此我遂能保证他们的话不会是极端反动的。不过在训育员讲话中有一个节目我始终无能为力，那就是他

们时时要找—个过去曾经加入过中共，或受刑不过被逼自承为共产党员的同难，到讲台上去作—次自我侮辱。报告过去自己如何愚蠢以致加入了中共，及现在来团接受了三民主义洗礼是得了救—类的鬼话。我相信那些被逼去作这种报告的同难，每一个人都痛苦得不得了，而台下的其他同难，看着他们在台上出丑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没有—个人不也是痛苦不堪。实际上那些报告，也没有—个是真实的，不过是摭拾许多关于中共内幕的传说，硬拚合在—起的谰言。只是为了训育员们喜欢听这类话，他们为了争取出团也就适应着他们的要求来说而已。这种训育讲话的时间，如能逃避不参加，我总是逃避的。

我这种为训育员作替工的作法，后来日益扩大，扩大到许多属于训育员依理不应叫我知道的事，也都交给我来代办。

这个团对于准许离团的人，并不是说准许离团之后便再没有了关系。在离开之前，每个人都要填写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志愿书，临行时并给—本所谓和团里通讯办法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中载有许多指示与要求。它的目的在使每一个离团团员都成为这个团的通讯员，其主旨当然是想借此在中国社会中组成—个属于三青团下的康泽系的特务网。它要求凡是离团同难，不论到什么机关工作学习，—定要随时把这个机关的情况报告给训导团。工作人员的调动，收支详情，都要——写出，并且限定每月至少要写这样的报告—次。如果不写就要受到警告，警告之后再不理睬，则将被召回团中，重加训练。这个小册子的外面还印有“密件”二字，主持这种通讯工作的也是训育员。每一个被送进团里来的同难，照例要被编号并分配给—个训育员，以后不论你在团出团，遂都要属他管。就是这种通讯工作，主管我的训育员，居

然也托我代办起来。因此我从事实上证明这个建立特务网的企图，也是完全失败的。大部分离团的同难，都没有根据那小册子的指示和训导团通讯，偶有几个肯和这个团通讯的人，都是出团后失了业或失了学要求训导团给帮忙的同难。许多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机关或学校当局，知道了他们曾在训导团受过训的经历后，便把他们看成三青团的特务，尽量孤立封锁他们。甚至暗中搜检他们的箱笼，在箱笼中再找出那本小册子来，便硬说这小册子就是特务证，而往往把他们开除。所以这些写信来的人，多数是要求再回到团里来的人，他们说在团外既然因为受了训反而到处碰壁，自然只好找团里的长官来设法了。如果无法可设，那就只好要求再回团里来，至少可以不忧食住。训育员所叫我写的信，也就是答复这些人的，所要我告诉他们的便是千万不要再回来，团里已不能再负任何责任。实际上情形既然如此，所以训育员们再也没有勇气去质问任何同难，为什么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写信来作报告了。在训育员心目中这时已认为凡是沒有写信来的人，一定都是有了办法的人，他们既不肯作报告，写信去催，也会一样受到不理的待遇。再说“通讯办法”中规定的一个月以上不写信要受到惩罚，最后的武器是抓回团里来重加训练，可是事实上因为中统、军统两个调统局对这个团并不合作，要抓回一个放出来的人，并不容易，所以他们组成一个康系特务网的原意，执行到此也就成为“强弩之末”了。

最有趣味的是我为我的训育员代庖工作，竟连他在团外的工作也代了起来。他在兴隆场兼任着一个国民党区党部的委员，于是这个区党部的告民众书，也叫我起草；兴隆场上的壁报也叫我纠合同难代编。我心上暗暗地想，我这个被认为思想应受这个团



训练的人，现在竟成为这个团思想的权威，宁非滑稽之至！

这个团的思想斗争工作，由上述的种种已可完全说明是越作离题越远。甚至在团中工作的那些人员，也根本都不了然他们所作的工作是一种思想斗争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我看来，一句话可以说完，那就是因为国民党中缺乏有思想的人来执行这一工作。没有有思想的人来执行，自然只好由没有思想的人来滥竽充数。一个人自知没有思想，又负起来思想训导的任务，所训导的又是有思想的人，于是他就自然的强调起来他自己的训导责任，抹煞了他不擅长的“思想”这一主题，而在训导团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以蹂躏受训者为他们的当然特权的风习。不论对什么事都要求受训者“绝对服从”，明明教官所教的课程有了错误，但在考试时受训者也要照所授的错误说法作答。否则即使你的答案完全正确，他们要硬说不正确，受训者也没有办法。

所以根据我的观察，凡经这个主旨在作思想斗争的训导团训导过的人，出团之后其心理大致不外以下三类：（一）由于饱尝了特务、监狱和这个训导团的蹂躏之后，在心上种下了极深的怨恨，因而更坚定了他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决心，决定出去之后不顾一切再和他们战斗到底。不过这种人数并不多。（二）是饱尝了特务、监狱和这个训导团的蹂躏之后，感到了中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举手自己的生命便可能粉碎，过去因为不晓得这些情形所以遭了他们的毒手，现在已饱经沧桑，因而产生了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的意念。以后再也不想对国家社会有何积极贡献，只求能够勉强吃得上一口饭，混过去自己的残留生命便够了！这种人占绝大的多数。（三）则是由自己所受到的一切，证明了中国今日是一个好人遭殃，坏人得意的国家，

过去自己为了想作好人遭了殃，今后出去，为什么自己不也去作坏人而得得意？但这种人也不很多。于是这三种人在团内就都决定了他们的目标。第一种人，多半希望到解放区去，加入反国民党的阵营。第二种人多半希望回家种田或作生意。第三种人则希望一出去就钻进征兵，征粮，或税局等机关去作事，因为这样可以由舞弊害人而自己发财，发了财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训导团的思想斗争，只能斗出来这样三种人，一种是他们自己的敌人，一种是消极分子，一种是坏蛋。国民党当局如果知道这种事实，还会认为这种训导团有用极庞大的经费来办它的必要吗？可怜的是他们对这种事实完全无知，而 they 又只相信人类一定对暴力屈服。以为在特务，监狱，训导之后，再加上两个文官荐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的保人担保“不危害国家民族”，才放出去的人，必然是最驯顺的肯作他们走狗的人了。殊不知就是最坏的坏蛋，当训导团征询他们的意见肯不肯离团后作军统、中统的特务时，还是多被拒绝。至于虽然消极但仍不愿为恶的“消极分子”，就更不肯作他们的狗了！所以，训导团在事实上是除了豢养了一批以反民主反共反苏为职业的废物之外，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的。但从国民党当局的角度上来看这仍非全无收获，因为这群废物大半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为了找个题目养他们，训导团就应办下去。在他们心上，养这群人实比能改变团中同难的思想更为重要呢！

## 十七、逃 亡

人类是酷好自由的，当他们的自由受到不合理的阻害时，一定会本能地起而反抗。所以当监狱制度在人类中建立起来之后，跟着逃狱的事也就发生了。战时青年训导团既是一个变相的监狱，逃亡在这团中遂自然地成为一桩必然要发生的事。

我在训导团的一年多时间中，曾听到过许多同难偷偷地讨论着关于逃亡的问题。可以说，逃亡的意念，是每一个在团中的同难都有的，但真有勇气实行的，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却总共只有六起。为什么敢逃亡的人这样少，仔细加以研究，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怕逃不掉；（二）是怕逃成功了之后，也许问题更变得复杂起来。

训导团的地理环境，我在前面曾说过是一个孤立在山顶上的寨子，周围都是城垣，且有团的卫兵把守着。卫兵的数目加上负责管教的官长的数目，等于受训同难的四倍。这就是说有一百受训同难，就有四百官长和卫兵，以四对一的优势防范着逃亡，逃亡自然变成了很不容易的事。白天是全无可能逃亡的，门卫森严出不去，翻城垣下跳，也没有机会。改择夜间么？夜幕才垂下来，团内立即戒严，受训的人全被集中到宿舍的院落里去，垣墙外，不

断地可以听到警戒哨“口令口令……”的呼喊。

如果逃亡不成，误被警卫开枪打死，是太冤枉了；即使翻出了城垣，能否就已算逃脱了？同难们也多半怀疑。进团后被推光的头颅和所穿的军服，在方圆一二十华里内，老百姓都认得出来你是五云山上受训的“共产党”！所以逃出去后没有便衣，也不容易走脱。还有听说团里对围绕着的几个四通要道道口，都有电话可通。万一逃了出去又被在任何一个要道道口给抓了回来，谁也想象得到一定是一连串的毒打和禁闭。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这个团并没有这么好的防范逃亡设备，只不过在由团去北碚的一个道口——小湾那里设了一个米站，有直接的长途电话可通，那完全是为了运米的交通设备，与防止逃走无关。在团里的同难不知道真相，在被官长押着到小湾去抬米时，看见了那里有电话可以与团中通话，就以为一定是在团的方圆十几里外的道口都有这种设备，因而不禁胆怯起来。还有大家都是由很远的地方被解送到这里来的，没有一个人熟悉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团中且有一个传说，说在过去有过一个同难翻城垣出去成了功，可是以地理不熟不敢走，逃出去了两三天，结果是仍在围着五云山绕圈子。最后，竟被团里的官长用一根长藤条把他从丛莽中给赶出来，关了禁闭。并说他自己后来告诉人，如果不被发现，他也要走出来了，因为他已饿得不堪。这个传说也打消了许多人的逃亡勇气。

另有一些同难则想得更远，他们认为即使逃亡成功，以后怎么办呢？自己的家不敢回，自己的真名实姓也不敢再用，自己过去的经历，也不敢再提，而且时时要提心吊胆，因为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相当庞大，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被他们发觉逮

捕。这样想来，逃亡差不多等于死了一次一样，所以他们遂宁愿留在团里等待着开释，而不想去冒险。

当我在团里这个期间发生的六起逃亡事件中，大约就是为了上述的理由，致只有二起是政治犯。其余的四起都是因为国民党办的学校中反抗学校的命令，闹风潮而被送来的一点不懂政治的在校青年。他们虽然也是背了共党嫌疑这罪名进的训导团，实际上他们的罪名大都是因为揭发了学校当局侵吞了教育部发给学生的公费、公米。也就因为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还没有在社会上受过什么折磨，所以能有“初生犊不怕虎”的精神，不高兴失掉自由，便大胆的逃亡。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两个由某国立中学送来的学生，为了反抗学校当局，由学校给戴上思想不妥的帽子，送来训导团。来了不过一周，这两个人已都感觉到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当一下午，在队附和二三个区队长的监视下去小弯抬米，到小弯后，队伍解散，大家坐下来休息时，他们两个人便溜开沿着一条小径逃走。逃走不到五分钟已被发觉，在乡民的指引下，那些官长立刻分两个人沿着他们逃走的小道追下去，另外的官长立即集合起队伍押着我们把米抬回来。

为了这件事把我们平常认为愉快的抬米旅行也弄成极恐怖的事了。过去到小弯，区队长们为了讨好同难，立即将队伍解散，叫大家自由地到那三五家草棚小店中去买所需要的食品，如纸烟糖食之类。有时甚至可以在那唯一的茶馆中泡一盞茶，喝上两三道，欣赏一下来往的住在那附近的在司法行政部工作的都市型的男女职员。对于我们这些囚徒，能看见不是光头军服的其他人类，就是获得自由的象征，看见女性则尤令人振奋。有一首流传在团

中的描写小垮抬米的歌谣说：

小垮抬米走得慢，遇一摩登巧打扮；

脑后两条小辫子，胸前一对手榴弹。

虽不是很好的歌谣，可是集中营里囚犯渴望异性的心理却流露无遗。所以小垮抬米在过去即使有许多人把肩头磨破，但仍被认为是有兴趣的旅行。自从这两个人潜逃的事发生后，队伍到小垮即不再解散。并且是当米一装入竹筐，立即下令回团。奔来奔去，完全成了罚作苦役，以致大家对这两头小犊子乱窜所留下的影响，想到之后无不表示痛心疾首。

而这两个人，结果也只逃掉了一个，还是靠了天色黑下来的帮助。经过情形是：两个官长在后面紧追，看见了他们两个在不远的山坡上乱奔，就更追得紧。其中一个姓罗的湖北人，因为跑得太久，身体荏弱，突然肠子疼起来，便蹲下来隐匿在路旁，致被赶上抓到。而另一个则借他们和罗拉扯的时候，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了。

罗被抓回来照例地关了禁闭。关了三天，他的父亲已找到训导团中来拜访副主任了。据说他拿了他的同乡，也就是国民党内的大亨人物居正、孔庚的信来，请团中释放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决不会思想不妥。但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到团里之后又出了逃亡的岔子，结果是在副主任面前父子见了一面而去，但同时也传来了一个月后罗可获释的传说，并且在一个月后真的成为事实。

真正的政治犯要逃亡，就不会像他们这样的轻举妄动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万一走不脱，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当我在团中时曾亲见一个同难在势非逃亡不可的情势下计划逃亡的情形，他

的谨慎紧张的行动与面貌至今仍印在我的记忆中。

这个同难叫李椿，原是成都《新华日报》分馆的主任。我和他并不同住在一队，本来全不相识，巧得很，我和他竟同时被自己所在的那一队的同难选了出来，且获得了官长批准，叫我们在一起作伙食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我们两个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他告诉我，他的被捕经过，是有一天在成都街上走，突然由后面来了两个人一架，就把他绑进了国民党在成都的特务机关。每一个《新华日报》的人员依照国共之间的约定，是不应当随便逮捕的，他不但被捕了，还受了无数次的酷刑，坐飞机（即将人倒吊起来），鞭挞，都曾尝过。据他说他并不是共产党，可是特务不肯相信在成都作《新华日报》分馆主任的人会不会是共产党，屡施酷刑，他挺受不住，只好依照他们的意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又逼问他所在的那一个小组，都有些什么人？他没有办法不说出一些人名来。但事实上他实在没有参加过什么小组，自然举不出什么人，迫不得已，他就胡乱地说：周恩来、潘梓年、吴克坚，都在他的小组内。他们居然相信了他的话，并以为他们抓到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在成都关了一个时期之后，就把他送来训导团，在团里已经住过一年多。到团后，从写自传起，他就说明他自己并非共产党。虽在特务手中时他承认过，但那全是“屈打成招”。这类情形，在训导团内本极寻常，几乎百分之九十到团的同难，都是如此。训导团也最头痛这种情形，有这种情形的同难，出团也最困难，总是调查考核，逼你再承认是共产党。有的训导员，曾公开告诉同难们：“你们承认了是共产党，悔过出团要容易得多，一定要翻供说‘不是’，实在是自己找麻烦。”所以李也是他们眼中所谓“自己找麻烦”的人物。

在李和我同当伙委之前不久，正是林祖涵代表共产党到重庆来谈判的时候。林祖涵和张治中分别代表共国双方到当时开会的参政会中，报告谈判情形。在林祖涵的报告里说到在全国各地，有许多中共公开的机关中的工作人员，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去，并一一把姓名列举出来，李的名字也被列举在四川被捕人名之内。

林的报告原文，国民党为了要向世界表示中国有言论自由，竟由中央社破例代为全文发表，这结果是使李在团中异常着慌起来。他知道这样一来，训导团当局将会更注意他，更要迫他自承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在《新华日报》中会有非共产党员参加工作。最后一定是要逼他在训育台上讲话的时间，去悔过去侮辱自己。

“我决不能去干那种事，我宁死也不愿意那样做！”这是当他和我已经很熟了之后跟我讲的话，也就是这一念头驱使他下了要逃亡的决心。他曾几次询问我赞同不赞同他逃亡，我懂得他的处境的艰难，可是我也担心他如果逃亡不成，面对着他的就会是死亡。所以我给他的意见是我知道他除了逃亡之外无路可走，可是如果没有百分之百可以逃脱的把握，我认为不应轻于一试。他也承认我的意见很对，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筹划着逃亡的万全之策。

一天，他忽然和我说：“我已决定逃亡了，但是我不愿意在我走了后叫人说我帐目不清，在这一周起我们第一队将开始考试而你们第二队却不考，我想我即以将考试为借口把伙食委员会的帐交你代管一个星期。官长一定不会疑心，这样我走后伙食帐也不至紊乱了，你看如何？”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接过来他的帐，他也更详细地把他的逃亡计划告诉了我。他决定择一个赶场的日子以伙食委员的资格去赶场，然后乘监视他的上士不留心的时候溜走。

他有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可以穿在军装的里面，溜走时就把军装脱掉当能减少别人的注意。他是西康人，希望能第一步溜到重庆，第二步转到成都再回西康。我知道他身边没有多少钱，我又主张他为了快点逃脱并减少不识路的麻烦，应当雇一乘滑竿，我就把我手头仅余的几百元国币都给了他。那时候这几百元还能雇得到一乘滑竿抬他走二三十里路。他答应我逃脱了之后一定把钱汇还给我，我说我只希望能知道他已安然逃脱。

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一个场期，李在上午七时许就同一个上士到兴隆场去赶场。我真为他担心，甚至在他走时我都不敢和他再谈话。由他走后到下午我都在极不安的情况下度过，我知道李逃亡的消息一定要在这一天的下午传来，我希望这消息传来得愈晚愈好，因为愈传来得晚，则李走得愈远，逃脱的可能性愈高。李逃走的消息是下午三时许由一个从场上回来的炊事兵告诉我的，不久那个跟着李上场的上士也跑回来，报告李逃亡的经过。据他说：李到场上之后即把同难打牙祭应买的猪肉买好，再把其他同难托他代买的东西买就，并一一写明何物属于何人，放在一个布口袋中，然后同这个上士到一个茶馆中去喝茶。坐了一阵，他告诉上士他去上厕所，上士并未料想到他会逃走，就由他一个人去厕所，不想他就由厕所逃走了。上士等了一阵不见他回来，以为他或者是又到街上去要补买什么东西，就把场上的每一条街都又走了一遍，并于碰到团中的人时，即嘱托他们看见李时，告诉他仍回那茶馆相候。结果是在场上的团里官兵，都说没有再看见过

李，再回到茶馆，李也没有回来，他才开始怀疑李是否逃走了。不过他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李也许先回了训导团，所以他连忙赶回团来，等到知道他并未回团，他才作李一定是逃亡了的结论。

这个上士的陈述叫我的心放宽了许多。从他所说的情形来看，李是在上午九、十时即已离开了兴隆场。到下午四时许他应已安全地到了重庆的近郊磁器口。那里人口稠密，李走到那里就等于投进了人的大海，他们想追捕已无及了。何况他们还不像我知李到底走的哪一条路。

李就这样逃走了，以后我再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他的逃亡，确曾震动了全团上下。平常一个同难逃走，团里当时必即派了官长带了枪四出追缉，追缉无着，照例地写个呈文向上一报，队上值日官长照例地被记一过就完了。李逃之后，不只曾即派官长四出追缉；当日追缉无着，翌日且曾专派了一个队附赴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附近一带窥伺了三天。三天后那个队附回来报了一笔相当大的费用，但李的踪影仍然全未查到。团里当局这才硬着头皮呈报出去李已逃亡，要求通缉。用同难的话来说：“自从李这个‘钦犯’逃了以后，我们这群倒霉鬼确实饱尝了一阵‘贼走了关门’的紧张滋味”，我也因此不能再连任伙食委员。虽然全团上下都承认我作伙食委员的成绩很好，但为了怕我这个“钦犯”再逃，还是叫我卸了任。在我未卸任之前，我们伙食委员住宿的小屋前，曾特添了一个岗位，连我们在夜间出去小便，都会被那位持枪的武装士兵用刺刀给威逼回来。我为此曾向总队长提出严重抗议，我说：“你们如果不信任我们，我们可以立即交卸搬回队上来睡，不再当什么伙委。”他们虽假装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说要申斥那个卫兵，事实上他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怕我再走

了他们将更无法交代，“加强防范”，正是他们下的命令。

李走了，我交卸了伙委。在办交接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叫我生气的事。一个比李更早来团、绰号“老乌龟”的政治犯也是我们这一届的伙委，他忽然说李携走了九百元现款，这句话他在李逃亡消息初传来时都不敢说，直到证实他确已逃脱了，他就敢放出来这个谣言。我心中非常明白是他吞没了九百元公款，硬栽赃给李。可是我除了心里明白之外，嘴里并没有方法说出来。李唯恐有人在他走后诬赖他帐目不清才先把帐交给我，不想他走后同难中竟仍有这种无耻的人诬陷他。我曾用了许多方法证明李的帐目交给我时清清楚楚，“老乌龟”的九百元由李拿去了的说法，缺乏证据，不尽可信。不过我也只能用反证来证明，即李如果要拐款逃走，何不多拐一点，他那天如不买打牙祭的肉，不为同学买托买的东西，他可以拐走五六千元。五六千元他没有拐，何以单单要拐“老乌龟”交他的九百元。

经过我这样从旁代李分辩，在同难中算获得了大多数的谅解，都认为一定是“老乌龟”在玩混水摸鱼的把戏，而不是李的金钱手续有什么不清。甚至一部分所谓官长，也同意了我的看法。可是“老乌龟”个人却仍坚持地说李拐走了九百元。

在一次由总队长主持的伙委会交代会上，我直爽地质问“老乌龟”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报告时，他也以为我并不知道真情而仍毫不羞惭地说他可以人格担保那是事实。在同难中竟也有这样坏蛋，曾叫我在很久的时间内感到非常伤心。

李逃亡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我还没有得到他答应寄给我的用隐语表示他已逃脱了的信，曾叫我非常为他担心。我起初坚信他一定不会忘了给我这样一封信。时间再久，我渐渐想明白了，

他不给我信实在是爱护我，他大约怕为了这样一封信会连累了我。所以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是一个团里的勤务兵带给我的，那也是在他逃亡后一两个月了。在偶然的闲谈中，那个勤务兵说，李逃的一天他刚好由重庆走向训导团，过磁器口到新店子的半途中他看见了李坐在一乘滑竿上。他认识他是团里的学生，但未想到他会逃亡，他只以为李是出团了。我开玩笑地问他如果他知道李是逃亡时，会不会拉住他呢？他耸耸肩说：“干我屁事！”勤务兵在气焰万丈的官长们的折磨之下，他们确实多半是同情政治犯的！后来，待到我被释放以后，徐冰曾向我说起过李椿逃出集中营后的情况。据徐冰说，李椿是想如约把钱汇还给我，还打算写封信，是他阻止了李椿这样做。徐冰认为，一旦被人发觉李的逃跑和我有关，对我是十分不利的，宁愿让我误解李不守信用，也不能让我因此而遭到危险。从在集中营和李椿分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听说他是回到了西康。这个人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上。

我在团中还遇见过一次同难逃亡后被捉回来的事，值得一谈。

一个姓陈的青年，身体很健壮，但是没有一点头脑，教育程度很低，连一个高小的学生都比不上。作过许多年的工人，抗战后转入了一个飞机装配厂，他心中总以为作一个工人太没有出息了。常希望有一天能作个公务员，被人称作“先生”。因此他糊里糊涂的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就参加了属于军统体系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作了一个职员，被派在重庆的朝天门至临天门一段地带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清闲的，所以长天是坐茶馆，看霸王戏，看霸

王电影。重庆有名的国泰电影院也在他们所管的区域内，因此国泰遂成为他们经常要到的地方。抗战期间在重庆要看电影，买票困难异常。但是“特”字号人物却不费吹灰之力。他就靠了这点方便，在国泰为了常代买入场券结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无聊由此已可想见。日子再久，两个人竟恋爱起来，这时他才晓得这个女孩子原来是他的上级——一个特务的女儿。过了不久，他的上级也知道了他的女儿爱了他的下属，便决定禁止他们往来。他们两个和一般的男女一样，在高压下偏不肯听命。于是上司便使出来他的“看家本领”，买了几本《新华日报》出版的书籍丢在陈的衣箱里，然后以此作为罪状，说他有奸党嫌疑，把他解来了训导团，想用这方法斩断他和他的女儿的情丝。

陈被送来之后非常气恼，认为他的上司不应当这样阴险。一个月后更叫他生气了，因为他们作特务的本是终身职业，虽然犯了罪，他也应仍领得到薪水，可是他的上司竟连薪水也给他停了。但再过一个月他却平静下来了，他知道他会很快出团的，奸党罪名原是假的，他连中国国民党几个字都认不全，有什么资格可以作思想犯。他这时口里虽常说的有“老子出去决不饶那狗入的”，可是如果出去叫他仍回特务集团里工作，他依然不会拒绝，因为在中国当特务比在中国当工人舒服得太多了。

突然，一天早晨我们在起床号响之后，发现这个陈不见了。经过仔细检查，那些所谓官长的推测，他一定是在半夜里混出了有卫兵的宿舍院落，然后翻城墙逃走的。派人四出追寻了一阵没有结果，大家以为陈一定是乘夜狂奔，早已远逃。不料到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队上的官长们竞相奔告，说陈已抓到了，在兴隆场上抓到的。

他隶第二队，二队的一个区队长遂奉派到兴隆场去领他回来。天黑了，陈果被带回，可是他已跛了，拄着一根竹棍，跳着向前移动。回到团里，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据领他回来的区队长说陈翻城墙出去时，就跌伤了右脚，以致不良于行，可是他仍连夜爬行，爬到了兴隆场朝阳学院的附近。恰巧这一夜有贼溜进了朝阳学院偷东西，惊醒了学生。大家群起逐贼，贼是跑掉了，陈却被他们在田垄间发现。他们断定陈就是贼，因为他不是场上的人，也不是朝阳的学生，而半夜里伏在田垄里。当时甚至有人高声喊打。陈着慌了，便说不要打，我不是贼而是训导团的学生，逃出团来跌伤了脚。朝阳的学生验看了他的军服和符号，才相信了他的话，便把他扶到兴隆场上交给了乡公所，任乡长处理。乡长不敢放走他，遂通知训导团将他领回，这就是他逃亡又被捉回的经过。

把陈关了禁闭室，官长们起初是很欣幸他们自己不但可以免去记过的处分，且反可以获得奖励；再过几天他们就干脆忘记了陈这个人，这件事。可是陈却通过那个每天送饭给他的炊事兵屡屡要我们为他帮忙，不让我们也忘了他，因为他跌伤了的脚，一天比一天痛。我也曾试着想唤醒我们的官长，要他们知道，在人道的立场上讲，他们应当把陈送到医务所，或派医务所的医生到禁闭室里给他诊视。所得的答复是那是他自己找来的痛苦，可以不必管他。总算他幸运，并未跌伤骨骼，加之身体又强，竟能没有医生诊视，肿疼自己渐渐消除。关过几个月后，因为他是军统人员不比思想犯，也就把他放了出来。

出来后，我问他为什么忽然要逃亡，和到底他是不是乘守宿舍卫兵的不备溜出去的。他告诉我，他的逃走是为了要报复一个

区队长，他屡屡虐待他。劳作时，他总是特别挑剔他的工作，例如除草，地皮已铲去了一层，那区队长仍说他作得不好，而罚他在赤日下再铲一两小时。他是粗人，心里不平，脸上就会表现出来，为此他受罚的机会更多。所以他特别找了那个区队长值日的时候逃亡。也是因为就在他逃走的晚上，那个区队长还惩罚过他。至于他逃出宿舍院落的方法，则也是翻墙出去的，并非溜出去的。

我亲眼见了这几桩逃亡事件之后，更证实了我的推想：“逃亡在训导团并非难事。训导团同难逃亡的少，乃是因为大家并不想逃。”虽然他们嘴上不时喊着要逃，但也可说，这种嘴上喊逃，正是为了他们并没有逃的决心。真有决心，反会“守口如瓶”了。为此我想到我进团不久之际，和许多同难谈到逃亡不易时，曾想到训导团卫兵所有的枪械不过一百多杆，如果同难一致行动，全体冲出训导团，也许要比零星逃亡容易些。这时想来，那想象真是离事实太远了！

为什么那些同难在不太难逃亡的环境下都不要逃亡，我仔细想来，找到了两个造成这现象的主因：一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使中国人民具有了世界他国人民所不会有的忍受高压蹂躏的耐性；另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学会了纳粹法西斯压迫人民的一切手法，把中国造成了一座整个的大集中营。使大家认为逃出训导团这类的集中营，事实上还是在大集中营内，一样没有自由可言。——中国人民在痛苦到非言语所能描画的程度下，而革命在中国仍然难产，是也可用这两点来说明的！

## 十八、特工的凶残

怀着滞留在桂林调统室一个多月中领教到的国民党特工凶残的记忆，到训导团后，知道许多同难是从不同的几省送来的，我就起意要调查这些同难是否也遭过特工的毒手，和受到的凶残待遇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我所得到的结论是证明各省的特工对待政治犯的手段都极凶残，虽稍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差别也并不大。

据我的统计，全团的同难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受过刑。也可以说，每一个政治犯几乎都受过刑。我所以不说百分之百都受过刑，是因为训导团中在政治犯外还有约百分之五的分子，是闹学潮的大中学生或生活困难而与团中官长有亲友关系的一些人，名为志愿来受训，实在是来混饭吃。

在凶残的程度上讲，根据我的调查，以贵州省的特工为最残忍。举一个实例来作证，一个在团中的滇省青年 X，当我到团时他才十九岁，但已失掉了自由三年。他本在一个测量学校里读书，为一些小事情得罪了校中的训育主任。在党化了的中国学校中，训育主任个个都是特工，诬学生为共产党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X在这时恰巧接到了一本由朋友寄给他的《群众》杂志，又不



幸被他的训育主任发现，于是他就被戴上了共产党的帽子。被捕，并由测量学校所在的黔南，被送到贵阳的特工机构内。尝尽了所有的非刑之后，X仍不肯承认他们要他承认的“共产党”这个头衔，于是特工就扬言如他再不自承，便枪毙他。

一天深夜里把X叫醒，告诉他你已经可以取保了。“取保”这个名词，被囚在特务机构中的政治犯都知道那就是“处决”的别名。X明白他要被枪毙了，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走出囚室，他和另外一个政治犯都被绑了起来，推入一辆汽车，载至一个荒野的地方。在凄寒的夜风中，再把他们由汽车拉出，然后向他提出最后的讯问，肯不肯承认是共产党。仍然被拒，于是他们就叫他看着把那个同他一起被绑来的政治犯一枪击毙，然后再向X询问。X这时已下了决心，认为死也许比活着受蹂躏好，依然拒绝，不料他们却没有用一粒子弹了结了他而又把他带回。事实上，对于X这办法当然比枪毙了他还残酷，在被拉出去到另一个人倒下去这一段时间中，他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么？

在贵州被捕的人，多半都坐过地牢。在地面几丈以下的地窖中，每天只能得到两餐。每餐只是一碗盐水泡饭。这样，时日一久，只以营养不够，已可置这些被捕的人于死地了，何况还有不断的刑讯的折磨。所以在贵阳被捕的政治犯，如果不糊里糊涂地遭枪毙，不幸殁死狱中，而能被送到训导团贵阳收容所再转送到重庆训导团总团来的，一定是全身都染着因为缺乏维他命，和住处太潮湿而酿成的皮肤溃烂症。

一个我在训导团中遇到时，年在二十三岁的青年告诉我，他在湖南被捕时才十八岁，在作着一个半官方的运输公司的电报生。

罪状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由湖南解到贵阳，在途中竟走了快一年，每一个贵阳小县的监狱他都寄住过。在那期间，他总是带着八九斤重的手铐和脚镣。他自己说，他的主要青年期是在狱中过的，在监狱里，他也受到了教育。因为在监狱里也碰到了许多可敬的教师。他们叫他一天比一天更明白了，人活在今日的中国里，就不能有思想。如有思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都可能构成思想犯的罪状。所以中国再没有民主，大多数中国人面前所有的，将只是死路一条！

特工在贵州执行“宁可错杀千百个人，也不能轻放一个共产党员”的政策，应说的确执行得非常彻底。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由贵州送来重庆，据说，都在贵州秘密处决了。在宁可错杀的原则下，贵州特工的横行遂比盗匪还凶。为了不肯俯顺他们的蹂躏，枪击女青年；为了敲诈金钱，诬陷无辜；在由黔送来同难口中，滔滔不绝地我曾听到过很多的实例。

各地的特工，在凶残上，真像在作比赛一般。由重庆区送来的同难，所供给我的消息告诉我，重庆特工的残忍，实在并不弱于贵州。我所得的贵州特工最凶残的印象，我常自己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在训导团中时，恰好团中由贵州送来的同难最多所造成。

由不同的同难口中，我知道在重庆特工囚人的地方多到不可胜数。重庆市区内，随处都有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警察局、江北县政府之类，正式机关的附属监狱，可以代他们囚人而外，中统、军统都还有自己囚人的地方。租来的民居，不用了的防空洞，都可作为监狱。重庆一个青年刊物的编者郑某，新四军事变后被捕，即在川东师范的防空洞内囚禁了很久。后来就没有了消息，据闻是被消灭了。这是我最初听到重庆有防空洞囚人，并随便

杀人的消息。因为我认识郑，所以听说后曾愤怒了许久。到团中后我才知道我为郑死而愤怒，实在是由于自己所见不广，重庆不知有多少类似川东师范防空洞的地方，无声无息就被消灭了的青年也多得很。至于特工尚未下消灭的决心，因受不了那种痛苦而自行死亡了的人也非少数。重庆法比瑞同学会的一个秘书便是瘐死在卫戍司令部监狱内的。是以被送到训导团来的重庆思想犯，多半可说是由鬼门关逃出来的。例如一个在辋校毕业在汽车兵团中干过排长的悍壮小伙子，因为厌倦军人生活，要加入文化圈，找不到门径；想离开重庆，在汽车站上被查出来行李中带有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遂被宪兵扣留。送到卫戍部，用种种非刑叫他自承是共产党。他本不是，坚决拒认，于是灌水进鼻腔，把身躯倒吊，弄得他死去活来。这时他想痛快死去实比这样活着零星受罪好，于是用力将头部向石块的棱角上撞去，撞破了头皮，人也碰得晕绝了。一连几次，他都未死。特工看他求死的心如此之坚，才放弃了再对他用刑的意思。他的头顶上至今还留着三道创痕，不生头发。

重庆特工的凶残且不只限于对付思想犯，这也是我由团中另一个同难A口中晓得的。A是东北人，他出生不到十岁，东三省已变成了“满洲国”。入初中，受的已是奴化教育。毕业后由于一个亲戚的推荐，便进了在长春的溥仪的伪宫，作了他的随侍。几年生活在伪宫中，因为根本没有假期，家也不许回，他感到非常痛苦，遂买通伪御医，装病出伪宫，入了医院，再从医院逃亡进关，想到贵州找曾写信给他叫他到关内来的一个姨夫。初到北平听说上海好玩且可能偷过伪军防区转入大后方，便到上海。

上海玩了一阵，找不到偷入大后方的关系，又听到在河南可

有偷入陕西的机会，就到了开封。到开封由长春携出的私蓄已全用光，无可奈何，只得留在那里当了一阵警察。慢慢找到了关系，积了点钱，还拐走了警察局的一支手枪，他才到了重庆。到重庆后住在饭店中，钱又用光，写信给他在贵州的姨夫求援，许久得不到回信。他相信一定是因为时间太久，叫他来的姨夫已不住在原址。于是他惶恐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有一个也住在那个旅店中的特工，知道了他的情形遂为他出谋画策说：“如果你说：是奉‘满洲国’派来大后方行刺要人的，以你所有手枪为证，向这里的特务机关自首，那时你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而且可以被政府重用呢！你如同意，自首的关系我可以给你介绍。”他才到大后方，哪里能明白那个特工是要把他当作一个牺牲品向特务机关报帐，竟认为这是他绝处逢生的好机会而表示同意，于是他被带进了特务机关。他们要他供出来同来的还有什么人，是谁派他来，行刺的目标是谁。他没有想到自首之后还有这么多问题，更没有想到他们审讯他不得要领之后，竟用起刑来。用刑之后他自然招出来所以自首的真相，但是特工们连他的真话也不肯信，仍然用刑追询。他在不同的刑讯下死去活来几次，他也曾胡说八道了一大堆，为了迎合审讯他的人的要求。特工们凭他们的经验，最后明白了这家伙实在没有什么“噱头”时，就把他丢进了江北监狱。

几个月都吃的是不能果腹的盐水泡饭，所以当他们又把他提出来要再审讯时，在由江北渡嘉陵江到重庆的渡船中，他曾向大江跃去，想自杀以逃避再受刑讯的痛苦。相伴他过江的两个特工把他拉住了，告诉他不要糊涂，他们已决定了送他到训导团来受训。其目的（一）为暂时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二）因为他在伪满环境中长大，太不了解国内情形，所以要训练他一下。此外还进一步安慰

他说，他的手枪打得很准，这一种特长，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受训出来，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机关工作了。

他的确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谈几句话就可以判断。但是他们却仍然要用刑。由此可以证明，不论什么人一进特务机关，都要受一顿残酷的刑讯。这样看来，中国人民今日所受的特务统治，真是比专制皇帝时代的统治还要恐怖多了。满清时代，县官虽然对人民动不动就打一顿屁股板子，甚至砍头，但他们仍要根据“大清律”办，并不能随便乱打乱杀。设若无故打死或错杀一个无辜老百姓，县官也要负责任，受惩处。现在特务抓人没有人知道，用刑杀死人民，他们的家属也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一个亲人失踪了，不明不白地永久失踪了。中国虽有法律，特务却完全可以不管。特务的意志就是法律，生杀都可以凭他们一时的兴趣决定。号称为民主国家，又是反纳粹法西斯的联合国之一的国家，国内竟有这种现象，说起来如何能令人相信？

但是比上述情形更难令人相信的残酷事实，还有的是。

我在训导团中还遇到一个华侨K。他是新加坡的华侨，兄弟甚多，一向经营橡胶园。他是一个小兄弟，所以什么事也没有作。当陈嘉庚老先生率领南侨考察团回国考察时，他曾追随着到国内来走过一次。走马看花地把祖国看了一下之后，他就决定了到国内来读书。他一面先去缅甸的仰光，一面叫家里汇学费到仰光。学费汇到了，据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大约有几万卢比。这时他在仰光的旅店中却交上了两个特务朋友，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特务。大家整天在一起吃、喝、玩。他们知道他家有那么多钱汇给他，就劝他不要回国读书，不如改用那笔钱，大家合伙作生意。K不同意。他们又改变策略，说他读书一时也用不了那么

多钱，何不分借一部分钱给他们去作生意，赚了钱将来一定加倍奉还他。K又拒绝了，说家里给钱是叫他读书，如果借给他们作生意，赚了钱固好，万一折了本，将无法向家里交帐。这个硬性的拒绝，惹翻了几位特工，于是K被绑失了自由。由仰光用汽车把他押到腊戍，在汽车中他的眼睛是被蒙起来的。在腊戍受了多种的刑讯：打，吊飞机，跪铁锁链，踏炽炭，用竹签插入指甲心，用猪鬃探尿道，还有上脑箍，即用绳子绕住头顶，然后用一根小棍穿在绳索中把绳子绞紧；在这酷刑下，他的眼睛被挤出了血，因而失明。

他所以受这么多种的刑，就是因为他反抗。他在海外时，常常行猎，在马来亚尤常猎虎，所以身体不错，而有了反抗的资本。但就为此，他吃了比别人更多的苦。据他说，有一次刑讯时他曾抢过来一个特工的手枪，想打死一个抵补自己的死亡。但不幸他不会用那种手枪，大约那手枪是有保险掣的一种。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发射，搬了几下枪机，射不出子弹，他就用手枪向那个特务掷去。终于他们再把他绑起来，打到他晕绝方才罢手。

他失明后被用飞机送到昆明，寄押在一个押女性的监狱中。他看不见那些女人是什么样子，但是她们都对他很好。他因失明而产生的不便，都在她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解决。同时在他的脑子里还留下了那些女性确实不平凡的记忆。他说每个女人都明白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夜里一声“取保”被带出去便永远不再回来，可是她们都能视死如归，没有哪一个说过乞怜的话。

在未到昆明之前，他因为受刑不过，非常痛苦，曾自杀过两次。一次托了看守他的人为他买来了砒霜想毒杀自己，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吃砒霜之后他不但未死，因受毒打而产生的淤血状

态，竟很快地好了起来，大概是吃得少了。又一次他是用一条带子自缢，带子系在梁上，把自己吊起来，突然那带子断了，他跌在地上且打翻了一张椅子，因而惊醒了看守者，加紧了他们对他的防范。

到了昆明之后，虽失了明，他还曾逃走过一次。得到同难的帮助，他慢慢地把囚他的房间内床后的土墙，挖了一个洞，爬了出去，且摸索着翻下了那监狱的土围墙。但以看不见的关系，一失脚踏了下来，跌伤了脊骨惊醒了守兵，致重被捉回。在昆明囚居了很久，又被送到贵州息烽军统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又关了一个时期，再被送到重庆。

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已渐渐恢复了视力，可以看见东西了。他见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位的特工，很详细地询问他被捕前后的情形。他据实说了一遍自己因钱遭祸的经过。这个人很仔细地再盘问了他一次，于是喊了来解送他到重庆的人，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叫人把他带开，暂羁在一个地方。几天后，就把他送来了训导团。送来时，他的姓即被取消了。K本姓C，K不过是他的名字中的一个字，大约是因为这个字也有人用它作姓，所以他们就派定了他姓这个姓。为什么他们取消了他的本姓？后来他才明白，是因为特工怕用他的原姓名，会令人发觉他们对华侨如此酷虐。也就为了同一的理由，他在训导团中遂和我一样，是属于“长期管训”类的“学生”！

当我碰着K时，他仍然有一只眼睛半残废着。他的国文程度也还不算通顺，但据K自己说，他吃这一场苦，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从前在南洋他连国语都说不好，更不要说用国文写文章表达意见了。在南洋时，对祖国真可说一点也不明白。现在他已

知道了国内政局是如此的黑暗不上轨道，政府当局对人民的压迫是这样的凶残。如果他恢复了自由回到南洋，他在南洋如何为这个坏政府作宣传是人人可以想象到的。所以这个坏政府存在一天，他将一天不能回南洋，可说已注定了。

和K一样毫无理由而吃尽了痛苦的，我在训导团中还遇见了一个G。G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在贵州桐梓一个公立中学教书，很得学生爱戴。他有一个朋友，也在这个学校中教书。忽然这个朋友失踪了，他四处追寻，很久全无结果。一天他听见人讲，在由桐梓北赴四川的公路途中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死尸。他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个人也许是他的朋友，跑了去看，居然被他猜中。

于是他便买了一口棺木去收殓了这个已死的友人，不意为了他作了这件笃于友谊的事，竟招来了牢狱之灾。他先在桐梓被捕，继被送到贵阳。受了许多非刑，要他承认是共产党，然后送入贵阳收容所，再转送来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到我遇到他时，他失掉自由已近三年了。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中，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处事非常谨慎的人。学识很有基础，不只对他的本行——算学如此，对于中国旧文学也是一样。至于思想却有点落后，孔孟哲学对他颇有影响。说他作事细致可以由一件小事说明。他被捕后曾得到一部白报纸的《三国演义》作消遣读物，后来狱中生活日难，纸烟成为不易获得的珍品，他就改吸土烟丝，而裁一寸宽二寸半长的纸条作卷烟纸。因为白报纸那时在大后方也已成为珍品了。到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已快把一部《三国演义》吸完。被裁剩下来的书本，叫我知道他裁那本书时很有规律。此外他待人接物，也极和蔼热诚。



这样一个人，竟不能逃掉特工的魔手，已可说明特工不是事前调查不周，就是任意胡为。如果是调查不周，抓了他之后应当很容易了然他的为人了，但他们仍不肯放掉他，这可说明特工不只糊涂而且固执。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知已牺牲了多少无辜！

这种足以说明特工凶残的例子是笔不胜书的。在训导团中，前后我遇见过三百个左右的政治犯，也就有三百个左右的凶残故事可写。不过那些事实大多数大同小异，为了节省篇幅，只好希望读者用“举一反三”的精神去理解，而不一一赘述了。在这里，我想继续说一点的是这种凶残行为，不只在特工的机构中，如调查统计局或调查统计室里有，甚至在以感化反国民党分子，期能收归国民党运用为目的的各种集中营里，也一样有这类行径。

前几章中我已说过不少集中营的所谓官长随意殴打禁闭同难的事，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凶残的例子。一个同难曾告诉我，有一个同难因为反抗所谓官长加给他的不断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蹂躏，惹恼了那些官长，于是把他带出了训导团，在旷野中用步枪上的一种叫作“枪探”的长铁条，不分头部身体乱抽了他一顿。在这种乱抽中，那个同难为了保护他的头部，用肉手去遮拦，结果三个手指的肉都被抽裂，疼得他晕绝。这个人在我到团时，已经出了团。也许那个同难的叙述，或不免有夸张的地方，但还有实例，则是我亲眼看见了的，可以作证。

一个身体在外表上看来相当健壮的同难，也是比我先到团中来的，他常说他身体不好，虽然还胖，但不健康。除了这几句话之外，长年都不喜欢谈什么话。这是叫我注意他的一个特征。我曾试着问他到团里来的经过，他总是吞吞吐吐不肯多讲。这又是

我在团中所遇见的仅有的一个例外。因为团中同难照例都喜欢跟我讲他们的经历，他们知道我是记者，把他们的痛苦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转告给全世界。

为了他的与众不同，我遂仔细地和其他先来的同难打听他的情形。从和他在重庆监狱中同过狱，和在他之前到训导团的人那里，我终于明白了他与众不同的原委。

据说他原是重庆市社会局的一个职员，过去人极活泼，工作也很努力。不知为了什么，突然他就被捕了，可能是因为同事不满意他而向特工诬告他是共产党的结果。被捕之后，他尝了许多苦痛的非刑，但他没有屈服。过了年余被送来团。他到团之后，仍然保持着坚强的意志，奋发的活力，喜欢说不满意的话，常想纠合同难反抗官长的不合理措置。这种情形惹恼官长，于是他受了一种非刑，这非刑就是把他的一个无名指用布缠起来，然后蘸了油把那布用火点燃。这样自然他的手指也被火烧着。

到我遇见他时，他的无名指已成为一只奇形怪状的手指。没有指甲，肉的形状显然经过很重的创伤。我当面问过他一次，手指为什么成了那种样子，他摇首不答。以后我知道了真相便不敢再问他了。据说他变成沉默寡言，也是在那手指烧过了以后。

我懂得经过这种凶残的蹂躏之后，他的心中一定对所有的人类都充满了恐惧与敌视。他永不会像过去那么爽快热情了！

的确，走到我们这个集中营里来的每一个政治犯，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的凶残训练成了一种善于怀疑，不肯相信任何人的高度的警惕特性。所以某某同难被官长收买了去作同难的“小报告”传说，在同难中非常流行。当然在同难中不能说没有这种败类，为了要求自己早点脱离这个苦海，或者是为了得到少少的一些报酬

而出卖朋友；有的同难甚至曾找到过那些败类所写的报告，更可以证明。不过为了大家的警惕特高，有时也中了所谓官长们的诡计。训育员或者是队上的官长，把一个同难喊到他们的房内，告诉他：“某某同难报告你如何如何，我不大相信这种话，所以特别找了你来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有什么解释呢？”当然，每一个人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都会狂怒，并要忙于为自己解释。这些话并不是那些所谓官长们要听的，他们所要听的是当这个人含着怒意为自己辩护完了之后，在下一句话中所作的答复：

“你看诬陷你的那个同学怎么样？”

任何一个人这时都会搜索心中存有的一切不利于曾攻击了自己的那个同难的佐证，一一倾泄出来，于是那些长官就获得了他们认为最宝贵的材料了。

所以说到特务机关集中营的凶残，绝不能只限于他们的用刑。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利用种种方法造成对立，然后从中运用，以求有利于他们的统治的种种手法，也无一不是凶残的。

失掉自由的人们之间，本应具有同船共济的要求。在监狱集中营中为了食物的不够，食量大的同难，常常成为许多同难不满的目标，是极普遍的现象。其实真正应当痛恨的是不以充足食物供给囚犯的人。但人类有时真会短视到只看到眼前的情形，忘了造成这情形的原委，竟糊里糊涂地同站在自己一个立场上的人对立起来，叫那些恶魔在暗中称快。

我痛感这种手段的卑劣、毒辣，在我失掉自由的时期中，我在同难中作了许多排难解纷工作，也就是为他们指出，谁是大家真正的敌人。经过这种提醒，集中营里的同难间确曾空前地增加了互谅的空气，使许多所谓官长的阴谋减少了作用。

我曾很仔细地想过中国的特务集中营制度和我从书本上了解的纳粹法西斯的特务集中营制度间有无不同。我所得的结论是：无疑地中国的这种制度是纳粹法西斯那里学来的。但是橘逾淮而为枳，这种制度进了中国之后也就不象在轴心国家中那种形式了。到中国之后主要的改变是什么？主要的我认为是中国的官僚作风浸入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被官僚作风浸入后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官僚作风，照例地等于怠工，对什么事情都会使之效率减少。据此推想，特务集中营在中国也应当效率减少才对。但从事实上证明，效率减少倒是事实，不过出人意外的是效率减少的抓人，比起来轴心国特务，结果竟是增加了残酷。抓人要更随便得多。不管张三李四，有一个什么情报说他有问题，就可以先把他捉来再讲。捉来之后，有天大的罪状或是根本没有罪状的人都会受到一样的待遇，即最坏的待遇，于是酷虐的程度当然是增加了。

再如抓到了人之后，在轴心国的特务，总是照例要问问的。在中国，为了官僚作风，常常可能把一个人关起来就忘掉了。一个月，一年，几年，是很普通的事。因为经手抓他的人起初也许是为了疏懒没有讯问，不幸突然这个人被调它去，没有人接头，就会永久摆下去，再也没有人多事愿意问起他。这结果，当然也是对不幸者增了残酷。

在集中营里官僚作风的增加残酷就更来得显著。举管理通信一件小事为例，就可说明。集中营对学生的通信管理办法是有信进来先登记，再送训育员检查。训育员检查后，才交给队上官长转发。如果附有汇票，那手续就更要严密。多一层登记，名义上是为了保证汇款会确实交到了学生手中，事实上是要限制学生手

上有太多的款。因为学生手中有了太多的款，逃亡的可能性一定增加。寄出的信，则每人每月限寄两封。写了信之后，也要先送队上官长，再转交训育员检查，检查后再交给队上的杂差在赶场的时候代寄。

因为有这么多曲曲折折的手续，以致不论寄进来或寄出去的信，都迟延了时间。一封信在团内旅行个十天八天，是极普通的事。在杂兵、司书、副官、区队长、区队附、队长、训育员任何一个人的手中，都可能停留个几天。并不是他们有意留难，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连感觉都不会感觉到的官僚作风，就会造成这结果。

在集中营里，没有一个政治犯肯写一封可写可不写的信。不只是为了团中有每月只许写两封信的限制，也是为了多写信，对自己对朋友亲属都不利。多写一句话，就是叫特工们多知道一句有关他自己的私事。因此他们的每一封信遂都是重要的。在集中营里需要写信解决的重要事，大致不外两项：一是关于经济的问题，一是关于两性间的问题。

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一定有许多与他有关的经济问题等他解决。找钱到集中营里来用；为尚需他负责的家属找钱维持生活；或者家里比较富有，财产应如何管理。大致每一个政治犯对上述三件事至少有一件要作。

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活着他一定有些两性之间的关系不易割断。有妻子儿女，有未婚妻，有虽未订婚但已在恋爱中的女友；大致每一个政治犯在上述三点中一定也要占一点。

这两项问题用书信来处理已不会处理得好，再加上集中营官僚作风的拖延，使书信交通的时间加长，自然更处理不好了。

有家产的政治犯多半弄得家产因为管理不好而丧失；有家属

待养的政治犯，常常弄得家人流离颠沛；最简单的没有什么牵累，只想弄些钱到集中营来自己用的人，也总是大旱望云霓一样地在盼望收到挂号信。至于妻子单方宣告离婚，未婚妻宣布解约，爱人移爱他人更是非常平常的事。

为了这些问题所加给政治犯心灵上的折磨，比在他们肉体上用种种的非刑，其痛苦往往有过之无不及。对肉体所施的刑罚总是一时的，时间太长，人就晕绝了。到晕绝时，刑罚自然就中止了。心灵上的折磨则是长期的。经年累月，很不容易解除，所以说事实上就更凶残。

集中营里上课、休息，甚至劳作的时间内都常有人呆呆地出神或突然地长吁短叹。懂得折磨人类心灵的凶残的人，在这时就会了解那种表情和声息，和在非刑中的呻吟呼喊是一样的痛苦表现。

何况集中营里的官僚作风并不只怠工一种。舞弊，掉枪花从中取利之类的事，也是照例包含在内的。

我所在的二队的一个副官，就是一个经常在同难的可怜汇款中打主意的人。我第一次收到我的几个学生汇来接济我的零用款三千元时，他说替我去取。我不懂他的用意，就把那张邮局汇票交给了他。过了一星期没有消息，我还感到不好意思追问他。偶和一个先来同难谈及，他立即很紧张地说：

“快去催他，你又上了他的当。他是著名喜欢乱扯用同难汇款的人。他利用同难不愿为了钱开罪团中官长的心理，见到同难有汇票来，他就要求代取。取到手便用掉，然后靠再扯用其他同难的款，陆续地零星地应付紧逼他还款的人。”

这个同难的话，后来在事实上完全应验了。我第一次去催

索，他只给了我三百元。以后总是过几星期催紧了，才再付二百元一百元。我在团中是著名一个不怕官长——官长对付我总要加三分小心的人，尚且如此，其他同难吃到他的苦头之大，自可想象而知。这个副官在我出团之前，因为在兴隆场上赌博大输，怕人家到团来追索现款，弃职潜逃。到他逃走时，仍欠我二百元未还。总计起来他骗欠同难的款约在十万元左右，其中连托他代买草鞋的款都有。

这一类的事加给同难的痛苦，当然是很大的。不过这种事对于那个副官个人还算有利，他作这类事还有一个利己损人的目的。此外还有些所谓官长，竟专爱作损人亦不利己的事。他们由外间寄给同难的信中知道那是同难的爱人写来的信时，他们总是大家先相互传观引为谈助，若干时期之后才交给应收这信的同难。如果有信寄出去给他的爱人，那也要在他们手中为了取笑而多留许多时间。同难的爱人妻子，千辛万苦奔到训导团来，想见见自己的亲人，那些官长如果不高兴就可以叫这个同难连知道也不知道而不许接见。根据训导团的规章，他们实在没有这种权力。但也有时候他们看了某个同难的爱人寄来的照片，被认为漂亮时，就鼓励那个同难，找她到团中来看看，甚至可以通融许她留住女同难宿舍中，在团里玩几天。这固然安慰了那个同难，但那些所谓官长也似乎由此得到了满足，——在他们的肮脏心上，可说已污辱了那个为了爱人不畏刀斧到团中来的女性。

## 十九、我的出团交涉

我在被捕之后不久，即曾向桂林夹山的同难们预言，如果我不被特务杀害，也会遭到很长期的囚禁。许多朋友为营救我东奔西走，我从心底感谢他们，可是我并没对那种奔走寄托过什么希望，我知道我的被释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政治局势的改变上。政局倾向民主，我就有恢复自由的机会；政局恶化，我很可能在监狱中度完了我的余年。

一九四三年末宪政实施促进会在渝成立之后，民盟的朋友们向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我时，我曾有一个很短的时期，误认为中国在国际的压力下，国民党一党专政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的出狱希望已临近了。等我知道了那次要求被拒，于桂林濒陷时，特务且把我转解到重庆训导团里来，又由汤如炎那里看到中统局的“长期管训”公文，我便确切地知道，恢复自由对于我，已差不多是梦想了。

当汤如炎要我写一个文件答辩中统局加给我的罪状时，我虽然照办了，但我所抱的意念不过是不放弃寻求万分之一的机会，而不是真期冀借此获释。

我的一个在《扫荡报》工作的学生阎奉璋，当我解到训导团之



后，曾写信给我，叫我写信给当时的《扫荡报》社长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黄少谷，请他帮忙谋求释放我的机会。因为黄是我在北平时的旧朋友。我虽然听从了阎的话，写了一封信给黄，告诉他我无辜被囚年余的经过；盼他在可能范围内相助，交阎转致。可是我也并未相信过，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我因为先有了长期在训导团中住下去的准备，所以心下再没有一点焦灼而能把自己的生活像在桂林时一样安排得相当上轨道。在团中时间虽然全被所谓官长控制着，写作已不可能，可是我仍能偷闲读我自己要读的书。团里有一个中山室有书出借，其中很有些进步的书籍，同难中相传那种书绝对借不得。训导团所以买这类书放在中山室，就是为了试探那些同难喜欢看哪类书。我认为我的能否出团，显然不是这个团的当局所能作主，我的思想是已经定了型的，也用不着掩饰。所以我借书时，完全不管那些传说，而找我爱看的书借。在上课时间，我公然把借到的书摊在桌上看，那些所谓教官也从来未干涉过我。他们多半都怕我在上课时为难他们，所以任何一个新教官上课一定要特别提到我客气一番：“哪一位是萨空了同学——久仰得很，以后希望常常指教。”我相信他们看到我摊开别的书自己看时，心上不但不以为侮，相反地且会有如释重负之感呢！

我到了团里两个半月后，团的副主任汤如炎回来，正当我大病初愈。我和他见面的第二天，第三队队长就来通知我，说副主任因为我身体不好，许我长期“半休”。这件事在训导团里是空前的优待。“半休”就是说可以不做苦工、不上操，因此我更多了读书的时间，甚至我要写作也可以有机会。但因为团中不像夹山的尼庵，谁也不能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藏私物，我如写作，一定会被

团里所谓官长发觉。万一被他们拿去胡乱篡改后，仍用我的名字出版，那时将弄到我跳到河里也洗不清的地步，所以我终于放弃了写作的意念。

在团里，我显然是个特殊分子。不只是为了我享受着半休优待，还因为我持着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饶人”的生活态度。一个警卫队的区队长有一次为了倒垃圾的地点问题和我发生了冲突。二队的区队长指定那个地方倒垃圾，他偏认为那里不能倒，并且出口伤人。我就问他：“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他在团里当然从未受过名为学生实是犯人的人这类的顶撞，遂大喊：

“你——你受过教育！”

“正因为我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我才那样问你！”这是我的答复。

“你叫什么名字？”他想用这句话来吓倒我。我把我的名字很清楚地告诉他，然后我当着许多同难责斥他说：“你们自己之间的命令冲突了，还要出口伤人，世界上宁有这种道理！”

这件事闹了之后，总队长曾叫队长来和我说，官长即使不对，我的态度也不应该那样不客气。我告诉队长请他转告总队长，我已活了大半生，没有一个人曾骂过我，我只觉得我对那个骂人的人已太客气了。在这件事之后，更叫许多所谓官长，对我存着戒心。

他们感到我在第二队，第二队的其他学生都很难管理，二队队长有几次和我谈：

“我看副主任对你非常之好，你可以写个呈文给副主任，要求改调研究室，那边生活要比队上好得多。副主任已准你半休，

你的教育程度又高，还留在队上受训实在毫无道理了。”

所谓研究室的生活比在队上确实是好一点，我由同难的口中早就听说过。我的一个旧友，在北平《远东时报》工作过，在东北大学教过书的H，在我到时，他已由团调到了研究室。他是在重庆被捕的，被捕时正在作正中书局的经理。由被捕到调研究室的时间是三年。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他曾很详细地把研究室的内幕告诉我。从他那里知道研究室的伙食比团里好，日常生活上的自由也比较多，在星期日且有一天假期，可以离开五云山到附近的小墟场上去玩玩。不过也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但叫人伤脑筋的是研究室办有两种刊物，一定要勉强调到研究室的同难——名义叫作研究生的政治犯写稿。他们所要的稿件内容很简单，凡痛骂共产党拥护国民党的，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刊物本身销路很少，然而期期一定在销路最大的报纸上登广告。社会上的人一看见某人那种刊物上写了文章，就知道这个人是对国民党屈服，被逼自首了。所以凡不愿向国民党屈服的人，即使不是共产党，也当然不会肯为这种刊物写稿。H又告诉我研究室主任叶青虽然不常在研究室，但因为这个人阴森全无“人性”，每月来一次，住二三天，也叫人非常不愉快。——研究室是这种情形，我如何能去？

不去研究室留在第二队，我的意思是宁可多叫身体吃点亏而不想多费点脑筋。但二队队长显然为此大费了脑筋。因为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联合国在军事上好转，使中国的民主力量稍有了点抬头的机会，于是九月五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民盟在参政会中的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就对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提出了关于杜重远和我的质询案。问杜重远在迪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问我失踪已久到底扣在什么地方。这件事立即在重庆《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出来。报上还说对这一质询谢冠生答应了用书面答复。这个消息刊后不久，《大公报》又刊载了一段加框的新闻，说我“在桂隐居后，现在重庆南岸劳动服务。”

在我被绑失踪后，全国报纸从来没有刊载过一个字，只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重庆出版的《时与潮》杂志文艺界消息栏内曾说过一次，谓我因病在桂逝世。许多朋友为了这条短讯非常着急。他们认为这个杂志和CC有关，一定是特务有意弄死我，先放这一个风声试探空气，因而支持我的长女在桂林刊载启事说我并没有死，《时与潮》的消息全非事实。到十月《时与潮》在同栏内也作了一次更正，只说了我逝世之说不确几个字。《时与潮》的报导没有日报的影响大，所以很多人没有看到。这次消息不但在日报刊出，且是在大公、新华两个销路最广的日报上刊出，情形自然不同了。

训导团是不订《新华日报》的，但订有《大公报》。在不几天的时间内该报刊载了两次有关我的消息，叫团内许多人好象突然感到了我的重要。又有同难因为到兴隆场采买，偷偷地带回了刊有我的消息的《新华日报》，杜重远和我的名字都用在三号字排成的标题内，就更感到醒目，也更叫人意味到我身上的政治气息的浓厚。

更不巧的是因为旧历中秋节近，我在作伙食委员，就在那时候被推出团去买猪。有一个同难，是为了在家庭内与哥哥不合，被父亲托重庆市党部的朋友送到团内来管教的。他的家距五云山不远，想找个机会回家一次，就央求我向团里要求带他回家去买他家里的猪，保证可以便宜。这个要求居然得到允许。于是我和他在

一个上士的监视下，由早上八时离团向他的家蔡家场出发。这个小孩子为求达到回家的目的，有意地将兴隆场与蔡家场的距离说得很近。走过之后，我才知道不但来回的距离是一百二十华里，且来回都要爬过一座三千级以上石梯的高山。我们由八时出去到晚上九时才回来，中间在他家休息不过一小时，把我的脚都走肿了。也就在这一天，偏偏突然有一个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关系的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被汤如炎请来团里讲话。他大约也是因为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又从汤处知道了我被禁团内，一时好奇，就要求和我见面。汤下了条子叫我去见他，队长着了慌，连忙呈报我出去买猪去了。汤大不谓然，认为外边认识我的人很多，不应放我出去。并说如果我回来，仍去见他。不意等我等到天黑，还不见踪影，队长区队长都认定我是逃走了，那个上士一定因为我逃走了不敢回团也逃走了。这样他们所负的责任太重了，因为我是一名有名的“钦犯”！夜九时，我们走到五云山脚，发现区队长已打了火把迎出来。等知道我们为了赶路还未吃饭后，就说他早已想到会未吃饭，所以先为我们买了鸡蛋和挂面。回到团里见队长，他脸上也显出了罕见的快乐表情。但是到第二天我却听到区队长已奉到了不许再准我出团采买的命令，显然是总队长，队长都不肯再为我出去伤脑筋了！

在参政会中提出关于我的质询案后半个月汤如炎忽然又找了我去谈话。他告诉我，我所写的关于新疆阴谋暴动问题答辩，已交给了中统局。中统局虽然仍坚持我和那件事有关，可是举不出来确切佐证，所以他承认我确实受了冤枉。再说这一点原本是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向中央控诉的，现在盛世才已不能再留在新疆而于一个月前改任农林部长，这问题的解决也更容易了一

点。这时我遂对他说：

“那么我已可被释出团了！因为我被送来团的罪状一个是奸伪分子，一个是与新疆阴谋暴动案有关。前一罪状根本是谣言，后一罪状，今日已证明无稽，还有什么理由不恢复我的自由？”

“正是因为第一点还弄不清，所以还有问题。你说你不是共产党怎么可以证明呢？”

“这你们可以调查呀！”

“调查一时恐不易调查清楚，所以我为你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有助于把这个问题弄清，那就是你加入国民党，足可证明你不是共产党。——甚至出团之后再有什么改变，我们也有话可以解释。我可以说明共产党都是这样的朝三暮四，我遂可不负任何责任。……”

我听完他的话不禁笑了，我说：

“你的意见是好的，但是我却做不到。我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如果我肯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我就加入了。我的朋友在那时加入国民党的，已有许多作了国民党中委，或者国民党政府的部长。那时我既然没有加入国民党，自不会在现在参加。十多年来我主张的是国共应当合作，且愿立于调人地位；假如今日忽然加入国民党，岂不成了调人参加打架？我不是共产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十多年来我在社会上的历史可以说明一切。我又不是在社会中突然出现的人物，何须用什么来证明？再说今日的国民党我认为是一个没有理论而且组织纷乱的党。一九三七年以后，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已不能一致，党内有派，已是全国皆知的事实。加入国民党而不加入其中某一小组，等于‘升堂

矣，未入室也！’加入国民党等于自我找麻烦，我为什么那么傻！”

“你的本意也许很好，你忧国忧民，并希望行其所信。但识时务者才是俊杰，否则你虽然精忠报国和岳飞一样，我的地位则是看守岳飞的牢头，——但是岳飞死了对国家又有何补？”

“那倒不能说无补，到今天人人都以为汉奸作不得，说到岳飞都肃然起敬，这种精神鼓励使人类走向好的一方厌恶丑的一方，显有极大的关系；至于生死，人总是要死的，只看是否死得其所了！”

我这段答话，使我们的谈话已僵到不能继续下去。于是他又转而问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干事中都有些什么人是我认识的。我举了黄少谷、谷正纲等几个人，有的在一起办过报，有的是老朋友。他说：

“那就好办了，我去和他们商酌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吧！”

这段话说完，我要退出时，他忽又向我提出要调我到研究室的意思。

我用以下的话拒绝了他：

“既然可能很快解决，就不必再调了。我已习于二队的环境，调到一个新环境里，也许反而觉得很习惯。”

汤听后也没有再说下去。在这谈话之后，团内就更注意起来我这个人，许多关于我的传说在所谓官长群中流传着，有人说团里已有呈文给蒋请求释放我。于是凡有关我的事，团里更显然在很小心地处理。

当我进团之日，我第一个遇见的团中所谓官长，二队王区队

长，在我到团后约一个月的时候，他忽然和我谈，他已请准了假回家结婚，希望我借给他一套西服，一件衬衫，一双皮鞋，在他结婚之日穿一穿。他是检查过我的皮箱，清清楚楚知道我有什么东西的人，我当然不能说没有；既有就不好说不借，于是我答应了借给他。他说：“向学生借东西是团里不允许的，最好不要声张，从箱子里拣出后可交给一个勤务兵转给我。”

我完全照他说的办了。一去几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团里来，问其他区队长说续了假，后来干脆说他大约不回来了。我有一次便和一个同难谈起这件事，叹息这些所谓官长之流，未免太不知耻。

这话不知怎样辗转传到二队队长的耳朵里，他是一个很懂得作官哲学的人，认为这件事一定要先由他去报告汤如炎，否则有一天我告诉了汤，他一定要受申斥。所以连忙把我喊了去，问有没有这件事。我告诉他，事是确实的，但这是我愿意借给他的，所以他不回来，我受了损失，也与团无关。但他仍说：

“这件事我一定要叫副主任知道。”

后来他果然向汤作了报告，另一面在向同难训话时，重申不许借东西给长官的训令，并说：“谁借东西受了损失，队长不但不负责任且要处罚你们。”我听了心中暗暗感到好笑，认为中国的官，真是太会打官腔压迫老百姓了！

出我意料之外，在约三星期后，二队训育员忽然找了我去，又问我这件事，说是奉副主任的命令来问我，并同时交出来一套西服，一件衬衫，叫我看是不是我的东西。我检视了一下之后，发现东西倒是我的，不过衬衫已被穿破补了起来，西服也已陈旧不堪了，而且少了一双皮鞋。那训育员说汤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认



为太丢训导团的脸，严函那个王某，叫他把东西送回，否则将开除他的特训班学籍并行文通缉他。王某为了他自己的前程才把衣服送回，至于鞋已穿烂，无可交还了。

衣服能够收回在我已是意外，所以当他问我东西是否已全时，我就答说全了，但队长却代我说出还少一双皮鞋。后来团里竟把王存在团里的行李卖了，拨了可以买到一双皮鞋的钱，代我买了一双皮鞋。

据我所知，团里所谓官长侵占同难的财产，这决不是仅有的一次。可是能够追回来的，这却是仅有的一次。他们对有关我的问题，处理时非常仔细，这就是一个明证。

汤如炎九月底和我谈过之后，许久许久，没有消息。我知道这是我拒绝了他们的人党要求后的必然结果，并不觉得稀奇。到十月二十八日，整整又过了一个月了，忽然队长通知我，说叶教官青在教员休息室等我谈话。那是下午二时左右，我想不出来叶青找我有何话说。我到团后他到我们第二队来上课的时间不过一二次，除了他的四川北部口音，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平庸而贫乏，团里的所谓官长，把他当作了不起的三民主义理论权威看待，我替孙中山想，真有点啼笑皆非。

在教员休息室中我们隔着一张桌子对坐而谈。他又照例地问了一套我到团里来的经过……我也大略地重给他说了一下。后来他和我谈到中国问题上来，我就再把我的国共应当合作的主张提出。我说：“中国是一个缺乏人才的国家，人民受过教育的本来已经很少，十几年来为了内战又有许多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牺牲了。从国家立场上来看，这确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跟着我

为他说了许多我自己亲见亲闻的特务横行的事实，并指出用特务制度荼毒知识青年，实在是太残酷了！

叶青针对着我的话讲了一套理论，他说：“政党不能不斗争，斗争就不能不残酷”；对于我攻击国民党的贪污、黑暗、无能，他表示他知道得比我多，也认为这是国民党存亡之所系的关键。对此，他自己说，已写了一本很厚的论改革国民党的意见书送给了蒋。跟着他就借此转入了他和我见面的正题，还是劝我加入国民党，我仍是很干脆地拒绝了。我告诉他看见一个腐臭了的东西，还故意去接近它，须是有逐臭之癖的人，我实在无此癖好。我们这一次谈话，也用去了三小时，全无结论而散。

和叶青谈话后，我有意地在我们每周一定要写了送给训育员看的周记上，记述我们的谈话并加以评论。我说叶青现在是国民党，国民党所崇奉的三民主义，依照现在的国民党理论家的说法，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但在叶青却主张斗争。叶青在背叛了共产党之后，在理论上显然有许多方面仍因循着共产党的看法，所以我以为在训导团中比较更像共产党的人，实在是只有叶青！在“学生”中却找不出来！

我这一段和叶青开玩笑的话，在团中所谓官长群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尤其素日反叶青的人，更多鼓掌称快。

后来我听到由所谓官长群中传来的消息，说叶青是奉了汤如炎的命令才来和我谈。因为汤要调我到研究室，他是研究室主任，便给了他这个任务。我们一谈便不投机，结果叶连要我到研究室的话也没提出来，就回了重庆。

我们谈话后十天，一个由团中调去研究室作研究生，已经三个月期满可以离团，但以他不愿意落魄回家，宁愿仍留在研究室中

多住一个时期的同难刘某，忽然来找我，劝我为研究室办的《时代青年》刊物写稿。我告诉他我不会写稿，他仍劝我写，我又以在队上忙于上课下课集合解散，一天的时间都掌握在区队长手上，实在没有空执笔为由拒绝了他。

关于刘这个人，我由我的旧朋友也在研究室作研究生的H那里知道得很多。他本是贵州一个小县的邮局局长，因为思想问题被捕，前后也已吃过三年以上的痛苦。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由婶母当家，他如落魄回家，要受到婶母的白眼。所以当叶青于他作研究生期满后留他仍在研究室服务，答应给他应有的薪金，为了苟安一时，他就答应了。我根据这些材料推想，认为叫他来劝我写稿的，一定还是叶青，或者是代叶主持研究室工作的叶的门徒们！

四天后，刘再来找我，我认定他又来找我写文章，所以不等他开口，即很痛快地告诉他，我根本不会为《时代青年》写文章，在思想上我是宁死不投降的人。不料他却说，这次他不是来找我写文章，而是找我谈另外一件事，且是代叶青主持研究室的王教官托他来谈的。据说如果我能答应不多接见朋友，我就可以被调到研究室。我说我并不调研究室，因为我听说到研究室的人都要为《时代青年》写稿，还要写一篇较长的研究论文，那论文且要根据叶青的思想路线写，我实在敬谢不敏！刘说：

“王教官说了，不要你为《时代青年》写文章了，研究论文也可以不写涉及思想的问题，而写关于技术研究的。所以要你不要叫许多朋友来看你，是因为研究室在训导团的围墙之外，朋友来访比较更容易，如不和你事先说明，怕将来大家感觉困难。”

我听了这话后就和他开玩笑说：

“难道我还会纠合我的朋友到五云山来开各党各派的会议?”

对于他说的在我不多会朋友的条件下调研究室这提议，我正式答复是在训导团中，我当然失掉了谈愿意或不愿意的自由。快两年了，不是一直在听任他们摆布么？所以他们一定要调我到研究室我也只好去。不叫我写什么文章最好，如果一定叫我写，我先说明我一定不写，发生冲突，造成什么结果我都不在意！

这答复刘已认为满意，当要和我分手时他又说：

“哦，我还忘了，他们说你决不能到重庆去！”

“我也没有说到重庆去呀！”

“不，那是因为研究室有星期日，其他的研究生有的人在星期六请半天假就可以搭汽车当晚到重庆，在重庆玩大半天再在星期日晚上回来。他们认为你在重庆熟人太多，你一去一定会有报纸刊载出来，你到了重庆，那连汤副主任也负不了这责任！”

我对这问题的答复是：“在我的问题未解决之前，我也不想去重庆。否则朋友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将怎样说？”

刘和我谈话后三天，二队训育员就来通知我说，把我调去研究室的事已决定了。我在过去屡听见同难说凡同难由团里调到研究室，事前一定要找两个文官荐任以上或武官校官以上的人担保才能出去。因为调到研究室自由已多，无人保证，万一逃走了怎么办？所以当我调研究室的传说一天比一天盛的时候，我已在暗暗考虑这问题了。我还听说过那保单上是要保证人担保所保的人，“不危害民国”。这是一桩莫须有罪状，叫自己的好朋友担保，等于牵连他们，不相干的普通朋友，看见这要保证的条件已吓倒了，谁肯担保？所以我心中先下了一个决定，即他们要调我

到研究室时，我拒绝找保。这样他们不放心，调研究室一事也可为此而打消。

等了几天也没有叫我找保。突然在十一月十五日早晨，汤如炎又找我去谈话。这次他和我说的是他已知道我这次事完全是冤枉。他进城(重庆)时曾去访过黄少谷，也见过中统局长徐恩曾，他们曾经商定，由五个人联名向蒋上一签呈请求将我保释。所谓五个人是他自己和黄少谷，徐恩曾之外，又加上了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和《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据汤说黄负责保证我不是共产党；肖和成也是我过去的朋友，熟知我过去情形，可证明我二十年来一向是一个新闻记者；徐证明我与新疆的案子无关；他自己则证明我受训期间一切良好。这个签呈上去，只要蒋一批，我就可以释放了。

此外他又说：“我已决定了立即调你到研究室，这是为了优待你。你除了现用的名字之外还有其它的名字么？”

我说：“没有用过其它的名字，只是桂林调统室送我来重庆，替我买飞机票时，曾给我起过一个名字叫‘萨忠’。”

“我看你改叫萨非空吧，这是因为我们要向内政部造报名册，我不愿意叫他们知道，所以不想一字不易地用你的原名。”

当时我可说完全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叫我改名字，要改名字为什么又只换一个字，这岂不等于掩耳盗铃，但我想这也没有和他争执的必要。不管他们如何安排我，我有坚定的主张便什么横逆都可以应付。我于是主动地改变话题向他谈到我的两个孩子，因为这时日寇已经占领了桂林，且已西进逼近宜山，她们是不是逃出了桂林我得不到一点消息。我告诉他如果我这两个孩子发生什么不幸，我是要和中统局算帐的。桂林调统室主任梁凤庭曾以将

来还要见我的话来保证在我离桂后一个月替她们买飞机票送来重庆，现在已过了五个多月，桂林已陷仍未送来，他们自然卸脱不了责任！关于这两个孩子的事，我和汤第一次见面时就曾提出，他曾说替我问中统局，并愿先为我汇些钱去给她们，被我拒绝了。我说她们要的是“来渝的便利”，并不是钱。现在桂林已陷，汤自然也感到这问题愈来愈难了，但仍安慰我说，推想一定是逃出来了。先耐心等有消息时，看她们逃到了哪里，再定办法。否则空焦急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事实我当然了解，所以也只好同意等些天再谈。

这次和汤谈后我调到研究室去的事算确定了。可是同难都知道我没找过保，便仍断言我在团内至少还要留一两个星期，因为觅保对保手续决非短期内所能办完。这时我心上也仍暗暗坚持着宁不它调决不找保的决定。

不料到了我和汤见面的后两天十一月十七日，忽然二队一个姓李的区队长通知我说，调我到研究室的公事已下来，叫我就到训导团的秘书室去报到并领徽章。领到徽章，凭它我就可以自由出入训导团的大门了！这消息叫我有点感到惊异，“他们真不怕我跑掉了么”，我这样自己暗问自己。我推断这一定是中国时局有点好转的现象。尽管国民党统制新闻极严，但从报纸上我这些天来已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了。史迪威将军在这个月的初旬回了美国；高思大使也在我调研究室公事下来的前一天回了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设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主持；此外叠床架屋的交通机构，也宣布了将设交通运输局统一管理。这些消息都显示出来一定是美国表示不满意中国作战努力的结果。中国真想加强作战努力，政治就非先民主不可，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我推

想他们这样大胆地不叫我找保就许自由出入训导团门，一定是中国政治上有了要转变的预兆。

到赫尔利来中国之后，事实证明，我这想法是完全错误了，所以我到研究室后很久仍不能恢复自由。可是我依然不能不相信，我之走出那个团门移入研究室与当时的重庆政治气氛有点好转有关。

在要移入研究室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我的长女由宜山寄给我的一封信，报告她已逃出桂林到了宜山。我托朋友汇给她的钱虽曾收到但已用完，身上无衣，手中无钱，且生了病。而当天报纸上的报导说敌人已逼近宜山，宜山陷落在即，我连忙写信给在贵阳办抢救文化人工作的熊佛西、谢六逸，和广西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程思远，希望他们能注意一下救助我的孩子。交给值日的李区队长，希望他即日为我发寄，同时还写了信给在渝的学生，要他们根据长女写来的宜山地址，拍电去宜山探询她的下落并汇款去接济。但是我心上很明白，这已等于尽人事求自己心安，事实上对我的孩子怕不会有什么帮助了！

不根据什么法令也没有任何证据便逮捕人，不加询问便囚禁人一年多；答应了照顾无辜失掉自由者的子女也不照办；甚至证明了无罪的话已由他们负责人口中说出，仍然不即释放，甚至没有释放的期限；并不只对我如此，大至张学良、杨虎城，小至一个十五岁的初中生都是一样；这就是国民党的统治，这种统治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中国有用的人民。我的孩子之被牺牲，实只是千千万万实例中最叫我痛心的一例而已。所以汤如炎虽然曾努力想用破格优待我的办法来缓和我对他们的反对，可是想到他们放在我面前的不顾我孩子生死的残酷事实，不过是千千万万事实之一

时，我立即看穿了那是他们的手段，只更增加了我反对他们那种残酷统治的决心！



## 二十、在研究室

我迁出训导团到研究室那一天是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午九时，佩上向秘书室领到的二六一号徽章走出那个团门，守门的士兵，照例看到徽章就喊敬礼。从这一天起我竟必须和我耻与为伍的所谓团中官长们受士兵的同样敬礼，可是我和他们之间距离真是隔得太远了！我在受了敬礼之后，还要去找代叶青主持研究室工作的王贻非教官请教，我今后应遵守的是些什么条款！

王是广西人，一向对我很客气，所以这一天他告诉我的，是到研究室照例要定一个研究题目，他希望我想一想。还有因为研究室人很少，所以出入最好大家相互通知一下。并说，他要出去也通知我。我当然立即明白了那话的真正含义是要我不要随便离开研究室。

对这两个问题我立即答复了他，我说我已决定了到研究室后想研究的问题。题目是：“中国印刷用铅字字架之研究。”我还给他讲了一阵中国印刷用铅字字架之起源及发展，和我过去所作过

改良它的工作；并说明，现在所以打算作这种研究是想在中文自动铸版机未造成前，设计一个更简捷便利的排字设备。我不相信王已很了解我所想研究的是什么，但是我想他一定可以懂得我所提出来的的是一个与政治思想完全无关的研究计划。这本是通过刘，双方有过谅解的，所以他立即连声说好。我之所以立即提出来这个题目，是我早就想好了的，希望在进研究室之前，再正式说明我不研究与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他的连声说好，在我看来，是王有意履行诺言的证明。所以我也就向他保证，不得他的同意，我决不叫朋友来看我，也决不会离开研究室。我这直率的保证，使王有点感到难为情，连忙说他说的相互通知，决不是想限制我，而确实是因为研究室人有限，万一大家都走开，怕失落东西。

研究室的地方是在五云山的半腰，房屋作凹字形，原为乡民住屋，后来强被训导团征用。房屋四周皆属于训导团的耕地，距普通农民的住所还是很远。研究室有杂兵三名，任奔走炊爨工作，书记两名，会计一名，研究生二名，研究员二名。王的名义就是研究员，王之外还有一个孙绳武。刘和一个Y是研究生，但是都已期满可以离开了，只以他们都还未找到出路，才暂时留在这里。除了刘和Y之外，由研究员到杂兵都和叶青有密切关系。杂兵是叶的同乡且有亲戚关系，书记都姓任，是他的同族，王和孙则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我到研究室的身分自己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想象着一定是和刘、Y一样的研究生。不意过了几天，团中秘书室忽然叫我填履历表并索照片，我才借此知道了我的名义是副研究员之类，比研究生高一等且为委任级，有薪俸。于是我就和王谈，这个表我没

法填，因为既然叫我改名萨非空，我自己的履历就不能再用。王却说没有关系，你填上去曾作记者和教授，含混过去就算了。还有一张保证书，要两个人担保我不是异党分子。我说：“你们不要我见朋友我如何找得到保证人！”王说他和汤如炎可以担保，这几张属于萨非空的表格算是糊里糊涂应付过去了。但我向王作了一个声明，即我决不接受那份委任一级的薪金。

我说：“没听说过有拿薪金的囚犯！再说我一辈子也不要作什么委任一级的官？”

王对这问题起初只简单地劝我几句不要不拿，后来两个月过去，他们的薪金都发了我仍不去领，他就更进一步劝我说：“你自己并没有钱，你失掉了自由不能工作，呆在这里又一定要用许多钱，为什么你拒绝要这笔钱？——我老实告诉你，如果你不要这笔钱我也希望你把它领出来，捐给什么人都好。团里有许多没有家属接济的人，你为什么不可以捐给他们？如果你不去领，那结果，只是便宜了管会计的人。他们已够肥了，何劳你再帮忙！”刘也这样劝我，我觉得他们的话也对，才托人为我刻了一个“萨非空”的章，去领那笔名为薪金，实是囚犯生活津贴的款。利用这笔款，我在团中曾帮助了许多同难，使他们能够多获得一点营养！

到研究室后我感到依然没有一点自由。最初一个月，因为人和环境都生疏，甚至感到比在团中时还要苦闷。因为在团中每天接触最多的还是同难，用不着长天怀着的一颗警惕的心。在研究室每一个人身后都有叶青的影子，所以我简直怕多讲话。

唯一叫我感到兴趣的是星期日。因为这一天我可以有自由离

开研究室。虽然我仍不能一个人离开，必须拉了刘和我同行，可是已比留在阴森的研究室好多了。刘在星期日和我总是同出同人，我知道这是出自王的建议，因为这样使我不感觉有人监视而又保证了我不至逃亡。刘是早可以离开研究室的人，不过为了家庭环境不好，又在力求上进的工作中受了严重的打击，以致在痛定思痛的心理下，产生了一种苟安在研究室的意念。所以我感到他是研究室中唯一可以争取的友人，我也愿意他成为我星期日的游伴。

最初我们每星期日的出游简直有点类乎疯狂：一早起来吃点稀饭，如果稀饭烧晚了，就连稀饭都不吃，便已出发。奔向我们前几日商妥要去的一个小乡场，来回都靠步行。假如路程较远，往往到了目的地，吃一顿中饭就要向回赶，一天走六七十里是寻常事。头几次走回来第二天一定有点脚酸腿痛，两个月后，不管走多远连这种疲劳现象都没有了。同时我们也已把围绕着五云山，靠两只脚走能够当天来回的乡场都走遍了。走遍了之后势须重走已走过的乡场时，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这时我们已习于用阴历计算，到星期日哪一个乡场是赶场的日子，我们都赶去趁热闹。现在回想当时的心理，我们为什么那样不怕跑路？这是基于我们需要自由的一种表现。我们希望接近一群群的无拘无束的农民，由和他们接近，可以叫我们忘掉我们一个星期中在研究室中尝够的那种苦闷气氛！

这种有点疯狂似的每星期赶场，除了排遣内心上的苦闷外，还帮助我对四川的农村有了很亲切的认识。袍哥的势力，农民在重重剥削压迫下的生活，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在都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能梦到的。

在这种不断的长天同游中，我和刘不自觉地谈得非常之多。渐渐地我发觉他心理上在起变化，他的向善的奋斗的勇气重燃起来。他本已放弃了重回他原籍的邮局去工作的意思，现在又决定了还是回去。因为他已了解到回邮局去工作，虽不如意，还是有益人类的工作；留在研究室里混饭吃，事实上等于是帮凶。

刘有了这种觉悟之后对我自然有了许多好处。关于我的事，他不会去多向叶青方面的人饶舌，有时且可帮我作些解释工作。加之人到底是感情的动物，大家天天在一起相处，我又素来用钱不大打算盘，渐渐地我已间接听见叶的人在我背后说：

“萨和我们政治上虽不一致，但人却可做朋友！”

我再加紧对他们用些处处大方的工夫，他们对我的壁垒渐渐都已撤销，和我一起谈天时批评叶青的话都肯讲了。我到训导团之后本就抱着看见有不满的事就要批评的态度，这时我就索性和他们表示我很直率，无所不讲。在这一个冬季里，我常常在晚上出钱买点酒菜糖食，烧起来一小炉炭火，煮点吃的东西兼以取暖。每晚都是四五小时大家聚在一间房里天上地下的乱谈。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生活经验丰富，又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因为我已作了二十年的新闻记者。在我不断地揭穿政治黑幕的说教中，叫这些人渐渐地感觉到他们自己是作了他人的工具而不自知。他们自己的政治看法，无形中都受了我的影响而有所修正。某一次我和研究室的几个人，一同去游距五云山约十五里的一个名胜——大磨滩。这里有一段约十余丈宽的悬崖飞瀑，四川的资本家卢作孚等集资在那里建了一个水力发电厂供应北碚一带的电力，更助长了这个名胜的名气。在走向大磨滩的途中，我和王、孙等说：

“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共问题，终是要和平解决的。因为以

现势来看，短期内，显然谁也消灭不了谁。共产党比较现实，早已认清了这一点，又看明白了敌寇当前，复巢之下将无完卵，所以首先提出来共同抗日的主张。国民党总是凭着玄想，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在碰了西安事变的现实的壁以后，承认了合作。但过不久，又重温起来武力统一的旧梦。然而现实总是现实，国际大势所趋，国民党加入民主阵线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如何能够不抗战而反共？所以我以为在今日的国际形势下，国共关系，是不可能如某一些人的愿望日益恶化的。大势既然如此，中国的一些制造摩擦专家的干法，即使为他们个人私利着想，也不很乐观呢！”

说到这里，我把我们研究室养的一条狗来作例。这条狗在我到研究室之前就养在那里，但从来没有名字。叶青的一个叔叔在研究室作书记，被推兼管伙食，大家就称他为伙食委员长，我和刘更简称之为委员长，我们的意思是他的作风死硬和当时中国的唯一委员长一样。每当吃饭，总是这位“委员长”先坐下去，立刻研究室养的一猫一狗也跑了来。猫跳到板凳上伺隙偷菜，狗则在桌下徘徊。于是我和刘因为那猫之狡猾阴险而命名为邱吉尔；狗还善良，就叫它罗斯福，并把每天饭前这一刹那，叫作开罗会议。后来我们的狗叫“罗斯福”这件事，连五云山兴隆场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孙平日最喜欢以一种嗤嗤的声音，作为指使“罗斯福”吠经过研究室的外人的暗号，屡试不爽。所以我说：

“我们的‘罗斯福’，在我们和一个人不相识的时候，有时很赏识它能对他狂吠；一旦那个不相识的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它再狂吠，不免就要被我们踢一脚了。这就是作狗的悲哀。在现在国共之间，我感到像叶主任这类人，很象我们的‘罗斯福’。万一

国共真的合作了，他岂不也逃不掉会被猛踢一脚的命运！”

我说这话之后，不但王和孙没有作声，连刘也未敢响而看了我一眼。但在我心中却认为我决不是刻薄，而是向王和孙进很诚挚的忠告。中国有机会读书的人并不多。每个读书人走错了路，如果在有人为他们指出来时而肯洗心革面，那未尝不可以说是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份改革的力量！

就为了我这种喜欢有话即说不肯忍在肚里的脾气，在研究室我曾和叶青有过一次争辩。

叶每月要到研究室来一次，每来一定留三天。这三天中，白天是到团里去上课，晚上则一定有一晚要和研究室的人开个研究会。与其说是研究，勿宁说是审案。即由叶出个题目叫每人发言，最后再由叶作一个教训式结论。这个会是研究室中每一个人每月最感头痛的一件事。研究生固然最恨这个会，书记也不喜欢。因为无缘无故弄他们来枯坐一二小时，谈话内容也不完全听得懂，简直是活受罪。甚至王和孙也是一样感到无聊。所以他们常常叮咛杂兵，叶来的晚上，灯盏中少加点油，使会开到半途，因为灯已无油而不能继续。这不只可以早点解放了大家，还可以叫叶青感到研究室很节约，他用的人，都能早睡早起。

这样的会我参加到第二次，便因为叶青有意和我挑衅而起了争执。

这次叶提出要讨论的是时事，并订定（一）谈国际问题；（二）谈中共问题；（三）国民党的六全大会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讨论国际问题时，他叫大家逐一发言，刘轮到第三名，我轮到第四。更前面表示意见的是王和孙。他们都是随便找些在报纸上看到的材料谈上几句，敷衍了事。轮到刘他非常原则性地说

了几句，第二次大战中只有民主的力量才能获胜。这话虽不是叶所爱听，但叶已没有反对的可能。因为当时重庆当局在罗斯福政策的影响下，不管真假，民主二字，已须公开叫喊了！刘说完轮到我说时，我仍抱着一贯的沉默态度，说我没有意见。一再叫我说几句，我就说刘先生的意见我认为很对，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以为通过刘，我和研究室有默契，叶不会逼我多讲什么。果然叶不再多逼而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这时正是英美苏对波兰问题有争执的时候，所以他就从波兰问题谈起，认为英美苏对波兰问题得不到协调，将逼使英美对德言和，共同进攻苏联；如此苏联将自顾不暇，更谈不到参加对日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最为有利。如果局势不如此发展，苏军将开入东三省树立政权和中共合作，那时中国将形成南北朝的状态。此外他断言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有把握可以收复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线，理由是伪军将只向国民党投降而不会向共产党投降。最后他确言美军即将在中国登陆，时间可能在六月，但对中共，政府一定用军事解决！

这些话，尤其是当时美英明明合作得很好，他却说美英将与德言和一点，叫我立即想到过去听见已经不知多少次的“叶青是托派”那句话。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这时忽然转变谈锋说：

“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中共问题吧！——这问题，萨先生请你先发表意见，好不好！”

他这句话，引起了我内心的忿怒。因为这显然证明了他不遵守通过刘、王和我成立的默契，谈中共问题为什么不像谈国际问题一样循着座位次序而谈，单要我先谈？于是我决定驳他一顿，叫他在他的干部前出丑。同时也叫他的干部听听叶青的看法之



外的意见，叫他们想想哪种看法更接近事实与真理。于是我对你说：

“中国的问题是要受国际问题的影响决定的。所以如果要谈，我想还是应从国际问题谈起。首先我想指出的是美英会与德和一点是出自叶先生主观愿望的推断，而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推断。美英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合作，显然已不会再分裂，所以如果凭主观先决定了三国仍要分裂来讨论中国问题，所得结论一定是错误的。错误的政策将使中国人民陷入极悲惨的境地……。”

我这种完全驳他的说法，使他感到很伤害了他主任的尊严，遂又争辩了一阵，坚持他的看法。然后提到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国民党将借此获得改革的机会。跟着再谈及国民大会，他说国民大会将使中国政治获得一个新的转机，而他所说的转机的意思是可以打击中共指责国民党不民主的宣传。对这两点我也表示了意见，我说我还记得国民党开前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党内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所以这个六全大会不见得能获得改造国民党的成就。至于国民大会如由国民党包办召开，当然对世界是没有号召力量，仍不能洗脱对外人对国民党不民主的印象。

这种争论，在研究室是空前的，所用掉的时间，也空前的长。在不知不觉中，灯油快干了，于是草草收场，争论全无结果而散。

第二天叶青走了，研究室同人对这次争论留下了很有趣的印象，甚至孙也很象孩子气地说：“叶先生在研究室未遇到过人和他这样顶嘴呢！”

这一次顶嘴的结果是后一个月叶青又来研究室召开这个会时，他先通知了王转告我，以后这个会不再叫我参加。从此我算

整个地得到了脱离受他们的思想干涉的机会。因为叶青都不要我和他开会，王自然更不愿再逼我作什么论文，我在研究室里遂成为吃了饭完全没事做的人。从前讲过的要写什么铅字字架的研究，我也不去理会，王也像忘了一样不再提起。不过在生活秩序上我为不叫王感到为难，依然守着他们的规定。研究室规定早晨要到团里去参加升旗，不过不去也很少人过问。我因素来养有起早的习惯，所以，反比研究室其他的人能够更守这个规定。这也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目的，我要借这个机会锻炼自己的身体，同时靠此和团中的同难保持着联络和给他们帮助。我调到研究室后就成了团中同难的通信和采买的负责人，不愿意交给团里看过寄发的信都交给我付邮；要买什么必须的东西，向我说一声，没有钱也可以给他们垫办。这些事接头多在早晨，前一晚有事托我办的，先向当伙食委员的同难说好，翌早我在参加升旗后到伙食委员会办的合作社作为买东西，消息就传达了给我。

同时我也可以借这机会知道昨天一天团内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可以把团外的种种事件传给团内的同难。象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之类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许多由《新华日报》发表的消息文件，训导团内本是完全没有机会知道的，现在也可以知道了。所以我在同难中，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重要。升旗时他们看不见我，就要推测我是不是生了病，或者已离开五云山！

此外对研究室的办公时间我也尽量地保持遵守，在这时间内我安排了自己读新书报杂志的计划和自修俄文。在我到研究室后不久，训导团为他们的职员眷属办的附属小学校长，改调我在团里时的二队训育员充任。他来和王商量要拖了我去教书，我也很喜欢和孩子们接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的是全校高小的历

史，我借这机会作了一个很有趣味的试验：这个学校采用的课本是教育部决定的国定教本，中国历史是根据陶希圣写的《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国历史观写成，叫人看了真要气得发抖。不只看法成问题，在安排史料上讲，也杂乱无章。那实在是利用“国定”二字来垄断发财不惜贻害子孙的课本，我不能昧着良心用它来教导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于是我决定不用那种课本，而另用自己根据科学观点写成的一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大纲来教导他们。先讲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再把他们买的课本中谈到的史实加以说明和批判；然后讲改造社会的正确理想。我发现小孩子们对我的讲法非常感觉兴趣，因为我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讲历史的那些含着毒素的玄怪穿凿的讲法，而用一种近情近理的小孩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可以了解的一些实例，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教法对我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因为我每授一小时课，起码需准备一小时，比教大学更辛苦。我曾想过，如果继续在研究室住下去，我将用这一历史大纲来编一部高小历史教科书。那对教育下一代，也许算得上是一点贡献。不过我虽然这样努力，但训导团的那些所谓官长们，如果能够懂得我的教法是根据一个什么历史观时，相信他们一定会立即不许我教下去。可怜的是他们没有判断这一切的知识。于是我才能对当时在兴隆场住的百余个小孩子灌输了一些正确的认识，这里面包含许多所谓官长们的子弟，连汤如炎的孩子也在内。在我心上，我这是“以德报怨”，如果他们知道这真相，也许还要说我是“以怨报怨”吧？

在这种以自己读书报和教小孩子的历史为中心工作的生活中打发日子，从表面看来，我似乎生活得平静；但内心里，我过得一

一点也不平静。在研究室我可看得到的报纸，实际上比住在重庆的朋友还要多几种。因为研究室里经常有中统局送来的由中共办的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山西兴县的《抗战日报》，甚至在北平以北的昌平油印出版的《平北日报》我都看得见。这样，战区、大后方、边区、解放区的动态，我都随时可以了然。每天报纸都带给我全世界在变动的报告，只有我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这叫我感到自己内心怀着的苦闷，有一天会使自己身体爆炸开来。

中国的时局总是很矛盾地在发展，我到研究室不到一个月，敌人已进入了贵州。从未到过训导团的主任康泽，这时在团中出现了。由王贻非那里我知道当时的重庆当局认为重庆不守的可能性已非常之大。康自己是四川人，希望留在四川打游击，此来是想知道团中有多少官长学生可以和他共甘苦；附带着还告诉那些腐化到顶点的官长们，要锻炼体格，研究地形，作打游击的准备。

这个消息带给我的是悲喜杂揉在一起的感情，我高兴重庆这腐朽了的政权将在敌人轻骑的进袭中粉碎了。今后人民的力量可以无阻碍地自由发展，最后轻进的敌人必又粉碎在人民力量之前。我悲痛的是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孩子是陷落在敌后了，还是先于敌人的进攻逃到了贵阳。从报纸上我知道重庆一面向贵阳前线增援，一面派了社会部长谷正纲到贵阳去作紧急抢救难民的工作。这时我就又抱了尽人事的心，要求训导团允许我打电报给谷正纲请他代我注意救助我的二女。

报上传来敌人进到独山的消息，同时也报告了参政会的延安访问团即将启程。敌人进攻加紧，国共合作便有转机；敌人进攻一松国共的对立就转紧。这规律在抗战中，屡试不爽。当时又转入了外紧内松的时机，所以我也受到了训导团的重视。康泽假作

一点也不知道我被捕的事，找了我去作了一次长谈。他的结论是许多事都是下面的人假借委员长的名义乱干出来的。委员长根本不知道。这一次他回到重庆后，将尽速与黄少谷商谈，设法令我早日恢复自由。

这只是一个高潮，敌人到独山后不愿摧毁了重庆政府反帮助中国解决了问题，于是不但不再轻进，且退回了桂北。重庆当局喘息借此粗定，于是一切他们过去想过的放宽一点“民主”的意念也又收了起来。所谓一批我就可以放的话，自也成了长期不兑现的支票。

我虽然很懂得他们是在循着那个规律动作，却偏装作不知道而向汤如炎紧催。汤被我催得没有办法，就说进城时一定替我问，于是我只要知道他进城后回来便再去催。到我调到研究室满两个月后，一天汤告诉我：

“委员长对那几个人联合请求保释你的签呈已经批了，批的是‘与盛世才一谈’。这有什么用，现在和盛世才有什么可谈？这是因为委员长根本已忘了你的案情。我在城里时和康主任商量过了，打算再由康主任单独向委员长上个签呈，然后我先到侍从室第六组去关照一下，大约批准释放便无问题了！”

汤既指出了这一个新的说法，我也就改用一种新的催法。此后一有机会，我便催问他是否康的签呈已经送出。这种不断的催询，曾使汤感到相当的难于应付之苦。

这时我的小女儿已由桂林逃到了重庆。训导团允许我接她到研究室来和我同住，使我得到不少安慰。可是我感觉到训导团这个环境总不是可以叫小孩子住的地方，她应当去上学，所以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我就决定了把她送到陶行知兄在北碚草街子

办的育才学校去。此后我也就有了题目，每星期六下午离开研究室赶到北碚，在育才住一夜。第二天下午再回研究室。由这时期起直到我出狱，我简直变成了育才学校每周必到一次的讲师。在我自己是一到育才就觉得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在月光或昏暗的油灯下，大家围着我坐下来，由谈时事到批评他们演出的戏或者解答他们提出来的，由天上谈到地下的问题。到最后我甚至同意了在社会组里成立一个新闻学研究小组，每周去给他们上一次课。可惜这计划一开始我已因为离开研究室而不能再每周固定地去北碚访问育才了。

一九四五年元旦，我以到北碚过年为借口，曾偷偷地溜进了重庆。那时，我每周去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去看我的小女儿的时候，陪我去的总是那个姓刘的小邮局长。一到那里，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同学就很巧妙地把刘很好地招待起来，实际上是把我和我隔离开来，给我创造出可以接近育才师生的条件。这回到了元旦，我们俩又从五云山到了北碚，在一个茶馆歇脚。在喝茶的时候，刘忽然对我说，他不想陪我去育才学校了，那里的师生都把他当作国民党特务。他说，我不想过元旦时找不痛快。你到那儿和女儿过节，我也乘机找个地方去玩一玩。我相信你也不会逃走，咱们就约定在第三天的下午，还到这个茶馆见面，然后一同回五云山。我听了就说，你一定不想去，也不勉强，你好好自己过个年，我也和孩子过个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说好了，我们付了茶钱就分手了。这时，我就决定乘此机会去一趟重庆。我先在街上转了几圈，看看他是否还跟着我。等到我确信没有人跟踪我以后，就急忙买了张从北碚到重庆的轮船票，一溜烟登上了船，当天下午在上清寺上了岸。在船上我盘算过，我不能去曾家岩的周

公馆，也不能去《新华日报》社，那附近总有特务监视着。最好找一个熟朋友的家，由他找共产党的朋友来谈谈。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我心里是想奔往延安去。于是我选择了到阎宝航家，他当时住在重庆新邨17号。

我到阎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我一敲门。开门的正是阎宝航。他一看是我，赶紧让我进去。我告诉他，我是偷跑出来的，要看几个人，再作下一步决定。他让我吃了饭再去，我说怕碰上别人。他说这里没别人。我因为中午没吃饭的确饿了，就决定留下来吃饭。正要吃饭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人，说：“这不是萨先生吗？”我一听，心想坏了，怎么有人认识我？我仔细一看，有点面熟，可记不得此人是什么名字了。我饭也吃不下了，很快起身告辞。阎宝航送我出来，我问他说，你不是说没有外人吗，这人是谁？他说，这是我女儿的朋友，在中央社当记者，他不会说出去的。我又问他沈衡老住的地方换了没有。他说还在良庄，我就决定去良庄。

从重庆新邨到良庄路不太远，我很快就找到了沈老。沈老听完我叙述逃出来的经过后，马上去找了住在同一楼里的王炳南。见到炳南我就告诉他，我打算不再回集中营，想去延安。炳南说，他不能决定，他要去周公馆问问。他立即就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回来。

炳南告诉我，周恩来回延安了，现在曾家岩50号的负责人是王若飞。他已向王若飞说了我的想法。王若飞说要考虑一下。明天一早王若飞将来这里。

当晚，我就睡在炳南家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挂着厚厚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寒风，保存住了室内炭盆的暖气，也留下了瓷

盆内水仙放出的清香。可是，它仍遮不断窗外庆祝新年的爆竹声，而节日的气氛也打不消我忐忑不安的心情。

第二天一早，王若飞就来了。这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因飞机失事，和博古、邓发等在黑茶山遇难牺牲了。

王若飞询问了我在集中营的情况，然后说，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你应该回集中营去。这个答复出乎我意料之外，便问回去有什么好处。他说，他们研究了我的情况，认为国民党不会把我怎样，最后还得释放。他还说，跑出来好，还是等释放好？他认为等释放好，否则就不能在蒋管区公开做工作，他希望我同意这个意见，还是回去。因为现在是第二天，第三天按约好的时间回去，谁也不会知道我到过重庆。

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集中营的情况。当他们听到集中营关着二十几名苏联方面在伊犁训练过的飞行员时，王若飞让我带些钱回去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下他们的困难。

第三天上午我离开炳南家又从上清寺乘船返回北碚，到茶馆里等刘。三点多钟，刘来了我们又一同回五云山去。

我回去时的心情和来时的心情大不一样。我真没想到在温暖的散发着水仙花香的房子住过以后，又要自己回到集中营，回到那已脱灰的监狱的房子里。

那时，时局时好时坏地在变，但在一好一坏的变化中，大势总是多少向民主方向更移近了一点。国民党中怕民主的分子，终将没落倒台的趋势已很明显。我既不愿意逃亡，只好熬下去等他们释放。研究室中的他人，有自由可以走开的，这时却比我还焦急起来了。



第一个是王贻非，两三个月和我相处下来，他已显然渐渐地在变。他是一个聪明人，也是贫苦出身，很肯看书，没有什么嗜好。他本是有资格可以作一个为真理奋斗的战士的，不幸他在社会中摸索时碰到了叶青，叶青为了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而援引他位置他一些工作。王以为那只是叶为了友谊而给他的帮助，遂产生了一种图报的心情，死心塌地地替他工作。甚至在研究室，叶可以领到的公价油米和糖，他都为他照顾得很仔细。但到这时，王由内外的情势来看，知道再跟叶青盲目地走下去，自己的前途太不光明了，于是他定了以回广西自己的家乡去看他的妻子为由，向训导团请假。在暗中他却告诉我，这一去就不想回来了。他想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中学，希望以后我能不时帮助他了解政局的真动向，如剪寄《新华日报》给他等。起初我还不大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是叶青的左右手，他们的关系太深，他怎么能离得开他。不料他真的很坚决便请了假，并作了种种动身的准备后便走了。

王走了之后，早已动摇了的刘更十二万分地焦急起来。我对他不只一次坦白地讲，他应当离开五云山。不论去做什么都比这里好。于是他再写信给贵州邮局说他决定回局。他焦急等待的就是那封许他回去的信。三月底他达到了目的，立即递了辞职的呈文。这时训导团也正因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亟思紧缩，很快地批准，于是和我相处四个月的刘也离开了。

这时研究室主要的人只剩下了孙绳武。孙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年纪约在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研究室人事的改变，使他有代替王，作那代叶青作研究室主任的机会。他对这一点极感满意。在生活上，他是一个不能守秩序的人，又和璧山某校的一个

女生在恋爱，生活就更难入轨。所以在他作了代主任后的行为，连兵都退有后言，可是研究室的空气却为此变得非常自由了。因为他自己作不到的，当然不便勉强他人去作；自己常作越轨的事，对他人越轨，也就不能不包涵。

我到育才去的自由，全是孙绳武擅自给我的。也是为了我直接间接向他提出过许多次保证，我决不逃亡。我告诉他政府无理逮捕我，这笔帐早晚有清算之一日。如果我逃走了，将来这笔帐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算了。孙绳武很相信我这话，同时也因为他常常离开研究室到壁山去会女友，一去三四天，研究室有些事还要叫我代他照顾遮掩，他也没有办法不信任我，不给我多一点自由。

这时研究室又搬了家。原来的研究室改为军服储藏所，我们搬入了训导团的官长合作社旧址。这地方房子较新，因为人少，我遂能一个人占据了一间房。这里和团里的隔阂情形与往日完全一样。在训导团的组织体系上研究室又是直属训导团主任管的组织，那就是说除了汤如炎之外他人无权过问，所以我和孙绳武偶有一二日不在研究室，简直不会有人知道。即或有人知道，也只能说些闲话，因为他们无权直接干涉。

加上这时候国际间要求中国民主呼声配合着中国国内人民要求民主的运动不断地在震动着中国的反动派，这种气息，五云山虽偏处在山凹里，但训导团中那些以反民主为职业的人对它却具有极强烈的敏感。训导团要解散、改组的消息时时伴随着要求中国民主的声浪传来。和教育部主办的大学先修班合并，变为训练由沦陷区逃到大后方来升学的青年的机构这一传说最为流行。因为这消息是由训导团的最上层那里传出的。他们自己知道，这个团

的命运不会长久了。这倒不是说民主空气会摧毁了他们，他们深信那是不会有的事。但是在国民党内小组织的斗法中，康泽这一集团比起CC来处于极劣的劣势，叫他们担忧他们这一集团所办的集中营的经费，会被CC玩个手段借口民主空气而停止拨发。这时在国民党内反CC的运动中，康泽和朱家骅正密切合作。朱正作着教育部长，所以由他们传出的训导团的改变，实在是他们已经计划好的争取保持训导团经费的一种办法。但是康系和朱系的人是不是真能由上层密切合作而到下层也密切合作呢？由训导团内的现实例子来看就证明了他们作不到。两个由朱家骅介绍到训导团当训育员的朱系分子，到团内就受到了康系特训班出身的所有干部的排挤。同时朱系的分子也看不起康系分子的跋扈和无能。他们之间的争斗，两面对我都不避讳。因为五云山是那么小的一个乡僻圈子，所谓官长们虽有充分的自由，但仍然闷得他们发慌，唯一可以消磨时间的地方是到兴隆场上去坐茶馆。我也是一个常常到兴隆场坐茶馆的人，我的目的则是为看《新华日报》，希望知道国民党包办的报纸所不肯刊载的消息。大家在茶馆常常遇到闲谈，他们两面心里孕藏着的苦闷，都因为我是中立的局外人，拼命地对我发泄。借此，我由深知他们的心理而理会到康系的分子心中普遍地存有一种恐惧，即训导团如果真的变成了朱康系合作的局面，那就等于朱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朱的干部一般说来文化水准比他们高，届时他们在训导团内的工作，即便不被排挤掉也要大权旁落；所以训导团的所谓官长们，这时一般的心理都是骑马找马，混一天算一天。五云山的这种气氛对我当然也是有利的。国民党在走下坡路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相对地自然增加了对我的重视而不愿意开罪我，所以当我留居

在研究室的最后几个月中，我的行动自由，逐渐地又扩张了许多。

由于我能经常到北碚，我看的朋友就更多了。北碚这个地方虽然也是特务密布，可是我相信他们认识我的还少。北碚是我去育才必经的地方，在这里，很容易无意中遇见朋友。所以即使被特务发觉我在北碚与什么朋友在一起，还有话可以分辩，说是偶然遇见的，也不至于连累了朋友。

在当时，北碚事实上早已形成了靠近重庆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据点：复旦大学在江北夏坝，育才学校在草街子北温泉，梁漱溟先生办的勉仁中学在金刚碑，此外还有一些国立的私立的学校，如戏剧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等也集聚在那里。这些学校里的教授和教职员，我很有些熟人。更有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因为重庆的生活费太高，找房子不易，搬到北碚来住。象老舍、肖亦吾等文协方面的朋友，叶浅予、戴爱莲等艺术界的朋友。我到了北碚，真是不要去找什么人，只要在那几条街上走走，就会遇见朋友拉了我去吃馆子坐茶馆。

在这时期内，许多朋友所给我的安慰是不容易忘掉的，尤其是舞蹈家戴爱莲女士。她在育才拿很少的薪金，听见我要来，又听说我们集中营里吃的苦，几次特别预备了很丰盛的菜，那会耗掉她半个月的收入。还知道我在集中营里没有什么书籍可看，所以即使她进了城，也要留一两本新的英文书给我，使我对美国的新杂志不至完全绝了缘！

还有两次，我参加了当时经常在北碚举行属于民盟的大学教授座谈会。这个会是陶行知兄推动出来的，隔两周一定开一次会。地点也许在北碚的蓉香川菜馆，也许在北温泉的一个北方菜馆。

在北碚各大学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授，都很热心参加这个集会。因为北碚距重庆虽然只几十公里，虽然除了看国民党控制下的报纸外，还可以看见《新华日报》，然而仍有许多政治内幕不能了然。因为《新华日报》虽说不顾忌国民党的言论统治，但是某些问题上仍须保留两党间可以见面商谈的余地；也有时正为了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反在许多问题的报导上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所以如果有深知政党内幕的人由重庆到北碚来作报告，使北碚关心政局的人可得到一些报纸而外的补充材料，当时是非常适合需要的。

记得我在北碚温泉参加的一次座谈，是张申府兄和邓初民兄特地由渝赶来作报告，使我这久已离开消息灵通圈子的人感到非常兴奋。他们报告之后，各位出席教授的发言和讨论也暗暗叫我吃惊。座上有几位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在过去我知道他们都是对政治没有兴趣，且绝口不谈政治的人，现在居然变成积极分子。是谁叫他们积极起来的？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坚持的统治逼出来的。

也就因为北碚有这样一群富有正义感坚持实现民主的大学教授，使北碚的空气和当时渝郊的另一大学区——沙坪坝(中大、重大所在地)的空气有了极大的差别。

我明了沙坪坝的情形，是因为我的小女儿患牙病，得到训导团的允许，带她到沙坪坝的沙磁医院去诊治的结果。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中，有四五个和我一同去过新疆，后来回来也被捉进训导团，训了一年多放出来才又考进该系的学生。这些学生训导团都很清楚地知道。我到沙坪坝和他们住在一起，训导团的人因为他们出团时都交过保，且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所以

认为他们一定会帮忙监视我，可以放心。不料我却靠了他们的帮助，了解了許多这个大学区的内幕。

在沙坪坝任国民党特务的学生非常活跃，可是他们在大部分的学生中所得到的，却只有痛恨。这种痛恨当时虽还不敢表示出来，然而无形中这一小部分特殊分子已被大家孤立了起来。当我带着孩子在重大男生宿舍仅仅住了一夜的翌晨，在那宿舍的门口就贴上了一张：“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告同学书”。

我暗中留意，这一文件在那里贴了一个上午，出出入入的学生都很感兴趣地看它一遍然后再走开。过一刻似乎这里有这样一种文件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许多学生显然是为了看这文件才到这门口来。最后才有一个特务学生跑来悍然把它撕掉。当撕掉时没有一个学生敢阻止他，反而是他把围在那里看的学生一一看了一眼然后昂然走去。

在北碚复旦就不是这种情形了。复旦常有盛大的宣传民主的集会在校内举行。在复旦的特务学生虽然有枪带在身上，但以主张民主的学生数目上比他们多得多，使他们不得不自己敛迹一点。有一次几个学生在北碚街上被特务绑了去。这消息传到了校中，立即有几十个学生追踪到十里外的白庙子，把被绑去的学生由特务手中夺回来。

还有一次一个在校中作体育主任的三青团人物，靠了他的特务势力包办了由学校到北碚的渡船。因为他只想弄钱，不注意管理，结果弄翻了船，淹死了几个同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学校，学生一定是敢怒而不敢言。在复旦，却因为学生一致来抗争，使学校当局不能不把这主任送交法院处理。

我之能非常了解复旦的情形，是因为我过北碚赴育才时，往

往在该校的教授张志让家里住一夜；还因为郁风的妹妹怡民在湘桂事变后由东吴转来了复旦，还有复旦新闻系的系主任陈望道，偶尔也碰得见。所以复旦上层下层的消息，都传到我耳中来。

此外还有距五云山比北碚还近的歇马场朝阳学院分院，也是在星期日我常到的地方。因为我的一个旧友闵刚候这时正在作这个分院的主任。朝阳的本院在兴隆场，王贻非在朝阳教过三民主义也认得闵刚候，所以我到歇马场朝阳分院去，有两次还是和王贻非去的。王贻非走后孙绳武也被我带了去谈过天。所以我到朝阳，对研究室是完全公开的。有时闵刚候到了星期日且可以派该院接教授的滑竿来接我去玩。

因为我不时到朝阳，渐渐我知道了朝阳的内部也有特务学生在活动，同时也引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加上教授间又有人为了权力上的争夺，利用学生作工具，遂在学校里引起了风潮，造成了学生罢考的运动。这件事甚至震动了训导团。我在团中听说国民党当局据他们所得的报告，一直在相信着共产党要用鼓动学潮入手，用暴力推翻政府。所以朝阳风潮一发生，国民党就授权给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他们迅速把这风潮扑灭。三青团因为训导团距朝阳甚近，就授权汤如炎叫他就近调查处理。于是我在团中一面听到了训导团已准备了最后调团里的警卫去镇压，一面知道汤如炎已接见过朝阳的当局且到朝阳去对学生训过话。但另外我却从闵刚候那里晓得了这次学潮中，该院的进步分子并未积极参加，领导分子事实上是一些平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学生。

所以我虽然幽居在研究室，只有在北碚这一带盘旋的自由，可是就由于我个人的这些简单接触，我已深深感到国民党政权的动摇，和国民党中反动分子的没有自信。大约也就为此，他们才

不顾一切地加强各方面的特务工作。使用种种的高压手段。

我很清楚地知道有一个在兴隆场上卖《新华日报》的小童，由于他卖报非常努力，最后竟招致了“自行朱迹”的结果。这件事的演变经过，我以为很可以把它当作国共斗争的缩影来看。兴隆场距重庆相当远，距最近的公路线也有十余华里，过去看报一直是要看隔夜报的。突然《新华日报》可以当天送到场上了，于是全兴隆场看报的人都改了看《新华日报》，其它的报生意全被它夺去了。这种情形赓续了很久，训导团当局开始感到了威胁，决定与《新华日报》竞争，立刻写信给重庆《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叫他们设法当日把报交公共汽车带到小湾，然后由训导团派一名杂兵去小湾领回，到兴隆场上叫卖。价钱得到《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支持，比《新华日报》卖得还要便宜。在理想中，本来他们是应当可以战胜《新华日报》的，因为这个叫卖的杂兵在教导团有薪饷拿，已比那个报童自求生活费优越了。可是也就为了这一点，使那个杂兵失去了战斗意志。

卖《新华日报》的报童上午九时左右已到小湾车站去等候了，当然这种等法是常常会失望的：或者因为重庆报出得晚没有赶上第一班汽车，或者汽车在途中抛了锚，往往等四五小时都等不到报。训导团的杂兵等了几次之后感觉到这种等法太愚蠢了，所以便改为下午一二时才出发赴小湾。结果是他回到兴隆场时，《新华日报》已早卖过了。还有的时候，因为汽车上人拥挤，汽车上的售票员懒得为这一卷报找麻烦，或者是忘了把它抛下车交给车站，于是报纸就误被他带回北碚。那样报纸便只好第二天再卖了。至于那个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因为是等在那里，车到了他就挤上去自己搜寻，遂可免掉这种事发生。《新华日报》也就为此可以保



证每天一定到兴隆场，且可以早到。后来我更知道不只在兴隆场上如此，附近其他的小场也莫不如此。

经过了一两个月，这现象叫训导团当局又知道了。他们不责备自己的杂兵太不努力，却迁怒于那个《新华日报》的报童，于是突然间某一天，《新华日报》在兴隆场上买不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依然买不到。兴隆场的报市自然地被《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所垄断。这时我也就听到了团内传说那个报童是在训导团的指使下被特务抓去了。但这报市场他们也未垄断很久，一个新的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又出现在兴隆场上了！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中共的斗争并不是在工作上。即或有某一时期在工作上，一旦感到斗争不过中共的时候，就改采用野蛮手段对付。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取得胜利，事实上这种胜利没有一次不在人民心上造成对他们极大的不满。

在兴隆场一带的乡民，我就很清楚知道他们都是很同情那个《新华日报》的报童的。我在研究室曾公开订有一份《新华日报》，每天由那个《新华日报》报童送，他失踪后，新报童来送时，他就和我说，送报到我住的这个地方来太危险，是不是可以改送其他的地方？我问他有什么地方可送，他说：

“在垭口有一个小杂货店，我每天送到那里怎么样？”

我问他那小店怎么肯每天代存《新华日报》转交我。他很肯定地说一定可以，我就叫他试一下看。过了两天我到那小店去取报，果然它们很妥贴地存在那里。我知道在训导团四周的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这顶帽子不好戴的，所以我和他们开玩笑说：

“你们胆子真不小，敢代报童存这种报！”

那个店主很淡然地说：“有什么关系，他们可以随便‘整’（四川话，虐待的意思）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帮手！”

这种反训导团的感情在兴隆场五云山一带非常普遍，决不只限于一家小店。每一个住在那周围的农民，看见穿军服，佩训导团符号或徽章的人，都怀着戒心，存着敌意。所以我到研究室后走到兴隆场上，或在五云山附近散步，心上总是非常痛苦，我受不了老百姓那种怀着敌意的眼光和那种敬而远之的神气。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在我调到研究室不久之后，兴隆场上的人竟有不少人知道了我的姓名。不但对我没有敌意，且处处表示出来对我颇有好感。邮局局长、小学校长、教员、地方上的绅粮（四川人对很有些土地的乡绅的称谓）都想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为了减少他们的麻烦，我只好谢绝那些盛意。由这里，我证明兴隆场上的人对这个训导团的人物是太注意了。大约每一个团中的所谓官长，他们都认得很清楚，而且对他们这些人背后一定都有一种舆论。他们发现我这个人，决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注意我，不过是一般注意中偶然发现了我，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与兴趣而已。

后来由在朝阳学院的朋友那里，果然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说训导团的官长欺凌兴隆场上的老百姓，可说无微不至。强占老百姓的住屋只付极少的租金，甚至不付租金，任意采食瓜果、蔬菜，随便砍伐竹林树木，偷杀鸡鸭猪狗佐餐，都是极普通的事。当康泽到场里来宣布重庆危急要团中所谓官长准备打游击战时，我把这消息告诉朝阳的朋友们。他们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断言，康泽他们不但打不成游击，结果一定是被兴隆场的老百姓把他们给游击到一个人也不剩。这话我认为并不太夸张。训

导团中这一群人欺凌老百姓的作风，完全是顺应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要求而养成的。他们的逻辑是：“我们是最正确的，谁反对我们谁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罪当万死；如果某人已被认为是共产党，那么没收他的财产，虐杀他也未尝不可说是‘替天行道’。”这逻辑再发展下去，也就可以把它的前后秩序稍微颠倒一下，而成为：他们如果侵占了什么人的财产，伤害了什么人的生命，那个人无疑地一定是共产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把共产主义和杀人越货混为一谈的。如果杀人越货叫作共产主义，我以为真正的共产党实在是他们这一群。

这样的一群人，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有计划的制造之下，在今日中国内已不是很小的一群。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生活得安适、容易，便举着共产党这顶帽子向一切人示威，甚至杀人越货。对兴隆场老百姓，训导团中一群人的欺凌掠夺不过是九牛一毛的例子而已！

这种卑劣的手段，在我留在研究室的后一期内，几几乎要到我的头上来。

我前面已说过我到研究室后常常暗中把团外的消息书报带给团内的同难，使他们能够知道读官方报纸所不能知道的新闻。一次，突然出了毛病，一个同难偷看载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长文的《新华日报》时，被所谓官长捉到了。这报纸是我带给他们的，万一这个人因为吃不起苦刑招供出来是我给他们的，对我当然非常不利。所幸这个同难很坚强，一直不肯供出来这报纸的真正来源，只说那是在团内捡到的，大约是杂兵由兴隆场上包东西带回来的报纸。那些官长们自然不肯相信，一面他们把这个同难关了禁闭，一面就到研究室来调查。他们知道我自己订有一份

《新华日报》，便派一个训育员来向我借载有《论联合政府》一文的报。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招我早已有了准备。当那个同难被捉到的下午，其他同难就把这件事通知了我，我立即想到这张报纸我这里一定要有，才能证明不是我拿给他的。于是我连忙到兴隆场茶馆中去再找了一张这天的《新华日报》来，所以那个训育员来向我借这张报时，我立即由存报堆中拣出给他。

他们的怀疑虽然并未由此消释，可是他们至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我给了团内同难这张报纸了。以后他们更进一步凌虐那个被禁闭了的同难，把他关入禁闭箱，即所谓重禁闭。事实上那是和清朝的酷刑站木笼差不多的东西。然而，那个同难始终守口如瓶没有说出来那张报纸的来源。

不过他们并不以此而不再怀疑我。相反地是由于这件事的启发，他们开始了对我的戒备工作。过去我到团里去找同难完全没有人注意，这件事发生后情形不同了。队上的所谓官长，每当我进团找同难时，便表现出一种虎视眈眈的神色。这样过了不到一周，他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遂由二队的队长出面找我谈话：

“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事要和队上的同学接头，请依照规定，先到队上来说一声。”

我问他：“这是什么人规定的呢？”

“这是团里历来的规定。”

“为什么我一直不晓得？——我只知道团外的人来看团里边的人，要有手续；但从未听说过研究室的人和队上的同学见面要办什么手续。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意思，我希望告诉我谁叫你这样对我说！”

这个队长本是个很庸懦的人，我这样的诘询，他已不知道如

何应付好，最后只得坦白告诉我，这是总队附叫他这样讲的。我就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总队附。他说，他没有时间，可以改一天去。我明白这是一种托词，实际上是他怕和我一道去。所谓总队附，在我入团时本是二队的队长，能力较强，对付同难的手段也就较辣。我知道他在主动作这件事时，便认定非先下手作些应付工作不可了。于是我就找了研究室的代主任孙绳武和他讲：

“那个总队附叫二队队长这样对我下警告，实在有点不对，因为我已早非二队的学生。如果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通知研究室的负责人来通知我，而不应直接越权来警告。再说他们说研究室的人和团里学生谈话，都需要有手续，这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研究室里人也有了关系，看这事应如何办？”

因为研究室一向和团里的所谓官长关系都不好，所以孙绳武听了这些话之后比我更为气愤，反而问我这件事应当如何应付。我遂向他建议，这件事不必和他们直接冲突。也不必由他出面去办什么交涉，最好还是向团里的最高当局那里去弄明白这件事，我愿意自己出面。孙绳武非常同意我的作法，这时汤如炎适不在团，他就跑去看在代理汤职任的训导团主任秘书辛某，告诉他我有事想和他谈。辛为表示好感，就说，他很久就想请孙绳武和我吃饭了，何不就在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吃饭顺便长谈！

第二天，孙绳武和我去辛家吃了一餐晚饭。席上谈的都是不相干的话，饭后我才轻描淡写地对辛说：

“我素来直爽不免开罪人，最近或者有些人不大谅解我，我已深深地感到了。希望团当局如果有什么不满我的地方，能够明白告诉我，我决不会使团里的当局为难。如团当局没有什么对我不满之处，那么假如有人在背后说什么诬陷我的坏话，希望也不要

轻信。我在研究室的行动如何，孙绳武先生很清楚的，盼能向他调查。”

因为我知道总队附叫二队队长警告我这件事，孙绳武在事前已和辛谈过，我只说这几句已可叫他明白我的话意义是什么，而不需要我再赤裸裸地讲那警告的经过。

果然辛立即回答，叫我放心，团当局对我决无不谅解的地方，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当面或通过孙绳武对我说，至于其他的闲话也希望我不要听。

这件事经我这样应付了一下，真是平安过去了。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把握到当时的大环境对我有利，外面民主之声洋洋乎盈耳，使他们不敢太苛待我；再则我把握这个团里的学生总队与研究室之间的矛盾也很适当；还有我把握的时机也还够迅速。因为同难的合作使我消息灵通，没有容不利我的活动展开，我已先下手作了防御工作，所以似乎很容易地能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事后想来，这件事能够如此平安度过，实在是太侥幸了。万一不论在那一点上不凑巧，使他们决心要穷追那张报纸的来源，万一那个被抓到的同难再忍受不了苦刑供出来真相，那时我将遭到什么不幸的结果，事后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点恐怖。

只是在那些官长的恶意诬陷中，就不知道有多少同难吃了说不尽的亏，何况我还是一个确曾为团里同难传递过象《新华日报》这类危险读物的人！所以当我回忆自己在训导团中这一段生活时，不论是在学生总队的时期，还是在研究室的时期，我都认为一半是靠了机会好，在整个的趋向上讲，民主势力一天比一天增强，使他们对我产生了投鼠忌器的顾虑；一半则是靠了自己在社会中混了二十年，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不亢不卑不即不离地

应付那些吃摩擦饭的走卒，使他们对我至少没有太强烈的个人恶感，才能未吃大亏。但一般说来，我的遭遇，在所有落到他们这些摩擦专家掌握中的人里面，实在是一个特殊又特殊的例外。然而，就以我这个最幸运的例外来说，我都认为在研究室这一段最没有人约束我的生活也很够痛苦了！长天二十四小时，——这就是说连在睡眠中也一样，我总要怀着最高的警惕心！即使我在笑，我在内心里另外还在盘算着，这笑的时间空间是不是适宜。在没有民主的环境中生活的痛苦，我相信决不是未曾身历其境的人所能了解的。我今天追述这一段生活，虽然依然心有余悸，可是我当时的痛苦体验，也因为时过境迁，虽想把它写得更逼真一点，也不可能了！

## 二十一、获释前后

我之由训导团研究室释出，对我自己，也可说完全是一桩意外的事。

汤如炎告诉我蒋在请求释放我的呈文上批了“与盛世才一谈”之后，他虽然又许了我，将另由康泽再上签呈，我也曾催过他几次，可是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一直没有把这签呈拟好送出。因为在训导团的秘书处里，我也早已有了线索，如果他写了这样一个签呈，我可以立即得到报告。为此后来我渐渐地已在怀疑，汤所说的拟再上签呈，很可能只是安慰、欺骗我的话，如果真认为他们会为我再上签呈，那我简直成了个傻瓜！

汤过去为我转述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话，一直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版上。这段话是在报纸上不断宣称杜重远兄在新疆遇害消息之后，汤对我说的。他向我证实了杜重远兄已死，且说死得极惨，盛世才先叫人用绳子把他勒死，然后用刺刀把他的肚子划破。他告诉我这一消息是为了传达徐恩曾以下的意见：

“徐局长叫我告诉你，天下的事往往有幸有不幸。你虽不是最幸运的人，但也不是最不幸的人。到新疆的你们这一些人



中，茅盾是最幸的。因为他由香港回到桂林后，接受委员长的邀请，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逮捕他。最不幸的是杜重远，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死了。你的情形只是介于幸与不幸之间而已。”

他们的意思寻思起来，其中心当然是在责备我，一条命能侥幸保全下来为什么还不知足！殊不知我和他们争的虽然是我的自由，但我并不是在以自己为中心而抗争。在他们的魔掌控制下，不争也许比争还好些。每一次争论的结果，只有叫他们更恨我的倔强。可是当我听到他们也满口假装地喊着民主时，遂不能自禁地要揭穿他们的假面。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人并不都怕死；真理正义是不容歪曲的，所以人往往不惜一死来保卫真理正义。

我和他们的距离是这么远，如何能够希望他们释放我？尤其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间，我到研究室已经三个月之后，忽然又发生了叫我补办保证手续的事，更叫我感到希望他们释放等于缘木求鱼了！

这件事是由孙绳武来向我说明的，他说：

“有一件事叫在二队作过你的训育员的H很为难。不知为什么团里训育组组长忽然通知他你在临离开学生总队调到研究室来时，没有照常例找过保，现在必须补办这手续。他知道，不必问，你一定不肯办这件事。可是在他的立场上他又不能不通知你这样做。所以他来找我叫我疏通。他愿意代你在兴隆场找两家店担保，只要你肯承认这件事，便可应付过了。”

H这个训育员，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坏人，在兴隆场上也还薄有财产，过去糊里糊涂进了康泽的特训班，结果当了个团

的训育员。也就因为他不太坏，所以和团里他的上司和其他同事都有点格格不入，在我在团里这个时间他曾被记几次大过。现在由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且不是直接提出而是很小心地转了一个弯经过孙绳武提出，叫我应付这个问题自然也有点为难。经过仔细寻思之后，我告诉孙绳武，叫H把两张证明书拿来交给我，至于他要代我找两家店保的事，则希望孙绳武代我谢绝。

孙绳武问我什么意思，我告诉他：

“训导团叫我找保不只全无法令根据，并且违背现政府法令。行政院最近还曾有过通令，为了保障人权，不许各级机关逮捕人民，证明无罪之后，还要强令找保。所以训导团现在要我找保乃是不尊重这个现政府命令的表现。我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反对国民党专政的政府，可是它的好命令我却也还不忽视。训导团天天高喊拥护这个政府，为什么他们要违反它的政令？至于我拒绝H好意代我在兴隆场上找几家保那件事，是因为我知道这种保人太不容易当了。他们要人家担保不危害民国，什么叫危害民国？完全没有一定的定义。他们不高兴，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可被认为危害民国。——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更是时时会被认为危害民国。我如果叫兴隆场上H的朋友开的商店为我担保，那么他们必将受累无穷，而H也将被牵连，弄得无以对人，所以我必须拒绝。不过我也想过，如果我完全拒绝找保，会使H非常困难，因此我接受这两张保证书过来，H没了责任！至于保我是决不找的，叫他们来问我好了。如果有什么训育组的人来问我，我会告诉他们叫汤如炎来问我，我才肯答复。那时我就要向他请教请教他是不是遵守国民政府的法令。”

孙绳武对我的话没表示意见，过两三天，把两张保证书交了

给我。我相信，他一定也将我的表示传出去了。在这情形之下，不是很显然地他们不能继续压迫我找保，已属对我让步了。哪里还能希望他们释放？

所以在这叫我找保的事发生了半个月之后，一个安南华侨同难，经历了学生总队和研究室这两个阶段，获释离开五云山，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去工作的C，跑来告诉我：他在重庆城里听到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已去职，改由叶秀峰继任。我的问题，经过《扫荡报》社长黄少谷的帮忙，已由黄和梁寒操、成舍我出面致函康泽要求保释。我依然不相信会有什么作用，并且对于要保释我这一点，我也仍然保持着反对的观念。所以我曾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少谷，告诉他我听见说他在为我帮忙非常感谢，不过这件事恐怕没有什么可为，希望他不要再进行。但此后我没得到他的复信，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这封信。

不过在十多天后，我却从训导团秘书处方面，又得到了报告，证实了黄、梁、成确有一封信交到团里来，要保释我。团里也回了信，说一时还不能释放。这一事实更叫我证实了我自己的看法的正确。

然而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了或者会侥幸被释的希望。因为我从桂林被捕时起就深信他们不会轻易释放我——可是中国政局如果日趋民主，一定会有一天环境会迫着他们非释放我不可。在我住在研究室这个时期，比起我在桂林被捕之际，中国政局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无可讳言地已有了不少进展。回想召开国是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只是民主政团同盟同人向世界宣布的一个理想，到这时竟成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共同要求，使国民党不能不考虑接受。过去国人即使不满意政府，也只好腹诽而没人敢说

出来，更不要讲写出来署上自己的真姓名，到报纸上去发表了。到这时，情形大不相同了。公开表示不满意现政府，因而要求召开各党派的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言论，接二连三地在报上出现，后面署名的人且都是一些很有社会地位的知名之士。虽然国民党为了对抗这一种真正的民众呼声也组织了许多人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政府的宣言，可是那些署名的人比在反政府宣言上署名的人，未免相形见绌了。许多在过去拥护国民党政府或至少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知名教授，工业家，妇女居然都在反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从《新华日报》上我们还知道有些教授因为在反政府的宣言上签名立即受到政治压力，叫他们出来否认曾经签名，但大多数都虽受了压迫也不肯否认。最有名的，象中国古代史研究家名教授顾颉刚便是一个。这实在太叫人吃惊了，并且令人对他们不禁产生了应刮目相待的心理——显然中国是什么都在变化着了！

尤其到了四月六日苏联宣布废止苏日中立协定之后，更叫我感到中国的环境在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苏联宣布废止苏日中立协定，谁也知道那是它将在远东方面参加对日作战的先声。苏联对日开始积极行动，一定会使美国的对日行动更加积极。美军要在中国登陆的消息，虽然报纸上没发表过，但我在研究室里已不断地听到叶青等由城里来的人谈到。美国真要到中国土地上对日作战时，中国政府如果仍然是国民党专政的无效率的腐化政府，美军势力必会吃很大的亏。所以那时美国当局即使为了他们自己也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进步，要求中国政治民主化，使国民党取得中国人民的拥护然后使他们也能间接地获得军事行动上的便利。

就是这些现象鼓舞着我，叫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突然因为环境有了大变化而获释。

不过我虽有这种信心，可是我对汤如炎说再为我上签呈之类的话，却失掉了信任。我已明白这类文章绝对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不料在我再也不信任这类官样文章时，突然一天汤如炎在他家里请我吃饭。在席上向我宣布，他明天进城，将把要求蒋批准释放我的签呈带了去，并说他这次一定先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说好，不要把这签呈批成上次那种样子。我当时也说了感谢他的话，可是事后想来，我说那话的淡漠神情，大约连汤如炎也感到了我并不很关心这件事！

在这以后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是曲曲折折的，更叫我感到问题难于解决。

例如三月底，抗战后即在政治部下设立，由郭沫若领导，起初叫第三厅后来改为文委会的那个收容进步文化人的机构忽然被解散了。政治如果真的趋向民主，这件事似乎就不应发生。这件事发生后两个月，到五月底，苏联有了邀郭赴苏之议。在我心里以为郭一定不能去苏联，不意他竟成了行。

还有在文委会解散后十几天，报上忽然刊出了董必武率章汉夫、陈家康赴美，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消息。再过半个月报上又出现了成都《华西日报》社被捣毁，浙大教授费巩失踪，中大教授吴思裕被殴的报告。

到底中国政局要走哪一条路，改向民主还是继续独裁？我这个失掉了自由，只还有机会看《新华日报》的人，简直不能判断了。

这时的国际局势，也变化得一样微妙。四月十四日我在由训

导团赴北碚育才学校的途中，听到了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我立即感到美国的政策将有大变化。但是到五月一日希特勒、墨索里尼死亡的消息也传来了，那时我以为希、墨之死，至少应算是一个好消息，中国总不应再允许任何人走希、墨的老路了。可是到五月下旬，我却由朝阳、复旦几个我可以接触到的文化界朋友那里听了国民党在这个月里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大会中，充满了对中共剑拔弩张的气氛。国民党中民主派领袖之一的王昆仑，在会场中受了不少诬蔑，甚至公开说他日间与国民党开会，夜间与共产党开会。他是由第一届国民党代表大会起，一直就在作国民党中央委的，在这次大会中却落了选。新产生的中委，不是军人，便是C C。其他象政学系朱家骅、康泽等小派系也都受到了打击。

由这事来看，国民党这个在独占着中国政权的政党，是更加紧的法西斯化了，国际局势能允许中国这样下去么？到六月四日我在报纸上又看见了陈诚的公开谈话，说中国靠租借法案得到的武器，当然是用以打敌人的，不过如有不友谊的军队袭击了国民党军队而不许他自卫，那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听到这种口吻，我当然可以立即明白，它的真义，就是要用租借来的武器打中共。同时我在《新华日报》上还又看见了中共的王震部队正由陕入湘与李先念的队伍会师之讯，我自然更明白了陈诚的话，是大规模内战行将爆发的信号。

这种种情势，在训导团内也随着它的发展有着适合的反应。当外面民主气氛浓厚的時候，训导团内一教官，在纪念周上居然大讲起来天赋人权，反对一党专政。训导组给同难的辩论会出辩论题目时，也居然以“一党政治优于多党政治”，“多党政治优于一党政治”作为正组反组的讲题了。更有趣的是请来评判这一辩

论的教官，有两人因为一个坚持多党政治，一个坚持一党政治，始而对骂继而挥起手杖，打了一架。

但到了陈诚宣告“受了不友谊的部队袭击时，而不许国民党军自卫是不近人情”以后，训导团内的空气也有了新的改变。一直在宣传的训导团行将解散的话，先被郑重否认了。康泽这时也跑到训导团里来，上次他来是敌骑逼近贵阳，重庆震动的时候，他来希望的是有多少人可以跟他打游击；这次他来却不同了，因为这次他已负起来招募青年军的责任，且已以准备反攻，受美军训练为号召，招到了不少中学以上的知识青年入伍，组成了几个师。所以他的训话口吻比上次强硬多了，反对组织联合政府，坚主召开一党国大，成为他这一次训话的中心。

同时，我还从孙绳武那里听到了康对训导团的新计划。据说他已下令给近延安的榆林分团多存储食粮，把住老河口的豫鄂分团解散，湖北只保留在恩施的分团，至于衡阳分团，则拟扩大。

孙绳武说这话时叫我想到了上次康来过之后，衡阳分团的教务主任C在湘桂撤退中不只再也顾不上因在衡阳分团的政治犯，甚至被逼着忍痛把亲生儿女送给了别人。最后他逃来五云山，带着半神经病的表情，对政府和三青团当局大发过一顿牢骚。想到那时他们的狼狈，和现在康又要把衡阳分团扩大，叫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自己只要稍微有一点把握可以存在时，就要加紧蹂躏别人，怎么能不叫人民痛恨？

所以当孙绳武告诉我，康又想要见我，为表示他不摆架子，这次且不拟喊我去见他，而要来研究室拜访我时，我立即在心里决定了拒绝和他见面。遂告诉孙绳武说，我盼他去代我向汤如炎

说一声，我想趁着康泽在团的时候，请他们共同作一决定，许我请假赴昆明去接我大女儿来重庆。如果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可派一个人陪了我去。在湘桂撤退中，中统局的桂林调统室负责人完全未履行他们对我的诺言，造成了我大女儿今天仍流落在昆明的事实，这件事现在不能再不谋补救了。——我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叫康知道在见我的面时客气一番是没有用的。不过我虽然这样做了，仍怕康或者会来。所以在下午二时我又决定了到兴隆场上坐茶馆，并留到吃过晚饭后再回研究室，叫他即使来了也见不到我。我告诉孙绳武我去兴隆场时，孙绳武说五时千万记得回来，康主任说要来的，我漫应了他一声便走了。晚八时，在场上吃了晚饭才买了一个灯笼照着走回研究室。孙绳武忙过来和我说：

“康主任没有来，由汤副主任陪着在梁滩河里游泳呢！还有一些训育员的女眷们在一起！”

果然我们可以听得见，就是研究室脚下的河中，不时传来一片男男女女的欢笑声。我问孙绳武，是不是曾把我的要求告诉汤如炎，他说已经照办，我遂知道康不会来了。

在这时期内报纸上除了一般的国内外新闻外，又新产生了两种新闻，一种是关于青年军的新闻，一种是关于美军的新闻。重庆许多大的公馆，传说都被政府征用了，还传说北碚有许多地方也要被征用，拨给美军住。距训导团不远的小县璧山，则成为青年军的训练中心，住了一个军在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军人的新闻，性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胡作非为，扰乱社会秩序。青年军的杰作是在重庆集体捣毁电影院。美军的杰作是在渝碚公路上调戏妇女，甚至强奸妇女。



训导团在渝碕公路的一个小站——小湾，设有一个运米站。我已在前面谈过这个米站上有一辆属于训导团的运输卡车，雇有一个汽车司机。这司机和他的眷属，就住在公路旁米站内。这个司机的太太是一个年青的四川妇女，生得还够漂亮。据说某一天忽然被过路的美军劫走了，她还有一个吃乳的小孩要她喂乳，但是谁晓得她被劫到哪里去了呢？事情的发生非常仓促，她的丈夫不在家，没有一个人记得那汽车号码，报告了保安警察大队，但有什么用？所幸过了三天，她自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家里的人却改了口，说她不是被美军劫去了，而是到别处去玩了几天。这女人回来便病倒了。

但是四邻却传说她带回了不少美金。也就为此在北碕一带人民心上写下了极深的愤恨。这个消息没有见过报，只凭口传，在民众中竟传布得非常迅速而且深入。兴隆场乡公所在一个赶场的日子，被场上民众逼着派出一个乡丁，敲着锣向民众通告，以后妇女赶场不要浓妆艳抹。又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听到了在青木关附近发生了一桩群众共起逐走调戏妇女的美兵的故事。一个在公路上走着的乡妇被驾着吉普车经过的两个美兵看中了，停下车来和她调笑。她起初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等到由表情上知道对方来意不善，大约美兵行为不端的传说也同时从记忆中唤起，于是她跑了。她在前面跑，美兵在后边追，惊动了在田里工作的农民，于是纷纷携了农具，也来参加这纠纷。这时候美兵发觉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利了，连忙奔回所乘的吉普车，开车逃去。

青年军在璧山给人民的印象，多半是由孙绳武带来给我的。他决不会造谣诽谤青年军，所以他的报告只会有不够的地方，决不会有夸张之处。我由孙绳武处知道，起初青年军中确有不少好青

年，他们抱着一腔爱国热忱加入青年军，志在接受美国的装备训练后配合着美苏的兵力对日反攻。训练开始后叫他们从事实上证明了，所谓训练只是一种普通士兵的训练，现代化的装备根本是一句空话。而训练他们的那些官长又都是知识不及他们还喜欢用高压手段的法西斯型人物。他们失望了，但是后路已断，想重回原学校原机关已不可能，于是在失望中他们之间部分人就开始干出来许多糊涂事。但也有人说，这话都不是事实。那些糊涂事并不是真正好青年干的，他们虽然失望也不肯做坏事。作坏事的是另外一种混在青年军中而非志在为国杀敌的坏蛋。所以当局虽还未把训练青年军的本意是训练一支剿共的骁悍军队宣布出来，青年军在他们揉杂着法西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训练作风下，已先整个失败了。渐渐地青年军逃跑之风盛行，青年军当局却认为这对他们也有利，正好借此吃空额。逃的太多了，他们才去募一些职业的“兵油子”来补充补充。“青年军待遇好”，是他们向“兵油子”号召的口号。号召来的，自然不言可喻没有好人。于是很快地，曾被老百姓刮目相待过的青年军，现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又变成了和过去一般军队一样的“一丘之貉”！甚至可以说印象更坏一点，因为青年军是目前随时可以加害于他们的军队，比在记忆中的坏军队自更可怕得多！

兴隆场虽然是山坳里的一个小乡场，由这些事实叫我们可以知道，它正和一切中国其它小乡场一样跟中国整体是呼吸相连的。也许在这种小乡场上如有冷静的头脑，就更容易找到真正的中国整体的动向。小乡场上的人民在多年高压统治下，他们也有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爱憎是分明的，他们决定爱憎是凭着冷酷的事实而不凭什么纸上的宣传。所以我在兴隆场这小乡场上，

为了多接近乡民反能很早地体会到中国人民反美情绪在生长，反对独裁政治的行动在酝酿。

距兴隆场不远有一段矿山，出产煤和其他种金属，由资源委员会经营着，雇用了许多外省工人采矿。那些工人在自认为奴役人民是他们的特权的政府人员行动的感染之下，和极微薄的待遇使他们连“足食”都谈不到的生活逼迫之下，交织成一种欺压乡农讨小便宜的心理。摘取农民果园的果实，拔折农民种植的蔬菜，偷杀农民豢养的鸡鸭猪狗，甚至调戏农民的妇女，最后终于由一桩调戏妇女的事件几乎酿成大械斗。

每到赶场的日子，那些矿工便有计划地在田间的小路上安排两个工人，把一个单身赶场的农妇夹在当中，然后两人唱和着说些无聊的话戏弄她。田间的小路都是窄到想越过前面的人或让后面的人越过自己都不容易的。致使农妇想逃避也没有办法。更大胆的工人甚至追随农妇到她的家里说长道短流连不去。农妇没有了办法，只好找她的丈夫回来，他们夫妻共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工人自己闹到无趣时走开。这类事随时随地在发生，农民的耐性再好也会有时忍耐不住，便发生了一次斗殴。事后矿工自己雇用的警卫竟把一个农民捉去痛打一顿。农民们忿恨不过，就计划如果再有矿工来骚扰，他们就集合起来用农具歼灭他几个再讲。这个消息渐渐传到了矿山上，于是矿工赶场都暗中携带武器，且不敢一两个人到场上来，最后还是乡长出来奔走调解才打消那一场大械斗。

这些事实，叫我一天比一天明白人民对外来侵略内在暴政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人民受高压到一定的限度后，他们就不顾一切要求翻身。国民党十几年的专政给人民的痛苦，早已到了叫

他们不能忍耐的限度，只以“打国仗”这个口号的提出，才又叫他们忍耐了下去。国仗如果打完，国内政治若还这样糟，人民岂能再行忍耐？我感到我的真正希望也就在此了！苏联在远东参战，美军在中国登陆，都已是指顾间的事。日寇在美苏夹攻下一定很快地覆灭，国民党政府那时如果不能自己醒觉改走民主的道路，也将被民众推着走上去，再不就是被推倒，到那时我就一定可以离开五云山了。所以当时国内局势虽然好一下坏一下，我也并不认为那些现象值得忧虑。甚至我由训导团秘书处那里知道了训导团函复黄少谷、梁寒操，成舍我要求保释我的信，说一时尚不能释放时，我不但不以为意，且觉得这样很好，否则被保了出来，为了顾虑他们的友谊反要叫我感觉到难于应付。我从很长期的观察中找到了中国问题的一般发展规律：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虽然为了人民推动出来的抗日战争而取消，可是因为产业落后，经济上中国仍然在事实上作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问题，大多数取决于国际的动向。更以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完全依赖美国的，所以美国的动向，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虽总希望作得比美国反动派所期望的更右一点，但在世界全体大势趋向民主时，他们也不能不至少在表面上跟着走。所以在每一件牵涉到国际的问题上，他们遂多半让步。董必武之能赴美，郭沫若之能赴苏都是证明。在国内问题上，他们却不肯让步了，因为再让步他们自己便将崩溃。是以《华西晚报》社被捣毁，费巩教授失踪等事，会在政府高唱民主的声浪中发生。他们的内心当然还期待着，有一天世界上要求民主的声浪成为过去时，他们更可大显身手。

殊不知世界大势，民主早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主流，中国民众

也早已不能忍耐，而在等待着每一个可以改革政府的机会而行动。据此，我相信，我被释放的日子并不太远。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在很近的时间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二十四日，汤如炎又叫人来通知我，那天中午请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请我到他家吃饭已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奇特。不料在入座之前，他突然通知我说：

“你已经可以离开研究室了。”

那时我真有点不大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很想要他再说一遍他所讲的话。不过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又接着讲下去：

“但是你如果认为研究室环境还好时，当然我还欢迎你住下去。”

我这时知道我的耳朵没有听错，他真的是在说我已可以离开五云山了，我遂问他：

“有什么条件么？”

“没有条件。”

“还有什么手续？”

“也没有，只希望你如果到重庆之后，去看看黄少谷和他谈一下。”

“如果是这样，那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少谷是我的朋友，你不说我也要去看看他的。”

饭后回到研究室，我就把消息告诉了孙绳武，同时希望他下午就去看看汤如炎，告诉他我明天就要走了，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意思也许他有什么条件不好意思和我当面说，孙绳武去见他当可叫孙转给我。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我是宁愿不走也不

愿接受的。

晚饭前孙绳武去见了汤，回来告诉我，汤仍然说没有什么条件，只说了一句希望我出去后慎重自处。此外就是希望他转达给我，他为了我的事奔走甚力，帮了不少忙，不过他不愿当面对我讲，否则就象向我邀功了！我也就顺便再托了孙绳武向汤代我致谢。

孙绳武劝我多留一两天再走，我知道那样将惹来许多无聊的应酬，训导团中的所谓官长们一知道我恢复了自由，一定有许多人请吃饭欢送，以示拉拢。那种饭，吃起来太无聊，还是早点走开的好，所以我坚决谢绝了孙的好意。并定翌早就离开五云山。

非常凑巧，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更巧的是朝阳学院的朋友闵刚候，又派了滑竿来接我去歇马场分院吃午饭，于是，我叫了滑竿抬了我唯一的一只箱子，离开五云山，先到朝阳学院。午饭后闵告诉我王昆仑兄适由重庆回到歇马场家中，我觉得去和他谈谈也很好，这一晚我就睡在昆仑家里。翌早我离开歇马场到北碚，转赴育才学校看我的次女，告诉她我已离五云山拟去重庆，在育才学校住了两天，直到六月底我才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始明白我之被释，实在是叨了国民参政会要开会的光。七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又要开会，共产党已决定了不出席，民主同盟不出席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把我放了出来，以示争取。因为我是民盟黄炎培等前次在参政会上质问过下落的人，放我出来，可以表示他们已在开始尊重人权。这真是太侥幸了——。

因为到重庆没有房子住，在朋友家东宿一宵，西住一夜，所以到了七月三日，我才去看汤如炎要我去看的黄少谷。闲谈一阵

之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汤如炎叫我来看他，那是什么意思？黄说，汤在不久前到他家来过，告诉他梁寒操、成舍我和他要保释我的事，已可办到了。希望我出来之后，由他替我打算一下工作问题。我就追问他：

“所谓替我打算工作问题，怎样打算呢？”

“他们的意思是你出来后，一定还是要参加新闻工作，那么不论在我办的《扫荡报》，或者在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内工作都好。最好，当然还是在我的《扫荡报》里面。”

我到此完全明白了汤如炎叫我来看他的意思，我就向他说：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们都是老朋友，我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作官。许多老友都或富或贵了，只有我仍还在作一个清寒的记者，我是一点不艳羡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收获，我也有我的收获。——那就是我还保留着我的气节，我所希望于老朋友的，也就是不勉强我放弃我自珍的敝帚。”

黄听了这话之后没有再开口。接着我又向他说明，我知道训导团曾用信答复过他们，说一时还不能释放。这次突然开释了我，而仍把这笔帐记在他们三人的名下，实在有点赖上来的意味。何况行政院有过“不许乱抓人，更不许在释放抓来的人时勉强人家找保”的通令。所以他们三个人联名要求保释我，我虽然非常感谢，可是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弄明白，这次我出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担保。因为我不愿意在将来牵连到他们三个人。

黄听了我的话之后笑了，他说：

“你不要太书呆子了吧！难道你有一天再反对政府时，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那绝不会的！不过你今后打算怎么样，我们一

些朋友却是很关心……”

我乘此时机就告诉了他，目前我除了两个女儿之外，已无家室之累。孑然一身，倒也觉得很轻松畅快。

我肩上还有的责任就是教养这两个孩子。小的孩子收养在育才学校已可放心，现在仍不放心的是在昆明的大女儿的情况，所以我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要去昆明。

“他们所怕的也就是这件事了，他们就是不喜欢你去昆明！”黄立即插入了这么一句。我心里也明白，黄这话是真的。因为当时的昆明还在龙云控制下，配合上西南联大要求民主的教授、学生也在那里，遂成为大后方主要的民主运动基地之一。这种地方当然他们不会赞同我去，但这是存在于幕后的事实，而非他们所愿公开讲的，黄这样说已算很坦率了。所以我也立即很坦率地说：

“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阻止我去昆明找我长女。过去他们不履行诺言，使我的孩子吃了无数的苦。今天说已恢复了 my 自由，怎么还干涉我去昆明探视孩子的行动？他们所怕的就是我留在昆明不回重庆，那么我向你提供诺言，我一定回来。这样可不可以叫我去呢？”

“那么我就向他们担保许你去昆明，但你一定要回来！”就在这交换条件下我决定了去昆明，并商定我向航空检查所请求允许飞昆的请求书上，由黄来签字作为我的保证人。

和黄这次见面，叫我充分证实了我的看法，我所走出的不过是个小集中营，行动自由的范围，比在营内只稍微宽广一点。但实际上我还是在一个大集中营内，并没有获得一个真正自由的公民所应享有的自由。过去他们用监狱狱卒束缚我，今后他们改为



暗中用特务监视，表面上用朋友的感情来羁靡。我如果稍微怯懦一点就再不要谈什么为民主奋斗了！所以我决定了第一件要作的事是冲破那种友谊的羁靡，在看黄的第二天又去看舍我。目的仍然是声明政府没有权叫我找保。我感谢他和梁、黄写要求保释我的信，但那信曾被拒绝。现在他们放我出来，自与朋友无关，他们并不再负有保证我的责任。舍我是更老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我遂更坦白地告诉他我所听见的，他们说他人国民党的时间短，党龄不够担保我的资格的话。舍我也和少谷一样说了一些话劝我对这些事不要太认真。看了舍我之后再去看梁寒操，我和梁过去交谊极浅，前次写信保我，是少谷拉了他帮忙的。所以在我见少谷时，就先托了他代我致谢，并转达梁，我这次出来他已没有了担保我的责任。我到 he 家里去的那一天，适值他外出，我就留了一个条子给他，说明特来致谢，其余已托少谷转达。

只是这样想解脱感情的羁靡，我感到还是不够，一定还要有公开的坚强的表示，使他们放弃了我是可以用旧朋友感情来束缚的人的思想。恰巧在我被释后的一个月，就到了邹韬奋兄逝世的周年纪念日。朋友们因为想纪念韬奋，又想到了连遇害确实日期都不知道的杜重远兄，因而决定一併纪念。纪念的办法决定为假《新华日报》副刊出一个纪念特刊，并假西南实业大厦开一纪念会。在当时这两件事在重庆作出来都是要震动社会的不算小的事件。因为当时的重庆，在表面上虽已可以侈谈民主，实际上人民却没有一点自由。大家想写文纪念邹、杜这样的朋友，除了《新华日报》而外，就没有其他的刊物可以发表；要开邹、杜纪念会想不叫每人出很高的茶点费借用西南实业大厦，根本就找不到别的地方。甚至开这个会时，要找个适当的年高德劭的主席，便由沈钧

儒先生去找与邹、杜都有深交的莫德惠，他都为了怕事不敢挺身而出。重庆的环境如何，由此当可想见。这时在重庆的每一个朋友都很忙，只有我是才获自由还没有一定工作的人，又和韬奋、重远关系都深，便被举来编辑那个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纪念特刊。我自己考虑了一下，觉得如果我在这特刊上写一篇纪念文字，署上我的真名，实在是一个最好向社会表示态度的办法，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不但如此，在纪念会上，我还讲了几句话。本来我由失踪到复出的事社会上许多人还不大了然，经过纪念邹、杜这个集会之后，至少文化界中人已大半知道我这两年多消声匿迹的原委，并知道我虽经过这种折磨并没有屈服。同时，另一方面的压力当然也跟着来了。少谷叫一个过去是我的学生，当时则在他的《扫荡报》工作的Y来通知我，说汤如炎看见了《新华日报》上我写的那篇纪念邹、杜的文章，想约我吃饭谈一次。这时我已订到了飞昆明的飞机票，决定在八月六日赴昆明，我遂以离渝在即为辞拒绝了这邀请。我说：

“我已答应黄回来，等回重庆后再找汤谈好了。”

八月六日我飞到昆明，李公朴兄为我找了一个药房的楼上作住所，暂时住下来，找我的长女，并带她回到重庆去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到昆明，抗战后由北平南下就留在昆明的许多在大学中教书的朋友，都碰到了。最有趣的是这些老朋友，这时已多半变成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和他们过去在北平就相熟，现在大家在政治上看法又相同，自然往来很多。象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诸兄的寓所，不免时去走走。那时，民盟在联大和云大的几千学生和昆明的工商金融界人士中获得广泛的支持，活动甚为积极。五四的大游行和日本投降后的联大师生“从胜利到和平”的演

讲大会，都是由民盟领导，闻、李、罗诸兄常常在公共集会中出席演讲。我与他们既有来往，自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但是其他在昆明的朋友的地方，我也并不少去。象当时昆明《中央日报》社长钱沧硕，是我在上海《立报》时代的同事；昆明《中央日报》经理吴范寰，是我在北平《世界日报》时期的同事；昆明《扫荡报》社社长李诚毅，我在《北平晚报》时他在《北平实报》工作，也是天天见面的人，所以我到昆明后和他们的来往也颇频繁。不料一天忽然吴范寰拿了一封少谷的来信给我看。那信中讲：据报，我到昆明之后非常活跃。我之到昆明，是负有民主同盟的使命，帮助罗隆基在昆明办理选举民主政团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为是他担保我到昆明来的，所以希望吴能劝我早点离开昆明回重庆。

吴和黄跟我都是十年前北平时代很接近的朋友，所以黄托了吴来劝我。对这件事我并没有和吴分辩什么，我只告诉他，我找长女的工作已办完了。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也准备了就回重庆去，并且已去航空检查所登记，要求准我购票携女飞渝。但是航空检查所至今并未批准，这可以证明并不是我不要回重庆，而是政府不愿意我回重庆。谁也知道，每一地的航检所都掌握在军统局手中，并且当时在昆明航检所的主任也就是过去我未被拘捕前在桂林的航检所主任。他应当知道我。并且我还曾托过一个朋友去昆明向他讲，我答应过少谷必须回渝，希望他能帮忙使我早日成行，都没有结果。少谷怎能怪我不速回渝？

吴依照我的话写了信给少谷，少谷并没有立即写信来。我再托人去催航检所，逼得他们没有了办法，才说出来他们已把我的请求书送去了重庆，重庆没有消息来，他们没有权批准或批驳我的要求。同时我还听到了一种传说，谓他们已得确报，民主政团

同盟订于十月一日起在渝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我之要求回渝，是为了出席那个大会。如果准我飞回重庆，岂不变成帮助了我？所以一时不会准我走。

这时候日寇已经投降，社会间充满了复员的声浪。在重庆的朋友写信来时都喊着要东去京沪，或北去平津，在昆明的朋友也一样恨不能立即离开他们在抗战中已蛰居太久的这个小城。大家的主观理想虽然如此，然而不论在渝在滇的朋友，除非与朝中大官有关系，能够侥幸搭上中央派到各地去接收的交通工具，根本就不能挪动一步。

日寇投降带给中国的胜利实在是太突然了。许多过去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一定是与中国民主的胜利一同实现的人，到这时多半都把主观的愿望当作客观的事实，以为今后的中国政局一定会循着民主的途径前进，不容再有第二条路。倒是我这个久与中国政局脱节的人，反而能够冷静地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我是凭了环绕着我的问题来判断的，如果国民党当局真有诚意实施民主，为什么对于他们已经承认了的民主政团同盟还那么不放心，甚至象我这样一个人都用特务死盯着不放松？民主政团同盟要在重庆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点没有想隐瞒国民党。否则他们很可以不在重庆开而在昆明开。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显然昆明比重庆更有利于民盟。在野的民盟是这样信任在朝的国民党，在朝的国民党对于一个不关重要的要求民主的个别分子都不惜用人力金钱处处刁难，其无诚意自极显然。所以在当时虽然许多朋友都在热心计划回到沿海的大城市时，我却在开始想是不是还是回香港或者还可以有助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因此在航检所用种种方法刁难我，不叫我回到重庆去时，我即在暗中设法找由昆明到香港的交

通。

九月底以前，李公朴、罗隆基等一些昆明的民盟代表分别乘坐汽车赴重庆时，我仍留在昆明，因找不到飞机，所以回不了重庆。事实上如果我真在那个时候想回重庆，我很可以和他们一同乘汽车走，在十月一日之前到达。

但是当时在昆明想找交通到香港也极不易。滇越铁路在云南省内的一段，在抗战中已被拆迁到滇西去改建滇缅路。现在要再拆回来重建滇越路，据工程师计算一拆一修至少需时一年。试问谁能等这条路修好了再走？如果以为滇越路在越南的已在通车，何不就乘汽车由昆明去滇越边境再搭火车。但据说这条公路已被破坏，汽车根本没有办法走，除非不怕跋涉徒步走去，然而到了滇越边境后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搭上火车，却没有人能断言。即使能搭上火车穿过河内到海防，到海防后有没有轮船到香港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经越南赴港的一条路，也可说根本不通。不错，可以由昆明经黔赴桂，经桂省的百色南宁到梧州，再转船到广州转港。虽然还有这么一条路，可是这条路，根本很少商车走，除非搭军车。军车的关系，象我这样的人也不容易找。再说不论乘什么车，除了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保护的车辆而外，大半都有在未出滇境之前被所谓土匪掠劫了的危险。这些所谓土匪，就是滇省因生活不下去不能不铤而走险的老百姓。他们因为头脑很简单，所以一向认为他们所受到的痛苦，都是外省人给他们带来的。外省人因为比滇人认识进步，赤手空拳到昆明，混一两年便发了财的的确不算少。所以滇省老百姓就普遍产生了一种嫉视外省人的心理。依据这心理在所谓土匪群中就产生了一种不成文的宣言，就是：“你们这些外省人，抗战中在我们云南已享够了福，

现在胜利到来你们要回家了，对不起请把你们在我们这里发的财给我们留下。”我虽然没有钱，并且是同情他们的外省人。可是万一遇到这样的掠劫时，我却没有办法可以向他们说明我跟一般外省人有什么不同？何况这条路是那么遥远，如果在滇省内被劫，没有了钱，路却还有十分之八九，怎么能再走下去？岂不是除了仍回昆明外便没有第二条路！我筹一笔去香港的旅费实在不容易，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机会可能把旅费失掉还走不成功，这种险我就不大想冒了。

除了上述的道路外，要由昆明到香港，自然只剩下乘飞机的一途。然而民航机这时还未通航，军用机虽有，可是非军人又非中国政府官吏的我，也没有资格搭乘。所以研究来研究去，到香港这条路也是走不通。再加上我还有一点顾虑，就是我答应过少谷回重庆那句诺言，我实在不愿意对他失信。因此，心里虽想到香港，实际上却留在昆明混过了不少日子。

不料突然间又来了一个新的意外，那就是十月三日，中央军委决心以武力推翻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权的战争在昆明爆发了。

那天正是我才搬到罗隆基兄昆明寓所的第三天。因为他们赴渝开会家里没有一个人，我则流浪在昆明，不知还要住多久。为了对他的家有些照应，也为了节省我的开销，我们作了这样的决定。谁也没想到结果是反而为我找来了不少新的麻烦。

三号清晨我被罗家的女仆喊醒，说是外面枪炮声已响了几个钟头。我起初还不相信以为是放爆竹，仔细听辨，才知道果然是枪炮声，并且就在昆明市内。

从三号昆明事变发生，到六号事变解决，这四天中我曾经历了不少惊险场面。为了买不到米，只好在枪林弹雨中穿过几条街

到朋友家里去吃饭；因为听说战事已停而走出来，突然双方又开起火来，被逼强躲进在火线中的老百姓的家中，也有过两三次。

日本投降之后，当龙云决定把他的军队调到越南去受降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有人抱着一种隐忧，以为云南空虚之后，恐怕中央军就要动手夺取政权。那时我还说他们有点杞人忧天，我以为国民党政府，总不好意思在抗战方停之际，就在国内搞“苦迭打”的把戏。没有想到，他们真就不顾国际视听，这样搞了起来。

四号趁日间战事暂停的间隙，我想去看看李公朴夫人。因为公朴不在昆明，不知道她那里昨夜情形如何。走到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西墙外，我看见华山西路的街心，还泛着一片人血构成的小渠，在街心也还抛有美国制的钢盔皮带。这些现实的景象叫我更深信民主和平不是轻易可以获致的了。

事变在宋子文偕龙云飞渝的把戏下结束后，我去联大，又听到许多朋友告诉我，在事变中他们看到当时驻在昆明的美军的行动。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军在昆明事变中的态度是袒护“中央军”的。他们指出来美军曾为“中央军”运输弹药，他们在昆明城外西南和东南郊布防，名义是保护巫家坝机场和美军的驻在地，事实上也等于帮助“中央军”。更显明的则是滇军被“中央军”由正谊路逐回。提到华山南路的一战，有许多人都讲那是由美国坦克作的先导。

我到昆明之后和在昆明所遇到的许多美国军人甚至新闻记者都对龙云存着一种反感。当我告诉一些记者就说龙云态度是比较倾向民主那一面时，他们都有点惊讶。不知道为什么龙云在他们

的心目中会这样坏。仔细研究一下后，我才明白了那完全是因为龙云手下缺乏好的外交人才，更没有具体的应付美国的外交手腕，在外交战斗中先被“中央”把他打败了。再加上有几次美军的汽车和军用物资，在昆明被穿军装的人掠夺了去，据说那些人所穿的军装和滇军完全一样。但据滇方的朋友说，那实在是一些特务伪装滇军干出来的事，嫁祸给滇军。但是滇当局也没有运用外交技术在这种问题上先把自己洗刷干净。于是造成美军自上至下普遍不满滇省当局的情绪。是以遇到昆明事变，使“中央军”在精神上先获得了美军的支持，更不讲幕后的其他把戏了。

其实，就是在昆明事变之前，我们也已看出来美军当局在积极地帮助“中央军”的许多事实。日本投降后，美军就用飞机载着“中央军”借受降之名，飞向大都市，本来没有“中央军”的地方遂都有了“中央军”。也就为此加强了“中央军”和中共军打内战的因素。依照日本投降时在中国版图内军队的散布情形来看，“中央军”是远隔在中共军的后面的。如果没有美军用飞机和军舰帮助运输，“中央军”决不可能跳过中共军去负担什么受降、接收工作。美军这样帮助“中央军”真的单纯是为了叫他们去受降么？谁也明白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主旨是在支持国民党当局，为了把中国建为美国的反苏基地，也为了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控制。

不过美国的这些工作都是在他们高喊着要在中国促成包括中共及其他党派的联合政府口号下进行的。所以他们一面虽在全中国各地区已造成了内战的因素，但在重庆他们的外交人员却似乎真在那里为求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努力。正因为美国的计划是这样的，所以在中国表现出来的遂是一面有蒋介石、毛泽东的会谈，一面却有昆明用流血手段夺取政权的“苦迭打”演出，好象



这两件事可以并行不悖。——自然真正明眼的人到此已能看到“民主”在中国将仍是一个遥远的梦，而内战却已逼在眉睫了。

是以经过了那四天的昆明事变之后，我就更坚强地决定了，不回离开八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惦记着的上海；也不回离开了十一年以上的我的第二故乡北平；一定先到我虽已到过三次，但始终感觉陌生的香港。不过到香港之心更坚定这点，也并不能有助于我到香港的交通问题的解决。昆明经过的战争虽只有四天，然而，昆明的改变却太大了。云南人都很明白，这四天的战争，只是云南一切都要改变的序幕，以后还有无穷的事变要跟踪而来。骁悍的已在喊他们今后只有“上山”的一途，懦怯的也知道他们今后将饱尝他人的践踏，为求避祸，最好是少出大门。这种看法并不单纯是云南人的幻想，事实也在证明云南已不再是云南人的乐土。云南已不再是云南人的乐土的时候，对为了云南较有民主气息而想托庇于云南的人们，当然更不会是乐土了。所以许多昆明的朋友都来催我快点走，并逼着我，在未走之前，搬出罗隆基的家，因为他的家，在昆明目标太大。朋友们带着深切爱护心情所提出来的这些意见，我自没有反对的理由，可是没有交通我怎么能走！

昆明战事停了，但昆明仍然是一个被切断了一切交通的孤立的城。仅有的一段火车不通了。公路局的汽车停开了，不要说去香港，连去重庆也去不成。不过当时也还有一条路，即靠了航空，昆明和重庆间还有着联络。如果说走，我只好放弃赴香港的计划改为找飞机回重庆。在朋友们的回重庆也比留在昆明好的劝告下，我终于在十月九日早晨又跑到昆明的中航公司去询问，看有没有万一的希望，可以叫我搭回重庆的飞机。出人意料之外的，

这次我竟听到了“可以”两个字。

“如果你真想走，两小时后你就要到公司来，下午二时有飞机起飞。——你到底走不走呢？”

“当然走，两小时后我一定带了行李来！”

我的回重庆，就这样决定了。趁着在昆明的最后两小时，到联大去看了一下闻一多、吴晗两兄，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一别便和一多、吴晗都成了永诀。

我明白我所以能够获准乘机回渝是因为在渝举行的民主政团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将闭幕，也因为战事甫停，昆明商人都在观望，再没有什么人肯用巨金贿赂特务和航空公司争着乘机离昆了。

带着血腥的记忆回到重庆，我非常诧异地发觉大家都很热心地在谈民主、和平，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对这一切成为最好讽刺的现实——昆明事变，大家却好象都不大介意。当然这也为了国民党当局对昆明事变的新闻，封锁得相当成功。然而大家并不是不知道昆明已开始流了血，为什么警惕性还那么低，实在叫我有有点迷惘。我于是一面见到朋友就报告他们在昆明的见闻，一面仍努力觅取能够叫我到香港的门路。第一个希望，自然是由渝直接飞港。如果不可能，则求只要能够叫我到香港，什么交通工具我都愿意搭乘。

为了找交通工具，我托过美国新闻处的朋友，也托过英国新闻处的朋友。有几个美国朋友确曾为我出了不少力，不幸的是美国的军用飞机当局突然在我要走的时候下了普通民众不能搭乘军用机的新令，使他们的努力败于垂成。英国新闻处的朋友则告诉我，他们的RAF飞机一定可以带我到香港。不过他们只飞昆明

香港线，不到重庆，除非我能再由渝赴昆，他便可以担保我由昆飞港。我才由昆明来，又要到昆明去，不只有点滑稽，且万一到了昆明，RAF又不能带我时，我将怎样办？话虽然这样说，基于我所抱的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的决定，我仍然托朋友向重庆航检所去请求了搭中航公司飞机飞昆。不过这次却改用了个假名，找了一个商店担保。因为我准知道，用真名去尝试，更不会有希望。飞机之外，我也找过轮船的机会。这计划是先乘船到上海，再转道赴港。试探一下，才知道这时由渝去沪，不论是订飞机轮船的座位都要行政院批准。我是一个失业的甫释之囚，哪里有资格请求行政院批准我订乘赴沪飞机轮船座位。听说美国新闻处自己包了一只船载他们自己的职员东下，等我去进行时，早已客满，甚至有的真正美国新闻处的职员还挤不上去，怎么能轮到我这个外人。

最后于是我只有考虑搭木船东下到沪转港，或搭公路局汽车经黔桂粤到广州转港这两条路了。走这两条路非常冒险，谁也知道。由川东下的木船中途复舟或被劫的消息，报上不断传来。而且到上海后到底有没有船转港也还没有把握。至于公路局的车子，这时也只能走一段算一段，湘桂粤的公路沿线各地都曾沦陷过很久，公路局也不知道那些公路破坏的程度如何。至于沿途的治安情形，他们却可以肯定地告诉我们，各地盗匪如毛，可能随时被抢。但是我仍托了朋友去进行，有木船赴沪我也走，有公路局汽车去黔湘我也走。

找交通，我在重庆由十月初住到十二月下旬，还是没有眉目。十二月初，我托朋友代我用假姓名向重庆航检所请求批准赴昆被拒的消息传来，更叫我感觉到走出重庆之不易。据说航检所

已由照片上发觉了我是谁，所以不肯批准。这样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如果找到了木船或公路局汽车离渝，他们会不会不让我走！

我从昆明回到重庆就没有去看过黄少谷，少谷也没有找过我。不过我间接地却叫了一个过去的学生去通知过他我已回来，对于他保证我赴昆后一定回渝的公案，至此总算已经了结，这在我心上也卸去了一个负担。不过想到我到昆明去之前，还有汤如炎找我的那件事未了，可能他们还会借此找文章作，那就更会妨害我离渝赴港的计划，所以当时我天天都很焦忧！

不过我应承认我实在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机会总是在很巧地对我有利。那时候重庆面临着侥幸的胜利局面，也一样地感到手足无措。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凌乱，没有办法。当局在军事上虽积极地奔向内战，但在政治上却走着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这种矛盾现象当然也在他们的许多政令中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对我最有利的，就是他们为了在国际视听上获得一些好印象而颁布的取消公路检查命令。在战争中国国民党政府以严防汉奸为名设立的公路检查制度，弄得普通老百姓都没有迁徙的自由，反对政府的政治人物，就更寸步难移。“重庆是一个大集中营”之成为中外爱好民主人士公认的事实，公路检查实是一个主因。由重庆向西北走的第一站青木关，由重庆向东南走的第一站一品场，对争取中国民主的人们是极有名的两道关口。邹韬奋生前在新四军事变后辞去参政员离开重庆赴香港时偷过一品场，曾用了许多心机。沈钧儒为了执行律师业务，拟赴璧山高等法院出庭，在青木关被特务挡住，无论如何不许他通过。这两件事在抗战中的重庆，是一般进步知识分子都很熟知的故事。

所以当取消公路检查命令传来时，我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表示我的庆幸。但是庆幸之后，我立即暗暗责备自己对不一定可信的事寄托希望。国民政府往往是说和做完全两样，所以对公路检查取消的话，我决不应认为完全可信。因而在我准备离渝的工作中，仍然作了些必要的应付公路检查的证件。我具备了充分的证明书，证明我是某大工厂的工程师，奉派到粤去设厂。

在这些手续已办得差不多，旅费也向朋友凑得可以使我成行的时候，又一个好机会叫我凑巧碰到。就是全国公路总局宣布渝梧线的通车。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当时所谓复员交通办得非常之坏，引起了国内外的不满。全国公路总局，为了表示他们的努力，遂调了一些车子开设了几条长途通车的路线，以平息舆论的攻击。也就为此，这条路的通车是才一宣布，即开始举办。普通人民没有想到忽然有这么一条路好走，离渝的准备大都不够，所以一开始时买票的人并不拥挤。因而我在第二次渝梧通车开行的前一天竟能买到了车票。

这一天正好是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已到了重庆，民主同盟参加政协的代表团已组成，各小党派也都在为了应付新的局势而加强自己。胜利到来不久；政协给人们带来实行民主已有可能的信号；新年又来；一切好象充满了希望，大家自不免有些兴奋。当我利用仅有的半天时间去看几个必须在行前话别一下的朋友时，我发觉他们都工作得很紧张，但这种紧张中，却带着一点欣喜的意味。还有一个朋友的家中，恰巧决定那晚破例举行一个并不算小的庆祝圣诞的跳舞会。事前我曾被邀，想象着那里可以遇见不少的朋友。所以我虽因为预备当晚睡在重庆的南岸，以便赶翌早开行的渝梧通车，而在南岸海棠溪一个小旅店中开了一间房间，可是当晚仍由南岸回到重庆

市区中来参加这个跳舞会。

我希望因为出席这个会，使许多人不会相信我在翌早已离了重庆。到了深夜十一点多钟，仅仅能够赶上十一时最后一次过江的轮渡的时间，我才悄悄地离开。知道我翌早要走的周恩来、徐冰同志用汽车送我到储奇门渡口。天上落着牛毛细雨，满地泥泞，又没有路灯，我曾几次几乎跌倒，但终于搭上了最末一次的轮渡。渡过南岸之后，在码头上买了一个火把，在凄风苦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江岸旁的海棠溪街市。回头看重庆，一片雨雾迷蒙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昏暗灯光，想着，我就将这样离开这个中国大集中营——重庆了，自己都辨不出来心上有的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是圣诞节，清早五点半我就到了公路局车站候车，十时半车才开行。我所最担心的一品场检查站，居然在当日下午三时一刻平安地通过。以后经过十八日的旅程，通过黔桂粤三省，我终于到达了香港。

在这十八天旅程中，我仍时时担着心，怕万一不幸中途发生了什么事，会使我功败垂成。所以当我到广州后，连一个在广州的朋友都不改去看，怕因此引起什么意外麻烦。当时港粤间还只有一条广九铁路可以通行，轮船飞机都未恢复，所以广九车拥挤得不得了。除非有熟朋友设法，买火车票便要前一天到中国旅行社门外去排班。但我都未为求方便去找明知道当时在广州且一定可以帮忙我解决问题的朋友，我生平的行动确实从未这样谨慎过。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到香港的当晚住在九龙弥敦道星光酒店里，对面四楼便是邹韬奋兄从前的住屋，后面九龙酒店是杜重远兄离港赴新疆时最后寄居的地方。一切景物都还依旧存在，可是他

封面  
目录  
正文